THE ON-THE-SPOT SERIES OF NEW CHINA

REMAKING WAR CRIMINALS

共和国改造战犯纪实丛书



『黑皮』自白

一个军统上校的反省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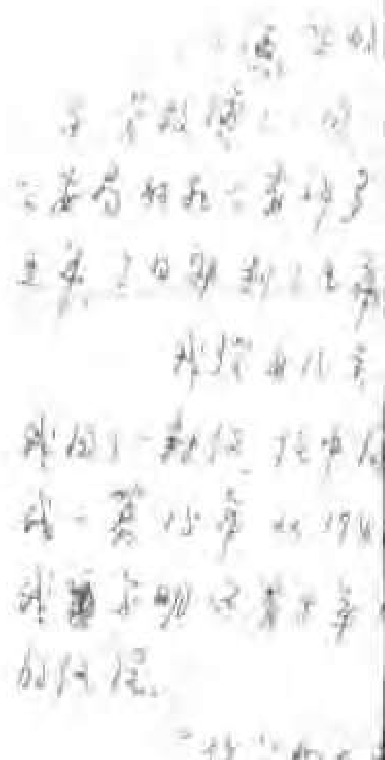
HIS WRITTEN CONFESSION

关梦龄 遗稿

李占恒 整理

解放军出版社





HIS WRITTEN CONFESSIO

“黑皮”自白

——一个军统上校的反省笔记

关梦龄　遗稿
李占恒　整理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皮自白/关梦龄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9
(共和国改造战犯纪实)
ISBN 7-5065-3618-8

Ⅰ. 黑…
Ⅱ. 关…
Ⅲ. ①关梦龄-日记
②战犯-劳动改造-中国-史料
Ⅳ. K825.2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政编码:100035)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125
字数:280千字 印数:1～10500册
定价:20.00元

《共和国改造战犯纪实丛书》编委会

主　编：李云平

副主编：薛一川　李占恒（执行）

编　委：马成翼　刘善兴　王世光



关梦龄，满族，辽宁新宾人，1915年生，出身东北军军官家庭，初中文化。

1934 年在北平电话局当出纳员；1936 年受其兄影响，抵西北参加抗日武装，由士兵干起，升至国民党上校军官，长期供职军统；1945 年"九·三"之后，随戴笠到北平执行肃奸任务，任肃委会总务科长；1947 年出任国民党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督察长；1948 年长春解放，在吉林解放团向我公安机关自首；1953 年经长春市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先关押长春监狱，后集中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1963 年刑满释放，就业于抚顺园林处，作园艺工人；1969 年故去。

关梦龄释放前后，留下一部反省笔记，总结了自己的坎坷人生。

李占恒，汉族，祖籍山东乳山，1944 年出生于黑龙江勃利。1962 年高中毕业即应征入伍。1976 年调沈阳军区政治部从事专业创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在三十余年的军旅生涯中，有 14 年服役于内卫执勤部队，曾作为士兵看押囚犯，后分别担任参谋、营副教导员，指导勤务，因而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反映内卫执勤部队生活，如短篇小说《夜的反省》、中篇报告文学《红房子·黑十字》、长篇纪实文学《冻土禁地》等。

该书是李占恒为关梦龄遗稿进行第二次整理的结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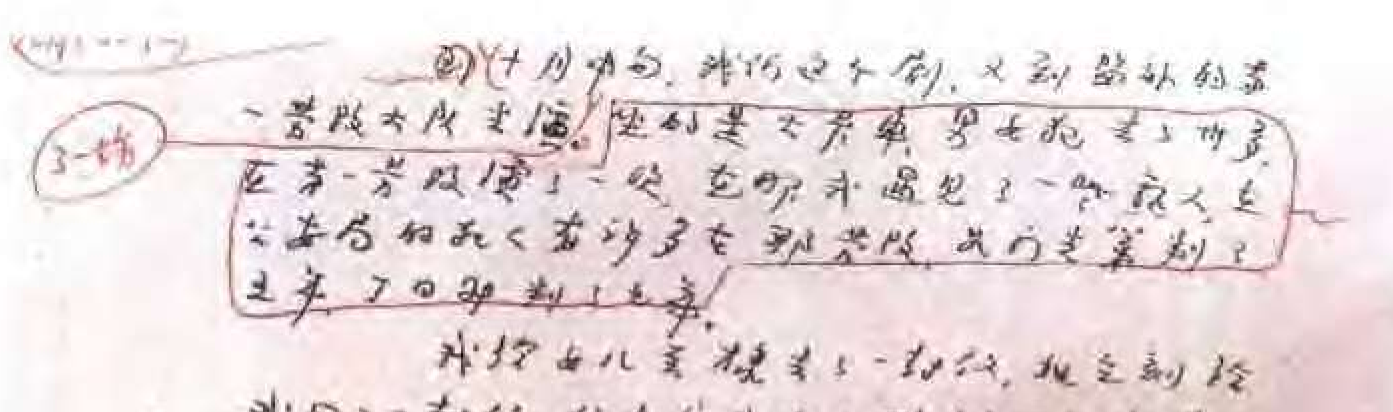




作为国民党军统上校的关梦龄



关梦龄释放前后留下的文稿



关梦龄遗稿局部及李占恒整理手迹

序

韩石山

大约十年前，占恒兄寄来一本书，叫《一个军统上校的自述》，署名是“关梦龄遗稿李占恒整理”。他的意思不外是他出了一本书，让老同学知道一下就行了，他不会想到这本书怎样吸引了我，很快从头到尾就看完了。

我是学历史的，虽说写小说，但阅读的兴趣始终在史书上，关心的是时代的更迭，人世的变迁，尤其是那些历史人物在动荡时局中的命运与心态。和“正面人物”相比较，那些“反面人物”的回忆录和传记更有看头。比如三年解放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的数百万军队，各种战史上都有翔实的记载，而看李宗仁、张治中、杜聿明、黄伯韬等人的回忆录，却有另一番兴味。

相比之下，《一个军统上校的自述》的主角关梦龄的职务是较低的，不过是原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长春督察处的上校督察长，连将官也不是，书中所写，也主要是被捕后在抚顺战犯监狱服刑的经历。但是因为作者记忆力强，文笔好，不光写出了种种事件的详细过程，也写出了他和他的同监犯人思想感情的变化。环境对人的影响，人在困境中的心理变化，都有委婉而曲折的记叙。平和的心态，朴实的文笔，很是增我的好感，甚至令我折服。记得看过全书后，我在给占恒兄的信中曾感慨地说：“多少年后，我们的书也许不会有人看了，而这位关某人不经间留下的文字却会流传下去的。”

原稿较为零乱，占恒兄的整理之功不可没。他是写小说的，这是他的当行本色。

说起来，在此书未出版前，我也是见过原稿的。那是一九八〇

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举办文学讲习所（后来改称鲁迅文学院），我和占恒都去了，我们两人且还分在一个宿舍，同室还住着河北的贾大山，湖北的王承启。课程不多，平日就在宿舍里看书学习。好几次晚上读书时，我都见他在翻看一个黑皮本子，上面密密麻麻的写着钢笔字。问占恒，说是一位战犯的笔记，他要根据这些资料写部改造战犯的长篇小说。

那时候，他常常外出，挺神秘的。一次吴组缃先生来所里给我们讲课，课间休息时，占恒过去递给吴先生一封信，晚上我问他是谁的信，他说是国民党长春市长尚传道给吴先生的。原来他前一天去采访尚传道，说是吴先生要来给我们讲课，尚传道与吴先生有私交，便托他给吴先生带了一封信。看来他是不满足那个黑皮本提供的东西，还要搜集更多的材料，以便写好那部改造战犯的长篇小说。

按说，有关梦龄的笔记，这部长篇小说是不难完成的。

面最后，他完成的不是自己的小说，面是将关梦龄的遗稿整理出版。不是没这个能力，是他的心眼太好了。在该书的后记中，他说了自己改变初衷的原委——

>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人的基本品质里有一个“大公无私”，我不认为以关梦龄为模特儿写小说不“公”，但是比较起来，将他的遗稿整理发表，其“公”的蕴含不是更博大一些吗？

这话说的太好了。一个作家，谁不希望自己有部好作品传之后世，尤其是这样的机遇就在眼前，就在手边。然而，还有什么比一个人的良知更重要的呢？据此写成小说，不管写得多好，总是埋没了他人的才智与心血，而将之整理成书并联系出版，既可保存史料的完整，又对得起死者的在天之灵。

占恒兄的此举，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不仅如此，为了保证关梦龄的女儿能有这部书的继承权，他亲自由沈阳去徐州，为她办了公证手续。正是因为这些功德吧，关的女儿一家与他一家至今还保持着深厚的情谊，常来常往，如同远方的亲戚。

现在这部书稿，经过占恒再一次加工、修订，改名为《黑皮自白》，又要列入解放军出版社的《共和国改造战犯纪实丛书》出版了。我为占恒兄高兴，虽说他仅是位整理者，但这不是平常的整理，可以说没有他当年的经心寻找，这部书稿早就散失了，没有他后来的整理，就没有这部书稿的今天。

关梦龄是在文化革命中，万念俱灭之后沉湖而死的。从这一点上说，他没有逢上一个好的时代，在他不该死的时候死了。若从他的书稿终于在去世多少年后出版这一点上说，他又是幸运的，因为他逢上了李占恒这样一个好人，这样一个好作家。

我愿意更多的人读到这部书稿，看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值得一读。

1998 年 12 月 14 日于潺湲室

前　言

我有一段看押战犯的历史。那是1969年至1975年，我所在的团队由黑龙江调至辽宁，在新的内卫勤务里，有一个勤务是担任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外围警戒。我先是团政治处的干事，后来提升为营副教导员。我这个营所属的一个连队负责看押战犯，按内卫执勤规定，使用兵力单位提供兵舍，我所在营的营部便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住宅楼里。于是我近距离地接触了战犯管理所，近距离地接触了战争罪犯。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大名早有耳闻，她成功地改造了日本战犯，她使末代皇帝溥仪在这里获得新生……我到这里时，日本战犯已经全部获释回国了，尚关押在大墙里的是国民党战犯和伪满战犯。著名人物有国民党首要战犯、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

我把这一段生活视之为军旅生涯中的得意之笔。当了作家之后，每每在做创作规划时，都要打她的主意。

1979年，在意大利人贝尔托卢齐尚未着手《末代皇帝》的创作时，我看到溥仪是个人物，是个可以入戏的角色，于是邀同室作家宫魁斌一起来到溥仪的"再生之地"。我俩住在没有战犯的监舍里，聆听金源所长的往事回忆。当创作激情沸腾起来的时候，金源无意中透露《我的前半生》的责任编辑李文达已着手改编电影！像一桶凉水兜头浇将下来，我俩的心全凉了。虽然采访还在继续，但是外

延已经扩大了，宫魁斌对改造日本战犯发生了兴趣，我则无界定地张开了大网……这个时候尚有我熟悉的干部战士在这里执勤，我在造访他们时，发现他们在争相传看一本镶黑纸皮儿的书。虽然那个时候舆论对诸如《第二次握手》等手抄本做了肯定，但我还是把它视之为"民间文艺"，而不予问津。无奈大家极力向我推荐，出于礼貌与好奇我便翻开了那黑纸皮，在那业已泛黄的纸页上徜徉起来……

这是一个叫关梦龄的战犯的"改造十五年的回忆"。在长达七百余页的文稿里，关梦龄展示了世人陌生的生活，追溯了悲剧人生的根脉，自画了一个历史失意者的形象。

关梦龄，满族，辽宁省新宾县人，1915 年生。父亲是东北军的空军军官，长兄是抗日义勇军的团长。自己参加一段抗日，后加入军统组织。"九·三"胜利后，作为国民党的接收人员随军统头子戴笠赴北平，戴笠任肃奸委员会主任，关梦龄任戴笠手下的总务科长；1947 年，关梦龄出任国民党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督察长，军衔上校；1948 年长春解放，关梦龄在我吉林解放团自首；1953 年长春人民法院判处关梦龄十五年徒刑，关梦龄先服刑长春监狱，后集中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文稿为关梦龄亲笔，写作于 1963 年释放前后。

战争罪犯并不是以参加战争而获罪，是以战争中是否犯有战争罪而定罪。关梦龄是犯了战争罪的。根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战争犯罪有三种：一是破坏和平罪；二是战争罪；三是违反人道罪。头条多为决定战争政策的人，列为甲级战犯；触犯后两条的列为乙、丙级战犯。关梦龄后两条都犯了，并且相当严重。

关梦龄供职于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亦称保密局长春督察处。这个机关权力无边无沿：对上，监视军调处的中共代表，坐探、"警卫"、跟踪，有言必窃，有字必拾；对下，至"儿童团"一律惩治，以至 15 岁的少年口袋里装有 8 颗豆子，也以八路军的"探子"对待，

予以逮捕、关押、处死；对外，大批捕杀我地工人员和平民百姓；对内，涉嫌的国民党党棍、参议员、富商，以至郑洞国的秘书一律敲诈、刑讯、密裁……关梦龄是督察处的督察长，他管辖的督察室是督察处的核心，外勤行动的指挥部门，按行动程序，只有督察长批准才能实施逮捕，才能对人犯进行处置。我法院虽然以“协助督察处长张国卿杀害 40 多人，收集我第六纵队机要文件三百页”量刑，但是关梦龄的罪行远不止此，关梦龄在书中多处写到自己的“余罪”，仅 1948 年 6 月 3 日关梦龄便亲自指挥处决 14 名“政治犯”；在曾泽生将军率部起义，新七军是战、是和尚未拿定主意的时候，关梦龄在新七军决策会议前鼓动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绝不能放下武器，你们对共产党的情况知道得太少，真的放下武器，你们有后悔的日子，现在往沈阳突围，空军一定接应！”……

作为关梦龄这样一个犯有严重战争罪的人，一般的争取不可能不死，中等的争取也不会量以轻刑，关梦龄争取得相当不错，为人民立了大功，所以以功抵过，只判 15 年徒刑。功在哪里？书里有记载，我提示有四：一揭发检举了大量反革命分子，为社会稳定作了贡献；二编写军统手册，为我年轻的公安人员提供了业务教材；三协助我鉴别了狱中的好人、坏人，包括对美蒋派遣特务的识别；四为我历次政治运动所涉及的人员（多为领导干部）提供了证词，帮助我清理了阶级队伍；以至还有为我反特电影作业务“顾问”等等有益于新社会的事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关梦龄的服务质量是上乘的，没有虚假，没有邀功请赏，没有制造冤假错案，所以政府决意在他身上兑现政策，叫他不死。人民也能接受这个判决，1979 年长春公安局的一个管理档案的老大姐对我说：“关梦龄，功劳大啊！”老大姐年轻时就接触了关梦龄的案子，她的一声感叹是由衷的，是有历史厚重感的。

那么作为一个反动中坚，关梦龄何以那么果断，那么迅速地弃暗投明呢？从认识论讲，知黑暗才识光明，是可以解释关梦龄的抉择的。作为国民党的高级特务，关梦龄较之一般国民党人，距政治

中心，权力中心近了许多，因此种种光环，种种诱惑，对他都不具有吸引力，相反，他较一般国民党人，更感知国民党及国民党营造的那个社会的黑暗，尤知自己就是一个制造黑暗的人。于是在战争失败，人心背离的情势下，他走出了黑暗的营垒，黑暗的社会，黑暗的心理，奔向了光明——投向人民的营垒。投向人民的营垒还不算完，还有一个与光明世界融合的问题，关梦龄在主动与被动之中，经阳光照耀，受雨露滋润，良心慢慢得以复苏。这部文稿记述了这一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这一特定人物从特殊经历中的特别体验，使本书具有了一本好书所必备的丰富的内涵：有认识作用，有教育作用，有启迪作用，又因了文字的流畅、语言的幽默、细节的绝妙、情感的真实，而具有了审美价值。

何以达到这个水准？除关梦龄的文字功力以外，我以为与同类作品的写作主体相比，关梦龄写此稿与他们有三个显著的不同，那便是关梦龄写作时，一是正当中年，完稿之日，年仅48岁，往事如初，历历在目；二是非遵命所作，自己命笔，自白于纸上，不媚俗，不迎合，不必主题先行；三是并非为了成书发表，而是自传、自省、自娱，因此事亦真，情亦真，理亦真，有了“真实”这两个字，今天看起来有价值，今后看它还有价值。

我之整理，是而对两大本虽整齐，但有残缺的文稿及书写虽然工整，却无章节的七百页文字。这就需要我做一些必要的考证及些许的填补，然后打出章节来，有了章节就要取名，就要有中心，于是就要在保持原稿风格的前提下，对文字进行疏密处理，对情节进行取舍剪裁。余之我没有做什么。

我想创造一个佳话，那就是，一个国民党战犯的遗稿，由当年看押战犯，后来成为作家的人民解放军军官整理出版。仅此而已。

整理完文稿，我又恢复了它的原貌——两本镶着黑皮的文稿摆在我的面前。陡地，黑皮儿上的两行金字跳人我的眼帘：“罪犯在押期间思想表现材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战犯管理所”。虽然这是借具包装，但黑皮儿上的金字却提醒我文稿写作的背景与

因由，是一个在押战犯在大墙里面书写的反省笔记。于是我想，何不以此取书的名字：

黑皮自白。

李占恒

1998年5月30日于沈阳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败兵之将 …… (1)

生日，灯罩炸了 …… (1)

缴枪，掉下了眼泪 …… (7)

一个人在院中徘徊 …… (12)

平安胡同新新旅馆 …… (19)

“找人” …… (30)

要老实做人 …… (35)

第二章　该杀当死 …… (44)

被服线与纸条儿 …… (44)

少一个负担，多一个顾虑 …… (49)

锒铛脚镣 …… (54)

电影“顾问” …… (63)

尝到了犯人的滋味儿 …… (68)

采纳了我的建议 …… (73)

戴笠二三事 …… (76)

血债血还，杀人偿命 …… (81)

写材料，一个接一个 …… (89)

我一定争取 …… (95)

伊通小住 …… (101)

顽固者 …… (106)

第三章 网开一面 ………………………… (112)
大逮捕 ………………………………… (112)
大镇压 ………………………………… (120)
敬服 …………………………………… (126)
还有什么希望呢？ …………………… (133)

第四章 樊篱偷生 ………………………… (142)
急于判刑 ……………………………… (142)
降到黄牌，降到蓝牌 ………………… (153)
又戴镣铐 ……………………………… (160)
35 项缺点 ……………………………… (167)

第五章 目的不明 ………………………… (177)
洗掉背上的大字 ……………………… (177)
看了许多实在的东西 ………………… (182)
想入非非 ……………………………… (187)
沈阳寄押 ……………………………… (191)

第六章 感恩戴德 ………………………… (199)
帝封官在这里集合 …………………… (199)
自找麻烦 ……………………………… (204)
像在朋友家中做客 …………………… (212)
“战犯”帽子有点大 …………………… (218)
金木水火土 …………………………… (223)
不是事先布置的 ……………………… (229)
谢罪 …………………………………… (234)
无颜见长春父老 ……………………… (242)

第七章　监门微启 …………………………… (252)
越来越紧 ………………………………… (252)
交罪种种 ………………………………… (256)
人人呈请处死 ……………………………… (264)
大家所关心的 ……………………………… (268)
帝封官同堂谈罪 …………………………… (273)
是非是能够分辨的 ………………………… (277)
才放10个 ………………………………… (281)

第八章　犹有竟时 …………………………… (288)
黄金时代 ………………………………… (288)
小关师傅 ………………………………… (294)
"混蛋"这两个字重了 ……………………… (298)
谁吃豆腐？谁吃豆腐渣？ ………………… (303)
穷欢乐 …………………………………… (309)
欣慰 ……………………………………… (313)
病的包袱 ………………………………… (317)
第三个特赦令 ……………………………… (323)

后　记

第一章　败兵之将

生日，灯罩炸了

1948年秋天，长春城内一片混乱，被围困的十万国民党军队仅靠微少的空投粮食活命，老百姓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大街小巷每天都有饿死的人，关内的报纸说长春成立了“埋尸委员会”。一天，督察处逮捕了一个叫王万富的木匠，他的老婆孩子都被饿死了，他饿得没有办法，就到市场上去诳骗那些饥饿的孩子，把十一二岁的孩子骗到家，用斧子把小孩砍了，把身上的肉割下来拿到街上顶马肉卖，卖了钱，买高粱米。这样的事，我不但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什么“民不聊生”啊，“饿殍载道”等等都不足形容当时长春饿死十来万人的凄惨景象。守在长春的部队计有新7军和60军，加上吉林保安旅、骑2旅和警察总队等。这些部队的士兵饿得东倒西歪，不成样子；军官们依然如故，吃得脑满肠肥，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躺在白骨堆上享乐。

长春守军没有力量出击，期望辽西战役打好，能有援军到长春解围。蒋介石给郑洞国的电报指示：“固守待援，相机出击”。待援

是可以的，出击则办不到。士兵把长春当成“坟墓”，军官揶揄自己已成了“瓮中之鳖”。

这种情况下，我在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①]工作已没有什么劲头，加上我与处长张国卿还有一些私人意见，9月，我就离开了督察长的职务。随即，保密局长春站[②]站长项迺光保我为“军事联络组”组长。当然，南京保密局不会不准的。这个“军事联络组”是为控制袁晓轩一支两三万人的“吉黑地区人民义勇队”的武装特务而成立的，一个少将组长，四个中校组员，还有一部电台。由2月到9月，这支特务武装便垮台了。我这个组长已没有工作可做，只担个名领几个薪水和给养而已。

离了督察处，我是“无官一身轻”。每天自在逍遥，整天吃喝玩乐。虽然饿死了无数的老百姓，可是我的生活还保持正常。我的习惯，不吃大米，不吃豆油，每天仍然吃最好的美国面粉、猪油，或者芝麻油，鸡、肉不断，一些小特务给我到处搞吃的。我在外边也有一些应酬，所到之处也都是大酒大肉。除了吃就是嫖。找女人跳舞，没有大型舞会，就组织家庭小舞会，轮流在各个“公馆”举行。这个太太，那个小姐，乱七八糟，自己倚恃有高粱米可以作为玩弄女人的诱饵，这时我的生活毫无拘束，心想：反正快完蛋了，八路军一来，一切都不属于我，为什么不得乐且乐呢？

北平家中接二连三的来电报催我速回，二老婆郭依平给我来电报说：“老太爷叫你赶快回来，再不回来，就是不孝。不然，我就到长春去找你……”一些朋友从北平、天津都来信问候，望我早日离开长春这个危险地区。从关内寄到长春的信是空投的，长春往外寄信是寄不走的，只有用电台发电报，我利用空军的电台发这些私人电报。特务电台不能随便乱用。我回电报告诉他们：长春四面被围，飞机场已被八路军炮火控制，不能起落飞机，只要有飞机我就走。这是项迺光与我说定了的。

9月中旬以后，各地战况非常不好，天天是打败仗的消息，不是这个地方丢啦，就是那个县叫八路给占了。消息来源收音机，还

有沈阳“东北剿总”的通报。南京保密局也给长春站来了电报，指示：能潜伏的立即潜伏，不能潜伏的向沈阳疏散或到北平集中。9月底，我与项迺光商量，我要化装经四平去沈阳。项迺光说：“你走，我先向南京局本部请示，我不能同意你经过四平，你忘了，南忠信（长春警察三分局局长）到了四平，来信不是说得很清楚嘛，公主岭及四平等地的八路军卡哨都询问你的行迹。由此可见，八路军要抓你，你还自己送上门去了。”

我一想，这么走的确危险，认识我的人很多，比如5月20日在长春召开的军民大会，庆祝蒋介石就任总统，有六七万军民参加，我是这个大会的警卫组组长。我站在大会门前的警卫车上，虽然穿着便衣，却也暴露了身份。警察局副局长李贺民会后对我说：“你还怕八路不认识你，站在汽车上自己贴布告呢！”

长春如果失守了怎么办？我与项迺光研究，第一是随军向沈阳突围，项迺光对我说：“长春到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掌握三个部队：新7军的38师，60军的52师和吉林师管区，这三个部队的部队长陈鸣人、李嵩、李寓春都与我说好了，并且我已经给南京打了电报，毛先生（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回电说已转报给大总统。这三个部队可以与咱们一致行动。”我说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第二步就是化装潜逃。这虽然是下策，但也不能不准备。项迺光同意并准备逃跑的东西：先在市内照了二寸便衣小像片，我、项迺光、张国卿（督察处处长）、袁士举（保密局长春站副站长）、马绍周（市政府政工大队长）、袁晓轩等人都在督察处院内照的。像片照好之后，派人到长春市各区公所起了国民身份证，都用化名，我化名“吴国栋”，商人。又派上尉参谋孙万斌弄来六张路条，我给了他一两黄金。我又叫医生给我弄了一些吗啡、疲乏崩，我吸食鸦片，唯恐途中不能吸食。

有一天，我到督察处去看看。接我工作的陈牧对我说：“现在，没有什么案子可办了，政治案件都处理完了，看守所押的几十个人都是刑事犯。外边有人说，八路军就恨督察处，督察处就是关督察

长和两个陈主任，一个是我，一个是陈寿岚。这话也不假，咱们过去怎么抓人家，审人家，杀人家，将来人家如法炮制。所以有政治犯还要抓，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对呀，能杀就杀呀！宁可自杀，也不叫他杀。”我又接着说，“咱们手中连自杀的东西都没有，真被八路抓去，死不了活不了有罪受。应该预备毒药棉花，必要时往嘴里一放，完啦，省得遭罪。1945年光复，在汉口抓了一个日本战犯，少将级的军官，押在咱们的看守所，入所之时，没有认真检查，他带了一块毒药棉花，什么口供也没有就自杀了。老板(军统特务对戴笠的称呼)当时在北平发了一顿脾气，说这个看守长无能。”

“这个日本战犯把毒药棉花放在哪里啦？”陈牧问。

我告诉他：“放在军衣贴边儿，没法查出来。后来，我在北京担任肃奸委员会的总务科长，我对看守所所长说：‘抓来的八路和日本战犯一进所就要把衣服脱光，另给他们一套囚服，如果再不放心，叫他们先洗个澡。’这样什么事也没出过。”

没有几天，沈阳“东北剿总”二处处长郑兆一给我和张国卿来了一个电报，说要在长春布置潜伏组，原来的方学儒那个组已暴露身份，无法潜伏。求我们在长春给物色个组长人选。我找了徐克成，他是伪满的秘书官，后来又为我们做过情报工作。当时在长春赋闲，他的家在长春，长春的社会关系多。他愿意干。我与张国卿便给郑兆一回了一个电报，把徐克成介绍给他。10月初，由沈阳用飞机给徐克成这个潜伏组空投了干电池、密电本等，并由我代向长春后勤第16支部给徐克成领了半年的经费，半年的粮食。

同时，保密局长春站也布置了潜伏组，组长吴殷强，他年龄大，稳重，在七马路开了一个粮米加工厂，扮作商人，很像。

进入10月，形势恶化，项迺光找我去商谈随军队突围的事情，他说：“为了将来行动便利，把站上的人编成组，你、我、袁士举、袁晓轩、马绍周、李友濂编在一个组，其余的人编五个组，每组10个或15个人。这样行动起来不致紊乱。”

对于这些事情，我没有意见。

为了便于紧急行动，督察处的内外勤人员都命令搬到处内住。我内心并不紧张，听说蒋介石到沈阳亲自布置一切，我认为最近可以安然无事。我每天接触的新7军的军官们不是跳舞就是打牌。我想："长春有这么多军队，两个军，六个师，上校以上的军官有几百，我怕什么？天塌有大个，过河有矬子，死，大家死一块；逃，大家一起逃，我用不着过分忧虑。"我准备腌酸菜，叫手下的督察给我买一口猪，预备春节吃火锅，过个太平年。

10月14日锦州防线被突破，这个消息传到长春如晴天霹雳，凡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锦州被占，切断了沈山交通，使华北与东北交通断绝，使东北的守军成为瓮中之鳖。东北休矣，长春不待论矣！10月15日，我看见新7军的所有大小汽车、卡车一律试行加油，擦修，似乎要出动的样子。

10月16日是农历九月十四，我33岁的生日。长春金店同业公会理事长魏占元张罗给我祝寿，我说："这个时候可不能过生日，叫外人知道说闲话，如果要聚会聚会，就到我这儿，找几个朋友偷着吃一顿，我请客。"

于是魏占元找来了几个朋友，我叫厨子做了一桌席，鸡鱼海味，应有尽有。不算烟酒饭，花了七八百亿元，算在一起有九百亿元。酒醉饭饱，尽欢而散，午夜我才休息。我刚上床，床头的煤油灯罩炸了，我心中颇不高兴，谁也没碰它，这个灯罩怎么会坏了呢？早不坏，迟不坏，偏在过生日这夜坏！太不吉利。我怀着不愉快的心情入睡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还没有起来，我的表弟苗可成（新7军谍报队队副）到我这，惊慌失措地告诉我："不好了，60军叛变了！长春完蛋了。现在长春分两部分，新7军的防地可以通过，60军的防地不准通过。二哥你快到警备司令部去问问消息吧！"

我匆忙起床拿起电话机想给新7军参谋处打个电话，一拿耳机，没有声音，电话坏了？洗完脸我就到新7军参谋处，参谋处没有

人，几个下级军官什么也不知道，我下楼到卫侍班问李鸿军长的病好了没有？说现在正发高烧，不能说话。我又从新7军军部转到警备司令部参二科吴科长公馆，一进门看到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参谋处长肖豪，副官处长王士旗以及其他一些科长。他们抢先问我："有什么消息没有？""没有，我去新7军没找到一个人。""史副军长和龙参谋长都到兵团去了。"

我问他们看见国防部史高参（史祚炎，国防部二厅长春站少将站长）没有？大家都说没见到。电话打到他的住处，是一个职员接的，他说："史高参昨夜到空军张副官长那去跳舞，回来经过60军防地，60军哨兵问他口令，车子没有停，哨兵开枪，打伤了他的右肩，现在小五马路医院治疗。"

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

我又给督察处张国卿打电话，问他在押的人犯怎么办了？他说："都处理了。"

我告诉他："大势已去赶快走吧，还等什么！"

他说："好，我马上走。"

我回住处一看，简直成了拍卖行，什么皮袄、大衣、棉被、毛毯、西服、留声机……摆了一屋子。这些东西有的是朋友扔下的，有的是我用高粱米换的。一件白狐女大衣一千斤高粱米，一件黑狐女大衣六百斤高粱米，缎子被十来床，这些东西我无心多看。我叫勤务兵把我的日记、信件、电报，凡是有字的东西及所有照片一律焚烧。我把一个水晶的，一个贺兰山石的私章亲自砸碎。在屋内巡视一番，没发现有字的东西。

我匆忙赶到团管区，上楼找到项迺光，他穿一套黄布尉官棉军服，见我就问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不一会儿李寓春（吉林师管区少将司令）、马绍周（市政府政工大队长）、王焕斌（吉林教育厅长）、袁晓轩（保密局长春站军事组长）、袁士举（保密局长春站副站长）都来了。

项迺光对我说："咱们决定突围，你就不要回去了。"

他并且示意袁士举把我监视住，怕我出去泄漏这个机密。袁士举对我说："到那屋吧。"一个大屋几十个人，乱糟糟的。我还想回家看看，再去新 7 军打听打听消息。我趁袁士举不注意带着勤务兵溜了出来。

家里的东西没动，伙夫在那看着。我转了一圈，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对伙夫说："我走了，屋内的东西都给你了。"

缴枪，掉下了眼泪

我从家出来，打算到新 7 军去，一想到那儿也是没有办法，便又回到团管区，决定与项迺光他们突围。

不一会儿天黑了，吃了一碗小米饭，已经上灯了。我们在院子站队走出了团管区的大门。门口停着吉普车和其他车辆，这些车子都是我们乘坐的，司机也跟着突围，汽车没人管了。

月光下，由李寓春领队，向兴安桥哨卡行进。正行进间，正前方一个骑兵直奔我们而来，这一来把我们吓坏了，有的回头便跑，等这个骑兵到了跟前，才知道是新 7 军送公事的传达兵。我们有三百来人，在行进间漫无秩序，这些人是师管区的官兵，有特务、勤务兵、司机、炊事兵，就是缺少战斗兵。夜里 10 点到了宋家洼子保安旅，找到旅长何大刚，告诉他我们要突围。他叫人给我们几个做了一顿稀饭。休息了一会儿，李寓春把人集合起来讲了话："长春十万官兵投敌，我们决不投敌。我们一定要打出去，只要能走出 60 华里，咱们就到了安全地带，大家不要三心二意，只要精诚团结，我有办法。"

从宋家洼子继续向西突围，走了半里地，前面火光四起，枪声不停，我们队伍停了下来。我们当中属袁晓轩胆子小，他说前面必有八路军，前进必要被包围。这样一来，我们又退回到保安旅。在

那过了半夜，睡了一觉。从来没有步行过这么远，感到浑身乏困。

10月18日，天刚见鱼肚白，我们就起床向兴安桥行进。到了兴安桥，项迺光把我叫到一边说："突不出去了，自己想法子吧，咱们谁先到了北京，谁就给局本部发电报，报告今晚突围的经过。本来今年3月我可以叫你回北京，但是我没叫你上飞机，认为局势不致于坏到这种地步。我太相信政府了，结果把你拖住了。好吧，再见，珍重！"他哭我也哭了。

大家都在兴安桥作鸟兽散。一些师管区的官兵无所谓又返回城里。可我们这些特务多了一个心眼，项迺光、袁晓轩、袁士举、马绍周和我谁也不肯先进城，惟恐有人看见行踪，怕将来被人出卖。我一看这形势便对勤务兵使了个眼色："走，咱们到报话局去！"

我领着勤务兵进了城，往东一拐，往西一拐，乱走一阵，看看后面没人跟踪我才安心。

进了城里，我把长发推光，找了一套黑旧呢上衣，黑布夹裤，一顶旧礼帽，看了看，还可以。

上午10点我去新7军，在参谋处李润棠的屋子呆下。他是军部少将副参谋长，与我私交很好。我问他怎么样？他说："李军长在病中，不省人事，一切还没有一定。"他的女朋友赵小姐也搬到这儿，屋内放了几个皮箱。赵小姐说："就在这听信吧，别瞎跑了，听说要往外打，你跟军部一块走吧。"

李润棠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唉声叹气，如热锅上的蚂蚁。我问他郑洞国的动态，他说："郑洞国有什么办法啊？他只身一人，平常称孤道寡，现在谁理他。昨天向他请示，他也束手无策，现在新7军要自己拿主意，等命令已经来不及了。"

我与赵小姐谈谈她家情况，谈谈跳舞。我是故作镇静，心中非常焦躁。赵小姐说："你的太太没到长春有多好啊，一个人真方便，我现在跟着他多累赘。我要走他不让走，真要打出去，我害怕。"

晚饭在饭厅遇到军部的龙国钧参谋长，副军长史说及各处处长。我利用这个机会，尽力鼓励他们突围："绝不能放下武器，你们

对共产党的情况知道的太少，真的放下武器，你们有后悔的日子，现在往沈阳突围，空军一定接应！”

到了半夜，李润棠开完会回来，他说：“三个师长都同意向沈阳突围，打算明晚上就行动，你就在这儿吧。”

19日，情况又变了，长春围城司令员肖劲光派代表与新7军副军长交涉，劝说放下武器，举行和谈。这样一来突围的计划又搁下了。经过解放军的代表与新7军的代表多次面谈，又经过新7军三个师长的同意，决定和谈，李润棠把和谈的条文拿出来给我看。

条约有一二十条，我从头到尾看罢，计上心头，条约第三条写道：新7军尉官遣送吉林，明春送往辽南开垦，不愿参加者听从自便。我决定化装一个尉官，潜到尉官队，先到吉林后到辽南，以后再回北京。

新7军军部的楼下原来是警备司令部的各处办公室，现在各屋都挤满了人，一些太太、少爷也搬到这里，督察处的一些特务也混在里面。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也在这儿。他小声对我说：“你要注意呀，人家有人打听你呢，找一个小屋子躲起来，到晚上溜走吧。”

我心想，有人打听我，就没有人打听你，我的官比你大吗？心中有些不愉快。

晚上李润棠对我说：“方才龙参谋长说，我们已与共军签订了和约，你在咱们这不相当。”

我一听火了，决心离开他们。李润棠说：“你不要走，由我负责。平素是朋友，现在就不是朋友了吗？人情不能这样，胆小如鼠，根本就不是军人！”

20日上午，新7军军部大楼挤满了人，不管哪个部队的官兵，都到这儿来，似乎从这里能得到什么。

我把参谋处管总务的焦副官找来，叫他给我找一套尉官的棉服，他出去不一会儿，拿了一套新棉服，对我说：“您穿吧，不合适再换一套。”

我试了一试，还合适。我把呢子上衣和呢子裤扔在地下，焦副官说："您不要士兵要，他们有许多都穿上了呢子制服，他们不在乎。"

焦副官又把他的一双新皮鞋给了我。

我这样一改装，赵小姐说："像一个排长。"

我们正在楼上换衣服，院中枪响了，猛然间冲进一群八路军，穿着灰棉衣，全身武装，进了警备大门就射击，射击一阵，无人还击，他们将大门把上，接着一些士兵冲进大楼。我在屋中看到这种情况心中不悦，既然放下武器还来这一手干什么？是下马威？

一个班长模样的解放军，后面跟着一个武装士兵，走到我们面前，很客气地说："你们如果有武器，请缴出来，放在一个屋子！"

李润棠说："缴了吧，大炮机关枪都缴了，手枪留着也没用。"我把勤务兵叫来，叫他把身上带的左轮缴了。我的五眼左轮和一个最小的五锋子小枪，是放在口袋里的自卫武器，也都拿出来了。想一想，这些枪多少年来没曾离开过我，于是我掉下了眼泪。失败了，一切都没有了。

我在院中把新7军辎重营营长于新民找来，我对他说："听说辎重营营部缺一个少尉书记，我来顶他。我的名字叫吴国栋，有人问你就承认。如果有人追问就说我因为有病不到营部办公……"于新民都答应了。接着我又问了他营部人员及各连连长的名字。一一记下也是件麻烦事。

晚饭吃的油炸饼，油太多了，我只吃了一张。我到大厨房一看，挤满了士兵，两大锅豆油滚开，许多人把做好了的白面饼放进锅里炸，一边炸，一边吃，一边骂："有的是白面，有的是豆油，就是不发给弟兄，八路不来，这些东西不用说吃，老子看也看不见哪。"

我回头一看，地下洒满了油、白面。这不是吃是糟塌。这是家败人亡的景象。

我遇到了表弟苗可成，他是我姨母的儿子，在1947年11月24日随我一块从沈阳飞到长春的，我保他为新7军谍报队的队

副，后来是组长。这个时候他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随尉官去吉林。于是他就找来了七八个谍报队的组长和组员。

10 月 21 日的早上，李润棠说：“咱们都去吉林，你跟我坐一个车去吧。”

我说：“不能坐车，以免暴露身份。”

上午 10 点，新 7 军的尉官在警备司令部院子集合。焦副官给我一件美国呢子大衣，领子很高，这件衣服对我非常合适。李润棠告别时对我说：“一切保重，要小心谨慎，我认为你是个有办法的人，不会束手无策，吉人天相。再见。”我感到李润棠这个湖南人对我很义气，我把手上一块西马牌手表撸下来送给了赵小姐。

院子里挤满了人，乱吵乱嚷，不像是队伍，仿佛庙会一样。有人喊站队，喊了半天才站了几行队伍，苗可成、陈震寰、李继先，七八个人与我站在一起，他们抬了一箱饼干。从警备司令部院出来，奔空军司令部，七马路督察处……，路两旁站了不少老百姓，我把大衣领高高的立起，把帽檐扣在眼睛上，整个脸外人看不清楚。所谓败兵之将不如丧家之犬，一点也不错。经过督察处时我望了一眼，门口什么也没有，往日的威严一时化为云烟，一切都完了。

下级军官和士兵并不在乎这些。在路边休息时，我看到一个士兵卖自行车，他要一百万元，老百姓给 60 万元（东北流通券），这个士兵说：“你再加五万元就卖给你，这个自行车是新的，65 万元你占了便宜。其实我们的机关枪、大炮都给你们了，还在乎这辆车？拿去，加 5 万也可以，不加也没关系，都是中国人。”只有团长以上的官，才现出特别难过的表情，有的两眼微红，似乎掉了泪，我心想：事已至此，难过也是无益。

每次坐下休息，苗可成他们便坐在我的周围恐怕别人看见我。路上，全是新 7 军的官兵，有坐汽车的，有骑自行车的，有徒步的，秩序紊乱，不成样子。我正往前一步一步地走着，忽然一辆吉普车停在我身旁，我一看是军部陈处长和几个人。他叫我坐车，我坚持不肯，他们又上路了。这样一来，队伍里有人知道我了。我心中非

常不安。

一个人在院中徘徊

火车到吉林车站已经是夜里九点半钟。下车之后，由解放军武装战士押着往解放团走。沿马路都站着岗哨，队伍已没有队形，零零落落。路上遇着一个卖酱肉的，一群官兵围上去，把酱肉抢光了。卖肉的小贩喊起来："你们是干什么的？不是队伍简直是土匪！在长春你们抢人，到吉林还抢人。"解放军战士也没法子，只好对那个小贩说："你走吧，找不到人了。"

走了两个多钟头，到了一个有铁丝网的大院子，说是叫北大营。进院之后，按人数编队，坐在院里等着开饭。到过夜两点饭才煮好，苞米干饭、白菜土豆汤。一点也不好吃。吃饭时，我看见了李济才（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科长，后调充56师中校副官主任）、方学儒（东北剿总二处第三组组长）。李济才的那个日本下女现在成了他的老婆，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他们怕我与他们说话，躲着我，其实我也怕他们招呼我。心想，我是个危险人物呀，都怕我牵连了他们。

吃完饭，又集合。走了许久，天亮时走到了船营中心小学校。解放军战士把着大门。在院里又编队，又分班，又举班长。我们这八九个人，我指定陈震寰为班长，他比较能办事。我们这一队共一百人，十个班，被安置在一个大教室里。教室地下铺着谷草，分成十块、一个班一块。我们这个班在中间一块。我看到墙上有黑板，还有批评与表扬的文字。这里没有大伙房，是由区政府给米，给柴，发动老乡煮饭。晚上吃的是高粱米小豆干饭，炖白菜豆腐，很好吃，颇有家乡风味。

院里有许多送饭老乡，我看无人监视，就与他们谈了起来。先

从东西贵不贵谈起，谈到黄金，国民党、共产党，路条、户口，以至到沈阳好走不好走？最后我问他："明天你还来不？""不一定，我们轮班往这送饭。"我计划利用这个老乡，决定明天进一步做工作。

这是尉官解放团，有一千多人，年龄都在 30 岁以下，很少有 40 岁的。新一军的京剧团，新 7 军的政工队，与我在一个屋子住。这些人小孩子一样的脾气，不是吃就是唱。他们把美式大衣卖了，到街上吃大炖肉。长春吃不到猪肉，吉林的猪肉一万元一斤，便宜。大门站着战士，凡是请假就可以出去。解放团内只有几个干部，忙不过来，许多军官在大门口一挤就出去了。站岗的年轻战士阻拦不住。后来，根本也不请假了，秩序特别乱。

过了不久，解放团成立一个小卖店，卖香烟、麻花、烧饼、花生米、鸡蛋、糖块……应有尽有。据说成立这个小卖店是为了便利投降人员生活需要；另一方面，这个学校作了解放团，损失了很多用具，用小卖店的盈利作为将来补修的费用。担任售货员的都是小学校的男女教员。

解放团内不但有尉官，也有尉官的眷属。有眷属的尉官住在一个大屋子，一个家眷一块地方。这些眷属们不断的吵闹、打架，没有家眷的排连长，到街上买一只鸡、买一斤肉，没有锅，便把头上的钢盔翻过来当锅用。炖鸡炖肉，喝上半斤白酒，酒话就来了。

"当了半辈子军人，从来没有叫人缴过械，这回可好，一枪没放，什么也没看见，全给人家了。真丢人！好歹打几枪，再缴械也是那么个意思，心中难过呀。"

"难过啥？凭这一块，到哪不是当兵？共产党不要咱，咱回家种地。"

10 月 20 日，早晨起床，我到厕所去，无意中遇见了好几个熟人。

"督察长也到这来了？"

"我现在改名吴国栋了，是新七军辎重营的少尉书记，告诉别的朋友，别叫督察长了。"

"好了，好了。"

这样的事一天发生了七八次，我心想糟了，知道的人多了。

晚上，我把陈震寰、李继先、苗可成等人叫到院子，他们都是我从沈阳带到长春的，是可靠的部下，我对他们说："这里不是久居之地，必须尽早作决定。你们没有关系，我要马上离开吉林。你们明天早饭后出去找社会关系。没有社会关系到饭馆、车站找小贩，打听好到沈阳的火车要不要路条？我先到沈阳再转到北京。"我接着指示他们，"吉林有多少部队？警察对户口查的严不严？报户口有什么困难没有？都要打听清楚，在可能内收集一切情况，做到对环境了如指掌。"

陈震寰说："昨天到街上遇见警备司令部一个参谋，原来他在长春，我与他是朋友。明天我找他想办法。"

晚饭后，来了一个矮个的干部，不知什么职务，穿着布棉袄，给我们全体投降的尉官讲话，他说："朋友们！"这个称呼第一次听到，接着他说，"蒋介石那个王八蛋，卖国贼，祸国殃民，把中国统治了二十多年……"一听骂蒋介石，心里不是滋味，胜败军家之常，出口骂人不应该。以后的话我没有很好地听，最后他说："据我们了解，从长春到吉林来的上校以上的军官很多，在这吃住不方便，受委屈。我们准备了招待所，现在只有几个人。不要害怕，我们希望你们到招待所去。"接着他又说，"你们这些人中还有隐藏武器的，希望今天当众缴出来，不加追究。如果不缴，被检查出来，那就不按朋友办，按敌人办了。"

经过一再说服，有十几个人把匕首、手枪缴出来了。

陈震寰他们到街上收集了不少情况，弄路条也不困难；吉林户口也好上；没有队伍在吉林，在吉林的都是地方武装，新入伍的战士；地方治安由吉林警备司令部负责；大街上的军风纪有执法队维持。但是陈震寰认识的那个解放军参谋今天没有见着。

我对陈震寰说："这件事不要进行了，他会把咱们逮捕。自己送上门去，那可是智者所不取也。"

陈震寰问："那怎么找路条？"

我说："咱们找老百姓，花几个钱买一张，这样办比较妥当。"

《吉林日报》发下来了，每队两份。我第一次看到解放区的报纸，报载：辽西战事，解放军逼进沈阳，士气旺盛，势如破竹。我一考虑，锦州解放，沈阳的国民党军队已成瓮中之鳖；长春解放，围长春的第一兵团再开到沈阳，沈阳危矣。东北全部解放，华北也要动荡，这么一来，我到沈阳已无意义。战争的进展比我走的快，我走投无路，徒唤奈何？

李继先从街上回来，对我说："长春的人到吉林的不少，见面都问您，我说不知道。他们说，您来到吉林有人看见了。"

陈震寰说："在街上遇见督察处总务科长陈哲，情报科长杨绍林，他们都在校官招待所。招待所在一个饭馆里面，一顿四个菜两个汤。他们还问您呢。"他又说，"听说共产党有宽大政策，不管有多大罪，只要坦白就没事。"

我告诉他："听共产党的话，要从反面解释，不要一听就相信。我们搞工作这么多年，人家一说我们就相信，这样的人不配搞工作。"

晚上，我想找那个胖胖的，说话很迟顿，看之很老实的干部透问一些情况，特别是宽大政策。上灯时候，他一个人在屋中写什么。我先叫李继先进屋反映情况，说解放团里每天夜里有人赌钱，有人喝酒，有人骂共产党。接着又进去了两三个人，也是反映情况，我也跟着进去了，由纪律谈到生活，拐弯抹角的谈到宽大政策上去。

苗可成问："干部，共产党真有宽大政策吗？有人说这是欺骗人的，有人说新民主主义不杀人，说列宁主义杀人。"

他对宽大政策做了解释，说："这个政策是共产党毛主席制定的，决不欺骗人。我们干部都要按政策办事，不管过去有多大罪恶，只要老老实实的坦白，就可以受到宽大，相反，就要受到处分。解放吉林的时候，有许多人到政府坦白了过去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坦白的好，政府叫他回家生产去，不处分。这样的例子很多，慢慢的你们

就知道了。”

我听了这些话，也有些作用，不过我与别人不同，自己的事自己知道。情绪始终忐忑不安。

平素嫌官小，现在嫌官大。但是有人却在这个时候充高级军官。有一些尉官冒充校官到招待所去，解放团里也有不少尉官原是班长或者列兵，他们在长春弄了一套美式服装穿上，冒充尉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士兵吃大灶，每天两顿粗粮；尉官每天一顿粗粮，一顿细粮，还有荤菜；校官是每顿四菜两汤；将官吃席，特殊招待。冒充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伙食。校官有冒充的，将官就没有冒充的了。

一些尉官到这以后，无忧无虑，把自己带的东西拿到大街上去卖，什么美式大衣、毛衣、毛毯、派克笔、手表、皮鞋等，老百姓都抢着买。把这些东西卖了，在街上又吃馆子又嫖妓女。回到解放团就赌博，赌输了就吵架，发牢骚，骂大街。各个屋子谷草满地，随地吐痰，随处小便。还有一些眷属把小孩的尿布，女人的裤子，挂了一绳子，五光十色，简直不像样子。可想而知，骤然间长春解放，长春的十万守军大部分到了吉林，给吉林添了很大麻烦。学校停课了，饭馆、旅馆都用作临时招待所，大街上小巷里都挤满了穿美式服装的官兵。这么多官兵每天要吃要喝，吉林人民政府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来安置这么多官兵的生活，可是这些官兵还感到不满意，有的士兵说：“我们的机关枪都给你们了，结果给我们高粱米吃，我们早知道这样，不来了。”由于闹得太不像话，政府叫新 7 军 38 师师长陈鸣人到尉官解放团讲话。我借故有病，没有去听陈鸣人讲话。见到他不好意思，不见面好些。

在这遇见了很多熟人，如督察处的督察王士廷、张致温，长春站第二组组长邱明端，长春站的司书齐一文，军统特务孙国、李雄飞、邹盛文等，还有一些面孔很熟，我叫不上来名字，他们都能叫出我的名字。见到了这么多的人，我已经知道没有秘密了。

25 日晚上，我与陈震寰、苗可成、李继先在院中研究了多时。

关于我走的问题，找路条、上火车都已不成问题。他们的意见还是叫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犹豫，我提出要向共产党自首。他们都说那是危险的事，虽然有宽大政策，并没有见过例证；再说督察处的人不比别的人，北满杀人惟一的特务机关就是督察处，尤其是我，他们说："万万不能那样做！"

我的理由是：

一、做件非常的事，军统特务像我这样的职务，绝不会有自首的，我开个先例，叫共产党看看。真的把我这个先例杀了，那好了，他们去宽大士兵吧，今后，谁还敢自首？潜伏也是死，自首也是死，宁愿逃跑或潜伏起来，也不自首。所以不一定杀我；

二、到沈阳、到北平都有被捕的可能，如果将来被共产党抓到，用小绳绑上，那就不够面子了。自己送上门去，该死该活来个痛快；

三、如果宽大政策欺骗了我，将来共产党就不会成功，而共产党又何必欺骗我呢？因此，我自首不会不按照宽大政策办事；

四、我到共产党那方面去，依我的特务工作能力，再来对付国民党那些特务——军统和中统我都有办法。给共产党做一些工作，可以得到意外的职位。

苗可成的意思还是叫我再考虑一下，他说这不是赌钱，这是赌命，不能输只能赢。我同意他的这个见解。

和他们谈了一会儿就散了，他们回屋睡觉，我一个人院中徘徊。我想起了从前，1934 年我 19 岁，在北平电话局当出纳员，学会了赌钱，学会了一些骗人的技术。我不论打麻将或推牌九，我用这种技术都能赢钱。父亲是东北军官，自己是"少爷"，在外面招摇撞骗弄了很多钱。1936 年在北京东方大饭店开了一个常房间，自己有包车，有各种衣服，我还是青帮家礼，在北京前门外人们称我"关二爷"，背地里称"小孩王"。因为钱来得容易，去得也糊涂，什么人找我借钱或求帮一概应允，颇有侠义气概。我要作上海黄金荣和杜月笙那样的人物。日子一久我成了赌棍，于是一些朋友看不起我了，渐渐和我疏远起来。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同乡马博权从东北

来。他在辽南与我哥一起搞义勇军。我哥当团长，被日本鬼子俘去，用开水浇死。他给我哥当团副，跑了出来，到了北平，继续抗日。他想在察北利用汉奸王英成立军队，打进去进行活动，把实力搞起来再拉到内地。他到饭店找我是下午两点，我还没有起床。他进屋一看：又是女人，又是鸦片烟灯，20岁的青年这样堕落，他很失望。马博权对我说："你哥被日本鬼子用开水浇死，你家仇国仇都不顾，在这过着慢性自杀的生活，你回头看看东北故乡，父老兄弟姊妹在敌人蹂躏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你这青年人就熟视无睹吗？你赌钱赌得好，那又能怎样？不过是左手来右手去，落一个赌棍之名，最后没有人理。如在这国家多事之秋，当一个抗日英雄，或者作一个军事统帅，那有多光彩！你人聪明，赶快离开这里，与我到西北去成立军队，我有路线。"我很犹豫，经过一天的反复思索，最后决定离开北平奔赴察北。临离北平之时，我辞别双亲，决心苦干十年，不成功不回北平。一下子到了西北，脱了大褂，开始当兵，一步一步从汉奸的二等兵干起……以后这个部队反正到国民党那方面，我一直干到上校。光复后回到北平。有了1936年那个决定，才有以后的前途。可是今天呢？既然我认为这个决定对，就不能再错了，一错再错，一辈子就完了，辗转反侧想了一夜，还是认为应该自首，不然精神上的痛苦和折磨受不了。

10月26日起床以后，发下一种登记表，姓名、年龄、职务、经历，这个表要求下午填好。我一看名堂越来越多，昨天重新编队，造名册，今天又要填表，我怎么填呢？全填内地的经历，内地没解放，这里的政府也没有地方去调查。先这么办，打个经历草稿，一项一项的伪造，可是伪造起来感到心虚。问题不在这个表上，今后的日子难过呀！填完经历表，再找个别谈话，再从别人那里了解我，我隐藏得住吗？我一跺脚不填了，把表撕碎，决心自首。我把苗可成、李继先他们找来，我说："我决心自首，你们将来有机会给我北平家中写封信，告诉一声，就说我在吉林公安处投的案。"

我的勤务兵杨成荣一定要同我一起自首，我同意了。杨成荣拿

起两个灰色军毯，一个粗布饭包，他每天不离身地背这个饭包，那里面装着我的鸦片烟药、药针……

他跟我到干部的屋子，干部不在。我俩便找了一处矮墙跳了出去，到了大街上，雇了一辆马车，直奔公安处。

平安胡同新新旅馆

公安处是红油大门，人们说这是伪满大汉奸熙洽的住宅。门口没有卫兵，看不出来这是个机关。

一个年轻的战士问我："同志，你有什么事？"

我庄重地说："我是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的特务，叫关梦龄，到这自首的。"

"他是督察处的督察长，到你们这儿自首报到。"杨成荣从旁加以强调。

这个年轻战士显然对督察处这个机关还不明了，他看了看我，说："同志们，先等一下。"转身就往院子跑，不一会，出来一个30来岁的人，很稳重地问了我的姓名及职务，然后说："请到里边吧。"

他把我领到一个空屋子。不一会儿一个背手枪的战士进来说："饭好了。"

这个战士引我到了一个饭厅，屋内有几条长桌和条凳，桌子上摆了两碗炖豆腐，苞米饭。我吃了一碗，挺好吃。正吃饭间，进来一个矮个儿，穿一件黑旧呢子上衣，敞着怀，里面一件黑制服，脸上还有几个麻子，他问那个炊事员："没炒菜吗？""没有，来不及了。"炊事员回答。

我看他一眼，他看我一眼。饭吃完了，那个背枪的战士把我领到一个屋子，把杨成荣引到另一个屋子。我进了一间小屋，屋内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年轻女人穿着黑棉制服在床边给很小的

孩子喂乳。方才在饭厅的那个人站在屋内，笑着伸出手来与我握手，我很不自然的与他握了握，他很随便地问我："到吉林几天了？"

"唉哟，21 日晚上下火车，有六天了。"

"在哪儿住了这么些日子？"

"在解放团。"

"那里人那么多，怎么挤得下，怎么不到我们这来呢？"

"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住？"

"你们会不知道？"

我笑了："不客气说，我害怕。"

"对，这是老实话。"他也笑了。

他给我纸烟，我说："我这里有，从长春带来的，比你这烟好。"

"好，吸你根好的。"

他是江苏口音，说话很痛快。他与我谈到长春解放前的各种情况，谈到内地——我到过的地方。他谈到反动派把共产党宣传为杀人放火的毒蛇猛兽时，说："你们宣传，到头来自己也中了毒，所以你害怕了。你看，我们这里有什么可怕的？昨天是敌人，今天你过来就成了朋友。"

我想知道他是什么职务，但不好开口，想用一点技术，又考虑不该对这个直爽人耍手腕，慢慢就会晓得了。我说："到这之后，对你们的政策完全不了解，希望能不客气的指教，我知道我应当做些什么。"

他接过我的后一句话："那是以后的事情，不忙，先安下心来。"

天黑了，我们又随着那个年轻战士出了大门，走了两个胡同一道街，到了一个院子。门口有战士守卫，院里有老百姓。迎面是一个木制的楼房，墙是青砖砌的，不怎么好看。我被领进楼下一间屋子。不一会儿来了一位穿黑呢大衣，戴八角帽的人，进了屋子，样子很严肃地问我："你知道项迺光跑哪去了？"

"我不知道。"

"你是督察处督察长，少将？"

“上校。”

“老兄，你没想到会有今天吧？”

“没想到有今天，也没想到到这儿来。”

“你把项迺光的下落写一下。”他右脚踏着土炕，左手拿着纸烟，歪着脑袋，很随便的样子。

“好吧。”

他走了，一会儿来人给我送来几张纸，在一盏不亮的电灯下，我写了两页与项迺光突围未果的经过。

躺在炕上我心里很难过，这么几个钟头接触了这么多的人，先一个说话那样和蔼，后一个简直是对我侮辱，两个人很不一样。我睡不着，一支接一支地吸烟。那个战士来了，我问他有什么书看没有？他问要看什么书？我说：“共产主义常识的书。”他转身给我拿来一本《共产主义常识》，我打开一看，第一篇是列宁著的《论国家》，看不懂，看了两页放下了。

这时，楼上地板不住的响，是脚在地板上跺的声音，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叫唤，是给女人用刑吗？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半夜上刑别人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听到这些声音，想到我的将来，不禁毛骨悚然。翻来覆去，到天亮才睡去。早饭后昨天晚上穿大衣那个人又来了。他叫我写一份自传。我把八岁至今的经历写了十多页，交给了他。

午后一点，那个年轻战士来了，大家叫他小王。小王长得很老实，有20岁，腮帮上的肉很厚，眼睛不大，说话先笑。这样的人一望就不叫人担心。

他说：“请你去谈话。”

我跟他出了大门，在道上问他：“昨天跟我谈话的那位是不是科长？”

“那是朱副处长，今天还是他找你谈话。”

他是副处长呵，我对朱副处长的印象很好，我的思想是“可杀不可辱”，只要客客气气，不打不骂，枪毙了也没关系，千万别零遭

罪，给我精神痛苦。

到了公安处，见了朱副处长。他问我昨天睡得好不好？我说没有睡好，心中有事。他说："新到一个环境，再过几天就好了。"

"昨天晚上，那位穿黑大衣的干部叫我写项迺光的材料，我对他的下落实在不知道。今天早上叫我写自传，我倒写得比较完全。关于我应该做的，我一定自觉去做。因为我是自己来的，又不是你们抓来的，我何不争取主动呢？敬酒不喝，喝罚酒？那样的人，说句上海话，叫不识相。"

"你能这样做，我们欢迎。这样做对你自己有利，对人民有好处。你的问题，我们是了解的，你自己来了，那是最好的表现。"

"你们的工作我也了解，你们现在需要什么我也知道。我先坦白在特务机关长春督察处当督察长时，由我指挥杀死的地工人员及进步人士 40 多人，这是一个极大的罪恶！"

"这是一个很大的罪恶，应该坦白。不过这些人已经死了，以后再写材料不迟，当前……"

"关于军统在长春潜伏的组织，埋在地下的电台，布置在哈尔滨的潜伏组，藏在督察处楼梯下的黄色炸药，以及从长春到吉林的许多特务……这是当务之急。是不是？"

"对！应当马上检举。这些潜伏组织不挖出来，会出事情。你在这马上写！"

他叫人给我拿来几张纸，我检举如下：

一、长春站哈尔滨潜伏组，自 1946 年建立以来，直到长春解放的早上还通报。这个组组长姓蔡，是哈尔滨报话局的一个报务员，特务电台设在他朋友处，他朋友住在道外一个破烂市；

二、军统局北满电务支台，两部大型电台及几部十五瓦手摇机，埋在督察处院内东南角墙下；

三、长春站潜伏组长吴殷强，以粮米加工厂做掩护，该工厂设在长春市七马路路北，离韩国侨民会很近；

四、东北剿总第二处设在长春的潜伏组组长徐克成，该组设在

长春市长江路水楼子隔壁；

五、督察处办公大楼的楼梯下，藏有一箱黄色炸药；

六、随新7军到吉林的特务有：安震东（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以及张致温、孙国、王士廷、李雄飞等人，均在尉官解放团。

这个检举写完之后，按上指印，交给了那个战士。不一会儿朱副处长又来了，他说："你们的人，有不少在这里，你大概还没见到，你回去就能见到了。"

"报告副处长，他们吃什么灶？"

"他们可能吃大灶。"

"他们既然吃大灶，我也不应该特殊，我请求吃大灶！"

"这是对你的照顾，你先回去吧。有什么事，可以找曹同志。"

从公安处回我住的地方，我留意街的名字。我看见了牌子，我住的是通天街平安胡同，楼房是原来的新新旅馆。我对这些名字感到愉快，象征着我这个案子是通天的，上边知道；平安胡同预示我会平安无事，没有危险。我这是迷信吗？是迷信，但是有许多事应了验。

1946年2月14日在北平招考北平特警班学生。考完试出来，我走到一个死胡同，这个胡同叫"鬼门关"，我心里很不痛快。没有几天，特务头子戴笠下了个条子，因为我贪污，把我关起来，过了一次鬼门关，在无可奈何的时候，最容易迷信，并以此来安慰自己。

我回到住处，昨天那位穿大衣的干部，见了我说："你上楼住吧，你们的人也知道你来了。"他引我上了楼，在门外他就喊："陈哲，你看看谁来了？"

呵，陈哲、杨绍林、邱明瑞、翟丕禽、杨钧，都来了！

"督察处来了几个科长了？"曹科长问。

"我是总务科科长，杨绍林是情报科科长，这回又来了督察长，越来人越多。"

"早晚都跑不了，早来好。"曹科长接着又说，"你们谈谈吧，看看吉林市还有谁？找找他们。"

曹科长走了，我们扯起来。自从突围失败便各自分散了，只十天的工夫，经过了各自不同的奔波又在这会面了。他们说陈哲是自己到吉林警备司令部报到的，别的人都是一个找一个找来的，这叫连环套。

大家谈了一下项迺光的下落，谁也说不清楚。吃完晚饭，陈哲自己拉胡琴，唱青衣，大家还买了一些花生米、茶叶，等于开了一个小型茶会。十来天的改名换姓的生活结束了。这么一唱，精神轻松了许多。

第二天早晨起床，陈哲到我这个屋子与我谈了多时，他说："这里是公安处的招待所，这里住的人，有公安处的干部和他们内部犯了错误的同志；还有捕来的几个可疑的人；剩下的十多个人都是军统，这里顶数你的官大。"

我问他曹科长在什么科？他说："公安处处长叫陈波，副处长姓朱，治安科科长吕浩，是陈处长的爱人，曹科长是治安科副科长，在招待所负责。陈处长一定要找你谈话的。"

这一天7点钟刚过，曹科长叫我们几个人跟他到公安处去。还是我来那天的院子，不过进的屋子是西式的，屋子里有沙发，写字台，一个穿着古铜色旧呢上衣，背头，戴着近视镜，一只胳膊的干部站了起来，他笑着与我们打招呼，陈哲对我说："这是陈处长！"

我给陈处长鞠了一躬，他叫坐下。我们八个人都坐在大沙发上，我坐的位置与陈处长的写字台很近。在陈处长旁边坐着一个女人，穿黑制服，可能他就是吕科长。桌上放着纸烟，战士给每人倒上茶，曹科长把烟递给大家吸，陈处长先对我说："过去没到过吉林吗？"

"没有到过。"

"吉林不如长春热闹。"

"长春是伪满的首都，人口多一些。"

陈处长转而对大家说："你们来了不少天了，早就想和你们谈谈，一直没有工夫，今天咱们好好谈几个问题。我说话，大家能听懂

吧？”

他的广东话接近北方话。我们回答：“能听懂！”

桌上放着一个本子，陈处长把本子打开，说：“今天我们讲四个问题，第一，是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现在的形势；第三，宽大政策；第四，义气问题与你们的出路。”从 7 点半讲到 11 点，问题讲得很透彻，关于宽大政策讲得更清楚，这个问题，我听得非常仔细，对宽大政策有了初步了解。谈到义气问题，他说：“义气是反动派很讲究的东西，对蒋介石应当讲义气吗？不论是朋友或同事，只要他反人民就与他一刀两断，不要因为义气而不肯与他划清界线。对人民要有义气，对反动派不应有义气……”

“关于你们的出路问题，应该靠拢人民，与反动派一刀两断。这个决心要下，要用行动表现出来，要老老实实地向人民低头认罪，诚诚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就有你们的出路。在我们队伍里也有从反动派来的人，60 军军长曾泽生的起义，就受到了人民的欢迎。你们应当选择自己的出路，那就是靠拢人民……”

讲到十一点，讲完了。我对宽大政策与出路这两项很注意，我心里明白，现在要检举特务立功赎罪。没有这个行动，不足以表达向人民靠拢。

晚上，我们这几个人在一起研究如何检举，他们说：“北满支台在督察处埋了两部大电台，埋在什么地方了？”

我留了一个心眼，没有告诉他们我已经交代了。

关于检举，这些人都是很积极的，谁也不会不关心。我为前天检举了一些潜伏组织，内心感到很踏实。

长春解放那天早上，督察处把在押人犯都处理了。我只是在电话中听督察处处长张国卿说过此事，详细情况，我不了解。翟丕翕是当时的侦审室主任（即司法科长），我问他是怎么处理的？翟丕翕说：“10 月 17 日那天，天刚亮，就知道 60 军起义了。张国卿从家来到督察处，把陈牧（当时督察长）找来，命令先把文卷档案焚毁。侦审室与秘书室的电文档案多得很，烧得满院子是烟。烧完了这些东

西，张国卿把陈牧、印匡时（主任秘书）、陈寿岚（督察主任）、我，一齐找到他的办公室，研究如何处理在押人犯？

"'一不做，二不休，杀呀！'陈牧抢先说。

"'杀就杀，杀完了，看守所的秘密不会泄漏。'

"'都是些什么案件？'印匡时明知故问，他的意思不同意把这些刑事犯都杀了。

"'都是些刑事犯，内中还有三名同志。一个是绥靖大队谍报17组的组长张政，还有两个长春站的同志，因为工作情绪不好，临时送到咱们这禁闭的。'我这样说明，也不同意乱杀。

"'一律杀！'张国卿火了，喊了起来。

"'两个斗殴的，昨天叫他们打保，没有打好，这两个人也处理？'我又补充了这么几句。

"'都杀，只把张政一个人释放，其余四十八个人全部杀掉，一个不留，开始行动！'

"于是由陈牧、陈寿岚集合督察室的人，开始从看守所提人。我在看守所门口，拿着人犯名册，喊一个提一个，由我过目，当时也不验明正身，不问三七二十一，反正都杀。人犯到了看守所门口，由督察室的督察把人犯架到后院土山下，一枪一个，不一会儿，把48个人都枪毙了。完结之后，用土掩埋在山下。这就是解放那天早上的大屠杀。当时，张国卿与陈牧杀人都红了眼，自己的那两个小同志年纪不大，因为请假到沈阳，他们组长呈报上来说他们情绪不安，就把他们送到督察处禁闭起来，以为押几天就可以释放，想不到把他们二人也一齐杀死了。真是不分青红皂白呀！我也是杀人者之一，从良心上说，如果杀共产党的人，我还没有意见，可是这些是刑事案件，不是打架斗殴，就是买卖银元的，根本不应当押，更不该处死。"

翟丕禽把上边这段话说完，我又问他："张国卿怎么跑的？"

"他把人杀完了之后，在督察处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就回到西四马路他的住处。他把呢子制服穿好，把少将领章肩章戴上，在家

等着解放军进城，等了两个小时解放军没有来。他一想当俘虏不是好办法，于是又换上便衣，出了大门往对面的小胡同溜了。”

我又问陈牧、陈寿岚、印匡时他们都到哪去了？翟丕禽说：“有路条，都换上便衣逃走了。”

10 月 30 日夜里陈处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今晚找你来，研究项迺光的下落问题，如何能把项迺光找着，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这么些天没有一点线索。你们那晚上突围的情况，你写了两页，从那上面也找不到什么线索。”

我沉思了一会儿说：“项迺光是共产党的叛徒，这就决定他不会自首投案。有一件事可以顺便谈一下，1947 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袁晓轩为东北特技组少将组长，袁晓轩也是叛徒，曾给朱德总司令当过洛阳的办事处处长。派袁晓轩到吉林的目的是策反张学思、吕正操、万毅等人。解放区知道这件事，就由周保中将军给袁晓轩写了一封信，劝说他回到人民方面来，并且可以保证袁晓轩的生命安全并予以适当工作。这封信送到了袁晓轩手里，他找项迺光研究，结果两人把这个情况呈报给了南京保密局，并以袁晓轩个人名义给周保中将军回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很关心我，我很感激。但是我不能到你那里去，你如果能过来，我可以向中央保举，仍任吉林省主席并兼兵团司令等职。这件事可以证明，他们俩不会回心转意的。因此项迺光不会到吉林，他一定在长春，这是一；另，我要从长春到沈阳，化装通过解放区，项迺光不同意，他说中途有许多共军的卡哨在打听我。同时项迺光说：‘你与我不一样，认识我的人少。’那就是说他可以通过解放区了。所以我判断他必从长春经过公主岭和四平到沈阳；再有，解放前几天我给搞的路条，是从长春到沈阳的，如果拿这样的路条拐到吉林，就不合适了。因此现在叫四平卡哨特别注意项迺光还来得及。不过距长春解放已经有十多天。”

“听说于浩在九台，这可靠吗？”

我说：“据翟丕禽说于浩是他的总务组组长，从不离项迺光的身旁，如果于浩真的在九台，那也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接着陈处长站起来，拿了一张地图铺在写字台上仔细地看着。

这时吕科长问我："项迺光在长春都有什么亲友？"

"他有一个表姐，表姐夫在督察处充上尉人事科员，叫刘继皋。住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别的关系我不清楚。"

陈处长又坐下，问了一些项迺光的化装情况，就叫我回来了。我心想突围那天早上在兴安桥卡哨分手，项迺光不先进城，就是防备别人检举他的。他这一手现在说是做对了，如果我真的知道他的下落，今天为了自己的前途，我一定检举他。

我的心情很焦躁，家中也不通信。造谣社说：郑洞国带领三百官兵，在长春殉国。北平家中知道这个消息，一定担心我也在长春牺牲了。造谣社无中生有，造这谣将来如何自圆其说？送来的报纸说，沈阳蒋军也惊慌失措。如果国民党能占领许多地盘，还有许多军队，我就可以像被俘的长春市长赵君迈那样，用一个共产党干部换一个国民党的干部，赵君迈就是用人民作家金人换回来的，回来之后仍任长春市长。如果国民党节节失败，就换不成了。

这里还有长春兴安中学校校长胡松岳一家。两口子都是大学毕业，北平人，在这反省不错。曹科长叫他管招待所帐目。他认出我是督察处的督察长。

我来到这的头一晚上，楼上发生的女人叫唤始终困扰着我。这天我上了楼进了胡松岳的屋子，朝他对门一看，那屋坐着一个女人。那屋正是那晚我的楼上。于是我问胡松岳："那个女人是谁？"

"我老婆的娘家嫂子。"

"我来的那天晚上，楼上有女人叫唤，还有脚踩地板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

"那是我嫂子头痛，躺在床上叫唤，两个孩子在地板上乱蹦。"胡松岳的老婆这样解释。我笑了笑，看来我的神经太过敏了。

楼里那两个反省的干部举动很稳重，非常有修养。我们上街有人跟着，他们出去随便。我问胡松岳这两个干部犯了什么错误？他说："大概是不服从领导。"

这两个干部有一个姓邹的三十七八岁。有一天我到邹同志那屋，他正在整理一张表，我一眼便看出是长春督察处的人事系统表。他还整理这个？我特别想看这张表，我掏出纸烟，给他一支，他不要，我强给他，他接过去，没有火柴，他便下楼去找火。我赶紧挨近桌子，一看真是督察处的人事表，有我的名字，旁边还有“又名关锡九”。别人的人名，职务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我的姓名、职务都对。另一页是长春站的人事表，只看见“项迺光”，邹同志就上楼了。我问他：“你还办公？”

“他们忙不过来，求我帮忙，给他们整理一下。”

“关锡九”这个名字是我在中学用的，以后到社会干事我发现“锡九”有许多人用，我就不用了，用我的号“关梦龄”代名，名、号一致。在反动派里凡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叫关梦龄，不知道叫关锡九。能知道我叫关锡九的，只有中学的同学。忽然我想起今年 3 月，一个叫陈尔立的中学同学，从哈尔滨到长春，由在骑 2 旅当副团长的同学杨崇侠陪同到督察处去看我。可能他是共产党的地工人员，不然别人不会知道。这张表可以证明公安处知道我的情况不少。我回到房子里又生了疑问，这张表难道故意给我看的？表示公安处对于关梦龄什么都知道，连你的学名都知道，你要好好的交待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11 月 2 日的早晨，起床后在院中散步，朱副处长满面笑容地走到我的跟前，说：“老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沈阳解放了！”

“啊，沈阳解放了！”我重复着朱副处长的话，这与我有什么好处？沈阳解放能把我释放了吗？不见得。同时心里也很宽慰，幸亏我没往沈阳跑，否则还得往北平跑，万一跑不了被抓着更麻烦。沈阳解放，东北解放，华北早晚也得解放，这是兵败如山倒哇！卫立煌守不住东北，傅作义也难守得住华北。这样一来，东北、华北和西北完全解放，蒋家天下丢了一半，再从共产党手里拿回来不容易了。在目前情况下争取活命就是我最大的幸运，蒋介石是指望不上了。我忙说：“好极了，早解放一天，沈阳老百姓少受一些痛苦。”马上我

又对朱副处长说，“不是说‘找人’吗？怎么找？时间太长了，恐怕找不到，越快越好。”

“好，这件事，马上就办！”

“找 人”

第二天吃完早饭，曹科长对我们说：“今天都出去‘找人！’”

我问：“怎么个找法？”

曹科长说：“这种工作，你还不明白？”

我说：“当场逮捕是一种方法；另一种方法是把他的地点记下来以后再去捕；再一种是把他领到一个地方去捕；还有第四种方法……”

“咱们采用第二种方法，先把他的地点记下来再说。”

我们出去四个组。我一个人一组，由曹科长，还有一个郝同志跟着；杨绍林、翟丕翕、陈哲、邱明瑞、杨钧分了三个组。他们也由公安处的干部跟着。

我们徒步走在街上，往人多的地方去。表面上看我是一个人走路，曹科长走在我的前面，后面跟着郝同志。一到大马路就见到了国防部新闻局长春通讯处的杜主任，他问我在哪儿住？我说在一个朋友家，他说：“少在大街上走啊，有人问你哪！”

“没关系，敢在大街上走的人没有问题，有问题的人不敢在街上走，我这是利用这种心理兜兜风。你在哪儿住？”

“我在××胡同一个朋友家，预备三两天就走，此非久居之地。”

我把地点告诉了郝同志，他记了下来。拐一个弯又遇见一个穿灰呢大衣的人，见面就拉手，我不认识他，他小声说：“督察长，你还在这悠哉游哉呢，有人说你被抓到公安处去了。”

"我怎么把您的台甫忘了?"

"我叫宋至诚,吉林铁路党部主任秘书,在长春,马绍周结婚时,咱们不是见过吗?"

"对,我想起来了!宋主任,您什么时候到了吉林?有什么消息没有?"

"没有消息。沈阳一解放立足之地都没有了。您住的地方方便吗?"

"那个地方不可靠,一两天我要迁移一下。"

"我在××胡同××号住,到我那住几天也可以,那是我的至好朋友。"

"看吧,如果实在没办法再去麻烦您。"

分手之后,郝同志又把地址记下,郝同志看着我发笑。

忽然迎头遇见柏经纬,他穿着一套黑棉袄裤,他是军统局北平特警班毕业学生。我在那个班当过总务科长,给他们讲过课,在长春一向叫我关老师。他是长春警察局保警大队长。他一看就我一个人,便马上走过来,又往前后看了一下,笑着对我说:"我以为您化装逃走了呢,怎么还没有走?"

"我逛逛吉林,吉林的白肉血肠挺好吃,吃完了再走。这回不逛逛吉林,以后不一定有机会了。"

"老师,您的胆子真不小呀。"

"你一个人来的吗?你太太来了没有?"

"我的岳母也来了,三个人都来了,我岳母在那呢。"他往后一指,有一个不到40岁的中年妇女在路旁等着他。

"你想怎么办呢?"

"我想到王家善的部队,我与他还有一点关系。"

"什么时候去呀?"

"今晚上就去。"他很小声的说了这句话。

我说:"我住在一个朋友家中,你若是愿意去,住几天没关系,日子多了,当然不行,你们在哪住呢?"

“一个小买卖的后院，××街××号，找一个姓王，啊，不姓王，姓梁的。找到他就能找到我。”

我一看，他这个地点不对，也没说清是姓梁还是姓王，说出来又改嘴。在老师面前卖弄特务技术，这个小子挺狡猾。他未入特务训练班之前在伪满当情报参谋，对于日本特务那一套手段他不外行。今天看出来他对我有戒心。需马上逮捕！不然找不着了。于是我对他说：“我要走了，在北平见吧，到我家过新年。”

“谢谢老师！”

他一转身，我回头告诉郝同志马上抓，他要跑。郝同志马上撵上他，我与曹科长跟在后面，我对曹科长说：“警察局大特务立刻抓！不然，飞了。”郝同志身体有劲，强拉硬扯把他逮住了，一边走一边说：“找你谈一谈就回来。”

他的岳母上来了，很不满意郝同志：“你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拉拉扯扯的。他不走，你强迫他走，一点也不讲理！”

这时候，柏经纬明白过来了。一个特务这点事还能不明白吗？他说：“好，我跟你们去，不要这样，不好看。”

郝同志与柏经纬并肩走，我对曹科长说：“给他们俩雇一辆马车。”曹科长马上叫了一辆马车。回到了招待所，一进院，柏经纬便对我笑：“老师，您对我费那么多话干什么？您叫我来，我不会不来。”

我没理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公安处曹科长。”接着我把柏经纬的反动职务说了一遍。

“是关梦龄的官大呀？还是你的官大呀？”曹科长问柏经纬。

“当然是他的官大，在长春工作时我还听他调遣呢。”

“既然关梦龄的官大，他在这都不害怕，你怕什么？官大的没事，官小的倒有事？你不要恐惧，不要胡思乱想，他没事，你来也没事，他能立功，你不也一样能立功。”

柏经纬两眼一转，想出来个办法：“科长，他能立功，我也能立功；长春警察局的职员，没有不认识我的，各分局长、各科长，听说

到吉林的不少，我一定能找出来几个。现在咱们就找去！听说二分局局长张宝田在解放团，先把他找来。”

“能找来吗？”曹科长问他。

“能找来，去晚了可不保险。”

这时我出屋，站在院子里，用眼睛把郝同志调了出来，我告诉他：“可不能听他的，真的要去找人，一两个人跟不住他，可别闹个鸡飞蛋打。”

“没关系，跑不了。”

吃完饭大家都回来了，还从街上带回来一些吃的。这一天很有收获。陈哲说：“‘找人’立功，谁也赛不过老关。”

“听说老关‘找人’的办法好，行呵，这就是立功赎罪呀！”石同志在旁边这样鼓励我。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他。

“听郝同志回来讲的。”

翟丕翕等人也找来了两个人，是谍报队的，地位低。

第二天起床后，曹科长对我说：“柏经纬那个小子跑了，真是鸡飞蛋打了！”

我没有说什么，心里话，抓到手的特务又叫跑了，这么办案子浪费人力与物力。

11 月 4 日又出去“找人”，我与郝同志到大街上转，遇见的军统特务都留下了地点。

已经下午两点多了，我对郝同志说：“咱们回去吃饭已来不及了，在街上吃吧，我也馋了，咱们今天改善生活。”

“回去吃吧，家里会给留饭的。”

“不，不，不用回去吃！”我感到郝同志有些为难，又问，“郝同志，在外边吃一顿饭，是不是犯错误？如果犯错误，那就算了。”

“倒是不犯错误，不过……”

边说边到一个小饭馆子，我把郝同志拉进去。我从来不会喝酒，我问郝同志喝酒不？他摇头，问他吃什么？他也摇头，我告诉饭

馆的茶房："来40个蒸饺，一个糖醋鱼，一个木须肉，一个随便什么汤都可以。"

郝同志说吃不了，我说能吃了。吃完饭给完钱，又给了一些小费。出了饭馆到街上我对郝同志说："咱们这是吃便饭，也不是吃席，算不了什么，回去你不用向曹科长说。"

他没有吱声，我又买了几盒纸烟，就回来了。

回到招待所，胡松岳对我说："沈阳解放，社会上展开劳军，我们是不是也要响应一下？"

"好啊！我们应该响应。"

晚上，大家都谈论劳军的事，胡松岳先捐二百片沙发代津（贵重的美国药），还有20块银元，他老婆捐了5万元东北流通券。我们这些军统特务也开始捐，都是几万元钱，杨成荣对我说："我捐不捐？"

"你算了，我捐一块怀表。"

"那块表太好了！"

"一块表算什么？生命都不保了！这些身外之物留它何用。现在只要能表示出我们对人民热爱，捐什么都可以。"

这块怀表是我二老婆的父亲在第一次见面时给我的，一块银色瑞士怀表，带一条白色细钢链。价钱相当贵，我很爱惜它。这一次我捐出来了，我在捐献簿上写道：捐给解放沈阳的第一个战斗英雄。

这块表捐出后，胡松岳在背后说："他捐怀表，还不是贪污来的？"听这句话我非常难过，心想，贪污来的也是我的，我不捐也没有人强迫，说这种怪话，不应该。过了几天，《吉林日报》刊登出来，公安处劳军名单，第一个是关梦龄先生，捐瑞士怀表一块，捐献给解放沈阳的第一个战斗英雄。其他人列在其后。

要老实做人

有一天，曹科长与我闲谈，谈到生活，他说："如果要改善生活，可以买点肉回来吃，不要到饭馆了，太浪费。"

我的脸红了。

他又说："我们的同志有什么事都要向组织汇报的，你叫他不说，他也要说。这一点与你们阳奉阴违那一套不一样，我顺便对你提一下。"

"好，好，科长这样批评我对我有好处。"

看来郝同志把下馆子的事儿报告给曹科长了。

11 月 5 日，吉林全市举行庆祝沈阳解放大会，曹科长也叫我们参加，并且在会上"找人"。晚饭后，小王同志和郝同志来了。小王同志今天没有背枪，一见面就笑，他说话是关内冀东的口音，不过 20 岁，非常纯洁。我们三个人一出大门，就找了辆马车。上车之前小王买了一斤榛子，他说："关同志爱吃榛子，吃吧！"

我边吃榛子边想，共产党的人都像王同志这样，要我的心我也不会犹豫。他这是领我到会场，今天就是领我到法场，我也不会跑。

走了半个多小时到了大会场。我们下了车，在会场人多的地方乱钻。不一会儿遇到了中统局长春区的一个特务，叫李之龙。接着又遇见了五六个从长春到吉林的军统和中统的特务。如法炮制，都将地址套出来告诉给郝同志。会场里有不少穿美国服装的投降军官，有的认识，与我说了话；有的不认识，互相看看，彼此知道都是长春来的。还有秧歌队，不是东北原来的老式秧歌，是新秧歌，前走两步，后退一步，不好看。有一个人化装成蒋介石，另一个化装成宋美龄，样子很难看。心想，这是恶作剧，没有意思。

回来的路上，碰上老高家一家人。除了高心鲁到长春去了，全

家都来开大会。

高心鲁的父亲高铁峰是我的义父，在长春时我经常上他家吃饭。六月份他们全家迁到吉林，合股开了一个杂货铺。高老太太像对待自己的孩子，把我手拉过去说："你们那是什么地方？好不好？不吸烟行吗？（指吸食鸦片）手中有钱吗？每天都吃什么……"

一系列的问话，我都作了回答。

小王与郝同志在很远的地方谈天。

他们马上就要全家回长春，我说："我没有行李，想法给我送套旧铺盖，不要好的，送到通天街平安胡同一号，交给曹科长。"

谈了有20分钟才分手，现在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一定替我担心。

11月6日，郝同志领我到尉官解放团，士兵解放团等处去"找人"。北大营有铁丝网，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我们到吉林第一天夜里住的地方。我们挨着屋走，各屋子都是一铺一铺的大土炕，炕上有席子，有的炕上睡着人。看样子都是士兵。我遇见了几个宪兵，穿着整齐的制服，比较起来宪兵倒是挺精神，被俘或投降仍然这样整齐，不容易。他们见我，都站起来给我敬礼，我问道："你们王队长来吉林没有？"

"不知道，没有看见。"

"你们的那些'自来得'都缴了吗？"

"都缴给了人民政府了。"

"你们就来了这么几个吗？"

"来了十多个，其他的都不知跑到哪去了？"

离开北大营又到我住过的解放团。只见院子里扔着乱纸、垃圾、烟头、榛子皮、花生壳，很不像样子。怎么不扫一扫呢？我先进到我原来住过的屋子，想看看苗可成、李继先、陈震寰等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见着。各屋子有赌牌九的，有掷骰子的，有唱戏的，有睡觉的。从解放团的各宿舍可以看出国民党的这些军官，不但做军官不够格，就是做一个国家的普通人民也不够格，没有一点公共道

德，这样的军官训练出来的士兵怎么能打仗呢？早在我离开的时候就有人把窗户框拆下来当柴禾炖肉，今天再一看，有的屋子连门都没有了，这等于破坏了一个小学校，将来怎么复课？中央军走到哪破坏到哪。我们自己都看不下去，又何况解放区的人民呢？

“这些人不好改造。”我对郝同志说。

“好改造，将来一学习，订下制度就好了。”

“他们把自己多余的东西卖光，钱花完就老实了。腰中有钱他们睡不着觉。”

在街上逛了逛就回到了招待所。曹科长叫我把在解放团看见的那些特务姓名和职务写一写。写完我交给了他。

一个晚上我与大家聊天，曹科长告诉我：“有一个姓周的老太太给你送来一床被子，一个褥子和一个枕头，另外还有 20 万元钱，东西放下就走了。”

曹科长问我是什么关系，我告诉他是我义父家的佣人。我心想，她害怕这个地方，不敢久留，放下东西就走，连一个收条都没要。老高家对我还不坏。

我感到一个人说一些不是自己要说的话最苦恼。解放前我在特务机关——陕西缉私处当视察。到各县去视察，遇到一些地方绅士请吃饭，在宴会上说的那些应酬的辞令至今想起还令人生厌。现在呢？虽然共产党解放区的许多事没看见，不知道，但在说话中也得歌功颂德，说共产党好，比国民党好得不可比拟：解放区的人民丰衣足食，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廉洁自持，八路军的战士纪律严明……每天都有人这样说，我也这样说。好像不这样说不拥护共产党似的，可是所接触的就是曹科长和几个干部。事实上都是应酬辞令。有一天和朱副处长谈话，他问我：“解放区有什么好的地方？”

“我看哪样都好，尤其是老百姓能够吃饱穿暖。”

我具体说不上什么好，只能说哪样都好。可是吉林有妓馆这也好吗？也有小偷、盗贼、乞丐……到解放区有半个多月，到街上也走了几次，开大会我也参加了，没有看出解放区特别优越的地方。只

是解放军作战好我承认，不然不能把国民党军队打垮，这一点我没有怀疑。

11月9日，发下一种表格叫我们填，这是登记表，姓名、年龄、职务、原籍、何时报到、何时被捕、你将来要干什么工作？政府对你应当怎样处理？你对政府有什么要求与意见？另外还有九个问题，叫我们按个人实际情况填写，不要虚假，这九个问题是：

1. 长春解放以前你是怎样的想法？
2. 长春解放的早上又是怎样的想法？
3. 突围没有突出去是怎样想的？
4. 没到吉林是怎样想的？
5. 到了吉林之后又是怎样想的？
6. 没到这之前是怎样想的？
7. 到这之后又是怎样想的？
8. 对自己的将来是怎样考虑的？
9. 现在你又是怎样考虑的？

我一看这个表是印制的，是所有在这反省的人填的，不是专为我们几个人单印的，但是这九道问题是用钢笔写在纸上的，是特别为我们几个人拟的。上面的突围问题只适用我们几个人，连陈哲都不适合。这张表引起了我许多猜疑，我们的问题要处理了吗？看这个情形还不是处死，如果要处死还用写这些吗？

我开始填表，在"你将来要干什么工作"这一栏，我填"以特反特"；在"政府对你应当怎样处理"栏，我填"我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政府对我应依法严惩"；在"你对政府有什么要求与意见"这一栏，我填"希望迅速处理"……

这九道题，我认为是陈处长要研究我们这些特务的心理而拟的。

我想探听探听处理我们的消息。我和翟丕翕研究了一下，我说："不经过司法手续能处理吗？"翟丕翕认为不经过司法机关开斗争大会照样可以杀人。他这一说增加了我的思想负担。这几天朱

副处长也不找谈话了，陈处长更不理了，于是我又去找在这反省的邹同志谈天，我问他："你看我们的问题是不是要处理了？最近叫我们填表，还要回答九个问题。"

"我不大清楚，不过我看你们还应当学习一个阶段。"我问他怎样才能改造好？从哪儿下手？他说："依我自己参加革命这么久的经验来看，你本身最重要的就是老实做人。在旧社会老实吃亏，受欺负，在新社会老实是受欢迎的。一切问题，一切思想都要老老实实的交待，不要一丝一毫的埋伏。这是我个人的体会。"

邹同志诚恳的态度很感人，我看这个共产党人很好，他怎么也会犯错误呢？可能在共产党里工作也是不容易的事。

11 月 11 日下午，曹科长到楼上宣布："你们不是要求回长春立功赎罪吗？明天就回去，今晚你们准备一下！"

我问曹科长都是哪几个人回长春？他说有陈哲、杨绍林、杨成荣、杨钧、邱明瑞、翟丕翕、长春站一个司书和我。

曹科长对我说："回长春不要有顾虑，本来想不叫杨成荣跟你去，在这给他找工作，可是怕你有另外的想法，所以还是叫他跟你去。"

吃完晚饭曹科长把我叫到院中，那儿还有一个服装整齐的军人，有二十六七岁。曹科长对我说："老关，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朱同志，就由他送你们回长春。"

朱同志给我敬了个礼，伸手与我握手，笑着说："关同志，今夜我来接你们，咱们坐天亮三点钟那班火车回长春。有不周到的地方请关同志多提意见。"

"不用客气，请朱同志多多关照。"我这样说。

又说了几句话，曹科长与朱同志便走了。

我上楼之后，石同志听说我们回长春，说："长春公安局局长于方初那个人很好，我们是老搭档。到长春你们争取有条件，要好好争取，革命这方面也需要人哪。"

我一听说他认识于局长，我赶紧说："石同志，您给我写一封介

绍信好不好？把我的情况介绍一下，求他对我关照关照，不然他不了解我。”

“不用写信，你的情况这里会介绍去的。到那儿也和在这儿一样，争取在自己。”

共产党人不讲人情，一封介绍信都不肯写，一般应酬，有什么重要？真固执。

回到屋子，八个人都聚拢来了。他们的脸显出紧张的表情。我说：“咱们买点东西吃，买点烧饼、酱肉、花生。”翟丕翕抢着说：“再买半斤酒。”不一会儿都买来了，大家吃了起来。我心中犯嘀咕，他们心中也不安。我对杨成荣说：“曹科长要把你留下，在这给你找工作，我看你今夜就没有必要再跟我去长春了。回头我对曹科长说一说。”

“我留在这干什么？我还是跟你一块走。”

空气很严肃，每个人都认为今天晚上要发生什么不幸事件。邱明瑞先说：“我看今天夜里是凶多吉少。”

“也没有三点钟到长春的火车呀？”

“唉，知道是假话你还能怎样？在人家的势力范围之中，你不服？”

“过去咱们在长春都是晚上杀人家，现在人家就不能晚上杀咱们？”翟丕翕这样一说，我也害怕了。可是我还故作镇静地说：“没有关系，不要庸人自扰。曹科长方才对我说，叫咱们不要有顾虑。”

“曹科长那样说，你就相信？他不那样说又怎样说？我看今天晚上就是一关，不好过。”“我看不动手也是死，动手也是死，我到时候要动手。动手还能撞个侥幸，不动手就干等死！”邱明瑞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一件事。

1948年6月3日，督察处决定秘密杀害14个“政治犯”。晚上八点半钟，由我率领十多人，把这些“政治犯”从看守所提出来，问明姓名、年龄、职业、住址之后，便两手后绑，用黑布蒙上眼睛，嘴里塞进棉花，然后装上汽车，拉到南岭。到了南岭把这14个人一块架

下汽车，带到事先挖好的大坑边上，开始用枪杀害。枪声一响，那些未被射中的人知道不好，可能认为等着也是死，如果往外跑一下，侥幸冲出去，还可能活命，于是有一个人猛然间抬腿就跑，他虽然未戴脚镣，但是两手后绑，眼睛又被蒙上，天又黑，路又不平，没跑多远就被撵上抓了回来，当即"砰"地一枪，把他击毙了。跑与不跑都是死。

于是我说："老邱这种做法我不赞成，要处死你，人家就没有相应的准备吗？还能叫你动手？"

"准备也不一定准备得那么好，有机会就干，人急跳墙！"翟丕鑫气愤地说。

"我在吉林呆了好几年，从这里到车站这条路我熟悉。如果不是往车站开，那就是糟了。"杨钧从旁说。

"不管怎样，一看情形不对就得动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杨绍林的决心很大。

"我认为绝不会有意外，咱们不要这样胡搞。如果真正无事，我们搞出事来，作了无谓的牺牲，那可是冤哉枉也。"我知道干特务的人行动野蛮，性情粗鲁，很容易滋生事端。

"不会无事，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是邱明瑞与翟丕鑫二人的一致看法。看来他们二人是今天晚上的危险分子。

陈哲、杨成荣和长春站那个司书都没说话，在那吃花生，但很注意我的态度。我想，今晚共产党是不是杀我们，我的心里也没有底。也可能杀我们，不过杨成荣不应该杀呵，他不是军统特务。可我又一想，过去我们杀人的时候，不管是不是共产党，抓着与八路有关系的人都杀。杨成荣当过谍报队组长，又是我的勤务兵，还不该杀吗？我又一想不会杀我们，因为我们还能主动赎罪，况且在招待所住这么些天，也看不出来要杀我们的迹象——我的思想是：如果真要杀我们，我们也不要动手，命该如此，动手也无济于事。我们今夜有八个人，如果要杀我们就不能来八个人，而要来 30 人或 20 人。这些常识谁不知道，又何况我们是些军统特务呢？而这八个人

中我是头，将来闹出事来，人家还不找我算帐？一定说是我指使的，绝不能说杨成荣指使的。这一点我心中犯嘀咕，所以我惟恐出事。

我很后悔，不该给他们买酒喝。于是我装着到门外吐痰，看一看门外有没有人，幸好没有人。我们就各自回屋休息了。

在迷迷糊糊的梦中，杨成荣把我叫醒。

我们几个人跟朱同志走到门外，一看不是汽车，是一个胶轮大车。车旁边有六个带枪的武装战士。朱同志叫我们上车，我叫他们七个人先上，而后我才上去。我坐在车后边。战士前边坐三个，后边坐三个，朱同志挨着我坐。我没有看见邱明瑞和翟丕翕的表情。车一动，朱同志拿出一盒烟给大家吸，因为才两点钟，还很冷，我把脑袋缩到大衣领子里，心里希望赶快到车站，可别到另外的地方。千万不要出事呀。我吸完了一支烟接着又吸另一支，我对翟丕翕说："翟丕翕你冷不冷？你若冷，我把大衣给你穿？"

"不冷，我的棉袄挺厚。"

"穿我的这件皮大衣吧！"朱同志从身上把一件皮大衣脱下来，交给了翟丕翕。翟丕翕坚决不要，朱同志一定要他穿，我说："朱同志叫你穿你就穿吧，不用客气。"

我对翟丕翕说话的意思是试探一下他的情绪，听一听他的话声是不是很紧张。想法子打破这紧张的局面，故而利用了大衣的题目。想不到朱同志真的把大衣脱下来给了翟丕翕。这样一来我心中安定了，这是上车站，绝不是枪毙我们。真的要枪毙，还怕冻着？由这一点，我问杨钧："杨钧，咱们上车站的路对不对？"

"对，对，就是这条路。"

朱同志问："你们谁在吉林住过？"由这就开始聊起天来，不但不紧张，也不感到寂寞了。胶轮大车走了一个小时到了火车站。我心想："谢天谢地，平安到达。"

①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建于1946年初，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中将，1949年被俘，1975年特赦，现全国政协委员）为强化东北及长春地

区的反共力量，巩固国民党在东北的统治，扼制共产党力量在“北满”的扩展，签呈陈诚而建立的特务机关。

督察处对外由第一兵团司令部，长春警备司令部领导，对内由保密局沈阳督导室和保密局长春站操纵，因此亦称保密局长春督察处。

长春督察处下设秘书室、督察室、侦审室、第一科（情报科）、第二科（总务科）。

督察室为督察处的核心科室，外勤活动的指挥部门。督察处的大量活动均由该室执行，如搜集情报、侦察跟踪、检查搜捕以及行刑等。该室编制上校督察长一人，中校督察主任一人，督察员数人，以及遍布各个角落的巡查队，哨卡，检查所及警卫分队。上校陈毓、李冷、关梦龄、陈牧先后充任督察长。

该书涉及督察处的人物，除督察长关梦龄外，有安震东（少将，第二任督察处长，后充任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解放后处决），张国卿（少将，第三任督察处长，解放前夕逃往台湾），陈牧（上校，先任督察处侦审主任，后任督察长，解放后处决），陈寿岚（中校督察主任，解放后处决），印匡时（上校秘书主任，解放后处决），郭子襄（少校督察员）、翟丕翕（中校侦审主任）、杨绍林（中校情报科长）、董顺球（中校情报科长）均被处决；陈哲（中校总务科长，捕后释放）。

②保密局长春站：建于 1946 年 3 月，原称军统北满站，戴笠死后，改称保密局长春站。长春站是军统在“北满”的特务核心，军统在“北满”的各特务组织以长春站为轴进行特务活动，督察处亦在其中。长春站对督察处的领导是全面的，同时又是原则的，督察处既在长春站领导之下，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个特务组织在蒋管区大肆镇压革命者和人民群众，实行白色恐怖；在解放区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地派遣特务，设置潜伏小组，搜集情报，进行暗杀、破坏活动。

第二章 该杀当死

被服线与纸条儿

火车走得很慢，下午四点才到长春。天已冷了，行人很少。有一些穿美国军服的人在街上若无其事地走着，可能是60军的起义人员。“四五六”饭馆开张了，但是还有不少的商号没有恢复营业，显得有些萧条。我看到有些建筑挂着红旗，今天是11月12日，孙中山的诞辰。也许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吧？

卡车把我们拉进长春警察局。只有20多天哪，昨天座上客，今日阶下囚。心里十分难过。

我们被领到一座又破又小的红楼里。这个小楼靠大街，没有围墙，街上的行人看得很清楚。楼上的窗户都没有了，几个木匠正在修理。

天快黑了，一个战士提了一桶苞米粥，一桶白菜炖土豆。他把我们领到一个铺地板的屋子。那屋的窗户玻璃破了几块，地板上铺了一个破席子，墙上还有日本式的壁橱。我吃了一碗饭、半碗菜，便放下不吃了。到九点钟，我们大家就躺在地板上入睡了。我睡在墙

壁上的橱柜里。大家谁也不愿意说话，内心都在考虑自己的问题。到这儿怎么办？第二天我被领到一个小弄堂里的空屋子，屋内有一个讲坛，二尺来高，木头做的，可以当床也可以当凳子。一个徒手的战士在这个小弄堂里来回走着。我往对门的小屋子一看，原来是尚传道，长春市长。他穿了一件蓝色棉袍，拿着一厚本书在那看着。他见到我马上打招呼。我对战士说："纸烟没有了，请给我买几盒烟。"尚传道闻声便给我送过一盒纸烟，一盒火柴。我问尚传道还有谁来了，他说："王焕斌（吉林省教育厅厅长）在我隔壁，岳希文（吉林省党部书记长）在你的隔壁，我斜对门的那位是警察局的，不认识。"

我把门打开，假作吐痰的样子，往门外一走，往左一看，看见了警察局的那个人，是左炎，警察局督察处调查股股长，我的学生。我回到屋子仔细一想，这个弄堂里的几个人，是长春各机关的典型，尚传道是政府领导，岳希文是国民党干部，王焕斌是三青团吉林负责人之一，我是军统特务的主要分子，都是反动派的主要人物，很危险。把我与那七个人隔开，说明我比他们更重要。

晚上我这屋没有灯，只从门玻璃射进一些走廊的电灯光。我在屋内往来地踱着。七点钟来了一个战士，把我的行李、毯子一齐抱走，什么也没有讲。这是干什么？过了 20 分钟又给我送回来，并叫我跟他走。走进一个屋子进行登记，姓名、年龄、籍贯等。这时过来一个红脸膛的人，有三四十岁，满脸皱纹。他叫我脱衣服检查，并把我皮鞋上的带子，扎裤子的皮带都留下了。我明白了，这是看守所。昨天想到长春住什么招待所都成泡影，现在我是一个犯人了。

我住的这个屋子是洋灰地，地下有个大窟窿。我往下一看，发现里面有一团被服线，我拿出来一条，有一丈多长，有用，保留起来，我把被服线偷偷放在饭包里了。

过了不久，尚传道、岳希文、王焕斌和我搬到了小红楼。我被指定住一个小屋子，屋里放着一个木架子，上边有个草垫子，日本人叫"他她蜜"，是我的床。我往四周一看，墙上有个小洞，我赶紧把藏在裤兜的被服线取出来，塞进了这个小洞。

起床、睡觉没人管，第二天早上到吃饭的时候才起来。不洗脸，也不洗手，下床就盛饭，是很稀的高粱米粥，汤多米少，一碗豆腐渣吃不饱。我看王焕斌他们也吃这样的饭。他们吃饭时都要求盛饭的战士："给我一点干的。"战士回答："都一样，没有干的。"

一天午后，我正躺在床上睡觉，突然进来一个挎手枪的战士，他叫我起床。我随他出了小红楼，过了办公大楼，进了局长室。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个40岁的干部，脸有些苍白，他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这个人很沉稳，看了看我，问："你叫关梦龄吗？"

"是的。"

"从吉林到这多少天了？"

"12日到的，有半个月了。"

这位是什么人？我要明白一下，不然说话不方便。与中级干部谈话是一种方式，与高级干部谈话又是一种方式。

"我可以知道您的职务吗？"

"我是公安局的秘书长，今天我代表局方与你谈话。"

"那好极了，我一定好好回答。"

"咱们这不是审讯，随便谈谈。"

没有题目，他问了许多特务内幕，又把宽大政策给我讲了一下，说着随手从抽屉里拿出来一本旧的文件，他打开之后，对我说："这是我们学习的文件，你看……"

我走过去，他用手指着画了红道的词句对我说："这就是对待反革命分子宽大政策的具体实施……"我按着他的手指一行一行的往下看去，后面还有对叛徒的宽大，凡是有悔改表现，均不处死。无论什么犯人，一律不准用刑讯、逼供、拷打等。

"我们的这些政策从上而下，任何人都要遵守的，不准任何人违犯。因此你要相信宽大政策，好好坦白。坦白从宽，否则就不好办了。"谈到在吉林的情形，他说："我看到你填的表，'以特反特'，这是你的看法，我们人民就可以反特，不用'以特反特'。不过你有这种心情还是好的。听说你在吉林协助政府'找'了不少人，这种表

现在长春还要发扬。"

接着他又问戴笠的一些情况，我说了许多，最后我说："将来有时间，我把戴笠的事写一本小册子。"

他告诉勤务员把我送到李副科长处，我随之出来了。我问勤务员这个秘书长姓什么？他告诉我："姓龚。"

回到小红楼监房，感到同龚秘书长谈话很痛快，对宽大政策有了一点底儿。人在失意或在倒霉的时候，有人对他说句同情的话，关照的话，都是雪里送炭。当一个人成了犯人，有人对他和蔼一些，客气一些，他都受之有愧，感到特别的温暖而备受感动。

我要求看守所给我买纸烟、花生米、咸菜，下午都买来了。是那位张看守长亲自送来的。这位看守长老是板着面孔，从没有一点笑容。他对犯人毫不客气，犯人都怕他。他把东西往屋里一放，一句话不说就走，什么"辛苦了，谢谢。"这套话他听都不听。以后我也不说这些客套话了。

与看守的战士在夜里聊天。他们知道我们这几个住单人号的是职位比较高的，因此他们对我们比较客气。我问他每天吃什么？

"也是高粱米粥。长春一解放，老百姓都没有吃的，为了救济难民，粮食不够吃。我们也吃稀的，与你们一样。"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呀！不仅仅是犯人喝稀米汤，军队也是如此！这可与国民党的军队不同，八路军这样做可以说是与人民共甘苦。既然如此，我喝米汤也是应该的。

一天上午，我发现窗前有一个纸条子被风吹得飘荡起来，这个纸条子上有"小心……"字样，我一想，大概是我案情重要，因此在我这屋的窗子前面贴着"小心看守"，以提醒看守对我注意，以免逃跑或发生意外。我趁着看守不在，问隔壁的左炎："你窗前有纸条没有？"

"没有，屋里看不见，窗户前而不准去。"他不知道什么意思，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想了半天，安慰道："告诉看守注意你，并非是坏事，你不要过份的瞎想。"接着他又告诉我长春警察局局长袁家

佩也来了，“你见到没有？也在这个楼上住。你知道不知道，他的小老婆周小姐是八路的地工人员。在解放前五天，袁家佩亲自送她出卡哨，说是去沈阳。到了卡哨，卡哨长韩伯敏不准他的汽车出去，听说后来给你打了电话，你叫韩伯敏放他的汽车出去。周小姐一出卡哨就回到了解放区。五天以后长春解放，袁家佩在公馆里坐着，打电话给八路军，自报家门，要八路军抓他。于是这里派人把他接来了。袁家佩到这儿已经日子不少了。”

我问：“袁家佩知道不知道周小姐是八路的地工人员？”

“是后来知道的，因为他的许多重要文件都被她拿走了。”

“周小姐工作搞得好哇，我与袁家佩住得很近，每次开舞会，袁家佩都是一个人来，他的太太从不露面。我当时有所怀疑，问袁家佩，他说内人身体不好。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位周小姐是什么模样。”

左炎告诉我警察局一分局局长李海涛、二分局局长张宝田、三分局局长马衡、四分局局长杨双贵等人都来了。马衡现在公安局的感化所，那里比这自由，人比这里多。

我们楼下还有许多监号，押的人比楼上的多。楼下的犯人在院子里放便，楼上的岗也随即撤到楼下。我站在床上，一个一个地数，有 60 多人。有中统长春区秘书刘芸峰、军统长春督察处主任秘书印匡时、警察局外事科长孟益龄等。有一次我到前面办公大楼谈话，遇到他们晚饭后放便。只要有一个看见我，就都知道我来了。不管看守所的纪律有多严，犯人照样串供。

前面还有一个圆楼监房，这个监房是日伪时期建筑的。有楼上楼下，各屋没有窗户门，一律是铁栏杆。一个看守站在圆楼中间的台子上，楼上楼下的犯人一览无余。现在楼上押的是反革命犯，楼下押的是刑事犯。刑事犯不多。

少一个负担，多一个顾虑

人民政府发表一批战犯的名单，从蒋介石开始共43名。接着北平解放。我的家不知怎么样？大老婆、二老婆、父母及孩子是不是因为我要受很多牵连？我的心很挂念，自己又不能要求写信，只好默默地祝祷父母二位老大人身体健康，在梦中相见吧。

在小便所里遇见袁家佩，他的腿有风湿病，我问他有什么消息没有？他说："咱们都是小战犯哪，不好办呀！"

我摇摇头，不同意他这种说法。

他说："你不信，将来看吧。"

我看袁家佩很悲观，身体又弱，最近能释放还没有问题，日子多了，危险。

没有几天，岳希文迁到楼下与一般反革命住在一块了。不是优待吗？怎么又不优待了？王焕斌因为家中有支手枪没有交待，他老婆交待出来了，认为他不老实，也不优待了，把他押在我右侧的普通号。他那屋有督察处的后任情报科科员郑鑫，我与他们只隔一间便所，这便所只有我去小便，别人不去。岳希文下楼，袁家佩顶了他的缺。我们这一侧的次序是：袁家佩、左炎、我，小便间，王焕斌，最后一个屋子也是普通号，押的是王心一，他是军统外围分子，长春香烟厂厂长，还有其他几个人。

12月1日早晨开饭的时候，我照例把门推开，把饭碗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一个战士提了桶稀饭走过来，他对我说："今天不给你吃这个饭了，回头有人给你送饭。"

不大一会儿，另一个战士挑了一桶饭和一桶菜，放在我的门口，他把对面的门也打开了。这个战士送来的是炖豆腐，高粱米小豆干饭，闻着很香。他给我盛了一碗干饭、一碗菜。这时门前的看

守对我说："你们这几个人的饭与干部一样。那些普通号仍然吃稀的。"

我吃得很香，感到一样的反革命，王焕斌、岳希文、印匡时等人吃稀饭，我们这十来个人吃干部饭，问心有愧。我回忆起1948年7月，长春饿死数万人的时候，长春督察处押了一百多犯人，内中有几十个"政治犯"。这些犯人春天吃高粱米干饭，后来改吃稀饭，7月长春粮食奇缺，囚粮困难，又改喝米汤，最后吃霉烂的釉子。当时我对管理犯人伙食的特务说："只要这些人饿不死，吃什么都没有关系。只要他们有一口气，咱们就能交差。"

那时，"政治犯"在特务看守所吃不饱，睡不好，受尽了折磨。后来这些人都被我们杀害了。现在我受到共产党如此的照顾，越发显得自己从前的卑鄙和残忍。

我在屋里反复思索，我应该干些什么呢？政府这几天对我照顾得很周到，自己不能无动于衷，装聋作哑，应该有所表示。正在这个时候肖干部来到我这屋子。我求他给买二百张稿纸，一支木杆钢笔，一瓶蓝墨水，晚上他给我买来了。我问他："我想写点材料，不知有人看没有？"

"有人看，你写吧！"

第二天早饭后，我开始写第一个题目，取名：国特内幕。包括中统与军统，把中统的特务机关的一切材料，尽我所知，写了一个大概；第二部分写军统，写沿革，人事，活动，组织及经费等。每天上午写六七页，午后写两三页。不断有人来取材料，有一次只写了三页也拿走了。我知道这些材料有人看，于是我更细心地写了。这部分材料写了十多天，共写一百多页。

快要过新年了，我在屋里想，平津快解放了，北平特务组织应该检举。第二天早上我对看守说："我要和政府人员谈话。"他说可以。吃完早饭就把我提去了。我希望与高一级的干部谈话。在态度上高级干部的修养要好一些，不致于那样盛气凌人，一开口就是"你们……"

我跟着看守到了前面办公大楼，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人坐在沙发上，他叫我坐在他对面，我问他："看报纸，北平与天津快要解放了？"

"对呀，快要解放了，形势发展得很快，你要努力争取呀！"

我原来的意思是，如果干部对我的态度好一点，我就谈北平的特务组织，如果态度很严肃，又骄矜自恃，好了，我就不谈这个问题。顺便要求买几本马列主义书籍。这位干部的态度还不错，我就说了："现在平津还没有解放，我想把这两个地方的特务潜伏组织写一下，以备解放后，好逮捕。"

"那好，你马上写！用电报的方式写这份材料，材料写好我们用电报拍走！"

我马上回到监房写这份材料，我检举了军统局在北平印制解放区伪币的金城印刷局；又检举了西四牌楼路西龙井和点心铺与特务岳梓宇的关系；北平站另一个潜伏地点在板桥胡同十一号；检举天津秘密组组长于书绅，他在日租界胜得里，利用一个饭馆子作掩护潜伏等。

不知哪一天晚上九点钟，我刚要睡下，一个姓于的看守，把我的门骤然打开："姓关的出来！"

听这语气很厉害，我穿上大衣跟他出了屋子。我忽然一想，九点钟，不错，我杀你们的人，也在夜里九点钟。不用说这个时候提我，是要杀我！好了，我回头看了他一下，他手中没有武器，不会在后面给我一下子。

出了小红楼又上了办公大楼，进了一个小屋。一个没有见过的干部坐在那儿，他很慢地问："你们督察处有没有布置在长春的潜伏组织？"

我一边回答他的话一边巡视屋内的一切，看看有没有刑具：过电的东西，灌凉水的板凳……都没有。桌上只有一部自动电话。我心中平静了。大概有人说督察处在解放前有潜伏的部署，我说没有。我建议："再找董顺球问问，他是当时的情报科科长。"

不一会就回来了，这又是一场虚惊。昨天夜里作梦，梦见政府派人抓我，我藏在一家老百姓的天棚上，被政府人员发现，把我从天棚上往下拉，我怕掉下来，便惊醒了。

下午，吉林师管区司令李寓春被捕到这里，他戴了一副脚镣，穿一件大黑布棉袍，自己在一个小黑屋。那屋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门，是重禁闭室。与我是邻居，在我监号的里边。他一咳嗽，我与王焕斌都听见了。他要求看报，看守所给了他一张《长春新报》。他在门口看，屋内没有光线。他拿着报纸念了起来。这是给我们听呢！于是王焕斌问我："雄飞（李寓春的号）兄来了吗？"

我说："来了，我方才看见了，脚上戴着东西呢。"

过了一天，张看守长又把李寓春调到尚传道的隔壁，一个很小的屋子。不一会儿，出了事，看守的战士说李寓春把被子撕了，企图不轨！这下子麻烦了，张看守长把被拿走，把李寓春吊在小屋子的门上。怎样的吊法我不能出去看，只听李寓春的脚镣子在空中乱响，显然两脚不是站在地上，并且李寓春用哀告的声音说："看守长，我再也不敢了，饶恕我吧！……唉哟！受不了，唉哟……"

小楼上的犯人都听见了，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们失败了，落到人家的手里，给上什么刑也得忍受。其实这样用刑还不如打一枪痛快，今天给李寓春来这个，也是给我们看。叫人不寒而栗！在吉林听说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现在可以说不打好人。意思就是说打的都是坏人。我想起前些时候龚秘书长给我看的那个文件，说不准刑讯，那么这吊起来是干什么呢？他们这些举动上级干部不会知道。我看到张看守长就害怕，尽管他没有骂过我，也没有打过我。

我在吉林写过一份简单的坦白，只 20 多页，这次应当写一份比较详细的坦白书。我没有纸了，又得要求买纸。肖干部对我说："以后写材料由公家发给你纸，不用你自己买纸了。"

不一会儿拿来一些纸，都是黄色的粗纸，仿佛手纸似的。长春解放伊始，什么物资都缺乏。

我从八岁开始写，一边写，一边请示政府人员如何写。写到

1948年在长春督察处杀人的那些罪恶，我有些犹豫，督察处杀了许多地工人员及进步人士，每次都是我在场指挥。可是督察处处长张国卿也参加了呀！这个罪恶应该由张国卿负全责，还是由我负全责呀？我认为自己是中间的传达机关，上边有郑洞国批的公事及张国卿下达的命令；下边由督察主任和一些外勤人员具体执行。督察处没有我一样杀人，至于我呢，是奉命实施。这个责任我不能全负，也不能一点不负。写到这个地方我放下了笔，思想斗争起来。想起在吉林对朱副处长承认杀了四五十个人，觉得太不慎重。现在把我杀人经过一一写出来，我的心便忐忑起来。

正在这时几个穿蓝棉制服的干部来到我的监号窗前，头一个高个，我认识他叫王恒烈，他们在我窗前站住，王恒烈说："这不是关梦龄吗？"他们一齐对我看了一眼，在我窗前走过。看样子王恒烈还是一个负责干部。我心想，好哇，今天你当了干部，到我面前示威来了。我回忆以前：有人密告他是八路，并且说他在长春第一次解放[1]给共产党做工作。八路军退出长春时，把四支手枪存在他家。还说他与他表兄高心鲁用长春东兴粮栈作掩护进行地工活动。我根据这些情况与密告，以及我自己的考察，断定高心鲁与王恒烈都是共产党地工人员。由于高心鲁是我的盟兄弟，私交甚好，没有逮捕他。一直到1948年6月高心鲁、王恒烈先后奔赴解放区，我仍没有抓他们，因为高心鲁的母亲是我的义母，因此我不能下手。王恒烈是高心鲁的表弟，我也因为老高家的关系没有下手。但是这些情况我也没有对他们说，我如果把这些话说出来有两种不好：第一，被我的上级知道，"包庇八路，勾通奸匪"，这就是死罪；第二，我说出来，高心鲁、王恒烈二人一定害怕，或者认为我要敲诈他们，那也麻烦。

过去他们做地工，利用我的关系在长春大摇大摆，大查户口，到我的公馆躲避，坐我的车子逛大街，还经常到督察处找我。人们都知道高心鲁是关梦龄的盟兄弟，谁敢不高看一眼？今天说来他们是利用我，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任务。他们胜利了，我失败了。我杀

人太多，罪太大，提他们的关系与我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叫政府认为“邀功”。相反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我必须详细的交待出来，不然他们会揭发我，共产党是不讲人情的。再加上这楼上楼下押着几十个督察处的特务，坦白之后再追到我身上，我再交待就迟了。

关于我在督察处那一段，我没有写应该由谁负责任，反正就是那么回事，政府怎么看是政府的问题。写了半个月，150 多页，交给政府，肩上少了一个负担，可是心理上却多了一个顾虑——都交待了，按照我的坦白，拉出去枪毙够条件。于是又有点后悔，可不写又不行呵！矛盾。

锒铛脚镣

每天晚上趁看守不在甬道上，董顺球、王焕斌就与我打“电话”。一天董顺球告诉我：“听说陈牧也来了，在四平抓到的。”我说：“早来晚来，早晚都得来。逃走的太少了。”

杨成荣没几天就看不见了，我的这个勤务兵可能是释放回家生产了。

有一天，看守战士把董顺球提出来扫地。他扫到我的门口，趁看守没注意，他把我的门一开，扔进来一个苹果，一个很好的大苹果。我拿起来擦了擦，偷着吃起来。我一边吃一边想，有家眷在长春倒是好，还有人送东西，我的家在北平，离这太远了。

晚上董顺球在他那屋对我说：“尝尝苹果吧，长春的水果是很缺的呀。”

“你给我这个苹果，我心里很高兴，象征着我的事将来会平安结果。”

“对，一切没问题，我们这些人都认为脑筋最好的就是你。到什么时候，你都会有办法，不会吃亏。你看现在，你睡床上，我们躺在

石灰地上；你吃干的，我们喝稀的。将来更不一样，现在这里分三等犯人，第一等就是你们这几个人，住单房间的；第二等就是我们和楼下的这些人；第三等是前面圆楼里的反革命犯，在那比在红楼还厉害。”

一天，张看守长在董顺球的窗前大发脾气："给你们报纸看，你们在读报中串供，乱说话，你们是吃草的还是吃饭的？你们若是吃饭的为什么不守制度？一个人不干人事那就不如吃草的。今天这是警告，要注意！”

我一听，这是指张飞骂李逵，是批评我们这几个监号。可能我与董顺球谈话被他们听见了。犯人嘛，什么都要忍受，我想这还是好的，厉害的恐怕还在后头呢。

我想将来一定有那么一个场面：一个大屋子，上面坐着法官，旁边坐着记录员，另外坐着旁听人，两边站着武装战士。把我提上堂，对我公审。把督察处杀人的事一件一件来审。对于这种局面我抱定宗旨，问什么答什么，一切杀人罪责我一概承认，都是我关梦龄干的。好汉做事好汉当，决不拖泥带水叫人看不起。给法官找麻烦那又何必呢？怕死不等于不死。

不久，我看了冯至写的一本《平凡的真理》，上面只有两句话我记下来了，“往坏处打算，往好处争取。”我振作了精神。我认为到长春一定要枪毙我，但我要往不枪毙的方向争取。

快要过春节的时候，我又写了沈阳地区军统特务材料 80 多页。还应该写什么呢？要大力争取，不然自己就有生命之忧。

春节过得很难，我又吃一般犯人的伙食了。只吃了两顿有几块肉的菜。除夕之夜，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香烟慢慢地回忆过的许多个春节。

1945 年的除夕，“八・一五”光复后，回到北平。与父亲母亲及弟弟团聚了。作为一个接收人员真是扬眉吐气，趾高气扬。住着大房子，坐着高级车，一切应有尽有。同事和朋友们在除夕的夜晚到我家欢聚，屋内温暖，人声欢笑，父亲看到这样的豪华生活，感到十

分的愉快。第二天，大年初一，一件不快活的事发生了。早晨勤务兵从门口拿进来一张红色的贺年片，递给我一看，是八路军北平警备司令杨成武送来的。我很惊讶，八路军的贺年片怎么能送到我的大门？这是八路与我开玩笑吧？我把这张贺年片给北平站送去，并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马汉三（军统华北负责人），他对我说："不是单单给你一个人，北平高级军政人员公馆门前没有站岗的都给了。我们要针对这件事来布置我们的工作。"

1947年的春节，在北平特务看守所过的。因为华北特务内部闹人事磨擦，勾起我的贪污问题，戴笠把我押了起来。但是由于我在被押之前是军统局北平肃奸委员会的总务科科长，直接管理看守所的总务，这次被押，看守所所长以下的人员对我另眼看待。我受了优待，平日吃的喝的不是一般犯人所能享受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在除夕之夜，我与在押的特务赌博，喝酒，闹得也很热闹，并没有感到难过。

1948年的除夕，在长春度过，那晚上，因为逮捕政治犯庞静，一夜没有离开督察处，直到第二天，初一下午才出去吃饭。为了反人民没有过除夕。

今年的春节，我在公安局看守所度过，失去了自由，一切也谈不到了。1950年的春节在哪儿过都是问题。不敢多想，前途异常暗淡。

我把督察处历次杀人的地方绘了一张图，并且把活埋长春大学学生王恩孚等二人的地方一并绘图交给了政府。接着又写军统局华北与西北区的材料。东西好坏可以比较，我交待的材料可以从其他特务的材料中得到证明。

在情绪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些书，一些经典著作的书。开始看不进，日子久了，也能看了。有的词句我还要背诵，以备将来好引用。小说也看了几本，不过是当着消遣看的。

过了春节，看守所内的空气有些紧张。一天晚上，张看守长拿着几个锁吊，钉在我们这几个单房的门上。过去是没有的。呵，现

在要锁门！同时到我的屋子，把玻璃窗钉死。这一钉玻璃窗我的心更难受了，不仅仅是不通空气了，而是要对我加强管制了。但有趣的是，他这一钉窗户倒为我解决了一个问题，在我刚到这屋的时候窗外有一个纸条，写着"小心……"我认为是对我"小心看守"，今天晚上因为钉窗户，这张纸条掉下来了，我一看是"小心玻璃！"

门上锁、窗户钉死。天气逐渐的暖和，屋里闷热，混身发痒，不能洗澡，只在春节的时候推了一个秃头，别的什么也谈不到。我在黄昏的时分站在玻璃窗前，自己小声地念着：

这无尽的岁月，
无期的徒刑，
回忆过去，感到异常的惆怅；
瞻望未来，充满了痛苦与失望。
恐惧与悲伤，
萦绕在我的心房，
许多的问题无法去想……

我想起许多死去的亲友，有的做过大官，是榜上有名的人物，可是一死了之。人生百年不过一死，我这算什么呢？两眼一闭，万事皆休。我想到应该自杀，藏在墙里的那条被服线可以帮我"上天堂"。但是又想，现在还看不出共产党要杀我。那么到看出来的时候来得及吗？每天考虑怎么死，这样的日子是最痛苦的。

在2月底的一个晚上，大约有十点钟的样子，我刚睡下，张看守长来了。他把我推醒，叫我拿东西，穿好衣服。我很惊讶，我没有拿东西，我拿出一支纸烟，取出火柴点燃，我对张看守长说："没有关系，我知道有这么一天，一点也不使我意外，希望来个痛快！"过去东北枪毙土匪时，土匪花钱给监斩的人，求他执刑时，不用炸子，用一般子弹，把头部穿个眼，不至于把脑袋炸碎。所以土匪临死前都说："朋友，来个痛快！"

张看守长也没有听明白我的话，说："没关系，快点吧！"我把东西收拾起来说："算了吧，这些东西我不要了！""拿着吧，你不要行

李，怎么睡觉？”

我听还睡觉！便赶忙把东西包好，跟着他下楼了。

到了楼下的最里边的一个监号。一进屋，尿桶的臊味，屋内的臭味骤然扑鼻而来，使人作呕。屋内有四五个人，都睡着了。看守的战士在铁栏杆外边喊：“把他们推一推，就睡在那吧。”

我把行李一放，没有怎么整理就躺下了。心情非常紧张，这是加严了，痛苦的日子开始了。墙角放着一个尿桶，十分难闻，说不定还要长久的闻下去。我为什么到这个屋子来呢？我坦白的不好？有没交待的被别人揭发了？我藏了武器？翻来覆去地乱想，天亮才迷迷糊糊地合上了眼睛。刚一合眼，就喊起床，什么起床？都睡在地板上。大家从地板上爬起来，把被子一叠，坐在屁股下面，不洗脸，也不漱口。这屋共有六个人，有几个人直看我，似乎认识，但我不认识他们。看守的战士用命令的口气说：“不准说话，谁要说话，就处分谁！”

坐了半点钟的样子，门外响起饭桶的声音。我的肚子也饿了。一个战士送进来一个饭桶，高粱米饭泡在白菜汤里。六个铁碗，六双筷子。有的不是筷子，是木棍、树枝。由我们这屋的那个高个儿接过来，把饭桶放在地板中央。六个人围着饭桶，每人拿一个饭碗，拿一双筷子，用碗到饭桶里去舀饭，一个人一碗，我只舀了多半碗。

这屋的规矩是，不准交头接耳，不准打瞌睡，不准乱看，不准藏违禁物品，不准伸腿（只许盘腿而坐），不准……我心想，最好是不准活着，一切都解决了。

吃完早饭，楼下房子的门锁都打开了，一方面往外送饭桶，一方面放便。一个屋子一个屋子，依次到院中的露天厕所大便。外面站了许多武装战士，都是端着预备放的姿势。我看到一些年轻的战士，看样子还没有上过战场，他们拿枪看守犯人，表现得特别紧张。我对于这些年轻的战士很害怕：一个战士背手提轻机枪，很不熟悉地退子弹，我害怕他们任意摆弄，走了火，把我们打死。那真是冤哉枉也。

放便时，我们六个人一组，要快跑，跑到厕所蹲下就拉屎，完毕，一齐回来。路上不准左右乱看。但是我看到楼下是十二个监号，南北各六个，中间，四周都是走廊，看守在走廊四周监视。每个屋子一个门，一面是铁栏杆，铁栏杆外面是走廊。假如我从走廊经过，一咳嗽，各屋都会知道我下楼了。

楼下的制度可真严厉，可以说动辄则咎。盘腿面坐，目不斜视。这样坐下去，不残废才怪呢。这样不打不骂真够呛。

我们这屋五个人，有四个人见过我。杨光是军统局绥靖第二大队第二中队长，张逸民是中统局长春区第四分区主任，李中候是长春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的小特务，刘新斋是军统局东北特技组的中尉组员，另一个是中统特务姓王。他们说："都知道你在楼上优待，怎么又把你调普通号来了？"我摇摇头冷笑了一下。自己感到很惭愧，为什么对我昨天优待，今天又不优待了？共产党的事情真是捉摸不定。

一天上午，提我到前楼的审讯室。那个姓郭的与往日不同，进屋就喊："你不老实！有许多问题打埋伏，欺骗政府。你考虑考虑，还想争取不？你经过的案件那么多，抓了好几百人，你都交待出来了吗？别人交待了，你还在这装没事呢。对你这样的不能客气——砸上脚镣！"

接着事先布置的两个看守，把我叫到走廊，给我戴上了脚镣。再什么也没有说便叫我返回监号。戴上镣不让站着走路，叫弯腰手提脚镣走路，这样可以没有声音。回到监号，同屋的五个人都感到惊讶。我坐到原处思想极度紧张，情绪紊乱，忐忑不安，内心十分怨恨政府。心想，我这是自作自受，谁叫我自首呢？这就是自首的结果。我的脑袋太简单了，这样的下场叫人笑话。陡地，我想起一个日本歌子《秋词》：自己做错怨不得人，自作自己受；兴奋的歌声，热情的泪流，永远没有归期……唉，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这一辈子走错了这步路，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真是羞愧难当，不如死了好。我想起在楼上墙壁里藏着的被服线，可惜没有带下来，自杀都困难

了。活着难受，死又不能死，闹得死不死，活不活，天哪！我关梦龄已到山穷水尽之时了。

我又想，如果我从解放团上火车到沈阳，沈阳解放到北平。我真的走不了吗？难道说长春这么多特务，就没有一个人逃走了？既然有人逃走，我为什么不能？想在共产党这儿工作已成空中楼阁。我自首受了这样的罪，叫军统局的人知道，他们会指责我说："好哇，关梦龄叛变组织，投降奸匪，把自己同志检举了一二十人，把潜伏组织出卖给敌人，结果他自己被戴上脚镣押了起来，这就是没有骨气的下场！"

千头万绪不知从哪儿反省。晚上睡觉，脚镣把被里划破了；一幅冰冷的铁镣挨着小腿，真是不舒服；夜里小便，还不准脚镣响，要轻轻的拿起来，提着，走到尿桶跟前，慢慢地把脚镣放在地板上，再小便，便完再轻手轻脚的回来。脚镣给我的威胁太大了。

一天夜里，我对身旁的张逸民说："你修修好，把我勒死吧，我受不了这个罪。"

"拿什么勒呀？"他反问我。

"把我这条毛巾撕成两条，接起来，缠在脖子上，扎一个死扣，一勒，就能勒死。"

"你死了，我怎么办？"

"你装不知道。"

"我看你在外面很有两下子，现在怎么这样糊涂！你想想，咱们俩人紧挨紧睡觉，你勒死了，我不知道，人家能相信吗？"他不同意，又说，"打官司，戴一副两副脚镣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马金刀换来锒铛脚镣，没什么。胜者王侯，败者贼。不要难过，脑袋掉了才碗大的疤拉。你过去怎么押人家了？怎么给人家戴脚镣了？心宽绰一点想，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他说枪毙，就上汽车。振作点，别叫人家看我们太孬了。"

又过了两天，看守把我提到办公大楼。还是那个郭股长，叫我写材料，专门写督察处抓人杀人及我经办的案件。我说我都写过

了，说不行还得写。他叫我到一个大屋子去写。屋里没有外人，都是督察处的特务，有杨绍林、董顺球（他们二人是情报科的前后科长），督察处主任秘书印匡时，审讯主任，接我任督察长的陈牧，少校督察郭子襄等，坐了一大屋子，都在低头写材料。把督察处的特务集合在一起写材料，那是暗示我们，自己不写，别人还写呢！并且叫别的特务知道，关梦龄已经戴上了脚镣，如果谁不好好写，也一样戴镣。这些做法我很明白。郭股长告诉一个战士："给他拿纸，叫他也写。"我拿了一打纸，坐在靠窗户的桌子旁边，我想了一下，把已经写过的案件又补充了一些。我写几页，郭股长就拿走几页。我一直写了三天，才把这些案件写完。比过去又多又全面。

3月中旬的一个上午，看守所把扩音机打开，播送长春市追悼被害烈士及无辜死难人民大会的现场实况。大会由长春市市长张文海主持。大会的会场设在中央银行前面的广场，也就是公安局的门前。会上陈列着烈士的棺材。许多烈士的遗族穿白戴孝追悼被害的亲人。张文海市长主祭，读祭文，我只记得有："长春督察处是人间地狱……"接着烈士遗族上台控诉匪特的杀人罪行，要求政府对杀人的刽子手，督察处的特务依法惩办！"点天灯！""杀人偿命！""血债血还！"群众的呼声响彻云霄。我在监号听到这些声音很难过，当众痛哭怕人说装假，我偷偷地掉下了眼泪。自己是杀人的刽子手，是指挥特务杀人的元凶，内心不能无动于衷。我想一死了之，良心受谴责，精神上不安，加上戴的脚镣，多方面不好受，不如死了。

大会结束时张市长说："烈士的亲人要求对这些杀人的刽子手'点天灯'，这个办不到。人民政府没有'点天灯'这一条规定。但是政府一定依照法律来惩办这些杀人的凶手！……"

我心想，人民不答应政府，要求惩办我们，我的材料写完了，戴上了脚镣，等着枪毙吧，不被"点天灯"就算便宜了。然而真若枪毙又害怕了。矛盾非常，心绪不宁。

大会之后，我们这屋的张逸民特别恐惧，脸一阵白，一阵青，他

用手在自己的脖子上比划，意思是他的脑袋保不住了。

我说："你没有我重要，我是注定了的。"

督察处的特务多数都知道自己凶多吉少，死的成分大。在我们这些特务里戴脚镣的不多，只有李贺民、陈牧、印匡时、翟丕翕、郭子襄和我戴了脚镣，别人都没戴。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我们号的刘新斋偷偷对我说："你不要害怕，我认识周总理。最近我就可以出去。我见着周总理把你的事情一说，你就可以释放了。你心安的等几天吧。"

"你与周总理是什么关系？"

"我的叔父与周总理同学。"

"那好极了，你能把我给救出去，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他这一说，我想起 1938 年 6 月在湖北武昌"军委会战干一团学员队政训班"受训的时候，周总理给我们讲课，他讲"第三期抗战与保卫大武汉"；叶剑英给我们讲"游击战术"；郭沫若讲"敌情研究"；田汉讲"话剧宣传"；马彦祥讲"街头话剧"。当时周总理穿着绿咔叽军装，不戴符号，每礼拜给我们讲四小时课。那时他还兼政治部副部长。曾几何时，我们毕业之后就参加了反共，一直反到解放。如果当时去延安，这会儿我也不会是反革命，还可以提一提这些旧事。现在既然反了革命，这些事就不必谈了，否则谈起来更坏，因为听了许多革命理论还反革命，那不是比糊里糊涂的反革命更坏吗？

晚上刘新斋在梦中坐了起来，大声地说："毛主席！我押在这里了，把我放了吧！"

看守战士把张看守长找来，张看守长告诉他要老实睡觉，他还是念念有词，张逸民把他按倒，他也没有睡。这时，我对他怀疑了，他莫不是有神经病？或者是假装神经病吧？第二天他不吃饭，一个劲地喝水，嘴里不住地说一些驴头不对马嘴的话，这时我才醒悟，他说他叔父与周总理同学是胡扯。可是我当时还寄予了希望。

电影"顾问"

一个礼拜三，我被提到审讯室。杨股长和一个穿蓝干部服的人在交谈什么。

杨股长说："关梦龄，我们今天要从你身上了解一些事情。这也是立功赎罪。你要好好地提供。"他说完就对那个干部说，"我还有事，你在这儿谈吧。"

这位干部有三十二三岁，白脸，很瘦。他让我坐下。我戴着脚镣感到很难堪。我轻轻地把脚镣放到石灰地上。地上依旧发出了叮哩锒铛的响声。他拿出一盒纸烟，给我一支，他吸一支。接着他问我的经历。他对我在军统受过两次特务训练很感兴趣，问得很详细。他随意地问，也不记录，就像闲谈一样。我观察他的言谈行为觉得他不是审讯案子，而是在我身上找什么罪行。我一边答复他的问话，一边端详他这个人。他是个什么干部呢？

"你写的'国特内幕'，我看见了，写得很好。你看过《腐蚀》这本小说没有？"

"看过多次，是沈雁冰写的。"

"这部小说写得怎么样？"

"对特务的一切他下了不少功夫，不与特务接触是写不出来那样的东西的。"

"你看《天字第一号》的电影了吗？"

"看过，在 1947 年 2 月于北京看的。我在解放前不怎么看电影，因为这个片子是宣传特务工作，一些军统的人叫我去看，我才看了一遍。"

"怎么样？"

"作消遣解闷倒可以，从特务技术上说，那是谈不到的。因为导

演屠光启对军统特务知道得太少。编剧的人凭主观想像搬到银幕，给社会上的小姐、少爷们当故事看可以，因为他们不懂沦陷区地工是怎么个搞法。看完之后大加赞赏。可是叫我们这些特务一看，就知道是胡扯，没有价值，既不合情理，也不合特务的活动规律。”

“怎么不合特务规律？”

“比如说《天字第一号》上收音器藏在古瓶里，这是不应该的。古瓶是人们欣赏的东西，客人来，要拿起古瓶仔细端详，十分容易被人发现。通常可以把收音器放在沙发里，茶几的下面。再有，电影上一个情报员化装成有钱的少爷，另一个情报员化装为乞丐，少爷走出公馆的大门乞丐向他乞讨，这个少爷很慷慨地给了他五元钱，这个纸币的面额太高了，应该给一些零钱，别人看到不会惊奇。还有女特务要从沦陷区脱逃，在临走之前，她计划把司令、参谋长都打死，她用了一个离间之计，说这个参谋长通国民党，当司令申斥这个参谋长的时候，她给了这个参谋长一枪，接着大声说：‘您何必亲自打他呢？叫我们去办吧。’

“她这是给外面的警卫人员听的，使外面的人以为是司令用枪打死了参谋长，接着她又要打司令，司令一看她要打自己，也找枪，她匆忙之间给了司令一枪，没有打死。她急忙向外逃脱，跳上事先预备好的汽车，但是没走多远她便被后面的机关枪击毙了。她用这些办法能行吗？不行。应该先用一个离间计，叫司令把参谋长杀了，之后，叫司令送她到一个地方，再把司令打死，自己也逃脱了。这很简单。真如电影那样，把参谋长打死，她自己是走不脱的，击毙倒好，就怕没有被击毙，击伤了被捕，是投降啊？还是坚持？都是不可意料的事情。所以这个片子的特务技术是谈不到的。如果搞电影的能找到一个有经验的特务，了解一些技术，电影会既精彩，又符合特工规律。”

我说这一段话，他一直看着我。最后点了点头，接着他问我：“解放后你们怎么搞潜伏工作？比如一个女特务，原来是指定她潜伏的，可是她看到人民政府号召登记了，有许多特务登记了，她害

怕也不想干了，她要登记。这时她找到她的上级，一个站长，这个站长要对她采取什么态度呢？假如你就是这个站长，我就是这个女特务，你坐在那里，我从门外进来……"

说着他邀我与他一起表演这个场面。我坐到桌子后面的椅子上，他从门外进来，站在我的桌子前面，用吞吞吐吐的声音称呼："关先生！"

我也演了起来："有什么情况没有？你们厂子去了新干部没有？"我拿着纸烟，歪着头，两眼对他似看不看地问着，语气拉着长声。

"没有什么情况，就是动员反动党团要登记，我……"

"你什么？不要听这一套！这是诈我们，真的掌握情况，还用号召？难道他们对我们还会有什么客气？你就是胆小！将来你要后悔的。假如我和你一样咱们就不用搞了。咱们的一举一动，上级派人在背后监视呢，如果你在这个节骨眼大意了，你的小命……"我从腰里掏出来一打钱给"她"："拿去，这是下月份的津贴。"

表演到这儿，我们又恢复了本来面目，各自坐到原来的座位。他又问我："你们特务里有没有杀鸡给猴看的事情？"

"有，一般情况不用。都知道特务纪律厉害，特务制裁特务也不客气。"

接着他又问了我许多特务的生活习惯、举动、言行，我谈了不少。我受过两次特务训练，又在特务机关很多年，尤其在北京"北平肃委会"充总务科长的时候，时常接触戴笠，使我对国民党特务这一套有所了解。我毫无保留的对他谈了。我以为他是作家，要从我身上收集素材写一本反特小说，后来我又觉得不像，可能是话剧团的导演来体验生活的。

我问他的姓名，他告诉我："姓伊，叫伊明。是东影（即现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

最后他说明了来意："我想写一个东西，假设在天津中纺里有一个女职员，她在解放前被人介绍参加了军统局天津站。解放后这

个女特务看到反动党团登记，她也想去登记，可是特务站长不答应。这仅是一个计划；另一个计划，打算写个潜伏站如何被公安机关发现破了案。你帮助我想一想，怎样才能被公安人员发现？"

我告诉他："那要看把这个潜伏站设在什么地方？潜伏站都有掩护的商号，商人，从这方面一点一点地深入比较好。"

谈到12点了，他要回去吃午饭，临分手时他说："我下午还要来，我知道你争取得很好，再努力争取，一定很有希望。"

"咳，戴这么副脚镣，一切都否定了。不过不管政府怎么看待我，我是自首的，凭良心我绝不欺骗政府。"

回到监号呆了一小时，心想这样的谈话没有什么顾虑，吸着烟，喝着茶，谈呗。伊明是个导演，他对我说："我从解放区来，我曾经找过一些军统的人，但是都没有你知道得多。"

我暗道，军统局的高级特务在北满根本没有被捕的，找一些外围分子什么也不知道，当然会使他失望。

下午一点把我提到看守所，杨股长对我说："今天给你下镣，以后还要好好争取，不要放松自己。"接着一个看守所的人把脚镣给我下了。自己感到说不出的感激，我忙对杨股长说："以后我一定要继续争取。"

又到了前楼，与上午一样，进了那个屋子，伊明早已等在那里。一见面，我说："下了脚镣，轻快了。"

"思想上也愉快了吧？"

"愉快了。"

我内心知道，下镣这件事与他从中婉说有关系。

坐下之后，接着谈，他假设了几种方案来破获军统的潜伏站，叫我参加意见。他设计潜伏站用一个饭店作掩护，这个饭店的茶房喝醉了酒，和客人吵架暴露了身份。

我问他："在破获这件案子的时候，公安人员的力量占几分？群众的力量占几分？先规定出来就可设计。"

他说："群众力量协助破案占四分，公安人员的力量占六分。"

我又说了几种情况，他说可以研究。虽不能把特务的一切东西都反映到银幕上，但是银幕上要有特务的东西。我在特务技术，潜伏站的组织、通讯、经费、掩护、化装等方面谈了很多。共谈了三天。最后一个下午，又把军统特务机关的一些活动规律、术语写出来，交给伊明。

过了两天，伊明和另一个干部来到看守所的监号，到处体验犯人的生活。伊明看到我，与我点了点头。他们在看守所呆了三天的样子。

第四天上午又把我提去，谈了特务走路、穿衣服、坐车子的习惯。那一个干部好像是电影演员吕班。我说了许多习惯："军统特务一般都不戴帽子，留着长发，发上放油，许多人的头发锃亮；衣服在蒋管区都穿藏青中山装，夏天是灰派力士料子的中山装；多数特务身后佩带自卫手枪，皮鞋都是发亮光的；如在沦陷区就要化妆了。特务们走路比较快，两眼向左右审视，走到地方还要向四周看看，这是习惯，特别是外勤人员更是如此。这是防备有意外，好作预防；坐车子，戴笠通常与司机一块坐前座，一般特务也有这样坐的，把警卫人员放在后座。这样坐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有情况在前面能先发现问题，即可指挥司机把车子开走，如果在后座就来不及了。"

伊明叫我学一学戴笠走路，我在屋子里走了几个来回，又谈了一会，我就回来了。

伊明导演的这部片子（也是他编剧）名叫《无形的战线》，多次修改，演出后受到公安部的嘉奖。1951年长春镇反时，把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个职员苗佩然逮捕，押在我一个屋子，他说："《无形的战线》这部片子，拍摄好了之后，拿到北京去审核。片子里有一个审讯员对捕获的特务站长李某审讯的镜头，审讯员对特务站长说：'你要知道人民的力量是反抗不了的！'说着便用拳头一拍桌子。这个镜头被周总理看见，受到了批评。后来这个镜头又改了。审讯犯人不准耍态度，那样演是歪曲政策。"

我对《无形的战线》采纳了我的一些意见感到高兴。

尝到了犯人的滋味儿

4 月 23 日南京解放，接着全国许多地方相继解放。报纸上大字标题报道这些胜利消息。我没有什么高兴的，认为这些事对我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说全国解放能够放我，我会迫切希望全国解放，但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共产党与国民党和谈，共产党提出的条件太苛了，国民党不干。这期间我看一切事情都从能不能释放出发。

关于国民党失败的问题，在号内反省的时候我细想过：是蒋介石个人昏庸无能吗？是他的部下不好，"一团糟"吗？是政治腐败，贪污混乱所致吗？是军事落后，官兵士气不振吗？国民党执政 20 多年，一无是处，根本没有一点好的事情吗？这些问题，翻来覆去地想，也想不通。

5 月的一个晚上，电灯已经亮了。看守所提刘一之，把他的东西都拿走了，接着在看守所门口给他下了脚镣。在犯人的心中，下镣如果不解走还好，如果下了镣走出大门，那可能是枪毙。刘一之的脚镣下了就走了。第二天夏芳庭也走了。他们俩人紧挨着走，我明白了：刘一之是督察处的上尉侦审员，夏芳庭是长春警察局八分局局长。他们俩人都是暗杀李兆麟将军的帮凶。1946 年 1 月，军统局在哈尔滨有一个潜伏小组，组长叫张伯生。张伯生忽然失踪了，潜伏小组的组员断定是八路军给暗害了。于是就自发的，没有军统的命令，自己作了行动工作。他们选择了一个对象李兆麟将军。李兆麟将军在哈尔滨很活跃，好跳舞，各种交际舞会都出席。特务找了一个漂亮女人，是混血儿，叫她把李兆麟拉拢上。1946 年 3 月 9 日，这个混血儿请李兆麟到哈尔滨道里水道街光明医院楼上见面，李兆麟没有多想就到了那里。这个混血儿与李兆麟饮酒，不一会儿

这个混血儿走了出去，于是，事先埋伏好的刽子手从内室出来，用斧子把李兆麟杀害了。然后，这些刽子手一齐到了长春，转沈阳，又赴锦州。他们在锦州见了东北特务头子文强，文强又给他们分派了工作，这内中就有刘一之和夏芳庭。虽然他俩不是主要分子，但是，他们是刺杀李兆麟将军的成员。夏芳庭在“北平特警班”受训，1947年派到长春警察局，1948年夏升充第八分局长。这次他们二人一齐从长春公安局押走，我想一定是解回哈尔滨，可以说注定死命。

6月的一个晚上，先把李中候从监号提出，过了一会儿又提我。我一进屋，郭股长就大喊：“你每天在号内有什么活动？”

“我没有什么活动。”

“你与张逸民两个人都说了些什么？”

“都是在长春的一些事情，他说中统方面的事情。”

“你是军统，他是中统，在外边你们就认识，现在你们在这里还交换情报吗？”

“根本没有这回事。”我内心非常抵触。

他很严厉的批评了半小时，叫我回到监号立正站着，不准睡觉。我回到监号立正站在铁栏杆边。看守战士对我也严厉起来，不准我动一动。我一再压制心中怒火，我记住“人在屋檐下，哪敢不低头”这句话，光棍不吃眼前亏，忍耐吧，小不忍则乱大谋。无论如何绝不能因小失大。内心的气愤无法形容。我想起1946年被押特务看守所。当时的看守人员对我十分客气，同囚的特务张霞飞对我说：“你看看守对你多客气，像你的勤务兵。他希望你出去派他一个好差事，伪满时，我也住这个监狱，现在我又住这个监狱。过去因为抗日，现在因为贪污，将来八路来，我还得住监狱，因为反共。我这一辈子住监狱很习惯。伪满时这里押的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人，连哈尔滨共产党办事处处长林枫都与我同在这里押过，直到1945年我们才一块从这里出去。当时这里的看守厉害呀，对犯人非打即骂。后来大家对这些看守说：‘告诉你们，你们的洋爸爸长不了，小心你们的后事！你没问问我们是干什么的？’以后他们有点老实了。

据说明朝有一个总兵元帅被人陷害押到监狱，他一进牢房，看守便叫他跪下，并往他身上小便，尿了他一身，他说：'吾曾统兵十万不知狱吏之尊。'在外面不管你是什么王爷、侯爷，押起来都是犯人。"

如今我也晓得"狱吏之尊"了。我想，国民党如果能回来，特务机关又不追我自首这件事，我首先要对看守所这些人予以报复，如果他们跑到解放区，我要布置一个潜伏组去行动他们！这样对我侮辱实在无法忍受。我从下午七点站起，一直站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开饭的时候我的两脚已经肿了。吃完早饭，坐在地板上，两腿麻木，如同失去知觉。自己偷偷地掉了几滴眼泪。自我安慰道：打掉牙吞到肚子里，忍吧。

在监号里最大的困难是大便。每天放便在早饭后，晚饭后。另外的时间有大便要报告看守的战士。看守战士要追问："为什么在大便时间不大便？现在要大便，挑什么皮！搞什么乱！"先予以批评，再向看守所报告，看守所还不一定有人。有人才能拿钥匙来开门，这就要 20 分钟。有的时候憋得难受，两手捂着肚子不能站起来。有一次我在开饭时要求大便，报告了半天没有人来。我不敢吃饭，怕吃饭之后拉在屋子里。做了犯人一切都完了，大小便也不自由了。

心里不痛快，不想活。如果能有一场病，病死了，那有多好。我看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要开斗争大会，那时最好是被枪毙，脑袋上一个眼，死不知道怎么死的。

刘新斋两手戴着手铐，还铐在后面。吃饭有困难，大便不能擦屁股。他头也肿，脚也肿。俗语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就是说男的怕腿肿，女的怕头肿，现在他头腿一齐肿，我看完了。我呢？什么病也没有，想死不能。可不可能在放便的时候假装逃跑？那样看守的战士一定开枪。这个法子也不好，假如一枪没打死，把腿打断了，成了残废，死又不能，活又受罪，岂不画虎未成反像犬。怎么样死呢？每天晚上手淫，无数次的手淫，可以吐血死去。这种法子很慢，传出去太不好听。死，我不犹豫，不要在死时闹出一些下流的勾当，给人们留一些谈话的材料，那就不是好样的。死也要死得漂亮，不

过想不出漂亮的死法。咳，成了犯人还是人吗？

上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不知哪个犯人抓住了一个苍蝇，在苍蝇屁股上塞了一个半寸长的小纸条。这个苍蝇到处乱飞，飞到我们这个监号，我们谁也不敢理。一个看守战士发现了，他把苍蝇抓住，一看苍蝇屁股上有纸条！虽然纸条上没有什么字，还是追问是谁搞的？我们五个人都说不知道。那个战士姓富，他的意思是我的嫌疑最大，他问我，我当然不承认。他一口咬定是我搞的，我又有什么法子呢？同号犯人证明，他也不相信。我心想，我是一个危险性很大的犯人呀，要整我随你们的便吧。

每天发下来的报纸，一个号一个号的往下传看，但我不敢看。有一天传看报纸，看守战士发现报纸上有个小眼。他追问这是谁搞的？没有人承认，有人说这是原来的，但是不行，就这个问题看守所也来了人，追问在报纸上弄个眼儿是什么暗号？始终无人回答。从此报纸传到我这屋，我不敢看。我怕报纸破了一个口，或者碰坏了一小块，追问起来，三个"为什么"，我是答复不上来的。我宁可不看报，少找这些麻烦。

政府人员知道我们这些特务罪大恶极，诡计多端，认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特务行为，对政府不会老实，在监号必然捣乱。可是怎样捣乱呢？特务的手段是什么？他们知道得太少了。有的干部还不知道军统局这个名词。他们只知道提高革命的警惕性，闹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使我们在监号不敢动一动。其实犯人的真实思想动态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发号施令，不听我的，我就给你吊起来、罚站、戴上手铐。这样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从前，我押过无数的人，拿笔写一个条子就押，从不考虑住监狱的情况，现在我尝到了这个滋味儿。押人者人恒押之，自己命该如此。

我们确实杀了不少共产党人，但是我们对一些共产党人也有优待。1943 年 1 月我在军统重庆特务训练班受训，我们这个训练班是视察人员训练班。担负视察特务工作与反贪污。也就是特务的特务。这个班共 29 个人，在戴笠公馆的隔壁，后山就是叶挺住的

地方。有一次我们躲警报，到了后山，看到了叶挺。一个同学对我说："叶挺吃的比咱们好，重庆最近买不到猪肉，可是他还是每餐有猪肉吃。他什么也不缺，只缺一个太太。"那时对叶挺没有罚站哪，可是现在对我们为什么这样呢？我承认杀了很多共产党人，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宽大政策"，杀人是公开的秘密。可是共产党人说"不打不骂"，但戴手铐子，吊起来，这是言行一致吗？

一次，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干部找我谈话，他说："我们有的干部很年轻，甚至有的比你们的子女还小，你们难免会产生对他们的轻视。他们问话，你们不愿多说；写材料有一些句子不写上去，认为他们看不懂。这都不对。我们是有组织的，他们可能看不懂，可是我们有人能看懂。所以你们写材料要详细写；他们问你们话，你们要作到知无不言，对他们有什么看法也可以对我谈。"经过那次谈话，对照这些日子对我的处罚，我感到上下不一致，没有什么好的印象。

6月底的一个上午，郭股长提我到前楼审讯室，他说了一些鼓励我的话，并说："这些日子你的思想很消极，什么材料也不写了，也不请求谈话了，你就这样争取吗？你不请求政府谈话，我找你来谈话，你最近有什么想法？"

"我没有什么想法，我在监号内不守制度犯了错误，受到处罚是应该的，论我的罪枪毙也是应该的，我毫无怨言。"我认可枪毙，也不能接受侮辱性的处罚。脚镣，刑具在某些犯人身上起作用，但是对我不起作用。这一点有些政府人员是不理解的。

郭股长接着说："今天叫你写一份材料，写军统局的沿革。这个材料你过去写了一个轮廓，这次要全面写一下，有关年月要写清楚。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说先回去想一想，明天再写。我回到监房想了一天。对于争取的问题，我反复地考虑了一番，"往坏处打算，往好处争取。"这个方向不应改变。现在正在争取的路上走着呢，还没有盖棺论定，因此自己不能半途而废，要大步赶上前去。经过思想斗争，我决定把

这部分材料写好。

采纳了我的建议

第二天，我一个人在一间屋子里写材料。每天写十三四页。从军统局的前身"军委会特务处"[②]，戴笠个人给蒋介石做情报开始写，一直写到1948年为止。分人事、组织、活动、经费等。主要的东西没有遗漏，但是我给政府写了一个建议："这样大的材料，仅就我个人所知太不完整。军统局的特务谁也写不完全，因为地区太广，组织太多，好几万特务。我在东北，对于西南地区的特务就不了解。因此，为了把这部材料写完整，写系统，我建议，把在押的特务，如：印匡时、刘文白、李秉一、翟丕翕等十个人提出来，集体提供材料，一块写。这样就能写出一部比较完整、准确、系统的材料。"

过了几天，郭股长找我谈话，他说："看了你写的材料，比较具体。印匡时在长春督察处当上校主任秘书，在军统局作过科员，军统局的事他能不知道吗？可是他写'军统局的沿革'只写了五页。先说蒋介石为什么成立军统局？这就占了一页，后边就说军统局这个番号是怎么来的？其他什么也不写。这不仅是知道的多少的问题，而是肯不肯靠拢人民的问题。你写的那个建议我们看了，必要的时候可以那样做，如果那样做，由你执笔担任主编。"

回到监房心里感到很宽慰，以后还要好好干。可是心里仍有余悸，说不定哪天又把脚镣子给我戴上了？不管怎么样也得争取。戴镣子在他们，争取在我。

7月7日，看了毛主席的新著《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很重要，深入浅出，容易看懂，对我们这些反革命犯很有关系。文章引用的"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句话给我印象最深。我把文章全文背诵下来，作为学习引用，对人也好卖弄。

这些天看不见张看守长了，内心感到很舒服。可能是调走了，由朴看守长负责。朴看守长是朝鲜族人，见人就笑，大家不害怕，有事也敢请求。听说张看守长是共产党员，参加革命年头很多，因为没有文化，只看守长这个工作就干了十几年。他 40 多岁，在工作上归 22 岁的郭股长领导。张看守长吃小灶，每天与分局长一块吃饭。这些话是两个看守战士在窗户前耳语我听到的。

我在屋里想，有什么办法能立功进而把我放了呢？我想回家看看，家中是否还住那座房子？才侠与依平（大老婆与二老婆）最近怎么样？父亲的身体如何？这辈子还能不能与他们见面？生离死别，人生如梦，自己摇了摇头。咳，如果 1947 年不来长春，在北京工作，我就可以跑到台湾，就没有这些事了。军统的人谁能像我这样来个"与众不同"的自首呢？别人跑了，我不跑，结果搞得人不人鬼不鬼。在共产党这方面，我成了最危险的犯人；在军统局方面，我是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叛徒。俗话说，"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我就是这样处境。有一次一个干部与我谈话说："你的历史可以清楚，却不可能清白。"

我心想：过去的污点没法子去掉，因为我是特务，共产党是不会信任的。这不奇怪，共产党的叛徒到国民党那方面去也是如此，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叛徒一贯采取"可以重赏，不可以重用"的原则，比如袁晓轩在共产党的地位还是不低的，可是到军统局却不给他独当一面的职务。再如张国焘，在军统局成了一个小丑。

在 8 月初的一个下午，郭股长来到监房走了一圈，不一会儿看守所便从各号提出去十多个人，内中有我。我们到了后院，我一看这十多个人都是军统特务，只有李树中是中统的，他是长春市的参议会议长。军统有杨绍林、李秉一、张锡德、董顺球、李海涛、孙静修等人。我们都坐在条凳上。这是干什么呀？没有什么坏事，因为这些人没有戴镣子。

郭股长笑了笑说："今天把你们找来开个会，叫什么会呢？叫个进步会吧，因为你们这些人是比较进步的，比较愿意靠拢人民的。

我们很欢迎你们这样做。在长春这个地方人民对你们这些人的名字是很熟悉的，同时也是很愤恨的。比如关梦龄，长春市开追悼大会那天，一个苦主在大会上要求政府惩办督察处的刽子手，其中就把关梦龄的名字提出来了！像关梦龄这样的人该死不该死呢？"

"我该死，我死有余辜！"我很激动地站了起来，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

"对！你该死。但是政府本着政策办事，关梦龄死不了！他是自首的，在吉林公安机关报到的。从到政府这天开始就积极立功赎罪，检举了潜伏的特务，检举了埋在地下的大小电台；到这之后自己买纸写材料，系统地写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东西，坦白了自己的全部罪恶。在押的军统局的特务，现在属关梦龄表现好。因此关梦龄不但死罪没有，连无期徒刑也没有。你们要向关梦龄学习，只要积极表现就有好的结果，用实际行动靠拢人民。"

接着他又讲了许多如何写材料，如何争取的话。听完了郭股长的讲话，知道自己的命保住了，内心感激共产党！十二万分的感激。

开完会回到监号，由于过分的激动至到半夜仍没有入睡。郭股长说话算数吗？这是命令，还是公告？也许是随便说一说？大概是代表政府发表的谈话。我看他不会随便说，因为有这么些犯人听着，将来不兑现，与他自己也不好，对政府更不好。

8 月底郭股长把我提出去，对我说："把你和印匡时，翟丕翕提出来写材料，写的全部材料，由你执笔。"

我说："我们三个人还是不行，还要提几个人，才能把这部分材料写全。现在这些人还在，如果他们走了，那就不好办了。三个人也是写，13 个人也是写，多提几个能写好。"

"那么，再提什么人呢？"

"刘文白、张锡德、孙静修、李海涛、张兆丰、李秉一、陈青波。"我提了这么多人的名字。

"把陈牧也提出来吧，他也能写。"翟丕翕建议。

郭股长没有说什么，我知道陈牧表现得不怎么好。这一点翟丕

翕还不了解，所以他才这样发言，结果郭股长没有理会。

"好吧，你们三个人先在这屋酝酿一下。"

郭股长推门走出去了，屋内只剩我们三个人了。

我问印匡时："你怎么来的？"

"解放后，我与张锡德到兴安桥的解放团，从解放团解到公安局，也是报到的。没有改名。你来到这，我们都知道，你戴镣我也知道。你从楼上搬到楼下，一咳嗽，我就听见了。现在你的镣下了，我这副镣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下呢？"

我又问翟丕翕："你怎么也戴上镣了？杨成荣什么时候走的？陈哲呢？邱明瑞到哪去了？"

"你下楼之后，我被弄到圆楼，就戴上了脚镣；杨成荣在春节之前走的；陈哲与邱明瑞都到感化所去了。感化所比这好多了，他们走运了。"

我安慰说："我们好好写材料，脚镣就能拿下来。"

第二天，郭股长把昨天我要求提的人都提来了，我们一共有十个人。他宣布："写材料算一个小组，小组长由关梦龄担任，副组长由李秉一担任。由关梦龄执笔负责编改。发给你们烟，只能在这吸，不准带回监号。大小便到楼下。"我们分了一下工，先写军统局的沿革，然后写人事、组织、活动、经费。首编戴笠的发家史。大家提供材料，我来编，叫陈青波抄写，他的字写得好。我们这屋整天烟气弥漫。

戴笠二三事

写了一个多月，关于特务训练班的材料写得比较充实，特别是那几个大的训练班写得很详细，因为这十个人都是那几个大训练班毕业的。自己身临其境，材料比较可靠。其他材料也很多，整理

起来十分费劲。有时候因为一件事的年月日大家争执半天。比如戴笠给蒋介石当中校参谋是1930年还是1931年？

我写了一个小册子叫《戴笠轶事》，把戴笠生前的一些特别的事例像写小说那样写了出来。比如他的嫖是突出的，只要他看中了，他就要睡觉。军统局职员的老婆，军统局的女特务，他朋友的老婆，以及舞女、电影明星，太太呀、小姐呀，他见过面就找来，找来就过夜。他的嫖也赶上军阀张宗昌了。我把知道的事情列举了几件：

军统局人事处一个科长叫李修凯，他老婆是家庭妇女，长得有点姿色，住在戴笠公馆的附近。有一天戴笠坐轿子从李修凯门前经过，一眼就看见了李太太，于是就派副官把李太太强制请来，不用说在那过了夜。

李修凯还有两个小孩，妈妈走了，乱闹。李修凯下班，听说自己的太太被戴笠找去，知道被强奸无讹。他就坐家等着，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李太太才回来。她一进屋，李修凯就拿把剪刀把她的头发给剪光了。由这儿两口子的感情破裂了。李太太被强奸了，丈夫不理她。她整日闭门不出，羞愧难当。同时李修凯也气病了。戴笠听说李修凯病了，便派人送去药品。李修凯憋着一肚子气，无法发泄。在抗日战争胜利前，李修凯把太太送回原籍，又娶了一个老婆。无形中把前妻抛弃了。

再有，汪精卫在南京组织傀儡政府，军统局处长丁默村投伪，给汪精卫当特务头子，在上海成立特务机关。这样一来丁默村对军统在上海的活动构成了威胁，于是戴笠计划把丁默村杀死。他物色了一个叫朱小姐的，此人在上海有许多社会关系，人长得也漂亮。戴笠把她吸收进来，给了许多物质，并且和她发生了关系。过了一个时期，朱小姐出现在上海市的高级交际场所，并且认识了一些贵夫人、小姐，因此，也就被丁默村所认识。丁默村本是酒色之徒，一见朱小姐以一个没有伴侣的小姐出现，丁默村就与她接触，追逐。朱小姐没有马上答应丁默村，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朱小姐把自己带的行动组布置好了，才与丁默村同居，成了丁的太太。又过了一段

时间，戴笠命令朱小姐杀死丁默村，朱小姐没有遵照命令行动。最后戴笠来了一个电报，大意是，如果不立即执行，即按团体纪律制裁，这使朱小姐没有法子不行动了。

行动前一天，朱小姐指示她的行动组：明天 12 时零分，由大新公司正门出来一男一女，女的穿红色半截大衣，左首有一个男人，把这个男人击毙。

第二天上午，朱小姐让丁默村与她一同到街上买东西，丁默村答应了。他俩先到别的地方逛了逛，11 点钟的时候到了大新公司。朱小姐这时也有些紧张。她要买一个很贵重的钻石戒指，需要很多的钱，丁默村没有犹豫就给她买了。这样一来，她认为丁默村对待她很好，决定不行动他。于是她在大新公司又买了一件蓝色呢上衣穿在身上，把脱下来的红上衣包起来，走出大新公司。

她的行动组没有等到穿红上衣的女人，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于是马上撤离了现场。丁默村与朱小姐回到公馆之后，丁默村马上派人把朱小姐关了起来。丁默村对朱小姐说："你和我来这一套？老子干了一辈子工作，你的这点东西还能瞒得过我吗？你不说实话，我就让你活不了，也死不了，叫你活受罪！"

朱小姐无奈把戴笠派她的任务具实告诉了丁默村。最后，朱小姐竟耍起娇来，说："如果我真想打死你，我就不换上衣了，我不想打死你，你反而要打死我，你打死我好了……"

丁默村没有把她打死，但把她这个行动组破获了。无奈，戴笠又派人到上海把朱小姐杀死。

这就是戴笠对女特务的先奸后用，再处死的例子。他把女人当玩物，他是个禽兽，根本没有什么感情可言。有的女人认为"戴先生爱上了某某小姐"，那是对戴笠没有看透。

1942 年 3 月我在军统局主办的"西安查缉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受训。一共二百多人。戴笠专程从重庆到西安主持我们的毕业典礼，并且亲自分配工作。他在人事上，对训练班很重视，非常相信他的学生。训练班毕业，他尽可能到班讲话及分派工作。没到西安

之前，他听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曾扩情说，西安开源寺妓馆有个叫妹妹的妓女，长得很漂亮。到西安之后，戴笠办了一些公事，晚上，他自己到了开源寺。

开源寺是一座古庙，后来改成妓馆。里边都是江苏扬州的名妓。进了开源寺，给他做警卫的西安警察局侦缉队队长马德皋马上跟了进去。各妓馆对马德皋很熟悉。戴笠一找就找到十七号院。他进院把帽子往下拉，大衣领子立起来。一进门就叫妹妹，伙计把他引进妹妹的屋子。妹妹不认识他，戴笠自我介绍说："我姓王，商人，跑单帮的。从上海到西安，来这儿玩一玩。"

戴笠既不喝茶，也不吸烟，这是他的生活习惯。他在那与妹妹对话，他问一句，妹妹答一句，戴笠说："你这套家具颜色不好看，明天我给你买一套。""谢谢吧，用不着。"妹妹认为他吹牛，很讨厌。这时马德皋在门口的一个屋子坐着。妹妹过去，马德皋问妹妹："屋里有客人没有？"

"有一个，他说是商人。唉哟，那样子凶得很呀，讨厌死了。他不走，说要在这儿过夜。天哪，我不留他！"

"这个人很有钱，我知道他是河南的一个大经理，在上海开绸缎店。他认识宪兵队的一个班长，你如果不留他，他打你们，我可不管。留下吧，他有钱，多给你钱那有什么关系？他住一夜又不与你结婚，管他凶不凶。"

妹妹被说服了。吃完晚饭，院中的伙计发现门前有许多人在来往地转悠，伙计赶忙报告了妹妹，怕出事。妹妹这时正在洗脸，准备睡觉，她自言自语地说："不晓得干什么的？有几个人老在门前转悠，要打架的样子。"

"那好办，你到门口，叫他们回去！"

"唉哟，我可不敢。"

"去吧，你到门口一喊，他们就散了。"

妹妹到了门口喊了一声："你们回去吧！"不一会儿，门口的人都不见了。马德皋自己带着几个喽罗在十七号的院外警卫了一夜。

第二天清早戴笠回到自己的住处，这一夜戴笠给妹妹六千元钱，等于二两黄金。第二天晚上又去了一趟，给妹妹买了四件衣料。妹妹始终不知道这是什么人物，只知道是个大官。戴笠走后我们到十七号院去玩，大家问她："那个河南商人最近还来不来？"

"弗晓得！"

再如，1945 年"九·三"之后，戴笠到北京，亲自主持"肃奸"。既抓共产党，也抓汉奸。戴笠在北京住他朋友吴泰勋家，吴泰勋的老婆陪他过夜。这种卑鄙的勾当特务们都知道。有一次开晚会，找×××唱戏。当时我是"肃委会"的总务科长。先唱了一段《凤还巢》，后来宋子文又点了一段《金玉奴》。唱完戏，戴笠不叫走了。那夜就把她带到他的临时公馆过了夜。这样的事，我们办总务的特务都要预备汽车，预备饭，所以知道得比较详细。

这样的材料我在小册子写了几段，多写没有必要。

戴笠用人的原则，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先给你们官做，如果做不好，我就要把'官'的上面加一个竹字头，变成'管'；如果管也不行，那就不客气，把竹字头拿下来，旁边加一个木字变成'棺'！"所以戴笠好押人，为一件小事也能押起来，这就是他所说的管。必要时他还杀人，就是所谓"棺"了。

他有一个副官对他这种嫖的生活很反感。有一夜时间很晚了，他叫副官坐车去接女人。把女人接上汽车，这个副官就当着女人面骂起来，意思是骂戴笠半夜三更叫我们到处找"破鞋"。这个女人见了戴笠把这件事说了。戴笠给蒋介石上了一个报告，说他的副官勾通宋子文的副官贩卖鸦片，应予以处死，就这样这个副官被杀了。

在用人方面，还有一个鱼鹰政策，他说："饱了的鱼鹰不干活，吃不饱也不能干活，只有饱与不饱之间才能干活——对待我们的部下，不能叫他们太有钱，也不能没有钱。"

小册子里，我知道的，加上大家知道的，写了 30 段，都是短篇的东西。

每天写材料，每天写工作日记。记录当天写了多少材料，谁提

供的，有什么特殊问题。然后一一呈报。我在呈报时从来不汇报某人的缺点，何必那样呢，他们不好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坚持隐恶扬善。我们每天谈的许多事情也从不反映，因为我就是好谈者之一。

血债血还，杀人偿命

10月16日，星期日。吃完早饭，就听看守到一号监房喊："16号出来！"我们知道叫的是陈牧。他戴着一副大脚镣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把我们这屋的门打开，我心想，陈牧提走了，这回该提我了。我要起来，看守说："不找你！"又朝张逸民一指："找你，出来！"张逸民穿上鞋出去了。我心中暗想，有什么重要的审讯礼拜天还办哪？到吃晚饭的时候陈牧先回来了，接着张逸民也回来了。张逸民精神紧张，脸色苍白，饭只吃了半碗。饭后，张逸民坐在我身旁，不停地摇头。我问他："干什么去了？"

他说："把我叫到局长室，一屋子干部。问我的一些罪恶；问经济大药房案件；问在伪满的活动；问我在长春杀了多少人？我说没杀过人。他们说因为我搞的情报，以致破了案子，都要由我负责。这么一来我就危险了。问我话的干部很严肃，其他的人不说话。情形不乐观。回头，又叫我把这些问题写下来，我写了两个小时。写完之后又拿去看，看回来又叫我补充，咳，不好办哪。"

我劝解道："没有关系，不要难过，有问题就交待，他要杀我们，哪件事不能杀？他要不杀，你多坦白个十件八件的也不会杀，反而说你坦白彻底。"

我总觉得张逸民没有我的罪大，他在伪满是个警尉补，在解放前是中统局长春区的一个分区主任，地位不高，责任也不大。但是他收集的经济大药房的原始情报，这一个案子就杀了六七个共产党的地工人员。还听说他在伪满时对老百姓很厉害，是长春老百姓

最仇恨的“三张二栗”之一（“三张”，即张效九、张逸民、张耀先；二栗，即栗宗元兄弟二人）。他这“一张”地位虽不高，坏事却没少做，他的老婆就是霸占别人的。还有一件坏事简直不好说出口，伪满时张逸民抓住了女共产党人，用一条大绳子在阴户下边前后拉，把阴户拉烂，然后用洋蜡把阴毛烧掉，最后强奸，杀害。这些残酷的行为我也感到过分，要杀就杀，用不着这样。我也杀过女地工人员，但我不像他这样残忍。如此看来，他的案子很不单纯。礼拜天干部办公，又来了那么多的人，不一般哪。我想，今天找张逸民，说不定明天就会找我。自己掐指一算，1948 年 10 月 17 日长春解放③，今天是 1949 年 10 月 16 日，整整一年。这一年，国内国外有了很大变化，我自己受了不少的折磨与考验，今天还能活着，真不容易呀！可是将来会怎样呢？想了许许多多。

第二天是 10 月 17 日，长春解放一周年。天气阴暗，刮着凉风，仿佛要下雨似的。早饭后，我以为照例会提我去前楼写材料，但是没有提。不一会儿，看守的战士端着枪，表情很紧张的样子，来回在我们的窗户前监视着。这就预示着将要发生不寻常的事情。接着把玻璃窗户里面的防空窗帘（一层黑纸）也关上了，这是因为这些窗户靠大街，怕我们往大街上看，可是大街上什么也没有哇。我坐着想着，今天是长春解放周年纪念日，也许……我想起 3 月份追悼大会的情景，那句“血债血还，杀人偿命”的口号，不能不使我害怕。我认为开大会不大好，一枪打倒在这屋算了。否则不如袁家佩、吴殿强、孙伯宇等人，他们病死在这里，政府给埋起来，外面人不知道，就算完了。可是郭股长对我说的清楚，“关梦龄不但死罪没有，连无期徒刑也没有。”啊，这句话犹在我的耳鼓。郭股长不会说瞎话的，我应当相信这句话，为什么偏要不相信，给自己增加烦忧呢？

看守所的人来到监房，监房异常肃静，一点声音也没有。看守手中的钥匙一响，大家的心一跳。一号监房的门打开了。

“16 号出来！拿着东西！”

接着脚镣子响，陈牧走出了监号，在看守所门口下了脚镣。铁

锤砸砧子的声音我听得很清楚，下完镣，没有声音了。接着又叫11号监房："71号出来！拿着东西！"

71号犯人是印匡时。他和陈牧一样在看守所门前下了镣。我以为这回该叫我了，心中忐忑，无法形容。真的，看守所的人往我这屋子走来了……却在我的对门站下了，把郭子襄叫了出去。郭子襄的动作很慢，因为他戴的脚镣太重。

"快点！"看守催促道。

郭子襄戴着那副大镣哗啦、哗啦地出去了，他也在看守所门前下了脚镣。下了脚镣能轻快吗？也许轻快一阵儿。

郭子襄的脚镣下完了，看守所的人直奔我这屋子，到门口开锁……我立刻站了起来……看守战士在铁栏前面怒斥道："你要干什么？老实点！"我的监号打开了，看守指着张逸民说："你出来！拿东西！"

张逸民急忙把自己的衣服包拿起来，到门口穿上鞋，走了。我想不会叫我了，如果有我，会与张逸民一块叫出去的。

这四个人走了，监房又恢复了原来的沉静。陈牧与印匡时的号数犯人都知道。到我这屋没叫张逸民的号数，只说"你出来"，犯人们很可能以为把我叫出去了，所以我咳嗽了一声，告诉关心我的人：我没有走。

他们这样走没个好，是开斗争大会吧？什么场面呢？想不出来一个轮廓，也没有具体的听说过。小说里有斗争地主恶霸的描写——大会上要控诉地主的罪恶，然后宣判等等。如果要控诉陈牧，他的罪与我的罪差不了多少。

陈牧是北京朝阳大学毕业，当时朝阳大学法律系是最好的。他毕业以后，入军统的"黔训班"受特务训练，以后到沦陷区干潜伏工作。1946年调到长春督察处充侦审室中校主任，1947年冬因贪污被撤职，押了二个月。释放调充吉林组副组长。他没到吉林，仍住长春。1948年3月督察处的审讯工作忙，副处长张国卿念他是"黔训班"的同学，叫他协助审讯。4月，张国卿升为处长，又把陈牧调

回来，仍充侦审室主任。陈牧与军统长春站站长项迺光是同乡，都是辽宁开原县人，所以项迺光对陈牧再回督察处也不反对。

陈牧吸食鸦片，为人阴险毒辣。不说别的，他与老婆吵架，操起椅子打过去，把老婆的头部打出血。这件事就发生在解放前的半个月。对老婆尚且如此，对别人就可想而知了。督察处的人，凡是他领导的特务，如侦审室的人，看守所的人，都怕他。他爱发脾气，接着就打人。看守所所长石玉璞常挨他的耳光。石玉璞对我说："给我调一调吧，我的能力实在不行。"他不是能力不行，是怕挨陈牧的打。

对自己的人还这样，对犯人就不用说了，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陈扒皮"。

1948 年 4 月，他到长春大马路重庆饭店去吃便饭。重庆饭店在长春是一个比较大的饭馆。经理姓庄，是个很活跃的商人，认识长春不少高级官员，在警备司令部里也认识不少处长和科长，但督察处他不熟悉。陈牧要了两个菜，不合口胃，价钱还贵。陈牧发了脾气，茶房下楼把庄经理找来。庄经理排解一番，陈牧仍不讲理，庄经理就与陈牧吵了起来。陈牧一生气拂袖而去。回到督察处，陈牧把政治犯的案卷拿出来查了查，接着就从看守所提出一个新抓来的政治犯，问这个犯人："你从哈尔滨到长春，见了几次庄经理？庄经理给你几份情报？"

这个犯人答复不上来，于是用刑，把这个犯人打得糊里糊涂不能不"承认"。于是陈牧就派人把重庆饭店庄经理抓来，抓来之后，不问青红皂白，先把庄经理重打一顿，然后押了起来。

第二天上班，陈牧对我说："昨天夜里审讯，一个八路地工人员供称重庆饭店庄经理与他有关系，并且说庄经理最近要到哈尔滨去，我怕他逃走，当时没有来得及向您报告，就把他抓了来，现在我补一个报告。"

按督察处规定，未经督察长批准是不能抓人的。他这样一说，我因不知内情，就同意了。他又对庄经理百般拷打。庄经理家中托

了许多人，以后又托到我这儿，我告诉陈牧把庄经理释放。这一押，重庆饭店关门了，庄经理花了很多钱，一下便垮台了。庄经理被释放之后，对人说："这回我才知道督察处的厉害！简直不讲理，叫人没有法子活。"

像这种无中生有的方法，是一般特务所想不到的，可是陈牧不但想得出来，还能做得出来。

再有，陈牧的审讯"本事"极强，督察处处长张国卿对我说："什么案子，只要到陈主任的手，就能审得出来，审讯能力比法官强得多。"

陈牧的确比法官有办法，他能把被审的人绕在里面。比如审讯地工人员："你到解放区把长春的物价说出去了吧？谈谈物价，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没有什么关系？"

对方没有考虑其他，就承认了这一点。然而到了陈牧的笔下就是"多次往返哈尔滨与长春之间，收集我方经济情报，调查物价，供给奸匪……"被讯问的人还认为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已被签处死刑。类似这样的审讯多得很，我也懂得不少。

陈牧在1948年审了一个地工案件，内中有一个长春大学的女学生杜鸣兰。由于这个案子不能构成"奸匪"之罪，原始情况也不具体，就把杜鸣兰等人开释了。到4月，办了一个政治案件，又牵涉到杜鸣兰。怎么牵涉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陈牧故意牵涉的？不能肯定。这个案子要结案的时候，一个晚上，陈牧把杜鸣兰提出来，威胁要处死她。杜鸣兰哀求他，他就把杜鸣兰强奸了。结果这个案子多数人被杀，杜鸣兰没被杀。这件事，南京来密令，叫我查。我包庇了陈牧。特务们不满意："抓到八路应该杀，不该强奸。强奸女犯，纵放八路，是犯团体纪律。"

陈牧的罪是数不尽的，还有一个我始终不明白的案子。1946年一个共产党机关干部从哈尔滨来到长春，他叫李文宣，他老婆叫韩瑛。到了长春之后，说是向国民党投降的。督察处把李文宣转送到沈阳东北行营二处，该处处长文强把李文宣又派到长春督察处

工作，并叫从优叙用。督察处便给李文宣一个中校侦审员的职务。1947年冬，督察处处长由安震东接充，陈牧对安震东不满，说："安震东不学无术，什么也不懂，连公事都不会批。"类似这样的话很多，李文宣报告了安震东。安震东就借陈牧贪污把他押了起来，并且撤了职。到1948年2月，安震东升充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督察处处长由副处长张国卿升充。张国卿与陈牧是同学，私交甚好，于是又把陈牧调回督察处。陈牧说李文宣是假投降，列出许多理由。他对我说："李文宣不是真投诚，第一，他在侦审案件时，对刑事案件往死里追，看上去工作很努力，可是对奸匪案件，他总是审不出来。到他手的政治犯就签释放。除夕的晚上，您在场，女八路庞静这个案子，原情报说她从哈尔滨到长春，结交了一些新一军军官的眷属作为掩护，以便收集我方各种情报。李文宣对庞静的讯问是这样问的：'你到长春干什么来了？你有没有组织？'这样问犯人是给犯人开脱，应当问，'你在长春先后收集了多少份军事情报？'或者问，'你在长春什么时候开始收集情报？你把情报收集好了之后怎样送走的？'第二个问题应当问，'你们小组有多少人？'或者问，'你领导几个人？''你归谁领导？'不能问你有没有组织？这事，你在场还对他申斥了！这是他的可疑的地方；第二，社会关系复杂，他每天外出，东一趟西一趟，乱跑一阵。因为他家住在督察处院子里，外人不敢到这里接头，他只好到外面去。我听说他有一些朋友是从哈尔滨来的；第三，他的钱很充裕，如果不是有人接济他，他不会比我们有钱。根据这些可疑之处，我说他是假投诚。"

我听了陈牧的这些话，觉得似乎有道理，我对陈牧说："再好好调查一下。"接着陈牧又到张国卿、项迺光那里游说。造成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形势。到了3月，张国卿、项迺光及袁晓轩几个人一研究，决定把李文宣秘密处死，（这件事我不知道。）决定好了之后，给南京保密局去了一个电报，南京回电照准。

3月中旬的一个夜里，我一进办公室，军用电话铃响了，我拿起了耳机，对方问："你哪儿？"我答："督察处。""你是什么人？""我

是勤务兵。”“找你们处长说话。”“处长不在。”“请督察长说话。”“也不在，你有什么事？我可以回来告诉他们。”

“你们的人在卡哨外，我们新7军38师的防地上放枪打死人，是怎么回事？”

“你给处长公馆打电话吧，他的电话是××××。”

我放下电话，心想又行动什么人了？我怎么不知道？又一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加多问，免得麻烦；再一想，如果我们督察处的人在外搞出事来，我能没有责任吗？况且我们这些人都是亡命徒，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事都敢干。我想给张国卿打电话问一下情况，但我又犹豫了。

第二天一上班，张国卿对我说：“李文宣是奸匪派过来的，昨天下午把他行动了。”

“怎么布置的？”我问张国卿。

“昨天下午我把李文宣找来，对他说，‘袁晓轩有一些部队在南关外，叫我们派一个人去给这个部队讲话，你去吧。袁晓轩也派两个人同去。’说完又给他拿了一些路费，打发他与王厚甫、刘士培二人一起走了。他们出了卡哨，走到无人的地方，王厚甫在李文宣身后开了枪，枪一响新7军的士兵来了，把王厚甫、刘士培逮捕，带到一个团部。后来给我打电话才把他们二人放了，就是这么回事。”

我越听越不满意，作行动不通知我，难道我还能泄漏机密吗？张国卿说：“昨天找你没有找到，听说你到中央银行去吃饭，现在你要做善后的事情。”

过了两天韩瑛来见我，她说：“文宣去了几天也没有回来，不知是怎么的了，督察长，您有信儿吗？”

“据说他到那个部队的晚上，八路派不少部队进攻，他被俘了。我怕不可靠，今天派人去调查，证实之后再告诉你。不要着急。”

韩瑛是哈尔滨有名的歌手，红极一时的韩小姐，后来嫁给李文宣，生了一个小女孩，才一岁。今天我看到韩瑛眼泪汪汪，心也有点难过。我这样欺骗她感到太不应该。

过了几天，她又来找我，我对她说："没有调查清楚，家中的生活，我告诉总务科陈科长给你想办法。"我拿起笔来写了一个条子，叫总务科给发二百斤小米及李文宣 4 月份的薪饷。这样又把她骗了一次。以后韩瑛又来一次，我对她说："八路抓去也不会杀了，将来我们抓了八路的干部和他们交换俘虏。"到 6 月份，韩瑛从督察处的职员宿舍搬出去了，她是不是已经知道丈夫被杀了呢？

陈牧害死的人多了，今天如果真枪毙他，我认为很公平。

如果印匡时被枪毙，我认为是陈牧咬的。陈牧充侦审室主任时，一切公事皆要经过秘书室复核，就是说要经过印匡时修改文稿。有的时候印匡时把陈牧的稿子也给改了，陈牧不同意，俩人便闹意见。张国卿与我给他们从中解说，也没有使他们和好。印匡时认为"陈牧自以为是，有的地方不通，我当然要改。不能把公事拿到别的机关，叫外人耻笑我们不懂公事。认为督察处无人。"其实印匡时只在公文上咬文嚼字，其他什么事也决定不了，空牌位。但是按例行公事他需要在这些抓人杀人的公事上签字。这次被捕，陈牧便咬他一口，陈牧在坦白时说："我签的杀人公事，都要经过印匡时审核。他不同意，我的公事不能出手。"这样说就加重了印匡时的罪恶，又加上印匡时坦白得不好，就注定了自己必死。还有郭子襄，我第一次作证，就是郭子襄的罪恶。

有一天，郭股长把我提到一个屋子。我进屋一看是郭子襄，督察处少校督察。他戴着一副大脚镣，脚镣上还有一个铁球。

郭股长对我说："关梦龄把郭子襄的血债说一说。"

"1948 年 3 月他在吉黑地区人民义勇总队充少校参谋时，在米沙子抢老百姓粮食，打死了两个老百姓；1948 年 7 月初，督察处在南岭秘密杀害地工人员十人，有他在场，是我指挥的……"

"郭子襄听见了没有？"郭股长问。

"他说有，就有，反正我没有杀过人。"他表现很顽固的样子。

我说："郭子襄你到今天还抵赖什么呢？我们杀的人都挖出来了，杀人的刽子手多数被捕，你还这样顽固，没有好处。"

我在讯问记录上签了名字。在事实面前还如此抵赖，郭子襄可谓是个顽固蛋。

他们三个都是督察处的。如果今天枪毙，督察处就被处决了三人。

我在屋子里看到窗外的天空，阴暗凄凉，使人感到忧郁。至到晚饭的时候，看守战士才把黑窗户打开，他们脸上的表情也不那样紧张了。这一天不比寻常，真不容易过呀。

第二天早饭后，又提我到前楼写材料。

陈青波说："早饭后，看守所把《长春新报》发下来，我一看，开大会枪毙人，有五个。一个工人说，给这些人点天灯也不多，这条消息我还没看全，看守所的人就把报纸收回去了。"

"我们小楼提出去四个，陈牧、印匡时、郭子襄、张逸民，那一个是谁呀？"我问。

"姓苏的，是建军的土匪，听说这个家伙的血债很多，昨天圆楼只走他一个。"李秉一说。

大家都感到很空虚，坐下来写材料，心老是沉不下来。

"咳！印匡时是贵州人，一把骨头扔在了东北。"我感叹道。

李秉一也很恐惧，解放后他潜伏在一个大车店，在那儿被捕的。他说："在大车店把我抓着，用木棒子把我好一顿打。我是被捕来的，所以危险成分多。"

在座的九个人都认为自己有危险，我最后说："好了，咱们不谈这个，写材料吧。"

写材料，一个接一个

一个材料写完了，又写另一个材料。郭股长要我们把长春的军统和中统组织制成一个表。军统的有我、李秉一（保密局长春站秘

书兼人事主任)，中统的有李树中(长春参议会议长)、李芳春、徐克成，还有一个日本特务叫竹中，专门能制表，共六个人完成这个材料。十来天就写完了。写完材料的这天下午，我们等着郭股长的吩咐。11 月，天气冷了。我倚在楼窗看着大街上的行人，十分羡慕。大马路上的汽车不断地奔驰着。想到一年以前，我出口是令，长春这个城市，我可以一个命令把全市交通封锁起来；警察、宪兵、特务，一齐在督察处的领导下进行户口大检查。可是现在，我大小便都不得自由。人哪，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了。

郭股长回来，叫我们把个人的东西搬到小红楼的一个大房间。他对我们说："这回小自由，在屋子里可以随便活动，看书、写材料都行。关梦龄这回不用照像了吧？(我曾说在监号里坐着，一动不准动，等于长期照像。)这是对你们的宽大，与别的犯人不同，你们要知道。"

郭股长走后，我对徐克成说："咱们写一个决心书吧，前一段是感谢共产党对咱们的宽大；第二段写今后一定要立功赎罪，努力争取，回报政府的宽大。"

徐克成说："你起稿吧，我缮写。"

我拿起笔来就写："我们都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犯，深知百倍努力也不能赎罪于万一。但在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下，我们得以复生。感戴之情无法形容，今后只当……"写了两页。由徐克成用仿宋体复制两份，一份呈给政府，一份我们贴在墙上自勉。

12 月初，我们从楼上搬到楼下的七号监房。现在楼上楼下的犯人很少，都走光了。军统这些特务除了我一个人，各屋都空了。楼上只有一个尚传道，楼下还有王心一等几个少数军统电务人员。他们都到哪去了？徐克成说到吉林去了。这么多的人到吉林？我无法判断。

有一天郭股长与我谈话，我说："陈牧他们五个都枪毙了，这件事我们已经知道了。"

"你们怎么知道的？"他问我。

我就把写材料时候，听陈青波说的那些话说了一遍。接着我说："枪毙的这五个人，论地位都没有我高，论罪恶也不一定比我多，只是陈牧严重。他们都枪毙了，我还不应该枪毙？我没有死，这是政府的法外施仁，网开一面。我内心充满感激。"

"你有这些认识是好的，但是枪毙与不枪毙不在反动职位高低。反动职位高肯定罪恶大，但是与争取的情况，靠拢人民的表现都有关系，看问题要全面，逐渐你就会明白了。"

接着他又叫我与徐克成绘制长春的各特务机关的系统表。表的内容都是政府拟好的，我们照写。徐克成的字写得好，他写的仿宋字如同印的一样。他写，我校对。共有 30 多张表，每张表上都有阶级、职务、姓名，被捕的有"△"号，未捕的没有记号。郭股长对我们说："你们看到这些表，不许乱讲。"

这些事知道不应该讲，这是政府的内部材料，政府叫我们整理是相信我们，也是一般犯人所不能做的事情。自己又想，这样事做多了，是不是能放我呢？不怕我把这些机密带走吗？于是又有了疑惑。

我们这屋五个人，日特竹中是日本关东军的中尉特务，"九·三"之后，军统的军事联络组组长刘精一留用了他。他的俄文好，在伪满时期做苏联的情报。

徐克成在伪满时期给汉奸于静涛当秘书官，于静涛是北满合江省省长，徐克成的日文好，当翻译。竹中说："徐先生的日本话与东京口音一样。"

李中候是小特务，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的喽罗。不知怎么回事与我们关在一起。大概交待材料表现好，这个人什么也不懂。

李芳春是中统局长春区的分区主任。这个人一身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不像一个中国人，真可气。他的日本话虽好，但赶不上徐克成。伪满时期他受的奴化太多，中毒太深。

快过新年的时候，我与徐克成说："我们住这样舒服的屋子，像小办公室一样，有书看，有烟吸，在屋内有自由。我们应该用行动来

表示对政府的感激。我提议，我们检举揭发长春的一切坏人，不限于军统、中统这两方面的，伪满的特务、青帮头子、地主恶霸、日本翻译、建军头子，都检举，以此迎接1950年的新年。"

徐克成、李芳春、李中候都同意。于是我们就开始写起这方面的材料。他们比我写得多，因为他们在长春的社会关系多。这份材料写得较好。郭股长认为还可以继续写。

要过新年了，我们希望能吃点肉。新年果然吃了两顿肉。年算过去了。我说："年好过，节好过，日子难过；出有门，入有门，回家无门。"

过了新年就是春节。除夕，郭股长调李中候到11号监房，徐克成调到一号监房。我听见了他俩的咳嗽声。过了两天，我明白了，他们到监号是去做工作的。在旧社会这叫"坐班探"。我心想，李中候懂狱侦技术吗？没叫我去，是不是自己改造不如他们？内心不愉快。

大年初一，早晨吃高粱米饭，炖白菜帮子。春节的肉在除夕以前就吃了。听说大厨房锅少，先叫我们过春节，到了春节，干部改善。想到活了34岁，大年初一早晨吃高粱米饭炖白菜帮子，这还是第一次。然而作反革命犯不也是第一次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古人作异客的心情，今天在这作犯人更加倍思念亲人了。过年家人不能团聚，自己被押，亲友自顾不暇，门前冷落，势所必然。家中凄凉景象可想而知。想到1946年的春节，我以接收人员的身份回到北京，自己兴高采烈，家中喜气洋洋。今天共产党的干部过春节一定是举家团圆，欢天喜地。我，我的家则是在悲哀失望中度过佳节呀。我想得很多，最后我想到被我杀的人，这些人的家属又怎样过春节呢？我不敢再想了，我能活着就算万幸，不能胡想了。所谓"知足常乐"，不知足就是不能正确认识自己。

正月十五早上，徐克成、李中候又回到我们这屋，徐克成对我说："现在破了一个现行反革命的案件，与李芳春有关系。"

我猛然想起，春节前郭股长找李芳春谈话，谈了几次，李芳春

回来便说："真不好办。"现在我明白了，当时问他，他不坦白。接着就把他从我们这屋调走了，那天是腊月二十二。我问徐克成是怎么回事？

他说："有一个叫于子杨的，解放前是李芳春运用的外围，解放后于子杨不但没有登记，反而继续活动，在火车上吸收了一些人。这其中有个叫刘金声的火车司机，被抓来了。我在于子杨那屋，李中候在刘金声那屋。他们都承认了这些事情，可是李芳春没承认。李芳春在楼上戴着手铐，还要撞头自杀呢。"

我点点头，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一切由个人负担。

3月，郭股长到我们这屋来，对我说："你判断一下，军统特务再到大陆活动会怎样布置？你如负责将怎样指挥？看看你们写的与事实能不能相符合。"

我考虑了一个下午，根据解放后的形势及军统特务的规律，我判断：第一，退到台湾，军统与中统等机构要合并，把特务机关统一起来，便于指挥；第二，特务机关与美特会比过去加强合作，在东京、菲律宾及冲绳岛，设置训练蒋美特务的据点；第三，派遣特务潜入大陆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香港，一个是北朝鲜，由南朝鲜到北朝鲜比较容易；第四，进入大陆所用的掩护，是华侨、商人、学生以及于斌指挥的天主教神父和教徒；第五，派遣进入大陆的特务，以华东、华南籍贯为多。他们熟悉方言便于活动。大致是这些。写完之后，交给了看守所。这份材料写完的第二年，证明我的判断多数是正确的。

一年多了，接触了不少干部，除了郭股长之外，还有于、肖、杨、王、张等许多审讯员。他们对我都熟悉了，每次写材料，也不用交待政策，更用不着启发，到我窗户前说一句："关梦龄把袁晓轩材料写一下。"我就可以写了。有时我问一句："逮捕了没有？"他们便会告诉我逮捕或未逮捕。如果没有逮捕，我在写材料时，一定要写年龄、相貌、特征、身材、什么地方的口音；如果已经逮捕，就写他的罪恶及一些社会关系。这些材料写得很多，写的要领我已经知道。我写

出去的材料没有不合要求的。

我感到这些审讯干部对特务技术知道得太少。这也难怪，这些20几岁的干部解放前还念书呢，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军统特务"，解放以后才接触我们这些特务，所以只能要材料，别的谈不到。因此，我想把特务技术写一些，供给他们参考。

"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拟了一个提纲，也没报告郭股长，自己就写起来了。先写特务是什么时候有的？历史上，明朝的刘瑾就是特务，他有组织，叫什么厂卫；到了清朝雍正年间"血滴子"也是特务……

之后，写了一些特务技术等方面的材料，如情报、侦察、逮捕、审讯等，共写了四本，有300页。我写完由徐克成替我抄写下来。日特竹中看了我的这些材料说："哈，哈，关先生知道这么多的特工知识，我们过去对军统局不知道，只知道蓝衣社厉害。"

我也问了他一些日本特工的情况。按他说，日本特工也有一套，比如在北京的一个日本特务头子，和北京人一样，化名"王二爷"。他就是日本特工技术较好的一个。日特在中国活动多数是收买利用中国人当腿子。日本钱多，只要肯花钱，在中国的特工就能搞好。所以说，日本特务技术在中国没有完全发生作用，发生作用的只是运用中国人。

我听了竹中的这些话想起1945年，"九·三"胜利后，军统局的特务在北京首先要逮捕日本特务头子"王二爷"，但是没有抓到。据说"王二爷"自小在北京长大，一口北京话，生活习惯也是北京化，所以很容易潜逃，这种特务技术就相当高。

1937年抗战开始，绥远的一个喇嘛庙走了一个喇嘛，这个喇嘛在这个庙已经七年，平素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以后才知道他是日本特务。这样的潜伏工作也作得好。再举一件丑事，傅作义部队用的包头以西的军事地图都是日本关东军测量局的，而不是我们参谋本部的。说明日本特务技术是很高的。

竹中在哈尔滨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干了多年，但对于特务外

勤知道得不多。

我把写成的这本特务技术材料交给了郭股长，我对郭股长说："我这本材料，在被捕的这些东北军统特务里，是不一定有人能写得出来的。"

郭股长笑着说："又自满了，你还能写很多东西，这屋子里有纸有笔，有时间你就写。"

我一定争取

6 月底，美帝侵略朝鲜。东北各地的反动残余分子利用这个机会自发地进行反革命活动。长春公安局逮捕了一些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天郭股长找我，对我说："新逮捕了一些人，属现行反革命。你跟他们住在一起，要积极争取呀！我说："我一定争取。"

接触的第一个人像是孙×，汽车司机。他的姐姐在长春一个军医院当护士长。1949 年与医院的一个老干部结婚。后来，这个医院的秘书被暗杀，这位老干部失踪。公安局便认为孙×的姐姐有嫌疑，抓来押在小红楼楼下二号。押了几天又把她的弟弟抓来，押在小红楼楼上 13 号。我到这个监号什么也没拿，空身进屋，门开之后，看守在门口厉声地说："你们俩认识不认识？"

"不认识。"他说，我也这样说。

门一锁，看守走了。石灰地上什么也没有，坐下太凉，我便把鞋垫在屁股下。吃完晚饭，他看看没有看守战士，便小声问我："你怎么来的？"

"今早抓来的。"我表现出害怕的样子。

他是司机，我懂汽车。我先从汽车谈起，问他驾驶的是什么汽车？这样有了共同语言。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是饭馆的茶房。饭馆的常识我也知道一些，是可以叫他相信的。他问我为什

么被捕？我说因为一贯道的嫌疑。谈来谈去，他说伪满时给王庆璋开汽车。王庆璋是伪满的邮政总局局长，我的三舅。谈到王庆璋家中情况，我说得很对。他对我更有好感了。我对他说："咱们是患难与共，不容易，有缘分。"我同情他，站在他的立场上替他想办法。他很相信我，什么话都对我说了。最后他说："我姐姐嫁的那个干部是一个转业军人，年龄 40 多岁，他们结婚的经过我不知道，他们俩只到我家一次，他们的活动我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我也不知道。"

我们俩提审后先后回到监房，我回去时装作很高兴的样子，对他说："我的案子结束了，一两天就会释放我，我出去到你家去送个信，你有什么要紧的话可以告诉我。"

他说："我家住在长通路天主堂后边，一个小角门里。你见着我家里的，告诉她：我因为姐夫逃跑押起来的。我不知道他们的事。姐姐也押在这里。我不会很久就能出去，不要着急。家中没有钱向老史家借几个，先维持一下，对亲友们就说我到沈阳去了，不要说我被押起来。"

我说："家中没有钱，不要紧，我在长春有朋友，我可以借给你几十万元(即人民币几十元)。等你出去，再还给我。你想想还有什么话？"

他接着说："没有什么话了，你对我这样好，我出去再报答吧。"

看来这个人与这个案子无关。

6 月底，美帝侵略朝鲜，从报纸上看美帝在朝鲜很猖狂。我心想，美帝这样搞，日本、蒋介石一定趁火打劫侵占东北。情况紧张，前途不乐观，与我本身不利。他们打进长春，共产党不会把我释放，只能把我处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呀。又过了一天，下午一点多钟，郭股长把我找到前楼，我进那个屋的门口挂了一个牌子：执行科。他在屋内沙发上坐着，叫我坐到他对面，我说："这个科是新成立的？您当科长了！"

他没有答复，笑了笑说："今天没有事，随便谈谈。"他叫看守所的警卫员，去买了 20 个包子、一盒纸烟、一斤花生，不一会儿都买

来了。郭科长说："吃吧，把这些东西都吃光，吃不光，明天再来吃。"我不客气地吃起来，他也吃了一点，一边吃一边谈，他说："今天你谈谈反动派内幕派系，政治的、军事的、党的、特务的……"

我谈了有一个多小时，最后我问："科长，我这个案子政府已经决定了，我非常放心。说是没有死刑，没有无期徒刑，那当然是有期徒刑了。有期徒刑是13年呢？还是10年？"

"你不要问这个，反正对你是最大限度的宽大。这样的宽大，不但人民有意见，就是你们这些人，也认为判得轻。你好好争取吧！"

我们屋的竹中走了，把崔毓琛调来了。他是保密局长春站国际组组长，专做苏联工作的。长春解放后，他抱着电台自首，表现得不坏。解放前与我也认识，这次调到一个屋子，我心中很高兴，因为竹中走了，他可以教给我俄文。我对他一说，他慨然允诺。

一个礼拜天早上，又是10月17日，长春解放两周年。看守所把广播打开："今天上午在胜利公园举行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共有七名……"

收音机关了，我一想开公审大会，又要枪毙人了！我回头一看，看守战士把裹腿都打上了。这少有的现象肯定与公审大会有关。我想了一会儿，枪毙谁呢？小红楼上没有人，只有前面圆楼的人了。我问徐克成："圆楼的特务还有谁？"

"好几十呢，李寓春都在那儿呢。"

下午晚饭后，一个看守战士来换岗，他脸上还有灰尘，我问他："你们今天到胜利公园去了吧？"

他没有说话，只点了点头。我心中明白，一定是从圆楼提人出去枪毙，能有李寓春吗？

10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过了鸭绿江，情况很紧急。一天下午把我押到3号监号。不一会儿带进一个人来。他两手戴着铐子，拿着被子、毯子，身上还披一条毯子，上身穿一件便衣袍子，贴身穿一件英国式的西服衬衣，脚上穿一双礼服呢便鞋，胶底。东西放在地板上。我看了他一眼，他看了我一眼。他坐下来把毯子包在身上，

另一条毯子坐在屁股下面，被子盖着脚，显出很冷的样子。这家伙二十八九岁，高高的个子，灰黑的脸，两只狡猾的眼睛。我要搞清他是怎样一个人。我站起来装作小便，把头往墙上一靠，两眼一闭，往右一倒，装作头昏。他赶紧过来扶我。我长吁了一口气，勉强地坐了起来，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两手一抱脑袋。

他小声说："不要着急。"

我一听是山东口音。他问我："你是怎么回事？"

"我是特务，不是特务还不丢人呢。"

"呵，怎么丢人？"

"我在长春潜伏了两年，没暴露身份。在审讯中方知道最近从台湾来了特务，这样一来，公安人员认定长春有潜伏组，一查，我的一个组员被捕了，他把我供了出来。你看，这么一来，一连串，都完蛋了！"

听完了我的话，他低下了头，一会儿他问我："台湾来的是什么人？"

"不知道，人不多，只有一两个人。"

又沉静了一会儿，我问他："你来几天了？"

"来两天了。"

"你何必来长春呢？你这套服装一到长春就得被捕！"

"为什么？"

"你看你这双胶底便鞋，胶鞋底上还有英文字呢，这样的鞋，大陆上是没有的。解放后，各商号一律取消英文招牌和商标，所以有英文字的鞋底不是从香港来，还有何处？再有，你这个毯子上也有英文字，还不是也告诉人家你是从香港来的吗？你的服装与长春的普通老百姓不同，使人感到突出，所以你容易引起怀疑。"

他没有吱声，他问我是哪部分的？我说："保密局直属组，在长春潜伏的。我是组长，干了半辈子工作，就这回丢人了。"

"有台吗？"

"没有台怎么潜伏？没有台情报怎么报？什么都有。可这一次，

什么都没有了。”

“过堂了没有?”

“过堂了,什么还没说就给我戴上脚镣。戴上就戴上,说坦白从宽,我不相信。你从香港什么时候动的身?”

“9 月初。在上海住了一个时期。”

“那你什么时候离开台北呢?”

“8 月中旬。”

“台北局本部没有告诉你长春的生活习惯?及大陆上的风俗人情吗?”

“没注意这一点。”他摇了摇头。

“怪不得一到长春就被捕了,这不是送命来了吗?”

“咳! 我不是派到长春的,我是派到北朝鲜的,我是路过长春的。”

“你受过训练没有?”

“受过训练,在台北。我们这一期有一二百人,都是军统的大特务当教官。我们受训的时候,不准叫姓名,只叫号码,绝对禁止谈论个人家庭历史。受了半年训,毕业。在毕业前实习半个月,发了不少钱,在台北狂嫖滥赌一阵,然后派到香港。到香港一个地方去见陈先生。陈先生又发给我的路费,派我到北朝鲜配合美军,进行收集情报及潜伏活动。我到了上海碰上了一个同学,我们在上海玩了几天,然后回到山东原籍,在原籍住了几天,我把手枪藏在家中的荤油缸里。到了长春,长春我有个叔伯哥哥,我想在平壤定居,开饭馆。我想利用这个关系由东北转去北朝鲜,不意在长春暴露了身份,被捕。”

“在上海的那个同学叫什么名字? 他到哪儿去了?”

“他叫×××,他是被派到杭州的。他在上海住西藏路 174 号后院一家货栈里。那个货栈是他亲戚开的。”

“你们的上级是谁呀? 情报怎么传递?”

“我们的上级是陈先生。没有电台,主要是潜伏活动。到时候

派人来与我们联系，给我们送经费。我们潜伏好了之后，呈报我们的地址，他按地址找我们。横的没有关系，这是风筝式的潜伏布置，只有纵的关系。”

我从他身上得到上海一个特务的线索，及山东原籍藏在荤油缸里的手枪。这两件事，必须马上反映。第二天，在提他出审的时候，我汇报给郭科长，他说：“这小子到长春，不会是过路，一定有目的。上海的那个特务线索，昨天他只谈了一半，这回说全了；原籍的枪，昨天说是步枪，对你说手枪，可能是手枪，步枪缸里放不下；在长春的社会关系，山东同乡中谁还与他有来往？吸收人没有？再好好查问一下。这是争取的好机会啊！”我说：“我一定争取。”

继续查询收获不大，但讲台湾的特务训练很有参考价值。他说：“我在上海作战中挂了彩，上了轮船运到台湾。挂彩时是上尉连长，在台北把伤养好之后，保密局要伤愈军官受训，这样，我在1950年1月调到保密局受训。在受训时，还有美国教官教给射击术、擒拿、密码通讯等，中国教官多数我都不认识，乐干给讲政治。”

“乐干原来是长春警察局局长，与我认识，四川人，很能讲话。”

“对，对，能讲话，他一上课，谁也不困。他知道的事真多，美国人对他很好，重庆中美训练班就是他办的。”

其次，我利用机会打听香港，上海等地的生活。他谈了许多，嫖女人，吸鸦片，上海仍有卖淫贩毒。他领了几两黄金的路费，一路上花天酒地，认为此去生死未卜，得乐且乐，和我谈起在香港找舞女，到上海嫖妓女，眉飞色舞，仿佛身在当时境地……一举手，手上戴着铐子，他才意识到现在已经被捕了。

这个特务的名字叫梁金剑。

伊通小住

梁金剑的事情结束的当天，郭科长对我说："回去把行李搬回你们小组，明天拂晓，要把你们16个人送到伊通县去暂住。这是为了防空，政府考虑你们的安全，才有这样的措施，你有没有顾虑？"

"我有顾虑，真的美蒋打到东北，我就危险，共产党不会把我放了，非把我杀了不可。我不希望到伊通，送到佳木斯或者满洲里那里还比较安全。伊通距长春才90里，没有什么安全可言。"

"这是你的错误想法，政府不会因为蒋美来了把你放掉，但也不会像你所想的那样把你杀了。到伊通是暂时的，比较在长春好一些。"

"科长去不去？处长去不去？"

"我送你们到那儿就回来。"

"局内的处长、科长都留在长春，我们这些人怕什么？"

"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不要有错误想法。在去伊通的路上和到那以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反映，不要马马虎虎。你先回去，呆一会儿我集合你们16个人讲话。"临走，郭科长还给了我一盒纸烟。

约摸有半小时，郭科长在后小院召集我们16个人讲话。这16个有尚传道、李寓春、杨文昌、徐克成、崔毓琛、张致文、王鼎百、张伯桥、谷口（日特），另外还有几个蒙古王子和特务。郭科长叫大家不要有顾虑，并且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过了鸭绿江，美国鬼子来不了，不要恐美，我们有力量打败敌人！"

解散之后，大家收拾东西，有一些东西可以不带。我把东西整理了一下，又给北京胞弟写了一封信。我在10月中旬接到姐夫从北京来的信，他告诉我父亲在1949年夏天故去，我的老婆回了徐

州，在我岳父那里。家中一切东西皆由我弟弟掌管。弟弟对我置之不理，我老婆回徐州，他一个铜板也没给。我老婆只身抱着孩子走了。弟弟这样做太不应该，我要写信说说。

大概三点钟的样子我们出发了。马路旁的住户还在熟睡中，有一家挂着红窗帘，从里面射出光亮，似乎妈妈在给婴儿喂乳，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我是不会有的。我自己反动，结果把一个家庭搞得生离死别。父亲死了，我没有尽孝。老婆回徐州怎么过呢？自己今天押到这儿，明天押到那儿，到哪去都要夜间进行，见不得人。也难怪，我这种人叫人看见是颇不相当的。

早晨五点钟左右天亮了，看到伊通的房子，家家户户燃起了炊烟，有几个老头在马路边上拾粪，有的赶车往城里运柴草……我真羡慕他们的自由。坐了牢知道自由的乐趣，患了病晓得健康的可贵。

进了伊通县城。我知道这地方不会有人认识我，我便大胆地东张西望。总也没看到社会上的事物，感到一切都很新鲜：街旁有许多卖小吃的摊子，我发现有卖切糕的，我幼年就喜欢吃切糕。有卖花生米的，有卖油炸果的，这些东西我都想吃。有机会买一点，我还有几十万元钱呢。

车拐了几个弯，在一家大门前停下，像一个粮栈的后门。大门打开，车开了进去。这是什么地方？我们下了车，把东西往里搬。搬到里面才看见有木栅栏。这是一个五间房的看守所。左两间，右两间，中间一间是走人的。屋内是对面土炕。出来进去必须弯腰。我一看这地方太差了。没办法，进也得进，不进也得进，进去吧。我们住两间，分四个炕，用木栅栏隔成四个监号，我们 16 个人，五个人一个监号，尚传道单独一个监号。各监距离很近，彼此能看见，随便说话。我与徐克成、张伯桥、谷口、崔毓琛五人住里边一个监号。

这是伊通公安局看守所。五间监房，我们占了一半，那一半伊通公安局用。这儿的犯人说话我们能够听见。这儿看守所的制度与在长春不一样，这里的犯人一动就要报告，“报告，我咳嗽！”“报

告，我小便！""报告，我换一换腿！""报告，我擦鼻涕！""报告，我找虱子！""报告，我扣裤钩！"……一天的"报告"，彼落此起。看样子都是乡下人，或者是地主恶霸之流，长得土头土脑。王所长对我们说："你们彼此之间不要叫名字，叫号，叫人知道你们是谁不好。"

我叫尚传道为希贤，他叫我梦龄。

与我们同来一个班战士，看守所只有王所长一人，我们一切活动与伊通公安局的犯人隔开，只有吃饭在一个锅里煮。高粱米饭，白菜汤。千篇一律。

有一天，我对王所长说："这菜里的盐太少，咱们自己买点盐，再买一点辣椒末。"

我们自己刷碗，扫地，晚饭后烧炕，各组轮班摊勤务。白天看书，晚上下象棋。坐在土炕上开"口头宴会"：这个饭馆子有什么名菜？那个地方出产什么好吃的？糖醋鱼怎么样做？锅贴鸡怎么做？你一句我一句，很有意思，津津乐道，臭味相同——对于旧的东西都那样留恋，对于吃喝玩乐的生活都不愿放弃。没有人反对开"口头宴会"。

到这之后没有材料可写，也没有人找我。我利用这个机会跟崔毓琛学俄文。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毛主席的《实践论》，由杨文昌负责领导。杨文昌是大学副教授，后来参加了军统，他是北平组的组员。解放后自首于北京，后来到了长春，在东北大学任副教授。他到长春报告过公安机关，因此他被捕后，公安局对他予以优待。他的理论知识很丰富，马列主义也有所体会，他领导我们学习，大家很有心得。

到这里没几天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情。张伯桥是中统局长春区的总务科科长，北平大学毕业，英文很好，国文也不错。他参加中统日期并不多，后来兼长春特秘处[④]的调查组组长，由他收集情报杀害了一些地工人员。被捕后他始终认为自己必然被处死。每天老是摇头叹息，1949 年在公安局把他案子结束了，1950 年春把他解到长春监狱。大概考虑他是个危险人物，于是又把他解回公安局看

守所。

早在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反动派要抓一个共产党地工人员，这个地工人员是张伯桥的朋友，他把他掩护起来，救了他，解放以后，这位地工人员在察哈尔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充主任委员，知道张伯桥在长春被捕，便给长春公安局来了一封信，证明“一二·九”运动张伯桥有功，并给张伯桥汇来一百万元钱。这样一来，公安局给他宣判有期徒刑十年。可是他心眼小，到了伊通，天天两眼望着屋顶乱想。我也想不到他会肇生意外。人人都不能设想的事情，在一个晚饭后发生了。

有人对王所长说：“我们手指甲、脚趾甲都长了，请借把剪子，剪一下。”

这个要求不成问题，王所长向马夫借了一把剪马鬃的剪刀。这个剪子比较大，王所长叫大家传着使用。轮到我们小组，先由徐克成用，然后张伯桥接了过去，他拿着剪子往脑盖上乱戳！不一会儿血流了下来……当时我在看报，他戳了几下我才发现，我上去把他剪子抢了下来，我气得打了他两个耳光，骂了他两句。这时大家都过来了，一看，他要自杀，赶紧报告王所长。王所长把他叫出去并没有责怪他，就领他去了医院。从医院回来，张伯桥头上扎了雪白的大绷带。我们大家把他恨死了。特别是我，郭科长分派我当组长，嘱咐我“绝对不要出事”，将来郭科长问我，如何回答？

王所长批评张伯桥：“你这样胡搞与你有什么好处？你这样做，自己受痛苦，对大家也不好。”

“请示所长给我戴铐子，给我严厉处分。”张伯桥站起来说。

“戴铐子就能解决你的思想问题？真的戴上铐子，不知你又怎么想了。什么也不用戴，你冷静的想一想，想通了再谈。”

王所长把我找到他的小屋子，开始就问：“前天晚上，张伯桥出事时，你打他耳光了吗？”

“我没打。”我笑了。

“你当个小组长，就有打人的权利吗？你再打人，可要犯错误。

这件事不发生别的组，偏偏发生你这小组。你还笑呢？”

“这样的人我没办法，以后再别借剪子了。”

“这是剪子问题吗？是思想问题。你怎么学习的？”

我很佩服王所长，他只有20几岁，山东小伙子，一个文化不高的干部。这二年他进步很快，对待张伯桥这件事，我认为一定会砸上镣或戴上铐，可是他没有这样办，而是和风细雨地教育了几句。使大家对王所长深加敬服。我内心说，这样的处理比戴上铐更起作用。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干部倒是不简单，我自愧不如。这一件事使我们16个人，进一步感到政府对我们的温暖与宽大。

收复平壤的消息传来，大家很高兴。我在监号对大家说：“咱们庆祝平壤解放，改善生活，自己拿钱买肉，大家赞成不？”

异口同声的赞成。于是我向王所长请示，并得到了王所长的同意。我们16个人，买了12斤肉。我和尚传道出的钱比较多。利用这个机会吃了一顿肉。由于肉少人多，感到还没解馋。

过了几天，于审讯员把高洁和胡泽雨接走了。又过了几天，宋所长把李寓春等八个人也接回了长春。最后只剩下尚传道、李中候、徐克成、崔毓琛、杨文昌和我六个人。

快过新年了，战士们要开新年晚会，叫我给编节目。我给他们编了一段快板，几个小调。每天晚上我到他们的屋子去教他们，他们那屋墙上挂着武器，从不防备我。有时他们买吃的也给我吃。王所长也在屋。大家说笑，也不回避。我感到政府对我很相信，思想上非常轻松。我对尚传道说：“过新年，咱们再买几斤肉炖一炖。这回由我做，保险比上回炖得好。”

大家都同意，由尚传道、杨文昌和我出钱买了五斤肉，还打了半斤酒，二斤花生米。打酒是我向王所长请示的：“我不喝酒，他们要喝一点，就给他们买半斤吧？我保证不会出事，张伯桥那样人是少有的。过年了，半斤酒不多。”这样，我们便买了半斤酒。

12月31日下午，我到大厨房炖肉，杨文昌烧火。炒了两个菜，一锅大炖肉，吃的大米饭。这个新年我们过得很好。事后我才知道

王所长没有过好，一个战士对我说："你们吃得好，你可不知道老王生了多少气！你到厨房去切肉，手里拿着菜刀。这里的看守所所长给老王提了意见，人家说犯人怎么能到厨房拿刀？老王说这些犯人都是比较进步的。人家又说，无论怎么进步也是犯人。这么一说老王就生气了。"不是咱们那儿的看守所，只好听着。我们大伙也感到不痛快。这个年过的……

我感到很难过，觉得对不起王所长。一个犯人要求吃肉喝酒，太过分了。我回到屋一说，大家都感到怪我们自己。大家决定，今后除了买书，其他东西一律不买。

顽 固 者

新年过后我们都回到了长春公安局。

一天，郭科长与大家谈了一会儿，又单独把我留下。他问我："尚传道[⑨]写了三百页的材料，是谁叫写的？"

"是我启发他写的。我的意思是，他到了公安局就吃小灶，什么罪恶也没有交待，应该主动写一些材料，争取进步。"

"难道我们没有图书目录吗？他写了一些图书目录！他读过这本书，读过那本书，这样体会，那样体会——卖弄自己的学问呢！一点罪他也没谈。这样的人给他机会反省，他也不认识自己。与你们差得很远。以后再不要启发他了，等他自己慢慢的认识吧。"

在伊通时，我对尚传道说："政府人员对你一向很客气，从不谈话，也不找你，可是你也不找政府，这样下去不好。应写材料，请求谈话，交待问题，坦白罪恶，不这样主动争取是不行的。每天只看一些书，写些日记，那是消极的，应当积极。"

于是尚传道听了我的话，写了一篇三百页的材料，名为"四十回忆"。主要是解放后，他读了一些经典著作的体会，摘引了许多毛

主席的话，及马列主义的书名。写完给我看了一下，我感到他的认识太差，自以为是，但是，写出来了，我说可以，他就呈给了政府。结果受到了郭科长的批评。尚传道一直不知道这件事，还以为自己这件材料写得很好呢，其实不很好，或者很不好。

接着郭科长又布置我到圆楼楼上的 4 号监房去做工作。

有一天段克文[①]来了，他穿着一个黑布破棉袍，戴一个古铜色的旧毡帽，脚上戴一副镣子。我曾在长春见过他一面，那是 1948 年夏天，在长春督察处处长张国卿家中。我与他点了点头，没有谈什么话就走了。虽有一面的会见，我没有忘记他，他可能忘记我了，所以，他见我一点表情也没有，不认识倒好。

段克文当过吉林伊通县县长，军统的外围，一贯是飞言浮躁，到任何地方都好出风头，夸夸其谈，有骆驼不说牛。一个没有修养的荒唐鬼。

他进号之后，问这个问那个。我告诉了自己的姓名，他问我干什么的？我说小特务。他问："在哪部分？"

我说在督察处，他的下句话一定是："你们处长张国卿我认识。"果然，他是这样说的。我笑了笑，他又说："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麗东也认识。"

在他心目中这些高级特务都是他的朋友，他的长官。衬托他在反动派里也很有地位。他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也不知道督察处处长与督察长是什么关系。坐下之后，东张西望，他可能考虑为什么把我从十号监房迁到四号监房呢？我一看就知道他是潜伏后被捕获的，看他那套衣服，故意装穷，怎么瞒得过公安人员的眼睛？

重新编组，我是 4 号的组长。给我这组调来几个人，都是现行活动的嫌疑。如苗佩然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职员，在口型科工作。其他如林宝华、杨绍时等也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嫌疑。

开头一次会，我说："咱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姓名、职业，好称呼，以便学习。"

每个人都自我介绍了，段克文没有说他是军统，他只说："我是

吉林伊通县县长，在 1947 年只干了一个月，以后就退到长春，赋闲。”

这么简单？不老实。我没有吱声。

苗佩然说：“我在长影口型科，是翻译外国片子，对口型的。我每天早晨起来练习举砖，有几个人与我一起练。我说咱们成立一个‘砖头会’吧，我当政委。就这样被捕了，其实我们是开玩笑的。”

晚上开会，段克文胡吹瞎扯，什么罪也没有，并且还说：“我认识张学思，有人叫我杀张学思，我没有干。我们是小学同学，我怎么能杀他呢？”

别人对段克文的事知道得不清楚，我说：“政府掌握全部材料，对于你段克文也不例外。你说这一套连我都欺骗不了，你还想欺骗政府！”

我这样说他感到很惊讶，冷笑了一笑。

段克文出去写了两天材料，回来直摇头，似乎有什么难心事。这小子一肚子诡计，两眼一翻，就生个坏道。我不理他。

一天上午，于审讯员找我：“段克文在你那个小组吗？”

“是的，表现不好，问题多。”

“问题不少。他是不是军统？”

“是军统，不是基干。他怎么交待的？”

“他说，1946 年在沈阳，由辽宁省主席徐箴介绍任东北统一接收委员会纠察队队长，以后就到吉林省当参议，又当伊通县县长，一直到长春解放。”

“他这是胡说，欺骗政府，1946 年他到东北统一接收委员会充纠察队队长，是军统东北特务头子文强介绍去的，躲避特务关系。在抗日时期的活动，他交待得也不清。他在小组会上说，他当游击副司令什么也没有干，这也是令人不能相信的。我看这家伙不是交待问题，是来钻政府的空子。”我告诉于审讯员，先追他在东北的社会关系，到东北先找的谁？这样一追就使他破绽百出，现原形。

第二天早饭后，提走了段克文，中午回来，他戴上了手铐，脚

服，夏士栋给段克文一个大耳光。段克文两手戴着铐子，无法还手。我回来之后听说此事，批评了夏士栋，叫夏士栋写检讨书。夏士栋对段克文说："我情愿加罪，非打你不可！你胡闹，我就要管你，县长、省长也不行！"

我对夏士栋说："不行，打人不对，这是看守所！"

同屋的犯人对段克文都十分愤恨，他不守制度，还说："你们用我作进步的台阶，那错了！我知道你们是假进步，实际你们心里还同情我呢。这一点我还看不出来？"

我对大家说："叫他自己反省吧，不要对他进行帮助了。"

对于苗佩然的案子，我也多次进行了解。解放以前，他在国民党军队政治部工作过，充少校政治指导员，参加过国民党及三青团，解放后，在北京参加了工作，又分到长春电影制片厂。他因成立"砖头会"被捕，惟恐他是打进来的内奸。我很注意他的社会关系，他过去的上级现在有的在起义部队，有的在北京学习，他的亲友都在北京，长春没有社会关系。他这个案子归于审讯员审理。于审讯员找我研究了一次，我从苗佩然老婆的来信、他的日记里找不到现行反革命的依据。我说："他历史虽有问题，但是现行活动没有。"我又建议，"长春的问题大致是这样，不会再有新东西，现在应该到北京了解他的一切情况。如果是现行活动，指挥他的人在北京，传递情报是他老婆的来信与他的去信。如果是这样，还要化验他们的信笺，是用什么方法书写的？是密码？还是什么化学手段？"

于审讯员点头，认为我说的有道理。

我白天几乎不在小组，我到小红楼与杨文昌整理各小组的材料。有一天，杨文昌说："科长叫我们赶快把这部分材料结束，又要展开新的学习了。"

第二天早饭前，收音机一打开就听到了长春市广播电台的广播，播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一条……处死！第二条也是处死！播到第四条，电门关了。犯人别的没听到，只听到"处死"。

①长春第一次解放：1946年4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次解放长春，后根据中央"变阵地战为运动战"的指示精神，决定放弃长春、吉林，撤至松花江以北。1948年10月19日人民解放军解放长春。

②军委会特务处：1932年3月，蒋介石召集"军方"黄埔系的骨干分子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下设有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1934年4月，复兴社特务处又与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课"合并，成立军事委员会特务处，仍由戴笠任处长。1937年4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与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合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党务调查处为第一处，特务处为第二处。1938年8月，蒋介石把第二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通常简称的"军统"，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1940年戴笠任局长。

③10月17日长春解放：长春宣告解放之日是1948年10月19日。10月17日国民党六十军起义，撤出防地，即人民解放军部分的解放长春。关梦龄如是记载这个日子，与他后来的遭遇紧密相联，故整理者保留了这个误点。

④长春特秘处：全称为"长春党政军特种联合会秘书处"。1948年在解放军兵临城下，长春市人民掀起反抗斗争，时局危机的情势下，为加紧对人民的镇压，于4月经吉林省主席、东北剿总副司令、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批准，成立了该组织。"特秘处"囊括了长春市的军、警、宪、特、政的全部力量，由保密局长春站、长春警察局、长春市政府、长春宪兵营、第一兵团司令部军法处和政工处、省党部、中统长春区、国防部史祚炎高参办事处、长春督察处等组成，郑洞国任主任委员，王中兴任主任秘书承办具体事宜。

"特秘处"建立几个月便审批逮捕二百多人，签报上级审核杀害四十余人。

在"特秘处"这个特务的联合体中，督察处起到了核心作用，它是"特秘处"罪恶活动的主要承办者。

⑤尚传道：原国民党吉林省民政厅厅长兼长春市市长。1975年3月获特赦。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港澳台暨海外组组员。已故。

⑥段克文：据1975年第七批特赦国民党人员名单记："段克文，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特赦后经香港去美国。已故。

第三章 网开一面

大 逮 捕

监号来了一个新犯人，是邹瑞亭，军统长春站离职的组长。我在督察处时，他与我往来颇为密切。1948年4月他从长春兑了许多款子去了北京，现在怎么又捕了回来？

邹瑞亭进屋来的时候，脚刚踏进屋内，把行李往地板上一放，两手便一举：请大家多关照！露出了家礼。坐下之后，他说他算完了。大家问他是什么官？他说是军统局少校组长。大家笑了，说："我们这屋有个督察长叫关梦龄的，他都没有事，你这个组长，不在话下。"

他认出我来，站起来拉了我的手说："见到你真不容易，北京的朋友都说你被镇压了。长春市除了你还有谁？官大的多了，可是实际办事的你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能看到你，我对宽大政策不怀疑了。你胖了。"

我们俩坐下来谈起来了，他说："1948年我到了北京，带了许多款，有几百两黄金，不成想被长春一个商人杨蔼祥骗去，没要回

多少。没有办法，我借了几个钱，开了一个煤铺，1950年到了天津，天津公安第十分局找我去谈话，叫我以灰色面目出现，一方面叫我做买卖，一方面叫我给他们做工作，戴罪立功。我只在长春认识一些人，这样，经过了十个多月，我什么也没有干，一点成绩也没有，于是便把我逮捕，由天津解到这里。我认为这回算完了，在小红楼的一个小屋子，我把手指咬破，在白衬衣上给我老婆写了一句话：瑞玉永别。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天津，她们还不知我被解到这儿。想不到你在这儿，我高兴极了。"

我问邹瑞亭，在北京都看到了什么人？长春的朋友都有谁到了北京？他说："长春站站长项迺光在1948年11月从长春化装到北京，站上的总务组组长子浩跟他一块去的。当时我在天津，项迺光派子浩到天津找我，要他的那个白金杯。原来在长春的时候，项迺光交给我一只白金杯，叫我带到北京给他经营一下，这一次他派子浩索要，我没有钱便没给他。后来他们就飞走了。"

"督察处长张国卿与项迺光前后脚到的北京，在北京交道口老刘家住了一个礼拜，也坐飞机逃走了。"

我感到邹瑞亭太势力眼，人家的东西为什么自己变卖了，还不给人家钱？项迺光已经不是长春站长了，管不着他了？小人作风。

邹瑞亭是地痞流氓，日本特务腿子，给日本人抱孩子，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后来又给白俄当仆役，又学会了俄语。伪满于长春警察六分局当特务股长。六分局住了许多白俄，归他监视，作了许多罪恶勾当。光复后，花钱运动参加了军统外围。在北京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当外勤督察员。有一次，派他去抓土匪，他不懂特务技术，叫门的时候，站在门的中间，手一敲门，里面"啪"地一枪，把他的右腿击伤，土匪没有抓着，自己先挨了枪子儿。谈起来真丢人。特务机关认为这种人没用，便放在一边不派他工作。他在医院把伤养好，一看没有人理睬他，又托人写了一封信调到东北。到沈阳后，他给军统局东北区秘书主任陈绎如行了贿，便派他到长春站工作。在长春站又行贿副站长袁士举，派他为少校组长。1947年春，因为

长春战事紧张，他私自逃到沈阳，擅离职守，长春站当时的站长王力，即刻把他开除。可是他仍与军统的大小特务勾搭，以后认识了项迺光，认识了我。投机倒把，坐飞机运黄金。娶了小老婆，对他母亲与大老婆置之不理。特别在伪满的时候，倚仗日特，强奸白俄女人，逮捕无辜人民。

这时从北京又解来了一个栗宗元，他是伪满长春"三张二栗"的"一栗"。倚仗日本势力胡作非为，他看中了哪家姑娘，便给这家打电话，叫这个姑娘于晚上什么时候到某某饭店，如果不去，明天就抓人，说是反满抗日，是思想犯。看中了一个京剧女演员，唱完戏，就用车拉到饭店过夜，不去？行吗？邹瑞亭说他看见栗宗元了。

栗宗元自己不能写材料，叫杨文昌帮着写。

杨文昌帮着栗宗元写材料，写了一天还未写完，我把杨文昌找来，对他说："你先把他在北京认识的社会关系写出来，检举要紧，过去的罪恶先不忙写。"

于是杨文昌启发栗宗元写社会关系，检举隐藏的反革命。他检举了不少人。郭科长一看这些材料很高兴，我又对杨文昌说："邹瑞亭与栗宗元二人都是伪满的特务，要他们互相交待罪恶，比他们单个儿交待还有成效。你对栗宗元说，邹瑞亭不够朋友，把你的事都说出来了。这个人为了自己，就不管别人。这样一说，栗宗元受不了，就会揭发邹瑞亭。"

杨文昌果然对栗宗元这么说了，轻描淡写的一提，栗宗元便受不了了。

"邹瑞亭说我什么？怎么说的？"

"算了，提这个没用，我也是听犯人说的。他不仁，咱们不能不义。不与他一般见识。他的事你又不知道。"杨文昌再三"拦阻"。

"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多得很，我说，你给我写！甭客气。"

栗宗元把邹瑞亭的罪恶检举了不少，内中有的邹瑞亭已经坦白，有的没有交待。

接着我又对邹瑞亭说："栗宗元与你有仇吗？"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只是吵过架又好了，怎么了？”

“他说你许多坏话，咳！这小子……”

“他说我坏话？我倒要检举他！在伪满时，栗宗元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谁不知道？他那个买卖怎么来的？还不是敲诈来的！16岁的小女孩他都强奸，缺德到家了……”

“算了，你要检举，就写材料。”

他说我代笔，写了许多栗宗元的罪恶。我给杨文昌一看，杨文昌说：“这两个小子，哪一个也活不了，有民愤。科长说有人控诉他们。”

“那就完了。”我下了结论。

小红楼各监房的门窗，大加修理，大部分都换了新门，安上新锁，比过去坚固多了。郭科长这些日子忙得很，见面说不上几句话就走，有些事，我报告给他，也不注意。我知道一定另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3 月下旬的《人民日报》刊载：美特高佩洁和他妻子马瑞卿在天津被捕。高佩洁是美国特务机关任用的特务。他在天津利用一个皮货庄，与丹麦、美国间谍一起活动。在他住处搜出大小电台 3 部，密电本 7 本，还有美特发的照相机等。这是解放后破获的第一个大特务机构，国际特务组织。使人震惊。

高佩洁与我相识，他的老婆马瑞卿在长春也与我认识。他家住长春东三马路。1948 年 7 月，他多次请我吃饭，我也多次到他家。那时，军统有人对我说：“高佩洁自称少将，说是给美国新闻处工作，美国新闻处在长春的时候，他与美国人有来往，现在美国人走了，他何去何从？别被他唬了，如果给八路做工作，那可上当了。”

我说派人从旁调查一下。这话被高佩洁知道了，他认识长春警察局长袁家佩和国防站二厅长春站少将站长史祚炎，他托这两个人婉说，要见见我，请我关照，并以史祚炎的名义在高佩洁家中设宴。我去了，他对我说，他给美国情报机关做工作。1948 年 9 月，我到他家，高佩洁对我说要到沈阳。我对他老婆说：“你们过解放区要

小心,共产党抓去了可要共妻的,那可不是玩的。”

“共产党把我抓去,我就自杀!”马瑞卿说。现在她被捕了,能自杀吗?这些人早晚都要落网,谁也跑不掉。

尚传道住一个单号,每天看书,吃小灶,犯人只有他一个吃小灶。早晨牛奶、面包、鸡蛋,中午一菜一汤,晚上一菜一汤,都是面食或大米饭。他什么也不写,似乎到这来研究马列主义而不是反省罪恶。一天我在看守所与宋所长谈话,郭科长也在。正赶这时,一个看守端一个方盘,盘里一碟炒鸡蛋、一碗黄瓜汤、三个馒头,这是尚传道的伙食。我说:“他什么也不干,吃这么好,现在东北吃黄瓜是稀罕东西。”

郭科长说:“你又馋了?回头给你也弄点吃。”

“我不吃,我吃炖豆腐就很好。”

“回头给你买包子,再买点酱肉。”宋所长说着骑车走了,不一会儿真买来了。郭科长叫我吃,他们谁也不吃。以后又把杨文昌找来,我俩把一斤酱肉,20 个包子吃光了。

郭科长说:“政府对你们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对尚传道与对你们的要求也不同。他觉悟慢,叫他多反省一个时间,叫他自觉认识自己才行,不能勉强。”

督察处侦审室的侦审员于文学也押在圆楼上。昨天小组长汇报,他是第一小组组长。会后,我问他什么时候来的?他说:“长春解放后,我逃到沈阳开了一个粮米铺,呆了一年,去冬被捕到这里,判刑 7 年,送到监狱。最后又从监狱解回公安局。”

我问他在沈阳还看见督察处的人没有?他说:“李贺民在沈阳蹬三轮,邢士林在沈阳开了一个电料行,贾英明在沈阳赋闲,去年冬天都被捕了,可能解到长春监狱。”

4 月 23 日,圆楼上的犯人一律搬走,搬到小红楼。这一下,小红楼住满了。我搬到小红楼楼下七号。我们这屋有杨文昌、徐克成、李中候和我。

4 月 26 日晚上,院内汽车不住地响。宋所长叫我们 4 个人搬

到圆楼。我们4个人，一屋一个，另外，马尚、沈重、王达生、栗宗元等人也一人进一个监号。我进屋之后，楼下便大批地往里进人。宋所长、王所长和几个所员，把进来的人送到各号。我在屋里往外看，人来得很多，也不问姓名，就往各监号塞。我这个屋一个一个地往里进，不到半夜，已28个人！不用说睡，就是坐也挤得难受。我心想，这是大逮捕。

楼下也押满了人。

这些人，我不认识。都是些什么人呢?楼上楼下押了五六百人。这个举动可不小！大概是现行反革命，也不能有这么多呀?

天亮时，我勉强地躺下睡了一觉。五点钟起来，坐着一屋子人，谁也不认识谁，互相看看都是陌生的。吃饭时更乱了，我装作什么也不懂。他们拿筷子，也递给我一双，半碗白菜汤，一碗高粱米饭。吃罢饭都开始大便，厕所在屋内，一大便，屋里这个臭哇。

饭后，我开始活动，先问我身旁犯人的姓名，这时看守战士严厉训斥：不准说话！我心中有数，照样与附近犯人说话。我告诉坐在门旁的一个小孩说："老弟，你在那看着点，看守的过来先咳嗽一下。我们谈话有什么关系？大家在一起都是有缘的。"

"对，这位说的对，贵姓?"

"姓郭，叫郭依平，买卖人。认识几个反动派，当年沾点光，现在受点罪。"

大家笑了，你一言，我一语。我明白了，都是昨天夜里一块捕的。捕的方式都一样，用公安局的捕票抓来的。

有的人说："我已经登记了，这回为什么还捕我?"

"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刚睡下就抓来了。连行李都不叫拿，咳，祸从天上来！"

"我就知道这几天不好，居民组长老到我们那儿，无话找话，问这个，问那个的。"

"昨天可抓老了！我来的时候，一院子大小汽车，满了，转不开身。"

"我还戴着这个家伙，下车拿不下来，就叫我进来了。"我一看这个高个胖子，右手戴一支铐子，左手没有戴，铐子紧紧扣在右手的肉里，手腕上的肉都红肿起来。看守所太忙了，宋所长也顾不得了，怎么还不给他拿下来？我告诉他，可以报告给那个看守战士，他赶忙报告看守，又等了一会儿王所长给他开了锁，把手铐子拿了下来，不过费了很大的工夫，因为这个铐子的锁不容易打开。

夜里，不能睡大面，不能仰面，只能侧身睡，叫作睡小面。28个人挤得喘不过气来，这些人都没有被褥，也不冷，挤得直出汗。刚睡下便开始提审，我们这号提出去五六个。有一个叫胡荄，是1949年底我们写材料，李芳春检举的。我感到，我们写的那些材料有了用途。先把胡提出去，又提宋毅，接着提老董头，后来提我。提我到郭科长办公室，于审讯员也在那儿。还有很多人在外边屋子审讯，都在连夜忙。我知道这个逮捕规模很大，不仅长春市，恐怕别的地方也会有。郭科长问我号内的反应，我说："都认为既已号召登记坦白，我们已经照办，还抓我们，这是说了不算；第二，自己不认为有罪，解放前自己没有血债。在解放以后，又无现行活动，为什么还要捕来？第三，反正政府说了算，刀把在政府手愿意抓谁就抓谁。"

又问我个别犯人情况，我举例说了几个，于审讯员在旁边说："关梦龄，你这回的工作可被徐克成拉下了，徐克成了解的情况比你多，比你全面。"

郭科长也这么说了两句。我心中的话，徐克成干这套给我提鞋，我都不要。用不着"激将"。桌上摆着纸烟，还有花生，我吸了一支烟，吃了几粒花生，郭科长叫我回去好好再了解一下，明晚再向他汇报。

我附近有一个小孩，有20岁，他叔父开理发馆的，因为认识一个建军的特务，被捕，他说："我什么也不知道，这个建军的孙华南叫我给他送信，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信，后来人家对我说，那是情报。现在被捕，大概就是因为这件事。"

我问他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他说在解放前。我心中想，那

问题还不大。他又说："我这个反革命，连烧鸡都没有吃过，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没有穿过，他也没有给我钱，今天我被捕来，你说冤不冤？"

我心想，这个小孩老实得很，怎么也反了革命？内中必有枝节，再不就是公安局做情报出了偏差。这么多的人捕来，绝不可能一点偏差没有。这个小孩就有问题。

有一个山东老头，在南关种地，姓什么我忘了。我看这个老头不像地主恶霸，我问了他许多事情，没有一点嫌疑，一定是抓错了。晚饭后，我到看守所对宋所长报告此事。看守所没有底案，查不着这个人的名字，宋所长说："回头再查一下，没有问题，就得放。"第二天早饭后，这个老头调走了，可能释放了。

夜里，照例审讯，各屋的铁门不住地响，不叫名，叫号，所以夜里睡觉多数睡不好。

我每天都出去汇报。看到各屋都有干部在审讯，有许多来审讯的干部我没有见过，可能是市局别的科的干部。看来是大动员。

有一个叫宋毅的，他是长春警察局的秘书，不是军统分子，一个书呆子。他没有什么特殊案情。

他戴上脚镣，我问他有什么感想？他吟诗一首：

银铛脚镣君莫羞，
君也当年逞风流；
若不及早痛改悔，
还有苦的在后头。

第三天，抓来了王厚甫，他是我的组员，军统基干，戴着手铐。我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的？从哪儿来？"

"我从长春监狱来。"

"怎么回事？"

"人家说我在新疆参加了暗杀毛泽民的行动。"

我赶紧叮嘱："我化名姓郭，保守秘密，不要乱讲。"

"没关系，我这事与你没牵连。"

我一想，当年陈牧报复从共产党叛逃来的李文宣，就是派王厚甫在南关处决的李文宣。如果说李文宣当年是假投降，那么王厚甫打死李文宣就是一条血债。晚上我把毯子给他盖上，他在这屋住了两天就走了。临走我听他对宋所长说："那个姓郭的是关梦龄，督察处的督察长。"过了"五·一"，天气热了，这屋子人多挤得难受。我在精神上倒很愉快，别人是住监房，我是在工作。是以工作人员的心情，在考虑怎样了解这些犯人的案情。我认为这些人都没有什么，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东西，没有重要的人犯。

第 3 号监房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犯人服毒了，说是吃了许多安眠药片，神志不清，很危险，由几个看守给抬出去了。服安眠药片，也不能是一片，要一二十片才能自杀。这么多的东西带在身上，怎么没有检查出来？这个人是在未被捕的时候就准备好了的。不然，公安人员闯进屋去现藏能来得及吗？由此可见，这个人是个很危险的反革命，不是一般嫌疑分子。过了两天，肖审讯员提我出去，他说："抓来一个刘天民，他不承认是督察处的，回头我把他提到这屋审讯，你在门上的玻璃小孔认一认。"我一看，正是督察处的额外上尉督察刘天民，高个子，黄脸，什么时候我也能认识他。

肖审讯员说："这小子不想活，服安眠药片，怕处死。"

5 月 20 日晚饭后，楼下有一些犯人调走。我听到叫"徐鸿如"这个名字，便一下子想起前些日子我曾替一个山东小伙子写检举材料，徐鸿如是内中的一个逃亡在长春的山东恶霸。呵，把他也抓来了。我一想，这回抓的人真多，大概不能只在这个地方押人，可能监狱也押了不少人。

大 镇 压

5 月 15 日早上，看守战士把圆楼钉有黑色防空纸的玻璃窗都

关上了。圆楼的窗户可以看到大街。早饭后，我站起来，利用看守不在跟前，偷着向大街看了一眼：街上的人很多，有扛着红旗的，有拿着标语的……小孩子和青年学生唱着“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中国人民力量大，把帝国主义连根拔……”

这时候，屋内漆黑，电灯打开了，看守把收音机也打开了。收音机不是播送新闻，而是播送一个旧京剧片子，《四郎探母》的一段，还有一个旧片子，也是京戏。声音不好听，来回地播这两个片子，我怀疑不是收音机，而是留声机。不一会儿，宋所长和王所长等人上楼来提人，每个监号都有几个人，我们这屋把胡亥和老董头提出去了，马尚、栗宗元，许许多多的人都被提出去了，有几十个人。栗宗元在临走的时候，一双便鞋拉下了，他还回来取的鞋。人提走了，屋内仍播送那两段难听的京戏……

我坐着一声不响，看守来回巡视，所有的人都不说话，大街上有喊口号的，但听不清喊什么。我心想，可能是枪毙人，但也不能枪毙这么多呀？这屋的老董头，他说开饭馆，实际是开妓馆的，把他也提走了。胡亥是建军的，昨天夜里还提他问话，问他：“这次把你抓来，你有什么想法？大胆地谈，言者无罪。”

胡亥暴露了许多思想，把不满政府的话，他都说了，回来对我说：“他叫我不要有顾虑，我当然没有顾虑，什么话都说了。共产党不是骗人吗？先叫登记，保证不抓，最后来一个大逮捕。”

他一说这话，使我想到在1945年秋，“九·三”胜利后，蒋介石对华北汉奸的处理。北京街头出了一个布告，上面有：“凡给敌伪工作之汉奸，但问行为，不论职位，予以办理……”就是不管这个人的汉奸职位多高，只要没有坏的行为就不抓，官虽小，但有坏的行为也要抓。这张布告一出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奸没有跑，自己都认为没干什么坏事。结果，戴笠一到北京把汉奸都抓了。汉奸被抓之后，在看守所说：“咱们被那张布告骗了。”

现在呢，这些人响应坦白从宽的号召而自首登记了。如果没有这个号召，有的人早就跑了。胡亥说的话，我同意一部分。昨天还

问他有什么意见，今天就枪毙了，这种作法谁也意料不到。这样也好，在最后几分钟才知道被枪毙，减少许多苦恼，如果说要枪毙这个人，头十天就告诉他，这个人有多难过呀。1946年，“南京人民法院”判处汉奸死刑，如判周佛海、绪民谊、林柏生、陈公博等人死刑，都是事先宣判，准许找律师辩驳，最后才执行枪毙。被宣判死刑尚未执行，那心情不堪设想。

晚饭，黑窗户才打开，我再一看大街，没有人了。这个大风暴过去了。

晚上到看守所去汇报，我进屋一看，桌子上有张报纸，我想看看，被王所长拿过去收了起来。王所长与宋所长问我号内的反映，我说：“大家不知什么，有人猜是开大会，但不知道什么大会，有人认为枪毙人，我也这样认为。”

别的号犯人害怕把自己提出去枪毙。有人说，这回被抓的都危险。因为抗美援朝一紧张，就要安定后方，所以我们这些人就该倒霉了。

我想到列宁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对一些反革命也施行大镇压，强调安定，毫不留情地杀反动派。现在，中国人走俄国人的路，也是一样。如此说来，今天杀人是按照列宁的做法执行的。自己会不会被杀掉呢？没有把握。比如栗宗元、马尚，他们二人与我一样分在各监号，给政府反映情况，夜里同时到看守所汇报。我曾对郭科长说：“马尚虽然是中统的工运组长，可是他争取得不错，才判他有期徒刑七年。这次他在第8监号工作，反映情况也很好。他戴一个小脚镣，走路一点一点的挪动，太不方便，给他拿下来叫他方便方便吧！”郭科长说再等两天。可是哪会料到被判7年有期徒刑的马尚这次又枪毙了！我这个没有判刑的比马尚还严重的大特务，不也随时有被拉出去的可能吗？想到这，自己警告自己，应该知道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是无情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我知道无情又能怎么办呢？我能对政府人员说，你们别来这一套，你们用完了我就要杀我的。

5 月 20 日以后，犯人有走的，也有来的，看守所把我调到第一监房担任学习组长。

我仍然用“郭依平”这个化名。我到这屋干什么来了，看守战士都知道。这些哨兵都认识我，每逢在号内与别的犯人讲话的时候，哨兵看到也装作没看见。可是有一个班副姓傅，山东人，他对我最过不去，号内不准交头接耳谈话，可我为了要弄清问题，不能死坐着不动啊，我与隔壁的同犯一说话，被傅班副看见了，他对我严厉地批评了一番。我心想这是故意找别扭。我心中不服，对宋所长说了，宋所长说：“我回头告诉他，你还要继续工作。”

没有几天，刘荣第来了，他是从北京捕获解到长春的，关到了我这号。此外还有长春市立医院医生丛佩芝、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情报大队副张长青、哈尔滨工大学生门光第、东北大学学生潘澄、中统特务严新汉、现行反革命于宗元，也关在我这号。一屋子人。

刘荣第穿一套新布制服，脚上戴着小镣，虽然这种小镣仅比手铐子大一点，但是戴上极不方便，一步只有几寸长，行走不如一般的铁镣。进屋后，让他靠近厕所坐下。我认识他，但是他不认识我。

1948 年 3 月，督察处把刘荣第和他老婆于凤茹逮捕了，因为于凤茹叫他外甥把一大批马列主义书籍拿到大街上当废纸卖，这一下被发现了。我亲自审讯于凤茹，陈牧审刘荣第，据刘荣第供称：“1946 年 4 月八路军占长春时，三联书店租了我的房子，到 5 月 23 日，八路退出长春，三联书店退得匆促，把许多共产党的书籍扔下，放了一年多，我内人认为这些书没有用处，就叫我外甥当废纸卖，这一卖，被督察处知道了，这事，我不在家，是内人办的。”又有许多人对我和处长张国卿婉说，我们才把他们夫妇开释。我当时看见过刘荣第的背影，他不认识我。

我和刘荣第谈了一会儿，没告诉他我是什么人，我只说：“咱们在长春的罪恶是老百姓都知道的，我们承认不承认，那是我们进步与顽固的问题，事实俱在，不承认并不等于没有。政府杀我们与不杀我们，不在我们多交一件罪恶，或少交一件罪恶，我们仿佛是一

列火车的货物，多放一包东西，少放一个行李，对整个这列火车无足轻重。我们的罪是很多的，不要顾虑这一件或那一件罪，要全交清，不交说明顽固，交了是进步，你就不要犹豫了，在长春认识你的人多，自己争取主动有好处。"

"我一定交清，这回我在北京看见镇压反革命，对我的教育很大。4 月 26 日那天，我还未被捕，北京这一天枪毙 200 人，原来计划枪毙 202 个人。把 202 人装上汽车，便有两个人要交待问题，于是又把这两个人从汽车拉下来，就枪毙了 200 人。我心中想，只要能坦白，就能受到宽大，方才听你这一说，我一定全部交待，没问题。"

下午，郭科长找我问刘荣第的情况，我说："他能交待全部问题，不是顽固蛋，把他戴的小镣子给下了吧。旧社会他是长春地面上的人物，戴着镣面子不好看，思想有负担，影响写材料。他认识的人多，还能检举许多人。"

"他主要职务是什么？"

"他是国民党东北党部的人，后来又与毕泽宇——吉林参议会议长，1948 年挂名哈尔滨市市长相勾结，给毕泽宇摇旗呐喊，毕泽宇任他为哈尔滨市社会局局长，长春参议员，他的政治关系比较复杂。"

刘荣第被下了脚镣。他写了不少材料，很能争取。

我们这屋，问题交待不少，丛佩芝交待出一支八音枪，他把他爸爸检举了，他爸爸是某省的国民党省党部委员。这都是显著的进步。我自己认为也有一份工作成绩。

于宗元是个中学生，他只有 19 岁，去年冬，他与两个同学成立反共青年团，他是负责人，在长春市内各电影院贴反动标语，散发反动传单。郭科长叫我了解他们的组织，人员及上级关系，两天之后，郭科长把我提到他的办公室，赵处长也在座，赵处长对我说："你很辛苦哇，健康还好吧？"

"报告处长，我的身体很好，处长好。"

他叫我坐下，递给我一支烟，郭科长从旁说："于宗元的问题进行的怎么样？处长要了解一下。"

"于宗元是反共青年团的团长，另外一个同学是副团长，姓×，他家开一个木匠铺。他们写传单，开会都到这个同学家。还有一个瓦匠支持他们，但不是上级。一个同学加入了他这个反共青年团。我问他为什么反对共产党？他说：'我也不是有钱人，我家也没有在国民党干事的，我看了一些侦探小说，见国民党接收人员很气派，认为不干革命，不吃苦，不自己打江山，将来没有出息。同时，我认为共产党长不了，于是我与同学就成立反共青年团。'"

"有一些问题真是不可思议呀！"赵处长摇摇头很慢地说出这句话来。

"我看应当把这个姓×的学生逮捕！"我没加思考，就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不能随便抓人，还要仔细考虑一下……"赵处长还要说什么，又不说了。

当时我脸很红，后悔失言。一个犯人，怎么能在政府人员面前说出这样的话，第一，忘了身份；第二，还是军统特务作风，随便抓人，不管证据够不够，抓来再说；第三，这样暴露自己的缺点，赵处长还能相信我吗？

我与门光第谈天，他从哈尔滨到长春，做投机倒把的买卖。在沈阳与长春之间联络了一些奸商，公安局认为可疑而被捕。他被捕在 5 月底，进监较晚。对这次大镇压，他说："这是全国性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长春抓了一千多人，除了押在公安总局，各公安分局也押满了人。4 月 26 日晚上来一个大逮捕，别的市也是同一天抓的。公安局有一个科长与我同学，这个科长姓×，他告诉我那天夜里公安局的干部都留在总局，不准外出，口令是'交通'。到了晚上 7 点，全市公安人员出动捕人，到 5 月 15 日这天开了全市公审大会，一次枪毙了 150 多人！叫这些人跪下，把帽子一抹，后而战士用机关枪扫射，第二次又枪毙了 50 多人，两次有 200 人。这两次我都

在场，这些人都是反革命、特务、建军的，还有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听说北京、沈阳枪毙的更多，还有已经判了徒刑的，这回也枪毙了。”

他这一说，我感到后悔，5 月 15 日我还不怎么害怕，认为不会枪毙多少人，可听他这么一说，判了刑的还有处死的，那我就是很危险的了！所幸没有被枪毙，又活到今天。是不是还有第三次镇压？那就听天由命了。共产党怎么说怎么有理，是辩证唯物主义，不杀也有理，杀了也有理。我又想，就是把我枪毙了，我比陈牧还多活了一年多，这也是宽大，不过我认为不会再枪毙我，我是北满军统特务宽大的典型，如果把我枪毙，那人们就会说，没有宽大，全是惩罚。况且我努力争取，也有成绩，到今天不会枪毙我了。我虽然这样想，恐惧的心情还是有的，这是内心的矛盾。为什么有这样矛盾呢？因为我对镇压与宽大的标准和依据还不知道，虽然毛主席说“可杀与不杀之间，不杀”，但是其间的分野我不清楚，犯人也不知道。因此，有恐惧的心情也毫不奇怪。不过这时的恐惧与 1949 年春天的恐惧不一样，现在的恐惧不严重，霎时间就过去了。

敬　服

楼上 10 个组展开交待问题竞赛，每个小组长都很焦急，要走在前头，作出成绩，互不相让，因此出了偏差。

首先，第 6 组组长李中候逼迫他那屋的一个犯人交血债，没交血债，不叫吃饭，不给水喝，接着又开始打人，罚跪。打人的情形各组都听到，看到了，因为同在一个圆楼，没有前窗，只是铁栏杆。各屋的事别屋能听见，看见。我把打人的事对宋所长反映了，在宋所长还未制止的时候，第 3 号、10 号、7 号，也都接着打起人了。于是宋所长把十个组长集合到后院进行了批评，强调不许打人！打人犯

错误。宋所长虽然这么说了，可是李中候、沈重等人认为是为了促进同犯交待问题，打几下没关系，因此依旧打下去，这样一来事情严重了。

我们第一组一直没有发生打人事件，我认为凭我这张嘴就能把对方说服，还用打？我在屋内对同犯说："咱们这屋，交待问题还用打吗？我看用不着，打人的犯错误，被打的人也丢人，男子大汉有什么事敢承当，别说坦白了不会枪毙，就是枪毙了，又有什么关系？你不坦白不一样枪毙吗？"我利用别屋打人威胁本号的同犯，敦促同犯交待问题。

10号监房有一个叫姚汝纯的，是中学的数学教员，到过台湾。小组长沈重说姚汝纯利用中学教员作掩护，进行潜伏活动，但是姚汝纯不承认，于是沈重就动手打他，姚汝纯在小组挨打受气，成了"碉堡"，于是他承认："我是台湾军统特务机关派来的，我携带有一部电台，两个密本，电台放在香港，我计划去取，我在长春收集文化机关的情报……"

这个材料内中有许多漏洞，赵处长提姚汝纯亲自问话，姚汝纯照样说，经赵处长再三追问，他就不能自圆其说了。赵处长问他："究竟怎么回事，你不要有顾虑，可以对我说。"

姚汝纯把小组打人逼供的事一一道出，于是赵处长知道了监号的一切情况。赵处长问郭科长，郭科长说："有打人的事，但批评纠正了。"

当天晚上，郭科长到了圆楼，大喊大叫，把各组的学习组长严厉地批评了一番："为什么打人？谁给你们的权？你们都是犯人，为什么把过去的那一套作风搬到这里来？损害政府的威信！打人的组长要进行自我检讨，现在宣布停止学习！"

第二天停止学习了，每个犯人都不准讲话。我心想，打人的事宋所长知道，他制止了，不过没有认真制止。郭科长对此也马马虎虎，看守战士每天看守犯人，各屋打人的事也看得到，都是有一半默许，才发生打人，逼供的事。这件事的出现，干部与犯人都有责

任。

停止学习的第三天，我们几个学习组长，除了沈重因负责挑饭仍住圆楼，其余八个学习组长都集中在小红楼楼下6号监房。这是个小黑房子，八个人挤在一块真够受，这是处分我们，小禁闭。

由这开始，来了许多男女干部，都穿藏青哔叽制服，每张面孔都异常严肃，找每个学习组长审问打人的事。

"谁叫你们打人的？"

"谁也没有叫，我自己打的。"

"你为什么打人？不知道打人犯法吗？"

"……"

一般都这样问答，只有我那组没打人，我的答话与以上不同，问我话的人是一个高个子干部。我既没有打人，他就询问别组情况，我尽知道的谈了一些。

讯问李中候的是一个女干部，有30多岁，板着面孔，问道："你们谁先带头打的人？"

"我先带头打的人。"

"你把打人的方式及打了多少人，详细地谈一谈，要老实。"

李中候从头到尾谈了一遍。

最后女干部问："你打人的目的是什么？"

"打人的目的是叫他交待问题。"

"打人之后，没有人制止你们吗？"

"宋所长制止了，我们没有听，我们还是打，一切由我自己负责。"

"你是不是钻政府的空子，给政府造成损失，企图破坏政府的政策？"

"不是。"

每一个学习组长都问了多次，这样审问了三四天，才告一段落。我们背后议论，这些人是长春市委会的干部，有的犯人认识其中的人。

另一个下午，把我们学习组长及原来的学习副组长都集合到办公大楼的一个大审讯室里，有 20 人。不一会儿，龚副局长和一个穿衬衣的人来了。龚副局长问："各学习组长，副组长都到齐了没有？"宋所长说到齐了。龚副局长讲话："你们这些人都是反革命犯人，在这次学习中，打人、逼供，这是特务行为，这与我们政策是相抵触的。我们对你们这种做法是不同意的，肯定说这也是错误的，有人钻政府人员的空子，企图不轨，这种行为是犯罪的。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已经纠正，这一点你们已经知道了。你们到了外边，不准许把这些事乱讲，如果有人乱讲，就是犯错误！"谈到这，停了一下，看了我一下："关梦龄！"

"有。"

"你谈谈这件事，怎么办？"

我说："我们都是反革命罪犯，在监中利用学习机会，钻政府人员的空子，打骂同屋犯人，逼供，给政府造成重大的损失，破坏了政府的威信，因此有人从中煽动造谣，说政府指使打人。这是无中生有的诬蔑，我坚决反对！犯人学习组长打人骂人，应看作是监内的现行反革命活动，应当受到人民政府的法律制裁！"

我说完了，龚副局长说："关梦龄这样认识比较正确，你们都应当有这样的认识，你们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龚副局长讲完话，叫别的学习组长回去了，唯独把我留了下来，龚副局长说："到那个屋子去，有人与你谈话。"

他下楼走了，我到了那个小屋子。方才穿衬衣的那个干部站在地中央，问我最近学习什么？我知道这是前言，不是本文，这些话他随便问，我也随便答，最后他问："郭科长给你买过苹果没有？买过其他吃的东西没有？买几次？"

我如实说："买过许多次，买过包子、苹果、香肠、花生等。"

"打人的事，郭科长看见过没有？"

"没看见过。"

又说了一些别的事，叫我回来了。这次谈话内容，我想是调查

郭科长给犯人买东西的开支，核对一下，是不是犯人真吃了这些东西？这真是，身子一虚，什么病都来了。犯人打犯人，郭科长犯了错误，这又有了贪污的嫌疑。我心中为郭科长犯错误而不快。我想，我没有给郭科长脸上抹灰，我对得起他。我是非常狡猾的特务，什么花招我都有，但我对郭科长没耍过手段，原因，他很年轻，口快心直，办事着急。我要留给他这样一个印象：关梦龄虽然是个老特务，但还老实，叫他办什么事，他努力去做，不会欺骗。所以，我写材料或反映情况，从没有半点不实之处。我看到的、听说的、我指挥别人做的、我自己在场看别人做的，都老老实实反映出来，并且一切都有分寸，从不糊里糊涂，故而郭科长相信我，因为有这些事实。

郭科长犯了错误，换了一个王科长。宋所长没有换。我们这屋八个人，王达生出去了解一个新来的犯人，走了；把李中候调到圆楼，蹲号去了，让他与一般犯人在号里坐着不准动。李中候这个人不老实，乱七八糟，自己没有办法帮助同犯交待问题就带头打人，这回就坏在他身上。

10 月上旬，看守所提我到前楼审讯室，审我的是我的盟兄弟高心鲁，头两个月我便从郭科长嘴里知道他升了科长。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干部坐在旁边。

高心鲁站起来与我握手，他说："没有瘦，还胖了。"

"身体还好，老太爷老太太都好吗？"

"都好。才侠有信没有？"

"没有，我给她去过信，小孩子来过信。她们在徐州，还可以生活。"

"今天向你了解一个材料，国防部第二厅的问题……"最后，那个女干部出去了，我对高心鲁说："这回郭科长犯错误，多可惜，我都不好受，你可千万别犯错误。负责任的人，稍一不慎，就可能犯错误。"

"我特别小心，不会犯错误。"

"我听人说，你在家还请客，这种作风要不得，不行呀，要节约

哇。”

“我找人吃顿饭你都知道？”

“有一个犯人住你对面，他说的。”

“是不是一个老头？”

“对了。”

我回来之后，感到高心鲁还是大手大脚的花钱，他吸的是有锡纸的香烟，这有多贵呀。我想起1948年高心鲁给第一兵团副官处长罗寿安行了贿，得到10万斤大豆加工成豆油的生意，按当时计算高心鲁可得70两黄金。他本没有加工厂，便将大豆卖了，折成豆油价格付给兵团。两天以后，郑洞国来了一个电报，不许把大豆加工成豆油，让把10万斤大豆作为军队的主食。罗寿安找高心鲁强迫他还大豆，高心鲁便携带全家老小出了长春，逃到解放区。临走之时找我给写了条子。没有我的条子出不了卡哨。为此罗寿安还放出空气，说“关梦龄私通八路！”想起这一段，看他现今的作风我替他担心。

自从镇反过去，敌我划清界限，干部也不与我握手了，说话也你我分清了；尚传道的小灶也不叫吃了，他在号内也不准吸烟了，现在完全是个犯人，没有两样。这时在我的心中又悲观起来，感到在共产党方面工作，只准有功，不准有过，有了过是不能原谅的，动一动就犯原则性的错误，真吓人！这回郭科长犯了错误，我的一切工作还不是随之完蛋，倒霉，用了多少脑筋，全部白费。

1952年春天到冬天，又派我到各号去做工作，其中一次很特殊，没有过多要求我了解情况，只是叫我陪着，看来是担心此人寻短见。这是一个小老头，叫吴凤林，是长春人民法院院长杨超的岳父。吴凤林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与杨超结婚，婚后，长春解放，杨超被派到长春充法院院长。杨超把岳父介绍到长春财政局工作，管采买。1951年从长春往北京天津两地运了一火车铁，卖后要吴凤林采买一批货物，吴凤林把铁卖掉，货买的不多，贪污了公款。今年“三反”，就把他给检举了，吴凤林不坦白，经群众大会斗争，最后把

他送到这里。吴凤林以为自己是杨超的岳父，给他戴上大脚镣，心里很不好过。我们在一块，我不断地安慰他。

吴凤林说："我本来在解放区做小买卖，女儿和杨超一定叫我到长春，这回可好，丢人现眼，怎么活呀！共产党这些人，什么感情也不讲呀，没有的事硬叫我承认，说我到天津贪污了多少，他们到我家去搜，什么也没搜着，现在又给我戴上大镣子，我比反革命都厉害了，咳！"

我想，难怪吴凤林想不开，旧社会过来的人，知道国民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共产党不行，莫说法院院长的岳父，吉林省政府副主席周持衡照样因贪污腐化予以撤职处分。这种事在国民党就行不通，一个省主席有了贪污，托人一活动就大事化小了。国民党是人事关系第一，人情大于王法。共产党这么办，我内心敬服！说到哪办到哪，不论是谁，法院院长的岳父不但坐牢，还要老老实实地坐。

楼上还有几个"特殊犯人"，住的是单号、铁床，吃的与我们也不一样，吴凤林说："今天早上我放便去，看见一个干部好像是商业局局长，可能也是'三反'①进来的。"

我说："现在'三反'进来的多，楼下住一个姜处长，据说是长春房地产管理处处长，对他们优待一些。"

这次"三反"反下来这么多领导干部，真是想不到。"三反"开始的时候，我认为这也是一阵风过去就算完了，可是一展开，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越来越深。国民党能这样做吗？不能，如果这样干，所有的文武官员都要被反下来。国民党的人为什么不能"三反"呢？国民党的官离开本职，别的工作就没有了，因此，在当权之时一定要贪污搞钱，以备将来做"寓公"，否则单纯的廉洁奉公，到后来没有饭吃，无人过问。那时把这些廉洁奉公的人叫"傻瓜"。共产党的干部不需要贪污，工作与生活都有保障，不会因为生活而发愁，只要给人民做了工作，人民就会给你一定待遇，这都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因此，国民党到什么时候也"三反"不了，贪污也去掉不了。我

这么一想，反动派确是不行，私有制度产生一切坏的事情。

有一天，王科长找我谈话，问我“三反”及“五反”的感想，我说：“对‘三反’，我认为这是共产党的英明措施，不‘三反’一下，有的干部以胜利者自居，就要腐化堕落，被糖衣炮弹打垮。这个运动国民党办不到，我从心眼里钦佩。不过有点雷声大，雨点小，许多人贪了污，最后检讨了事，办得太轻了。”

王科长讲了一些道理，大意是这与镇反不同，这是人民内部问题，主要是教育，性质恶劣的，天津地委张子善、刘青山那样的大贪污犯也处死。又问我“五反”②的认识，我按照思想，如实的谈出来，我认为干部受贿，商人负责任不大。汉口一个奸商给志愿军加工药棉，掺了脏棉花，对这个奸商枪毙也不过分，可是干部受贿，偏说奸商引诱，这就不公平，不能把责任都说是资本家向干部猖狂进攻，行贿与受贿是一件事的两方面，两者都有罪。无论怎么看这两个运动，对我都有教育作用。

还有什么希望呢？

我来到这里的日子够多了。从1948年到1952年，每个战士我都认识了，我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姓名，甚至于家庭住址。这不用侦察手段，他们说话，从旁一听，今天听一句这个，明天听一句那个，凑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情况。有时他们说话也不回避我。在伊通时，我教给他们说快板、唱小调，说呵，笑呵，我什么都知道了；哪个战士的脾气好，哪个班长的脾气坏，哪个战士有文化，哪个战士文化低，我都知道；每天他们上下岗，8至10点的班是谁，10到12点的班是谁？我都给他们列了一张“表”，要求大便时候，一看下一班是那个傅班副，脾气不好，好找我的麻烦，我就在这一班要求大便，因为这一班岗的战士好说话，以免到下一班，大便憋不住，不好办。

对干部也是这样，这么多审讯员经常找我了解情况，日子多了都很熟悉。我对这些审讯员也不是一律看待，于审讯员纸烟一吸，解放前后的材料一齐说，不用有顾忌；杨审讯员不吸烟，不多说话，他问一句我说一句，用不着多说；张审讯员找我到各监房做工作时，先表扬一番然后再交待任务；如果是肖审讯员找我谈话，我就对他谈些思想，因为他最年轻，很关心我的思想进步，他是共青团员，我愿意从他那吸收一些新东西。他很耐心，一个22岁的孩子，怎么有这样的素养？我看这与他的天性有关系，受共产党的教育也有关系。我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对他们要实事求是，忠诚老实，在材料上、罪恶上绝对不夸大，不缩小，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所以我的材料拿出去，他们都相信。

公安局的干部也知道我这个犯人，有时别的干部来了解材料，见面就问事，不需要交待政策或警告，我知道这是局里的干部。局外的干部，一说话我就知道。1951年冬，沈阳公安机关来人审我，肖审讯员在旁边陪着，我一进屋，他叫我坐在很远的椅子上，一副严肃的面孔：“你叫什么？”“关梦龄。”“多大岁数？”“37岁。”我心想，这是例行公事。“在解放前干什么？怎么被捕的？……”

我一一答复，接着他又把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给我讲了20分钟，接着警告我：“你要老老实实，知道的要交待出来。如果不老实，与你不利。”我心想，这是旧社会的评书馆，上场有定场诗、道白，最后才书归正传。我看了肖审讯员一眼，肖审讯员也不吱声。这位干部说话了：“有个张焕相你认识不？”我一惊异，怎么这样熟？“干什么的？”我反问他，“伪满大汉奸！”肖审讯员从旁这样说。“认识，是我的亲戚。”我真想不到能问到张焕相，“什么亲戚？”“我的姑母是张焕相的嫂子，1930年张焕相在东北空军当司令，我父亲在那当军械主任，1931年‘九·一八’事变，我父亲在北平，张焕相也到北平，东北空军司令部在北平又成立起来。后来张学良出国，张焕相回东北当了汉奸，听说先当宪兵司令，以后到长春当大官……”“还有什么？”“我在十二三岁念中学时，只见过他一次面，到

了北平又见他第二面；他当汉奸，我在西北；我回到东北，他在苏联；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他认识我父亲。”“你父亲呢？”“1949年病死在北平。”“你把张焕相的历史、罪恶，他的财产写份材料，能不能写？”“能写，但是我知道得太少。”

类似这样的审讯很多很多，我抱这样一个态度：反正我是犯人，你说我听着，问我什么，我答复什么，你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你，你不怕费时间，我更不怕费时间。

徐克成过去对我的一套待人接物很欣赏，如今他说：“正是因为你有两下子，罪恶才大，如果把这两下子用在为人民服务上，就好了。”

我说：“晚了，悔之晚矣。”

我问徐克成：“将来咱们怎么办？”

他说：“到一定时期就会释放，时间不会太久，一定会用咱们工作。”

“但愿如此，不过也不易呀。”

“为什么不易呢？”

“1949年刚解放的时候，这些审讯员对军统、中统的情况都不知道，可是现在什么都知道了。上一次有一个干部，年龄较大，可能科级以上的干部，穿着呢子制服，提我了解重庆中美训练班的材料。他问我，中美合作所与中美训练班的关系，我告诉他是两件事，中美训练班是戴笠与美国海军情报处处长梅乐斯签订的合同。谈到中美特务勾结，这位干部说：‘现在我们知道的比你知道得多，我们掌握了全部匪特材料。’从这些话可以分析，咱们出去，不能在保卫工作上立功赎罪。现在也不需要咱们做什么了。”

“那还有别的工作呢，这么大个国家，什么不可以干。”

我认为什么时候出去还没有指望呢，还谈出去做什么工作！这简直是没有老婆就把小孩的名字给起了，笑话。

生活太苦了，每日两餐高粱米饭，白菜汤，总是这样。不好吃，没有营养。心想这样下去，押个十年八年，身体完了。不要求好的，

小米饭也好一些，豆油炖菜也可以，脂肪不够人的身体受不了。人作了罪犯什么也谈不到了。犯人聊天最喜欢谈吃，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这些人不但会吃，还会做，发表自己意见，互相考问。刘荣第父亲是开饭馆发家的，懂得满汉全席，俄国大菜，我在北平多年，一些大饭馆的厨房我都进去看过，什么吃的都吃过，大家一谈津津有味；其次就是谈女人，自己的老婆、女朋友、电影明星、姨太太、交际花、某小姐，一谈没有完，谈到最后可能有人说："别谈了，老说这些没好处，谈谈新东西。"大家异口同声说："对，对。"

在生活上，我总结出来三句话："少吃，多嚼，勤运动。"吃的不要太多，吃九成八成饱；多嚼，饭到嘴里，多加咀嚼，再咽下去，这样可以给胃减轻负担，消化器官不出毛病；勤运动，只要有机会就勤加活动，做体操、跑步，不能到外边散步，在屋里又不准，我便趁看守不在，钻空子跳一阵，听到看守的脚步声再坐下来，搞得浑身是汗。有时宋所长把我提到院中去活动 20 分钟，这也是特殊照顾。不过比 1949 年春天要好一些，在监号可以靠一靠，伸伸腿，与同屋的说话。后来我对宋所长建议：每天正午 12 时，应当准许犯人起来在各屋自行活动一会儿，这样对身体有益处。宋所长批准了。可是有的看守战士到时候不叫起来，那就不能活动了。不自由就是不自由，在屋想走两步都不行，这些苦恼的生活不知哪年才能结束？

快过国庆节了，1952 年的国庆节与中秋节赶在一块了，宋所长说："改善生活三天！"好，盼到了这个伟大节日。我并不为庆祝这个节日而高兴，我是为了吃点肉，还可能有鸡蛋和馒头。果然有这三样，我不敢多吃，有计划地吃，免得发生消化不良，可是有许多犯人吃多了，夜里请求大便，看守的不开门，憋得难受，只好屙在小便桶里，整个走廊臭气难闻。我认为无论什么有身份的人，过去如何有地位的人，只要一做犯人，就变得不成样子。一块肉也成为争取的目标。不错，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过什么河脱什么鞋。自己看看吧，牙掉了两个，头发也白了，我才 37 岁就未老先衰，真是不堪设想。

过完了国庆节，一天下午，肖审讯员提我去谈话。先谈了一下号内新来人犯的情况，接着就问我老婆王才侠的一切。翻来覆去地问，我有点不耐烦，我说："我老婆王才侠绝没有政治问题，1943年11月在洛阳与我秘密订婚，1944年12月在西安结婚，1945年10月我到上海，把她安置在洛阳她叔父家中；1945年冬我又从上海回北平，她到徐州她父亲那里；1946年我因贪污被戴笠押起来，她仍在徐州；1947年5月，我到东北，她仍在北平；直到1949年夏，因我继母对她虐待，她抱着孩子回徐州她娘家，直到现在。去年她有信来告诉我，她入了会计学校，学成本会计……"

肖审讯员听了我这些话，停了一下，他很犹豫地说："王才侠要和你离婚，你同意吗？"

想不到的事，也是不敢想的事，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我沉思了一下，说："我同意。"

"你如果不同意，也可以提出理由。"

"我没有理由，我出监无日，她比我年轻12岁，我不能贻误她的青春。不过我有一个女孩，今年7岁，名叫关棣。她嫁人可以，但不准给我的孩子改名——这样吧，我给她写封信，政府也可以把我的意思通知她，关棣暂由她教养，我出监之后由我去领。"

肖审讯员说："可以，你写信吧。"

我拿起笔来，先写"才侠"，第一句话写什么呢？想了一下，写了下去，这封信的大意是：结婚以来，未能长期同居，又加继母心小，处事不当，婆媳不和在所难免。我因全家衣食奔波各处，对你未尽丈夫义务，对关棣未尽父亲的责任。效命蒋帮铸成大错，现在反省，出狱无期，你申请离婚，我完全同意，你的青春有待，不要贻误，女儿关棣暂请你代为教养，以候我获释之后，再去接领。

写完交给肖审讯员，他看了看，没有说什么，就叫我回来了。回到监狱，我心中十分难过，最近我给北京的表兄去信，没有回信，胞弟也不理我，把我的钱、衣物，完全吞搂，对才侠一文也不给，撵回徐州。自己做了犯人，亲不亲，友不友，夫妻不夫妻，兄弟不兄弟。一

切关系都建筑在国民党政权基础上，国民党垮台，这一切关系随之垮台了。人情冷暖莫如此甚。

我想起与王才侠结婚的经过，那时我是军统局安康查缉所所长，综管11个县的走私漏税的工作。王才侠父亲叫王悦珩，在河南洛阳，是红帮头子，也在东北军当过军人。他有一个女儿在洛阳中学念书，那年17岁，她叫王才侠。王悦珩与军统特务认识，华北办事处有一个秘书叫岳梓宇，是我的特务训练班同学，他占一个很重要地位。岳梓宇与王悦珩相识，王悦珩托岳梓宇给他女儿找个男人，条件有三：第一，不作妾；第二，东北人；第三，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不过28岁。岳梓宇说："这个条件不容易找，有机会我尽力帮忙。"

有人对岳梓宇说："关梦龄就够条件。"

岳梓宇一想也合适，他就给我去了一个急电：要事相商，速莅豫。

我不知什么事，马上到了洛阳。一见面，他说："我给你介绍个太太。不打这样的电报，你不会来。这个人是你们东北同乡，人很老实，不是你所喜欢的花花小姐，那些女人不能过日子。这个王才侠才17岁，家庭好，本人老实俭朴。"

我随岳梓宇到了王悦珩家中相看了一下，王才侠不怎么漂亮，但很老实。在大家的怂恿下我和她秘密地订了婚。那时军统局特别规定，战时不准结婚，有结婚的查出来关押5年。在西安一个会上，戴笠当场宣布，一对私自结婚的特务姜维世和陈友桂关押5年。所以均采取秘密结婚，或者说从故乡来的，父母包办的婚姻。1944年12月我与王才侠在西安秘密结婚，1946年1月她生了一个女孩，取名关棣。"九·三"胜利后，王悦珩到徐州开投机买卖，叫大同商行，直到徐州解放。

王才侠不好打扮，人又老实，我不愿与她出去，所以1947年春到沈阳，我又讨了一个小老婆，她叫郭依平。这些事都是不对的，自己反了革命对不起她们，现在闹得骨肉分离，妻离子散。对人民不

忠，对父母不孝，不忠不孝的人活在人间，真是惭愧！

现在眼前有什么希望呢？什么希望也没有了。既不杀，也不放。关于死，在我脑子里倒不成问题，可是放没有希望。想起来，从1948年11月12日由吉林解到长春，一共是8个人，这8个人中翟丕翕、杨绍林枪毙了；以后搬到楼下7号，张逸民与我同屋，他也被枪毙了；后来把军统特务集中写材料，一共十个人，先枪毙的印匡时，接着李秉一、张锡德、张兆丰、刘文白、孙静修、陈青波、李海涛也都枪毙了；1949年底，被优待集中到楼上大屋子，有李芳春、李中候、徐克成、我和一个日本人，李芳春有现行活动没交待，送到监狱也被枪毙了；1950年冬到伊通县公安局去了16个人，其中被枪毙的有王乃臣、王寿昌、张子文和蒙古特务；这回镇反，又有一批人被枪毙，长春解放一周年，二周年都枪毙人……经过多少次“过筛子”留下了我，真不容易，十分不容易。人民政府对我是法外施仁，网开一面。我不应当考虑死的问题，我应当考虑活。可是我怎么活呢？希望什么呢？目前没有希望，只好在这坐着，连洗脸的肥皂都没有，牙刷、牙粉、牙膏什么也没有，从1948年冬到现在没刷过牙。讲卫生那是谈不到的。这些事还不能请求，耐时顺守，等着吧。

此后，发生了一件事，是我被捕以来头一次听到的：在犯人放便时，有一个犯人认为粪坑这个墙角通大街，墙角边有棵大树，一上大树就可以逃跑，于是他一翻身上了大树，正要跳下去，“砰”的一枪，打伤了他的大腿，他在里边不知道外面还有看押的战士。听说挨这一枪很危险。当时我在屋看书，听枪声我以为枪走火了，后来听挑饭犯人一说，我才明白。真是，什么人都有，什么思想都有，既然到这里来了，还想跑？跑不脱的。这样的人绝不是严重的反革命分子，自己认为无所谓，反革命分子想的就不那样简单，跑出这个院子，又到哪去？社会上谁敢收留？街坊邻居能不检举吗？我知道反革命分子人人怕，谁也不敢沾，沾上了就麻烦，反革命成了毒蛇猛兽，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跑不了的。

3月8日这天，吃完早饭，公安局的旗杆上下了半旗，我对徐克成说："下了半旗，可能是追悼黄继光这些人。"

"一个战士死了，降半旗？"

"不然为什么下半旗呢？"

我在屋内坐着，王科长在我窗前站下说："斯大林元帅死了，你们知道吗？"

不一会儿报纸送来了，斯大林大元帅病死。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当时我想，这回完了，国际共产主义群龙无首了。什么病呢？报纸上报道了。我想苏联科学这么进步，就治不好斯大林的病？如果谁能把斯大林救活，这个功劳可大了。咳，斯大林一死，帝国主义一定高兴。斯大林死了，他的继承人一定是莫洛托夫，没有问题，莫洛托夫是斯大林的老战友，很负众望。

3月10日，午前提我与徐克成到看守所，王科长说："现在把你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改造，那里有劳动。政府考虑你们的健康，让你们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谈一谈。"

我心中想，在市局我的材料也写完了，一切工作也做完了，这是推完磨杀驴，我不答应也不行啊，我又转变了口气说："我在市局这么多年，受到了政府的特殊宽大和各级工作人员的耐心教育，内心非常感激，到那以后一定努力争取。"

王科长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又问："你还有衣服吗？"

我没有说话，王所长抢着说："再给他拿一套衬衣，拿一双新鞋。"这次押走的有我、徐克成，还有一个是一贯道的"皇帝"，有80岁，再一个是特务腿子，斜眼。临出门时，我对王所长说："戴点东西吧！"

"戴什么东西？"王所长莫名其妙地问。

"铐子。"

"走吧！"王所长和王科长都笑了。

①三反：从1951年底开始，在共产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了"反贪污、

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②五反：1952年初开始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第四章 樊篱偷生

急于判刑

汽车走了20多分钟，到了长春监狱。王所长把腰中的手枪掏出来，交给同去的战士，又办了手续。这时监狱旁边的便门打开了，我们这部车开了进去。王所长把我们交给一个女干部，女干部叫我们拿东西跟她走。我的东西多，扛着很费劲，走几步一歇。后来，这个女干部叫两个犯人把我们的东西扛上，进了一个小门。里面是个大厅，有许多走廊，呈放射状。我一看这是监房！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

我们四个人站在大厅里。出来几个看守，还有两三个穿黑衣服的。这个女干部对看守说："交给你们了，我走了。"说罢拿着簿子出了大厅。

看守叫我把东西都打开，一样一样地检查。我心中知道这是过关。一道一道地过。新的痛苦，新的困难，还不知有多少呢？罪孽深重，还要经受多少折磨才能够自由呢？

看守用剪子把枕头剪了一个大口子，将谷糠倒了出来。我想，

把我东西搞坏太不应当。检查到我的饭包，把吗啡药针及鸦片烟药拿了出来。我也忘了有多少，那还是1948年逃走时，勤务兵给我搞的。这回离开公安局看守所，我也没有细看。一个看守问我："这是什么？"

"这是治肚子疼的药。"我说。

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接过去一看，又看了看我，说："这不是吗啡吗？你怎么说是治肚子疼的药？"

"我肚子常疼，打这个针就不疼。这是医生给我的，我也不懂得。"

"哪个医生？"

"长春市固生医院，院长刘玉锡。"

"不老实！你叫什么名字？给他砸上镣！"

"关梦龄。"不知为什么没有马上戴镣。

检查完了，一个看守拿了钥匙把一个监号的门打开。这时从里面走出来五六个人，我一看，有段克文，他戴着脚镣走了出来。我真惭愧，不用说，我也得戴脚镣子。段克文暗地里一定会说，你在公安局进步，到这就吃不开了！咳，怎么与段克文在一块呢？与他在一起没个好，他是个顽固蛋。糟啦，段克文搬出了那个屋子，叫我们4个人搬了进去。这是一个很窄的屋子，如果我把褥子铺好，能睡两个人，还得头顶头，现在住4个人！

徐克成有病，坐不住，躺在地板上，他的心情也可想而知。我一声不响，非常懊丧。

晚饭吃的是小米粥。晚饭后，又来了一些犯人。各屋都加了人，我们这屋又加了4个人！一个戴镣的犯人，大个子，精神很愉快，满不在乎地坐在我的对面。他们一来就讲起话来，讲的都是犯人中间的事情，与我们一块来的那个斜眼问那个戴脚镣的："你判了没有？"

"判了。"

"判了多少年？"

“35天。”那个大个子笑着回答。

我心想，35天的刑期就戴上镣，我的刑期要多少年，那更得戴镣了。

斜眼又问：“35天？你来了多少天了？”

他们都笑了。一个老头从旁说：“不是35天，是无期徒刑——五七三十五。‘五七’与‘无期’是音同字不同。犯人一说35天，就知道是无期。你们新来还不懂得。”

我明白了，使我惊讶的是，一个判了无期徒刑，戴上脚镣的犯人还这样乐观。

最后，那个大个子说：“我的罪判我‘35天’，我很高兴。我以为非枪毙不可，这是政府的宽大。”

“什么案子？你犯了什么罪？”斜眼又问。

“我是土匪，杀了两个人。”

杀了两个人就判无期！我有那么多血债，那该判多少？这回麻烦了。

夜里，睡觉前放一次便，6小时放便一次，我感到尿憋得难受。夜里有尿不能出去，屋里又无便桶，我便尿到旧裤子里。这样的生活如何受得了？在公安局大便困难，在这小便困难。

8个人挤在这个窄屋子里，我把东西放在身子下边，非常不舒服。伸不开腿，翻不了身，这一夜痛苦极了。什么形容字句能把我现在的难过形容出来呢？拿一百个“难过”也形容不出来我当时的心情。

第二天是礼拜日，吃完早饭，一个穿干部服的到我们这屋点名，叫到我的名字，看了看我。他走后，那位大个子说：“他是监房李主任，很厉害。斯大林死的第二天，叫我们坐在屋里不准动。有几个动的，立刻就给砸上了脚镣。”

放便时，我看到了刘荣第。还有公安局看守所的许多犯人也都到这儿了。他们一听说我来了，都从小窗户往外看。这是第6监，专押反革命犯的。

3月12日，早饭后，看守在门外喊我的名字，我答应："有！"看守对我说："你把鞋提上，衣服扣好，跟我走！"出了监房大厅，经过一个院子，领到一个工厂。进了工厂门房的办公室，一个干部在屋里问："你叫关梦龄吗？"

"是。"

"现在派你到这参加劳动，在劳动中要守纪律，有什么事要报告。好，你去吧！"

一个班长[①]领我到厂里，那里面正开会。有七八十个穿着紫颜色棉衣的犯人在开会。一个主持会场的年轻干部问了班长几句话，点了点头。我坐下一听，是斗争一个女犯。说她给男犯馒头，拉拢男犯。我回头一看，还有四五十女犯坐在会场。又说这个女犯劳动不好，怕闻汽油味。于是大家展开批判，我也举了手，但没叫我发言，到中午开饭时，这个会开完了。

这个工厂是长春监狱的橡胶厂，做胶皮鞋，夏天做小孩穿的球鞋，冬天做大人穿的棉胶鞋。有三百犯人，分炼胶车间，缝纫车间……我在成型车间。我们车间有七八十男女犯人。分派我在里帮组，就是往鞋帮上刷胶。我的组长姓佟，头一次见面便很客气。中饭在那儿吃的，高粱米干饭，白菜汤，倒不坏。

我问组长："可以小便吗？"

他说："随便，有了就便。"

我很高兴，能够随便上厕所对我便是最大的方便，不过晚上回到监房仍是麻烦事儿。

最初我还穿着公安局发的衣服，一套绿布棉军服，战士的服装，质量比较好。一般犯人都穿紫棉袄，紫棉裤。我穿这么一身衣服使犯人们议论纷纷。

"这是干部，可能'三反'犯了错误。"

"还是个机关干部，一看就看出来了。"

一个年龄不大的车间技术人员，大家叫他于技师，走到我跟前，问："从哪儿来的？"

我说:"从公安局。"

又问:"'三反'犯了错误吗?"

我说:"不是,我是特务。"

他走了,什么也不问了。

第三天,叫我搬到第7监房,与橡胶厂的犯人一块住。屋子宽绰了,精神也不那么苦恼了。

犯人中有人认识我,过了几天都知道我是谁了。接着有人与我说话,打招呼。这些人有长春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的特务,有各军谍报队的谍报员,还有从前在公安局认识的犯人。我成了大家谈话的材料。他们互相一传,给我一吹,艺术加工,便把我说成了特务头子,长春最大的坏人。

工厂中女犯没有戴脚镣的,男犯百分之八十戴着脚镣。我问他们都犯了什么罪?他们中一般是无期和死缓,是反革命或有一两条血债,也有许多虽然没有血债,但是反动党团或地主恶霸。我一想,他们的罪比我小得多,简直不能相提并论,他们都判了无期或死缓,还戴上脚镣,我呢?最低限度也是死缓,如果判无期那就太便宜了。于是对郭科长在1949年说我没有无期徒刑的话,在目前的情况下动摇了。那是1949年,现在是1953年哪。

管生活的犯人叫刘英伟,公安六分局审讯股长,因"三反"进来的,判一年半。他接近我,问了一些话,我有分寸地告诉了他。这时正是监狱"三交"运动的尾声(交武器、交罪恶、交同案犯),还有个别组和人没交清,由大家帮助。我们里帮组有几个犯人需要帮助,我从旁听他们发言,最后我也发了言。我一帮助,大家认为说得对。刘英伟在会后问我:"在公安局看守所你们也学习吗?"

"学习,天天看书,不开会。"

之后,无论哪个组帮助人,如果火力不足,就调我去帮助。这样,张管教员对我就注意了,可能刘英伟反映我许多优点。

在3月底的一个晚上,缝纫车间开了一个大会,橡胶厂全体犯人参加。印刷厂、麻袋厂也派犯人代表参加,监狱管教科万科长主

持，还有各工厂的管教员。大会开始，万科长宣布："长春人民法院宣判大会……"我一听，莫名其妙。接着由长春市人民法院的审判员宣读判词，大意是：反革命罪犯杨绍时，因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15年，送到长春监狱参加劳动改造，在改造中作反动诗一首，企图变天。杨绍时不能认罪服法，继续现行活动，予以加刑处分，以肃法纪，由15年有期徒刑改为无期徒刑。杨绍时站在审讯员桌子前面，宣判完毕后，问他有什么意见，他说没有意见，然后叫他回到原位。接着管教科黄股长主持大会，犯人发言，许多人举手发言，两个人发言之后，我也举起手来。黄股长虽不认识我，却指定我发言。我站起来批判杨绍时作反动诗就是现行反革命，罪上加罪。这次宣判是政府对他再一次的宽大，不然把他枪毙也不过分。我说话中间，万科长把张管教员叫过去，一面说一面看我，可能谈到我的问题。

杨绍时1951年3月在公安局看守所时，与我一个屋子，那时他就很顽固，想不到现在依然如故。他这首反动诗是在橡胶厂缝纫车间作的。听说有这样两句："身入樊笼不自由，他日出狱上九霄。"意思是现在无能为力了，有机会我要再干一阵。这是他自己找死。

4月，又把我调到外帮组，专门往鞋帮外刷胶。这个技术比里帮高。我们把刷好胶的鞋送到下一个工序，让女犯套上包头、上大底。车间主任是女干部，看样子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她对我说："你给女犯三个组发半成品鞋，你要注意，她们都是女人，成份也不好，过去干这个活的男犯人有犯错误的，我事先提醒你注意！"

我们是两班倒，一礼拜白班，一礼拜夜班。我发鞋给女犯，言行很谨慎。这些女犯有的是破鞋，有的是妓女，吸毒、溺婴、一贯道、窃盗，反革命只有两个，是国民党员。我与她们接触有一个想法：过去我什么女人没见过，北京天津的小姐太太我认识多了，我的二老婆是天津有名的"郭小姐"。现在我能到这里搞男女关系？笑话。女犯也知道我是什么人，有一些妓女说："督察处才厉害呢，长春谁不怕？关梦龄这个人过去见也见不着哇。"

我不与她们多说话，于是她们又说："还是过去那样，架子哄哄

的，见凡人不说话。做了犯人就没什么了不起了，不是国民党时代了。”

刘英伟与我谈了许多公安局的事情，但做工作的事我一个字没提。我问了他许多事，关于王恒烈的事他说：“王恒烈是高心鲁的表弟，老地工人员。日本帝大毕业，在日本念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解放后，当治安科科长，综管日本特务工作。‘三反’以前他贪污了很多款，‘三反’中他一看不好，畏罪自杀了。”

我一听，真可惜。他这个共产党员没死在战场上，却死在贪污上。

我问刘英伟：“如果他不自杀，坦白，退赃，行不行？”

“咳！他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自己做事自己知道，如果坦白能行，他也未必愿意自杀。”

我想，这是共产党时代，如果是国民党时期，从长春往关内一跑，带着钱在上海一住，谁也管不着。现在跑不了，共产党统一全中国。在共产党这儿工作，只许好好干，干不好不行。

5 月份，刘英伟叫我写一篇墙报，号召大家遵守制度。我写了一篇“遵守监规制度，是衡量我们认罪服法的尺度”的墙报。张管教说写得很好，犯人也说好。由这以后，叫我负责墙报、壁报的编审工作。墙报用粉笔写在黑板上，壁报是写在纸上往墙上贴。这样一来，我的工作多了。一个礼拜出一期壁报，两个人投一份稿，就一百多份。我要看、要改，再呈给管教员批。这期间，我与男女犯接触的机会更多了，我成了刘英伟的助手。许多事情我向张管教员一说就照办。这时思想又开朗了，并且骄傲起来。认为自己与别的犯人不一样，虽然我对一些男女同犯非常客气，办事态度好，但是心里瞧不起他们，认为这些犯人都是土匪、窃盗、流氓、阿飞，不懂得什么，解放前他们这些人见我也见不着。现在都做了犯人，没有办法，只好在一块混。

一个土匪吹牛皮，说他过去的事：“那时候，一进村，杀鸡，炒黑菜（肉片炒木耳），白干酒一喝，他妈的，我说了算！”

听听，他们只知道炖鸡，炒木耳，别的什么也没见过。我与他们谈话是谈不到一起的，但我愿意听他们谈话，尤其是犯人的各种案情。

监狱规定，凡是未判刑的罪犯一律不参加劳动。我与徐克成均未判刑，我到的第三天，就提出去劳动，大家谈起来这是一个特殊。刘荣第、李树桂、郑建五、程登科等人因未判刑，都在监号坐着，不能劳动。凡是未判刑的人都十分恐惧，不知将来如何？处死的人都是没判刑的，到时候一提，上汽车就枪毙。因此，反革命犯都急于判刑，判无期，判死缓都能保住性命，就是不判保不住命。我和徐克成可以参加劳动与公安局的意见有关。回忆离开公安局看守所那天，我认为"推完磨杀驴"这是对不起政府的。在院子常看到李树桂他们晒太阳，坐一个大圈子，不准动。他们看到我很羡慕，因为一参加劳动，吃的比监号犯人好，行动也有小自由，犯人都希望劳动，尤其希望到橡胶厂劳动，这里除了炼胶以外都是轻体力劳动。从一个犯人谈话中，听说徐克成调到印刷厂劳动，他病了两个月，住进了病监。政府叫他找保到外边就医，他找不到保，病死了。我心中很难过，他与我在一块反省 4 年，对我帮助很大。人死无法预料，不过我的身体还不要紧。

有个犯人叫王喜桂，他说："监号有许多反革命犯都认识你。有个叫李中候的，从市局解来没有几天就枪毙了。他和我在一个号，那天他买了一只烧鸡，一边吃，一边摇头，自己唉声叹气，知道不好。第二天早饭后，一开门，戴上手铐，提上了汽车，那还用问！"

我想他被枪毙，一个是 1951 年在公安局看守所当 6 组组长时，破坏政府威信带头打人，这属现行特务活动；另一个是他提供的材料不实在，有一次，于审讯员说："李中候信口胡说，按他供的材料，派人到上海多次，都没有那么回事。态度太坏。"

6 月初的一天，监房的班长来到橡胶厂，提我到法院过堂。戴着手铐，坐着法院的汽车，我的心跳动得很厉害。过堂？必然要判刑，给我判什么刑呢？根据工厂犯人的刑期，反革命犯不是无期就

是死缓。判有期的不能说没有，那是少数。我呢，长春的特务头子之一，两手血腥，杀人很多，死罪虽免，活罪难逃，我看无期最有可能。如果判个无期，那怎么办呢？等着大赦吧，别的希望没有。日伪时代有天长节、地久节，犯人可以减刑。共产党到了把台湾解放时，一定有大赦。心绪极乱，先前郭科长对我说的“没有无期徒刑”，我根本不相信了。如果郭科长说的话真能兑现，那我感激共产党五体投地。咳，退一步想吧，李中候都枪毙了，我能活着就知足，判无期判死缓，绝对不会枪毙，落一个囫囵尸首这是肯定的。心里这样想，倒很安慰，“他人骑马我骑驴，后面还有推车汉，上不足兮下有余。”知足常乐，能忍则安。一路上我用各种想法来安慰忐忑的心房。

汽车开到了一个小胡同，一座小旧楼，这是重庆路。下了汽车，进了一个候审室。屋内是地板，没有椅子。进屋先把铐子下了，然后坐在地板上。刘荣第与我一个车来的，我没看见他，他看见了我，也没敢打招呼。现在我们坐在一起，谈话没人管，看守的法警在门外站着，不干涉我们的事，我问他：“怎么过堂？我还没来过。”

“一切材料都是公安局转来的，还是那些材料，再照材料问一下。过几次堂才能判。你，政府早就决定了，到这走一个司法手续，没问题。”刘荣第来过几次，很有经验。

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法警进来叫我的名字，我跟着他上楼，楼上有个屋写着“刑一庭”。拐了一个弯，进到一个小屋子，屋内正中一张写字台，坐着一个人，当然是法官了。他叫我坐到靠墙的一张条椅上，与他正对面，没有记录的，只有他和我。他说话很和蔼，先问我的姓名、反动职务、历史，最后问我的罪恶。

我说：“长春军统特务机关先后杀了 130 多人，都由我负责，我是杀人刽子手，一切由我承担罪行。”

“不要这样，我们审讯是实事求是的。不要离开事实说话，应该由你负什么责任，你就负什么责任，不要笼统的都由你负责。你在特务机关还没有独立人格，你还不能决定杀人的问题。不过你的罪

很大，你是协助处长张国卿杀人的，杀了 40 多人。内有人民政府的地工人员 30 多人，对不对？”

“对，对。”

“你在 1947 年，收集了第 6 纵队的机要文件 300 多页，呈给东北行辕二处，受到了奖励，是不是？”

“是，是。”

我的罪行没有全问，只把主要的血债问了问。我都承认了。他把我的材料摆在桌子旁边一个凳子上，低头翻看。一边翻一边问，按照我的坦白材料问，一点出入没有。问了有一个小时，他把材料放下，又说：“你把 1948 年 10 月在吉林向公安机关自首的思想谈一谈。”

我说：“长春解放那夜，我参加突围，没有达到目的，就混到新 7 军的尉官中，到了吉林，入了解放团，还想再逃沈阳。一看沈阳也要解放，如果沈阳解放，去北京就更不好走了，我便决定自首。第一，这是好汉思想，自首来的，比用小绳绑来好得多；第二，投机想法，没有像我这样大的特务敢自首，我开创这个先例，共产党把我作典型不一定能杀，听说还有宽大政策，我试一试这个宽大政策是怎么回事？第三，我有一套特务技术，共产党还可以用我来做军统特务的工作。基于以上这些思想我才自首。”

“没有进步的想法？”

“没有。”

“你写的材料，供的口供都很老实。我们根据这些情况来处理你的案子，你先回去吧。”

他叫我在讯问笔录上按了手印，并把审讯记录给我看，我拿起来没看，又交给了他。他问我对不对，我说：“对，对！”

回到候审室，刘荣第也过完堂了，我们又谈上了。他说：“我在 2 月底从市局到的监狱，几乎天天到法院来过堂，写材料。我过几次堂了，大概快结束了，我希望宣判，好参加劳动，在号里蹲着可太难受了。我宣判以后，到你们那儿行不行？”

"行呵，我回头报告张管教员一下，就可以调你来。"

过了两个礼拜，刘荣第判刑了。我知道之后，就向张管教员报告，说刘荣第是反革命犯，已判刑，能画报头（当时我们出壁报无人画报头），还能搞文娱。于是便把刘荣第调到橡胶厂来劳动。开始做零工，画报头，帮我做一些整理壁报的工作。

刘荣第只判了10年，他争取得好。不过他的罪没有我大，他没有血债，他没有抓过地工人员。这些我都不能与他比。

又过几天，我被提到法院。开庭先提我，一进屋看到上次审讯我的那位法官，他站在讲坛后面，没有别的人。他对我说："今天宣判！"

我站在他的对面，讲坛的前面。他拿着一张判词，念给我听，我心中非常忐忑……过去看小说形容一件还没有解决的事情，常常说"如同法官宣判"，这个经验我现在体会到了。判我什么刑呢？希望不要念判词原文，先告诉我判的什么刑，我就放心了。

这位法官先念了姓名、年龄、反动职务、具体罪恶……又念长春解放后，自首于我吉林省人民政府公安厅[2]，前记事实被告均坦白不讳，并有笔供、口供及起诉材料为证，可认为真实。查被告系蒋匪特务骨干分子，长期效忠蒋匪，刺探我方情报，暗杀我地工人员，血债累累，实属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在解放后，不仅向我人民政府自首，彻底坦白罪行，且能检举别人，并协助我人民政府捕获反革命罪犯数名，有积极立功赎罪表现，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14条，第1款及第2、4两款后半段之规定，特减轻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5年，自1948年10月26日至1963年10月25日止。"

读罢以后，我高兴极了，感激的眼泪当时便流出来了……

这位法官叫赵树祥，他问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感激共产党，感激人民政府对我特别宽大，我永世也忘不了！"

"好，今后在劳动改造中好好争取，还可以减刑。"

只说了这么几句话，我就回到了候审室。一进屋，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两手擦眼泪，别人问他哭什么？他说："这回完了，判了二年，唉……"哭得很痛心。

我判了15年高兴得不得了，他判二年这样难过，真是个人有个人的情况。这回我对公安局那些干部从内心感激，郭科长说的话真的兑现了，共产党不骗我，我今后要更老实！这个15年真不容易呀。

我给女儿关棣去了一封信，她立刻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我一算15年，从1948年起，这才5年，还有10年。我写明还有10年才能回家。张管教员一看我的信便说："你写15年干什么？就说改造好了就回家！"

我知道这封信不是女儿的意思，是她妈妈的意思。我老婆虽与我离婚，但是现在还没嫁人。这次来信问一问，如果在近期出去，复婚没有问题。如果近期不能出去，她就要嫁人了。孩子在信上说："我妈妈在利国铁矿当会计，住在宿舍，我常去看妈妈，我们娘俩在一起吃饭……"

我写了封信，含含糊糊的只说我很好，改造好了就回家。我的信会给她们增加许多疑团，没有办法，判了15年我还很高兴，可是告诉家里，她们一看15年，唱了《武家坡》了……18年见面人都老了！这些问题没有办法，好在她与我已离婚，由她的便吧。

降到黄牌，降到蓝牌

市公安局不断来人提审，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但是一听说市局的人，我就感到特别亲切，有什么话都想说。有一个姓王的，胖胖的，见我就笑。他了解一个问题，我提供之后，他对我说："听说你判了刑，还要好好争取，争取得好，还可以减刑。现在长春监狱归市

局直接领导，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能够改进的就改进，你有意见可以对我谈一谈。”

我想了一下说：“在监号里的犯人，半夜有了尿，憋得难受，我有两天，夜里来尿都尿到裤子里了，如果每个屋放一个尿桶，就没有这些困难。”

他掏出了笔记本写在了上面，说：“这事可以办，每个屋子设一个尿桶。过去没有吗？”

“没有。”

他又问了犯人的生活，犯人对政府的反映，我都具实的谈了。

7月份，我从外帮组调到记录员组，担任配料工作。就是到缝纫车间把缝好的鞋帮领来，再转发给里帮组刷胶。这个工作不累，接触的人多，每天要到缝纫组去几十次。缝纫组在另一个地方，所以我带着出入证在监狱满院子走。

8月份，我们橡胶厂排演大型话剧《升官图》。男女犯合演，我是剧务。每天晚饭后排演，一排就排到10点钟。男犯女犯30多人在一起排剧，严禁说笑，不准谈排剧以外的话。出演之前，到街上租的结婚礼服，花20万元，由政府开支。又发动犯人借了许多西服。这个剧10月1日出演，演出效果尚好。10月中旬，我们这个剧又到监外的第一劳改大队演了一场。由于长春监狱归市公安局领导，在一个全监大会上，市公安局的科长高心鲁来此作报告。看到他，我便想到贪污自杀的王恒烈，想到我的这位盟兄弟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他报告了一个小时，在台上拿着报告底稿，讲得非常清楚。我心想，高心鲁真行啊。几千只眼睛看着他的脸，几千只耳朵听着他的声音。我算完了，希望高心鲁好好工作，多给人民做一些事情。

大会之后，刘英伟对我说：“高科长住在这，监狱由他具体负责，他是第3处的科长。”

由这儿开始高心鲁不断出现在车间。有一晚上，他见到了我，向我点了点头，我也点了点头。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私人关系存在，敌我界限也要划分。他知道我的一切，我也知道他的一

切。

我认为来到橡胶厂改造得不错，因而产生了自满思想，事情终于发生了。长春监狱的犯人分三等九级，另外还有“等外”。最好的是一等，最坏的是等外。一等是红牌，二等是黄牌，三等是蓝牌，等外是黑牌。根据我的情况，刘英伟说，应该二等二级，可是张管教员发给我的等级牌是二等三级，下中等，黄牌！一对照别的犯人，我心中不服，就对刘英伟说了：“咳，咱们不行，这么争取才二等三级，太落后了。”

一些不平不满的话由刘英伟报告了张管教员。张管教员一听，对刘英伟说：“关梦龄二等三级呀，我大意了，回去调整一下。”刘英伟又把这话告诉我了。我心想，什么乱七八糟。我天天在他身边干活，他能不知道？内心十分抵触，认为管教员对犯人这样考核不应该。这期间，市局和各分局的干部每隔一天、两天，就有来找我了解材料的。一谈起来，我就诉苦：“长春监狱对我不了解，我在这改造没有个好。他们只注重劳动，写多少材料也是白费我的劳动，只能随大流，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我干不过他们。我犯了错误……”

“犯了什么错误？”

“别人穿了我的棉袄；我送给刑事犯辣椒面；我不满政府发给我的二等三级等级牌……”

一谈起来就没有完。我的意思，现在长春监狱归市局领导，我见人就说，叫市局知道，以免将来张管教员蓄意害我，我吃亏了，又无人知道，那才冤呢。要造成一个“先入为主”的态势。有的市局干部对我说：“他们会了解你的，不要失望，还要改造，不会有问题的。”

我想共产党对我的宽大和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市公安局执行的正确，长春监狱执行的有出人。我认为政策是好的，执行政策的人有问题。长春监狱的管教人员对犯人提高警惕是对的，但是宁左勿右的作风不对。没有那样的事，硬说有那样的事，这是逼迫犯人“无中生有”。我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既然不实事求是，我就不服。

我口头对万科长说:"我犯了严重错误,今后保证不犯。今天拉拢同犯,将来可能发展到现行反革命,我的脑袋也就掉了。这次政府挽救了我,再一次对我宽大,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些都不是思想话,他们对我的工作是软弱无力的,只是声音很大,词句内容很空洞,除了"不老实"、"耍花招",就是"你很危险"、"不要来这一套。"

晚饭后工厂常开会,由管教员讲话,没有底稿,信口说。对全厂犯人讲一些生产及改造情况。有一次批评我,说:"有的人在这里面捣鬼,我告诉你,这样搞下去对你不利,不要耍你那老一套,不行了,现在人民说了算……""有的特务头子,不认罪服法,消极反抗,这是自取灭亡……""有的人,我们掌握了他的材料,他还装作聪明呢,到时候,他就后悔了!"类似这样的话,不止一次在工厂犯人大会上讲,我装不知情。别的犯人问我:"管教员说谁呢?"我说:"不知道哇!"

有一天,找我到管教员室。一个干部说:"我是东北公安局的,从沈阳来到长春,向你了解几个情况。我到长春市局,那边对我介绍说你很争取,表现得不错。"

我一看张管教员还在屋,就说:"市局的干部说我很争取,那是过去,他们对我最近的情况不知道。我最近在这改造非常落后,表现很顽固,这一点对不起共产党对我的宽大,我很惭愧,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

"犯错误不要紧,只要能改就可以。改造也不是一个早晨就能改造好的,何况你在旧社会时间很长,下一些功夫,充实一些新东西,挖旧装新,不要闹情绪……"

这些话很温暖,东北公安局的干部水平高,态度也稳重,叫我心服。他问我的一个组员陈东海的情况。他拿出纸烟叫我吸,我不吸。他说:"你吸吧,我负责。"我就吸了起来,最后他说:"咱们谈的问题,你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明天上午我还来。"

我回来,感到共产党的干部也分三六九等,有的很能办事,有

的就能打官腔。也难说，出身不同，资历不同，年龄不同，看法不同，强求一致是不可能的。我把过去所接触的干部都回忆一下，也是各不相同。有的干部，如公安局赵处长与我谈话，也不吵，也不嚷，和颜悦色的，一句一句的说。他对陈牧说："你这样不正视自己，将来不很好……"最后，还不是枪毙了。声音虽然低，话有力量。但有些人大喊大叫，一听没有什么叫人信服的东西，气得他自己都发抖。

第二天，东北公安局这位干部又来提我，材料写完，又谈了一些改造的问题。我把在这改造所以犯错误的经过都告诉了他。我说："政府人员应该批评我，教育我，以至于处分我，不应该三天两头在犯人大会上，指张飞说李逵，那样讽刺，那样挖苦。有一次张管教员在犯人大会上说，'一个特务头子背后说蒋介石的像貌长得好，在这作反动宣传。'这话我没说，可能是别人说的，反映情况的犯人乱反映。我到管教员室找张管教员，他不在，我与李管教员说：'我没有说蒋介石的像貌长得好，这个说法我不承认。因为提到特务头子背后说，所以我不能不考虑。'李管教员是个转业军人，态度很好，他说：'特务头子又不是你一个，也没有指你名字，你不要冲动。回去吧。'类似这样的事，我在思想上抵触，对他们这样改造我，我接受困难。"

"我们一些年轻的同志走入社会不久，热心够，经验少，工作上也可能有问题。但是你要从自我方面检查，不要责人严，责己宽。至于在大会上批评你，那也没有什么，给别的犯人一些教育也有好处。这里归公安局领导，都要实事求是。思想打通了，这些问题就认识了。我说得对不对，给你作个参考吧。"

"您说得很对，但我的思想现在还没通，对这些问题还没有认识。"

"慢慢就通了，思想改造不能性急。"

这些话对我很有教育，我想了一下，应该加强自我改造。

市局的干部还是不断找我要材料。我要求调回市局，我的理由是："我在橡胶厂劳动，一个星期白天班，一个星期夜间班。白天班

各机关提我问话，我可以放下劳动去谈话；可是轮到夜班，白天提我审讯，我不能休息，不如回到市局看守所，天天写材料。"有的干部答应给我反映，有的说："不劳动身体不行，每天做一些轻微劳动对健康有好处，白天不能睡觉，工厂行政会给你解决的。"

没有高兴的事，每月两元钱的赏金也停发了。这里的什么东西都有，无钱不能买，馋得慌。一个叫阎树浩的刑事犯与我很好，到期释放，我求他把我的手表带出去卖了，把钱给我送来。报告了管教员，把表带出去了，但只给我送来六万元钱，就无音信了。我的表当时值一百万元，是瑞士乌铬卡。

现在，这里没有一个干部或管教员鼓励我，都是各机关保卫科的人或市局的干部对我教育或鼓励。他们不吸烟，但是给我买纸烟。我对市局的人说："我每天这么写材料，工厂的管教人员都不知道，还有的犯人背后说，关梦龄这家伙真成问题，自己的事不交清，今天审，明天审，没个完。"

"他们不知道，政府知道。"

"我建议各机关人员到这提审犯人，写材料，都要填一个表。审讯完毕，对这个犯人提供材料的内容及态度，予以鉴定。这样不致于把犯人的优点埋没，犯人积累一点优点不容易。没有优点，改造没有成绩，前途还有什么希望？"

后来，我的建议被采纳了，外机关人员到这提审手里都拿一张表，上面有被提审的犯人的姓名，了解的内容，这个犯人提供材料好不好都有鉴定。有了这样的表我的优点就多了，不论管教员知道不知道，我的优点写在纸上，不能否定。

1954 年 12 月中旬的一天，我是夜班，正在干活呢，管教员叫我回监房去睡觉。也没说什么事，我只好放下工具回号睡觉。我回到监号，贺班长问我："关梦龄你回来睡觉来了？"

"是啊，不叫劳动叫睡觉，也不知道什么事？"

"明天你去参加一个大会，还能吃肉呢！"

我再问，他就不说了。不过我也明白了一个大概，可能到别的

劳改机关参加奖惩大会。这倒没什么可顾虑的，不过心中有一个总的想法，在长春监狱好事轮不到我的头上。

天还没亮，班长就叫我起床，到监房另一个办公室，那儿有5个犯人。有一等犯人于来宾，他是进步的；有二等犯人2个，一个戴脚镣子，临时给他下镣，我一看就明白，这个是顽固蛋；还有一个人，虽然什么也没戴，看样子也不是进步的。史股长叫我们吃饭，高粱米饭、萝卜汤，我吃了半碗，等着吃肉去。

这个地方我们来演过剧，是第一劳改大队。进了第一中队的监房，有的犯人与我们认识，打招呼。不一会儿他们吃饭，大米饭炖肉。我一看，肉真不少！他们一百来个人吃起来，没理我们。岂有此理，他们的话剧团到我们那儿给他们包饺子，今天我们来了6个代表，连饭都不给吃！这里没有干部，犯人也不吱声。好，你们吃吧，我们坐在炕头上看着你们吃。一二千人改善生活，还在乎我们6个人？

他们吃完了肉，大会开始。那么冷的天，犯人都坐在院子里，我们坐在前排。这是劳改大队的年终奖惩大会，由吉林公安厅王处长主持。给改造好的犯人发了奖，不好的，还有潜逃的犯人加了刑。有一个刑事犯判了一年，还有2个月就到期，可是他等不及了，逃跑了，抓回来，又加刑3个月。这事叫人好笑；还有一个不接受改造的罪犯叫杨守田，当场被枪毙了。大会开完，又到一中队休息。他们开晚饭了，但是没有肉了。有个犯人张罗叫我们吃了一顿，也没吃好。天气很冷，坐卡车回到长春监狱。

第二天，管教科史股长叫我们把参加大会的情况，向全监犯人传达。我们整理了一天，才把这个稿子整好，我只动口，没有动手。我对这个大会感想不大，口头上说，对我有很大的教育作用，不能顽固，再顽固就枪毙，我一定好好改造，这回给我敲了警钟。其实这不是思想话，我是讲给进步犯人听的，叫他们给我反映，说这个奖惩大会对关梦龄很有教育。我的思想不是这个大会所能解决的。这个大会奖惩的犯人，与我根本不是一类。劳动好的得奖，我劳动是

中等得不了奖；刑事犯跑给加刑，我根本不敢跑，也没有想这个问题；杨守田反抗改造，现行犯罪枪毙，我也不可能像杨守田那样动手打干部。

又评犯人等级，给我评了一个三等二级蓝牌！但没发等级牌，我很不高兴。第二天，我去张管教员那要等级牌，以便佩戴，他说等做好再发。

我想，我戴上个三等二级的蓝牌，天天去提审，让各机关的干部看看，我哪点不好？给我评个三等二级，纯是张管教员私人义气用事。这个等级牌，始终没发给我。

又戴镣铐

1955 年夏，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公安部的一个报告上说，对反革命分子要进一步肃清。我看了这个报告的新闻，只一小条消息，怎么肃清没有说明。难道还要再来一个大镇压？那样我也许再被审核。既然判决了，也许不会翻案？我与车间的反革命犯郑建五私谈，他感到恐慌，他说："督察处的少校科员卢春印前天由这解走，可能解回市局，这与徐副部长的报告有关。"

我每天都被提出来过堂。各公安机关，各机关的保卫人员，找我了解材料。所有军统的特务、与特务有关的人、特务外围分子、与我有关的人，及其他特务机关的人都是了解的对象。有许多现在人民政府工作也要了解，都要写出具体材料。从审讯人员的谈话中知道"肃反"运动在进行着。

我已不能在工厂劳动，过堂要紧，劳动其次。监房有几个小屋子作临时审讯室。每天 8 点进到审讯室，一直到中饭，中饭后，再来审讯。这个机关的干部审完，那个公安干部再审。有时，外地来的干部在外面候着，时间长了，外面的干部就说了："等一个犯人，一

天没等上。”

这样的审讯一直进行到10月。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等地来审讯的较多。

10月28日，长春监狱开了一个大会，出乎意外，吉林省人民法院判处11名罪犯在监中的现行活动。第一名是陈兴芝，他在监中委任警察局长等职务，说是组织了一个小团体，企图变天。宣判后，把他们11人拉上汽车，到刑场枪毙了。

我感到很可怕，在监中稍一不慎，即有再犯罪的可能。陈兴芝的事我不清楚，在监中还图谋不轨，真是自找死亡，结果是全部枪毙，大快人心。我在监中抱定少与特务腿子们接触，不谈旧事，不谈旧人，即可以避免错误。

大会开罢的第三天，我们外帮组的犯人于也华、金锡恩、陈恩轩、蔡九峰、宋兆沂5人被砸上脚镣，关进6监。这件事引起了许多犯人的谈论。我也认为他们5个人有个小圈子，每天在一起嘀嘀咕咕，吃喝不分。这种情况我反映过，现在果然出了事。如果和陈兴芝的情形一样，就有危险。所幸我与他们没有什么勾搭，我认为他们很无聊。

11月3日，刚要吃晚饭，监房的班长来叫我，我心里抱怨来提审的太多，饭都吃不好。这次大概是外地的公安人员着急上火车等要材料，我随着班长进入监房办公室，我的脚刚踏入办公室的门，两个躲在门后的看守，便把我用绳子绑上，按倒在地，马上砸上一副大脚镣！砸了半天才砸好，起来又给我戴上手铐。我一看张管教员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纸烟，那种得意的样子，真是恨死我了！怒气似火烧，我想与他拼了，又一想，手上戴了铐子动不得，脚上戴着大镣站不稳，只看了他一眼，他那样子似乎说，关梦龄你服不服？我心里说，死也不服！

一个班长给我两个皮筒，犯人叫“镣模”，垫在小腿上，以免铁镣子把小腿磨破了，我接了过来。他把我带到6监里边，对着厕所的一间小屋子。

我进到屋里，看见屋内有两个小伙子。我坐下之后，外面的犯人给我端了一碗高粱米粥，一碗咸白菜，我吃了小半碗饭，就不吃了。情绪波动得不能安静，心跳动得十分厉害。不知有什么大祸在眼前，不知道张管教员给我捏造了一些什么东西。我只恨张管教员一个人，我绝对不会服。戴上两件，再加上两件，我也如此。这两个小伙子不用说是看我的。他们二人帮我把被褥放好，东西安置妥当，我坐在被子上。点名以后叫睡觉，我怎么能睡得着？脚镣、手铐，身子不能动，他俩帮我把被子盖上。我想，这回危险了，上边机关不知道，只好由这几个管教员和科长随便摆布了。多少高级干部我都见过，不成想一个刚由班长升上来的管教员就要了我的命。好，我倒霉，我认命，这不是共产党政策的问题，这是人的问题。再好的政策，像张管教员这样执行也无济于事。

9 点钟的时候，我的监号门打开，我知道是提我，我把鞋穿上，脚镣子响得厉害。我在最里面，到外面去要经过许多监号的门，一个班长把这些监号的窗户一个一个关上。走出 6 监的监筒，一个穿黑衣服的从没见过的干部叫我跟他走。我走不动，一步一步拖着脚镣向前挪，两手还要提着裤子。进了小铁门，到前面办公室，进右手一间屋，地中央放了一把椅子，是给我准备的，范典狱长坐在办公桌后面。这次是范典狱长任主审，李典狱长陪审，张管教员记录。叫我坐下，我没有犹豫就坐在了椅子上。

范典狱长问："关梦龄，你知道为什么给你戴上镣子？"

"不知道。"我摇了摇头。

"你要老实交待，你在监中的一切活动，我们都掌握了，不然，也不能对你这样。"

我心想，你们掌握了什么？都是一些诈语，在我身上能发生什么作用？我说："如果我有活动可以交待，不过我没有活动。"

范典狱长讲了些政策，启发我大胆交待，并且说："坦白从宽，现在交待还不晚。"

我想了一会儿，说："典狱长，我可以说说吗？"我说，"我这个犯

人与别的犯人不一样，我是无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如果我干了什么坏事，比如在监内有现行反革命活动，我一定会交待。交待可以得到宽大，不交待准死没活，这道理我明白。如果政府真的掌握了材料，有了同案人犯，我不交待也能处理。一个反革命犯，虽不承认自己罪恶，但是既有人证，又有物证，是不能叫他逍遥法外的。人民政府的空子不能钻，我也从没有钻过。”

“你说下去！”

“我认为给我戴上镣铐，不是为我有什么现行活动，而是在肃反中对我要重新议处，就是说，过去人民政府对我判得轻，这回在监狱找个理由加刑判处。这是要整我，我看真的这样，那倒好办，典狱长你说出几件事，我一承认就得了。”

“你这样想法与说法都是错误的，不是要整你，不是找理由，而是你有具体事实，没有事实不会把你关号。你要冷静地思考一下，思想斗争一下，你过去争取得很好，现在你要大胆争取。”

我说：“这样吧，我先回去想一想，问题也不是一个晚上就能解决，也许我真忘了，也许我假忘了。”

临走，把我的手铐子取掉了。进了屋还是睡不着，接着听到别的号开门，脚镣子响。我明白了，这是于也华他们。他们5个人各住一个号，也在夜间过堂。我的事与他们有关系，张管教员一定说我与他们5个人有现行活动。不过我记不得对他们说过什么了，他们5个人一咬我，我就不能脱身，我就成了这个小圈子的头，那就成了第二个陈兴芝，罪在必死了。

蒙上被子，心里感到很委屈。自己死在这里家中无人知道，我的孩子也不知道她的爸爸怎么死的。我在长春公安局争取了4年，费尽了气力，结果弄到这般地步。在北满，一些人都知道共产党对关梦龄宽大了，谁知道到头来，还是要杀。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糊涂了。共产党的事叫我莫名其妙，给我的刺激太深了。没办法，死了也好，省着零受罪。

第二天吃完饭在屋内坐着。同屋还有两个小伙子，一个叫李万

金，烧锅炉的工人，另一个叫刘克敏，是学生。他俩都是“三反”进来的，都是一年左右的刑期，这两个人，只是看着我别自杀，别的任务没有。

我的高腰皮鞋上有副蓝色鞋带，这是我自己用帆布线做的，既长又结实，我把这副鞋带拿下来绑镣子，用手提着这个蓝鞋带，走起路来轻快。我这样办他俩都说好。其实我这是准备自杀的，勒死人只要5分钟就行，我有经验。在长春我指挥特务们干过这种勾当。我勒死过别人，现在该我勒死自己了。想了想，今天先不勒，明天晚上过一堂看看风头再说，不要勒早了。越想越难过，掉了几滴眼泪。

第三天晚上，别的犯人都睡了，把我提到典狱长办公室，满屋子的人，叫我坐在地中央的一把椅子上。正坐是吉林公安厅的一个科长，找我了解过材料，他年龄较大，比较胖，对于特务问题颇有经验；左首沙发上坐的是吉林公安厅刘科长，他是专门负责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的；监狱管教科万科长，袁副科长，还有其他几个，一屋子椅子、凳子都坐满了，有10多位。正坐的那位科长说话了：“怎么不认识么？”

“有的认识。”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决不含糊，有话我是一定要说的。

“关梦龄，我告诉你，我们对你十分了解，知道你在特务机关有两下子，现在吃不开了！我问你，你在长春监狱都有什么活动？你好好谈一谈。”

“我是自首的，我如果在长春监狱还企图不轨，那我当初就不自首了，长春的特务头子都跑了，我没跑，自首，就是不想再反革命了。”

“你自首，那是迫于形势。”

“不论怎样，我是自首。”

“关梦龄你要老实一些。”万科长从旁对我申斥。

“你有什么活动？你怎样计划的？”还是正坐的那位科长，他主

持审我，别人都旁听。

“我这个人是痛快人，如果有计划，有活动，我在这一说，有多漂亮。何必叫这么多政府人员为我操心呢？不过，把我当作第二个陈兴芝，那是有出入的，我不是那种情形。”

“你是哪种情形？”

“我认为在监内搞现行反革命，第一，我没有那样想法；第二，没有对象。不管客观上怎样反映，我没有那样做。”

“你说你自己没有做，是客观上的反映，那么客观上根据什么反映的？”

“根据我是大特务，根据我们外帮组有5个犯人在一块搞小圈子，也许这5个人咬上了我，于是认为我有最大的嫌疑。”

“说了半天，都是别人认为，你自己没有事！”

“我没有事，也不能说没有事，有许多错误。”

“都有什么错误？”

“我借给别的犯人棉衣，拉拢同犯。”

“拉拢同犯干什么？”

“什么也没有干。”

“是不是叫他们当交通（特务机关传递情报的人）？”

“当交通，他们不懂得。”

“关梦龄你是不是认为你不说，就可以混过去？”

“这样吧，政府把我的活动计划说出来，我承认好了。政府宽大就宽大，不宽大也没有关系，现在枪毙了，我已经多活了6年。”

“你要坦白，自己说！政府不能替你坦白。”

“我没有办法，只能这样了，给我加什么罪我都接受。反动也好，顽固也好，我是承认的。”

“你这是什么态度？抗拒！”万科长又批评我。

我停了一下，没有说话。旁边那几位干部也都困倦了。我心想，白天都忙了一天，晚上又到这陪审，结果什么也没审出来。他们一定认为我很顽固。我想了一下说：“报告科长，我先回去，明天我写

一写，写完了你看看，不行再说。我这件案子也不是个小事，反正一天两天结束不了。天太晚了，我支持不了，腿也疼起来了。”

这位科长往沙发上看了一下，有几位干部也说：“先叫他回去吧。”

“关梦龄，你回去好好想，老实写！”

回到监号，我把今天的审讯仔细分析了一遍，知道他们手中什么也没有，审讯的词句很空虚，一听就是硬要东西。我最后脱身的那几句话是想试一试，如果他们不叫我回来，那是有证据的，放我回来就证明他们什么也没有。我说回来写，搭了个台阶。我如果总是“不知道”，“我什么活动也没有”，那就不好下台了。这样一说，暂时收场。我躺下来，心里很坦然。心想，他们这是何必呢？不敢往我身上乱加罪，又不肯对我放松。事缓则圆，这是我一贯的主张，日子多了就会好转。

早晨起床，一看脚脖子破了，我说：“这怎么办？挺疼！”

“找医生怕办不到。”这是李万金说的。

他说找医生办不到，我倒要试一试。我拿张纸写了一个条子，交给班长。我想，如果医生来看，那我还有一定的重要性；如果置之不理，那就如同一般犯人。一般犯人脚脖子卡破了，根本没有治的。条子交给班长，班长回来对我说先等一会儿，上班医生就来。这里有犯人医生，有政府人员的医生。一般犯人，都是犯人医生诊断。我这伤不知什么人来看？早饭后，一个女医生来到监房！她叫我坐在门口，给我清洗了伤口，上了药，用绷带扎上。走时还说后天再来换药。她走后，李万金说：“这是李典狱长的爱人，她是不给犯人看病的，你是个例外。”

“我的案子严重，犯人医生不能与我接触。”我这样说，但心里感到事情越来越好办了。

35 项缺点

天天提审，写材料，忙得不亦乐乎。抽出时间还要写检讨书。我的检讨是这样写的：第一项，拉拢同犯，企图不轨，在 1953 年秋，借给反革命犯方锡志毛衣一件，又借给邹达棉袄一件，造成小圈子；第二项，破坏生产，浪费原材料，在劳动中，多用胶浆，违反增产节约的号召；第三项，心怀不满，抗拒改造，对政府人员的教育背地发牢骚……共有 35 项缺点。写完之后，交给管教科。后面又补充说明一件事：在监号与犯人谈天时说，犯人在监中现行反革命活动应当镇压。这个问题可能反映错误，我予以解释，并找出几个犯人作证明。

晚上灯不亮，什么也不能写。我与刘克敏、李万金两个人聊天。他俩知道很多犯人的案情，没事他俩就谈这些。比如刘克敏说："大厨房姓苏的，因为入洞房判了 3 年徒刑。"

我一听感到奇怪："怎么回事呀？"

"成亲他没有房子，借住他大姨子的外屋。入洞房时，两口子一上床，他老婆一叫唤，他把嘴给捂上了……捂了半小时，后来一看他老婆不吱声了，没气了！死了。这就判了 3 年。你看糟不糟，洞房事儿还没完，就抬死人，预备棺材。"

"咱们隔壁住的那个小子，是个不要脸的东西，天天哭，天天唱，叫人不得安静。他是个乡下唱小戏[②]的，因为放火，判了 3 年。他是唱花旦的，留个大背头，长得像女人。他刚入监不在这儿，在别的地方。他装女犯，入了女监，在女监里住了好几个月，有好几个女犯叫他给划拉了，后来发现了，给他加刑到 8 年，送他到第一劳改队。在第一劳改队，别人去劳动，他请病假在家，他把别人的烧饼、酱肉偷吃光了。于是又把他关在小黑屋子禁闭，禁闭室有一个犯人

姓王。姓王的有东西给他吃，就把他奸了，这才把他调来。他每天报告班长，问那个姓王的能不能来这里，班长批评他无耻，他笑一笑。”

窃盗犯、破鞋、女人贩卖毒品……许多想不到的犯罪事实。听他们一说，我知道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都汇集在这里。真想不到，我与这些人在一个监狱改造。

6 监的那几个号，仍然在就寝后过堂，脚镣子直响。我想他们这个案子很危险，这 5 个人如果走陈兴芝的路，后果不堪设想。

11 月 21 日晚饭后，万科长把我找到监房办公室，匆忙地对我说：“今天晚上开大会，叫你在大会上坦白一下，坦白之后政府处理你的问题，你先写个提纲，不要有顾虑。”

给了我几张纸，我只写了一张纸的提纲，还未写完，又提我到办公室，万科长说：“写提纲来不及了，你上去斟酌情形说吧。”

一个班长把我领到橡胶厂，进入管教员室，我一看干部都在这儿呢。大家都很严肃地看着我，一声不吱。万科长又对我说：“你怎样说，看你改造的程度了。”

我心想，在这种场面我会自己找倒霉？乱说那就不应该了。我被领入会场，橡胶厂犯人全在。车间门口放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广播器，我一看便明白了，这是全监大会，中心会场设在这里，别的厂子也要收听，这个规模不小，所有的犯人都望着我，特别注意我戴的镣子。

叫什么会我忘记了，大会开始后宣布：“由罪犯关梦龄坦白！”

我走到播音器前面，开始讲话：“我叫关梦龄，反革命罪犯，长春解放前曾充军统特务，长春督察处督察长。为非作歹，万恶多端，长期效忠蒋帮，反对人民革命。在长春曾由我率领特务杀害人民政府地工人员 40 多人，收集解放区情报数百件，血债累累，死有余辜。长春解放后，迫于形势向人民政府自首，经过政府再三教育，始坦白罪恶，检举别人，有点滴表现。政府本着改造人类的伟大精神，对我予以宽大，未予处死，送我到长春监狱改造。本应带罪立功，积

极争取，但因过去反动成性，积习太深，在监中进行现行活动，阻扰同犯，破坏生产，不满政府，抗拒改造，初步检讨严重缺点35项。这些缺点多数是现行犯罪。自己认为，在监中不能立功赎罪，反而进行现行犯罪，理应受到严厉惩处。我本着不论有多大罪恶一定老老实实向政府坦白，争取得到政府宽大处理。今后，我一定认罪服法，接受政府教育，安心劳动，彻底改造自己。”

我说完了，袁副科长讲话：“方才关梦龄的坦白，你们都听到了，他有35项现行活动，他自己大胆地坦白了，政府宣布：对关梦龄这样大胆交待现行活动的罪犯，不予处分，现在给他下镣！”

班长早已预备好了锤子，给我下镣。脚镣子下了之后，袁副科长又说：“与关梦龄相反，不交待自己的现行活动的罪犯钱文华予以镣押，给钱文华戴脚镣子！”

马上把我那副脚镣给钱文华砸上了。袁副科长接着讲：“钱文华把秤砣放在机器里，破坏生产。这种现行活动有人证物证，但他拒不承认，所以予以惩办！由以上两件事可以看出，大胆交待问题的关梦龄可以得到宽大；钱文华拒不交待问题，必然要受到人民的处罚。你们都要好好考虑一下，有问题的要向关梦龄学习。由明天起全监各车间漫谈今天大会的收获，漫谈关梦龄与钱文华这两个罪犯的改造态度。”

把钱文华押起来，把我放回车间。许多犯人围拢来问我怎么回事，我说：“犯了错误，受到了政府的宽大。”

我回去拿行李，班长叫我在6监外面等着，他把行李给我拿了出来。我明白了，钱文华就住在我那屋子，不然一定叫我自己去拿。

搬到8监，这是橡胶厂犯人住的大宿舍，我心中倒也高兴，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了。我仔细一想，在肃反中拿我作典型这样办一下，对全体罪犯也可能发生一些作用。我已经过来了，就什么也不说了。张管教员有关系，他的关系还不大，决定这个问题的是长春监狱典狱长，以及比他大的负责干部。张管教员可能在提供材料时从中加盐加醋，把我说成十分危险的罪犯，但是上级不同意。吉林

公安厅来了几个科长，监狱的正副典狱长和各科长都参加了对我的审讯。开始相当紧张，过了两堂便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

在橡胶厂我原来有定额，因为白天我经常被提审，不能劳动，完成不了定额，影响下道工序生产。工厂负责人取消了我的定额，能干多少就干多少。

每天照例提审，从中我也受到一些教育。有这么一件事：1948年，督察处秘密处死了一个叫钱志球的，说他是地工人员。1947年冬，长春市海上大楼起火案，说他是纵火者，把他从38师政工室逮捕归案。逮捕时，经过该政工室主任许萤协助。现在从北京来了一个干部问："许萤协助你们逮捕钱志球，是怎样协助的？说了什么话？他自己说，'叫人把钱志球绑起来'，他说了这句话没有？"

"这我不知道。因为我派人到38师师部把钱志球接来，我们的人没到该师政工室，因此没有听到许萤说了什么话。他协助逮捕是肯定的，不协助抓不来。"

"许萤在北京已交待了这件血债，现在到长春对证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逮捕地工人员的罪已构成，钱志球已经被杀害。现在看，许萤负责逮捕之责，杀害的罪责由督察处负。"

我对这个从北京来的干部说："只这两句话你走了三千里地，真是实事求是。"

我感到有这种负责精神是不能判错案子的，与督察处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我们使多少冤枉者被陷害，惨死狱中。

一天上午，提我到办公室，把我交给两个干部。这两个干部交给管教科一张解票："我们是市局的，找你去问话，上车吧。"

门口停了一辆灰色的小吉普，我说："不戴点东西(指手铐)？"

"戴什么，上车吧，我们都知道你。"

我穿了一件小黑棉袄，背后写了两个大字：犯人。在市局办公楼里走，许多人都多看一眼。一个女干部叫我跟她走，进了局长室，出来一个高个干部，他是任青远局长。一张会议桌，他坐在里边，叫我坐在外边，与他对面坐着一个干部，担任记录的样子，桌上放着

香烟、火柴，任局长递过来叫我吸，我没吸，他说："会吸就吸嘛。"那个干部给我拿出来一支纸烟，我自己把烟点燃。

任局长说话很慢："听说你改造得不错，很争取，今天把你找来谈几个问题。"

"我知道的一定好好说。"

"这个问题，我派人到监狱找你谈过几次，都没有谈清楚，今天当面谈谈。有个唐文治，在吉林磐石于 1947 年成立了一个军统局通讯站，站长唐文治少将，下边还有许多人员，这个组织你知道不知道？唐文治这个人你认识不认识？"

"这个组织我不知道，唐文治其人我也不认识。"

"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呢？他怎么能报军统局呢？"

"军统局这个名词在 1946 年 9 月取消了，一般人口头有时还用'军统'二字，可是在公文上完全不用了，因为改为了'国防部保密局'。如果 1947 年还用军统局的番号，那他就不是军统的人，一定是外行人利用这个过了时的番号来招摇。一个少将站长，在军统局是高级干部，到了东北我不会不知道，多数我认识。唐文治这个名字我陌生得很。"

"他的组织很完全，下边还有组，并且有行动，收集我方情报。"

"那是有计划的，大规模地招摇撞骗，他搞到的情报给谁呢？"

"供称是给沈阳。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从南京直接派一个站到吉林？"

"这种情况也可能有，如果真正派来一个站，我们一定会知道的，不论怎么秘密也会知道。"

"他们这些人在东北还有许多社会关系，你把军统在东北的站以上的名单写给我。"

这时进来一个 30 岁左右的干部，他站在任局长身旁小声说了一些话，只听任局长说："好，晚上把他找来。"

我心想这是抓人。在局长室门外有一个干部等我，我说到执行科看一看肖科长，他领我到了执行科。从前是审讯员，现在升了科

长。见面之后，肖科长问我在监狱改造的情形，我说："他们对我不了解，认为我不好改造。"

"他们不会那样看问题，那样看问题会犯错误的。"

"我在那不怎么好过，有许多人认为我是长春监狱的危险人物，我在那儿很苦恼。"

"都是一个政府，他们办事也要按政策办，谁也不能违背。"

"话虽然这么说，执行政策的人不一定都是一样的水平，有的高，有的低。"

"当然，不过不管高与低都要有原则的。"

最后，他问刘荣第，我说："他不错，减了二年刑。"

"我听说了。"

"不是市局给减的吗？"

"监察署吧？听说他检举了许多反革命分子。"

"刘荣第都减了刑，我……"

"你没有减刑是不是？你不能与刘荣第比，他是长春参议员，没有血债，你呢？判15年，人民有意见，政府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你在长春的罪很大呀，这一点你还不清楚？体会的还不够哇！"

肖科长的话我再三回味，我体会的不够，是不够。

市局有位第一处的干部，不是副处长就是科长，下午来到监狱提我审讯，他说："你在1949年会同一些犯人共同写了军统特务材料，内中有训练班一部分，现在我把这份材料带来了。这种训练班共有百八十个，你们写了这么多，现在叫你把这份材料，缩减成16开纸5页，要包括这个训练班的主要内容，这个工作有困难没有？"

"有困难也要克服。"

"越快越好，明天晚上写好，后天上午10时派人来取。时间方面，回头我告诉这里的领导，给你安排一下。怎么写呢？你先说一说。"

我想了想说："把这些特务训练班分成三大类，第一类，训练特务干部；第二类，训练政治警察；第三类，训练特务机关的事务人

员，如会计、经理、管理等。再把训练宗旨说一下，找几个典型训练班举例说明。关于训练班的人事与课程作扼要说明；戴笠对各训练班的重视，对毕业学生的任用，也是一个内容。最后总结一下，军统特务训练班共有多少，毕业学生共有多少，在反人民当中都起了一些什么作用，这样也就够5页了。"

"可以，这样精简可以。"

接着谈起别的话题，我说："在这劳动改造，劳动少，写材料时间多，心不安。我希望回市局去，免得市局的人都来这找我。"

"回市局也可以。"

"我希望有一个小房子，屋内有桌椅，可以写材料，看看书报；我还希望吃一点小米粥，因为我牙不好，吃高粱米不消化，还没有营养。"

"还希望什么？"

"每礼拜改善一二次生活。"

"你的希望还不高，可以办到。"

"最近我可以回市局么？"

"你先准备吧，也许快。"

我回来心里真痛快，这回见了天日了！回到车间偷偷地收拾东西，这回可要离开长春监狱了。

过了两天，提我到典狱长办公室，是审过我的那位女干部审我，范典狱长陪着她。

她要了解一个姓丁的材料，并拿出一些相片叫我认。第二天又来提审，还是在典狱长办公室。我估计这位女干部是处级以上的，因为很少有在典狱长办公室审讯的，并且吉林公安厅刘科长对她也很客气，比科长都大，还不是处长以上的干部？她问我："你研究研究，长春解放前学校里的特务，可不可能有潜伏下来的？有没有布置潜伏的？"

"我知道没有，因为当时只有'长大'。而长春大学大部分也迁到了北京，长春校本部又没有多少人。别的学校根本没有人。"

“中统方面的情况你知道吗？”

“中统的情况虽然不知道，但也从没听说有去学校潜伏的，如果有潜伏的人，可能是自发的。”

“你说这个姓丁的，他可能不可能有潜伏任务？”

“我看不会有。”

“怎么不会有？”她接着又问。

“这个姓丁的虽然是国民党员，但不是中统，他与特秘处主任秘书王中兴认识，王中兴在长春没有潜伏任务。王中兴与我一块在长春解放之夜突围没突出去，他便逃跑了。他的事我很清楚，王中兴没有布置潜伏，姓丁的要潜伏，也是自发的。”

她叫我把这些判断写一下，我又写了一个小时才回来。

我就凭写材料争取，如果不靠这些材料，长春监狱对我的事不能解决得这样快。

12 月 24 日，早晨起床，按惯例要出号到工厂去，但这天班长把我留下来了，我心中明白这是叫我回市局。有的犯人一看把我留下，又以为出了什么事呢。下午，把我调到 2 监 9 号。一会儿来了一些反革命犯，内中有刘荣第。

第一劳改大队也来了几十个反革命犯，有不少人认识我，国民党长春警察局的多。每天不劳动，吉林公安厅有一个解管教员负责。没几天又把李树桂、黄炳寰提到这儿。各车间比较高一点的反革命犯都集中到这儿了，共有 70 人左右。吃的是劳动的饭，干饭，不是稀粥。班长对这些人还很照顾，还是准备集训？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12 月 28 日，刘科长与万科长把我们这 70 多人集合到第 8 监，对我们讲话。大意是，不要有什么顾虑，有人说把你们集合到长春监狱要处理你们，这都是胡说。你们看看，关梦龄的罪不比你们大？关梦龄的特务职务不比你们高？对他都没有怎么样。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是不变的，你们要安心，这回是集训。第一，通过这次集训，要叫你们同反动组织划清界限，彻底肃清反动思想；第

二，反革命犯将来另行编队，不再回原车间，到新的劳动岗位；第三，现在编成四个组，关梦龄是第一组组长，刘荣第是第二组组长……；第四，过新年后，正式开始学习，包括阅读文件，户外运动，漫谈等；第五，将来上课地点就在8监。讲完话每人发给一本《第一个五年计划》，又发给钢笔、墨水、学习本。这次学习看起来很重要。叫我当第一组组长，我就明白了，是要这些反革命犯继续检举交待问题。我们这组有21个人，大多数认识，少数虽未见过面，但听说过我的名字，可见我的名声大，罪恶多。我心想，在这学习不能回市局了。

第二天，把我、刘荣第、黄炳寰、李树桂4人提到7监一个监号，屋内摆有桌子，解管教员说："你们的历史、社会关系，全部写下来，罪恶也要写。"

说写就写，可是黄炳寰看到我有点害怕的样子，他也许想：怎么与关梦龄弄到一块了？可能把我当成特务了？我当过吉林警务处长，认为这是军统吧？他不住地看我，什么也写不出来。

如果在这个学习运动中，我好好发挥组长的作用，倒能够交出一些东西。我初步了解一下，这些人交待罪恶很仓促，没交待社会关系，他们还有东西可交。展开学习，我们第一组不会落后。我认为可以做一个"第一组"。

一天，刘科长对大家说："原来你们和一些文盲刑事犯在一起，学习水平提不高，这次集中在一起，水平都差不多，便于学习。"

我心想，"便于学习"下边还有一句话：便于管理。这些都是从劳改队和监狱调来的反革命犯，这些人集中在一起事就多了，一旦发生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怕人哪！我是惊弓之鸟，有了经验。

①班长：在这里并非是授有班长职务的军警，它是犯人（含战犯）中通常使用的，并非明令规定的对看守人员、看押战士的一种谦卑的称谓。

②吉林省人民政府公安厅：关梦龄于1948年10月26日自首于吉林省人民政府公安处，当时省政府设吉林市，后迁至长春市。

③小戏：即东北地方戏。东北地方戏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歌舞演唱，俗称“二人转”，演员二人，一饰女，即花旦，一饰男，为小丑，二人时而对唱，时而齐唱，且歌且舞，歌唱内容大多采自民间故事或历史传说；另一种是拉场戏，一种以东北民歌为主的小型歌剧。

第五章　目的不明

洗掉背上的大字

1月6日，段克文也调来了。9日，让我、黄炳寰、李树桂、刘荣第、段克文5个人把东西准备好。别的人在屋看文件，我们把东西包好，行李打好，在楼下坐着。解管教员来了，我说到厕所大便去，他准许我去了。段克文也报告上厕所跟我来了。

在厕所里，段克文问我："咱们这是到哪去呀？我直嘀咕。"

"跟我在一块没有坏地方，第一是北京，第二是市局，放心吧，擎好吧！"

这些话被站在厕所门口的解管教员听到了，我们出了厕所，解管教员问我说了什么？我如实说了，解管教员笑了。

9点钟，把我们提出去。门口停着一辆装货的大卡车，上车后两个人一副铐。出了监狱大门，汽车向西驶去。住了将近三年的监狱，这回告别了。我没有一点留恋，没有一点不高兴。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我得到的教育没有受的痛苦多，这就是长春监狱给我的印象。我清楚这些问题不属于政策方面，而是属于执行政策的人。这

一点，我没有把它们混淆起来，我有最起码的判断是非的水平。

汽车不是开往市局，也不是开往车站，我心中随着汽车轮子的转动猜疑不定……汽车开到一座建筑物的后面，我们把东西搬进这个建筑物，又搬上楼。我的东西多，浑身没有气力。我们背后都写着“犯人”两个白字，在楼上一站，许多人像看新奇动物那样地注视着我们。解管教员进了一个屋子，不一会儿刘科长出来，站在楼梯口上，简单地对我们说：“现在把你们集中到这儿，进行加速改造。这儿的各方面都要比过去好，饮食上还可以吃到比较有营养的东西。”

说完又领我们穿过马路，到另一个地方。这儿没有牌子，不知是什么地方，由于刘科长在这儿，估计这是公安厅的所在。我的东西由刘科长帮助拿，走了半里地，进了一座新的小房子——呵，看守所！门前有战士站岗。我们都走了进去，刘科长对我说：“段克文还嘀咕不嘀咕了？你们不要有顾虑，这里还有两个人。”回头他告诉这里的干部找来那两个人，不一会儿李寓春、尚传道来了，这回我们七个人了。

我们被领到了监号，共住两间屋子。尚传道、段克文、李树桂和我在一间；另一间是李寓春、黄炳寰和刘荣第。政府发给我们许多新东西，洗脸盆、毛巾、肥皂、茶杯等。新房子有木床、有桌椅、暖水瓶……骤然到了这么一个窗明几净的屋子，真是心旷神怡，精神痛快，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当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心情还不能冷静下来。尚传道对我说：“我以为把你释放了，不成想在这又见面了，想不到。”

这些人在长春差不多都认识，见面以后都要谈一些自己的经历，总的两句话，解放后都在反省，在政府的宽大之下都没有被处死。

中饭，每人一大碗大米饭，一小碗炒菜，内中还有肉，吃起来香甜可口。心想，吃这么好的东西，住这么好的屋子，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五个人相互谈论这个问题，正面的看法是重复刘科长的话“加

速改造，也要有生活照顾”，但究竟为什么要加速改造？不明白。

段克文说：“可能过去判偏差了，这回对咱们纠偏。”

我首先反对：“你判了，我判了，尚传道和李寓春还没有判呢，纠什么偏？又有什么偏？对我判的不偏！”我一反驳他，别人也不吱声了。

到了这个环境，比在长春监狱好得不能相比，首先是精神没有压力，不要顾虑一找谈话就出是非，或是戴脚镣；在物质上更不用说，吃得好、睡得好，夜里三次暖气，一点也不冷。

市局叫我写特务训练班情况的那个科长，又来找我谈话，还是写材料的事。他一见面就说：“这个环境比你所希望的怎么样？”

“好得多了，这不是‘小米’了，是‘大米’！比我希望的超过了许多。”

在长春监狱典狱长办公室审讯我的那个女干部，也来到这儿提我了解材料。陪同她的那个男干部问：“关梦龄，你多大岁数了？”

“今年41岁了。”

“不像41岁的人，很年轻嘛！”他说完看看那位女干部。

“好好改造，还可以给人民做不少的事情。”女干部鼓励我。

又问我们学习什么呢？我说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

那位男干部说：“都要学习，连溥仪还要学习呢，都要改造，不学习就落后了。”

材料了解完他们走了。我问李所长，这个女干部是不是公安厅的处长？李所长说：“是市局的处长。”

一提市局的干部就有好的印象。我从个别人的印象出发看事物当然是不全面的。

一些公安机关及各单位保卫干部，都到这里来提审我，了解材料。一见面，从服装、言谈、作风，我就能估计这个干部是什么职务。比如有一天来了一个大连公安局的股长，找我了解国民党吉林省会计长侯景文的材料。这个股长穿着一套蓝呢子制服，白衬衣已经有点脏了，穿着夹皮鞋。看来他不是长春的干部，这么冷的天，穿夹

皮鞋，少见；这么新的呢子制服，内中白衬衣却有灰了，一定是走了远路，没来得及更换，不然，这个呢制服与这个脏了的衬衣不相配呀，从哪来的呢？他坐下先问我："听说你改造得不错。"

听这话他不是市局的人。

他说："了解侯景文的一些问题。"上次，有一个审讯员问我侯景文在大连的关系，这个干部很可能是从大连来的。我看这个人很开朗，很随便，我就问了："您是从外地到这儿来的吧？"

"我从大连来的。"

"你穿这样的皮鞋，不冻脚吗？"

"我以为长春不能这么冷，来的时候太仓促。"

我心想，好像跳完舞就上了火车似的，也是个好玩的人。我说上次有一个干部来了解了一次侯景文的材料。他说："对，来过一次，有些问题，还没搞清楚，这回我自己来了解一下。"

可能是个科长或股长——"我自己"，表示下级不能办事，要亲自出马。我这样判断，大致是不会错的。最后，他说自己负责审讯股工作。这是个喜欢说话的人。还有不说话的人，只凭眼睛我也看得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从北京来了一个干部，一进屋穿的皮棉鞋，戴着皮手套、围巾、口罩和皮大衣，崭新的小棉袄套着单制服，可见这是临时做的。没有到过长春的人，以为长春能冻死人，穿戴这么多仿佛一个空军驾驶员。他的手提帆布包印有"北京×工厂"，我初步认定他是北京来的干部，果然一谈话，他是了解北京外围特务的情况。

有一些二十三四岁的干部，在审讯中板着面孔，他的心理是：关梦龄是个狡猾的特务，不能叫他钻了空子，所以对他要严肃。问一句，第一句，他掌握的材料也不多。他的上级临来的时候，只叫他了解一件事，别的事他不问，你说多了，他也不爱听，听也听不懂。这样工作效率就很低，同时，这些年轻干部有一个戒心，与这些特务说一些用不着的话不应该。

有一次，那是1955年10月28日，长春下大雨的一天，四个干

部到长春监狱，找我了解国民党吉林省财政厅长姜守全的材料。这四个干部有三个穿着夹呢大衣，一个穿着风雨衣，两个挟着黄皮公事包，年龄都在35岁以上。坐下之后，一个问，其他三个人在旁边听，在我答话的时候，那个高个儿的，有40岁的人，两眼一会儿看着我，一会儿又看看房顶，他虽然不说话，但这些举动能引起他们三个人的注意，我说了一段话，这三个人都要看看他的表情。我心中明白了，问话的人不是负责的，这个高个儿是决定问题的，果然，他说话了："姜守全与军统的关系，是组织关系还是像你方才所说的朋友关系？我们要了解他在吉林的社会关系。他在离开吉林之前，有没有布置潜伏组织？在北京他都有些什么社会关系？"

像这样了解材料，都是全面的掌握了姜守全材料之后，才往外发展他的亲友，他的部下，他的同事等等，这几个人不是一些下级干部，他们是中央级研究特务组织的干部，并且不单纯限于了解，而是研究特务的一切。因为姜守全已逃到台湾，写这样的材料是准备在一定的时候应用，并且肃清他在大陆上的反动的社会关系。这些人一了解材料就是两三个小时，随便不负责任的问答式的谈话，他们不能满意。那个高个儿，说话费斟酌，问话很稳重，没有想好，没有造好句的话不出口，这样的干部是负责任的老干部。

黄炳寰腿疼，这里的李所长问他治没治？他说喝虎骨酒有效。李所长便上街买虎骨酒两大瓶。这里要什么有什么，真想不到，这种优厚的待遇受之不安。

李所长这个人有二十七八岁，说话声音很低，和蔼可亲。他对我们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仿佛像托儿所的阿姨一样。先叫我们把背上"犯人"两个大字洗掉，洗不下去用汽油擦，因为是铅油写的，汽油也擦不掉，便重发棉衣。我的衣服又小又不好看，便发给一套黑斜纹干部服，别人的衣服也都换了，没有帽子的买了新帽子。

晚上，韩科长找我说话，鼓励我们早日改造好，在改造中给予一些物质上的照顾，是为了帮助改造，并且说："将来还有可能到社会上看一看建设的情形。"

我们认为把北满的少将以上的反动派都集合到这儿，这是中央统一的命令，对我们要很快处理。我个人的想法也不外乎是集中优待，快速处理。

看了许多实在的东西

真的要我们到社会上去看看！快八年了，我不知道老百姓是怎样生活的？也不知道社会都有什么样的变化？这回可以一饱眼福了。

参观新建的长春汽车制造厂。

旧历腊月二十八了，工人宿舍的主妇都在准备过春节的食品。我们参观了几栋工人住宅，楼上楼下没有煤灰，一律用煤气。每套房间有淋浴室、住室、小客厅、小厨房。井井有条，清洁非常。回想一下，过去东北的一般大地主也没住过这样好的房子。住这么好的屋子哪能不好好劳动？哪能不想办法发明创造？哪能不感激共产党、毛主席呢？解说员说："这是比较好的住宅，并不是其他工厂都这样，我们有同志还没有搬进这样的住宅，仍住旧房子，离这儿也很远。"

到了装配车间，这是制造汽车的最后一道工序，将来正式生产，9分钟一辆汽车！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制造过汽车，中国过去所用的汽车是"万国"牌，就是哪个国家的都有，就是没有中国自己出产的。现在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有了第一个汽车制造厂，这是新鲜事。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国民党贪污腐化，什么建设也不能搞，就能搜刮人民，压榨人民。

在底盘车间，解说员说："这个车间的地板是最好的松木块，经过消毒、上漆，七道工序制成，一块一块的立着放，能隔湿、隔凉、震动小，可以使工人不患关节风湿病。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厂多数是

水泥地，工人常年站在石灰地上干活，到晚年两腿不能动，半残废。”这么一听，在我们国家劳动的工人真是幸福，这是社会制度的问题。

春节吃得很好，在监狱是想象不到的。这位炊事员手艺好，人规矩利爽，一看就知道他过去在大饭馆干过或住过大公馆。就是中午炒一小碟咸菜，也好看好吃，达到了做菜的“色味香”要求。过春节，饺子、花卷、鱼、过油肉、葱爆羊肉，做得都很好，这样的炊事员怎么能到看守所给犯人做饭？一定是从哪个单位临时调来的。

崔所长怕我们过春节寂寞，给我们预备了象棋、军棋、扑克，他进来和我们一起玩。如此怕我们想家、闹情绪，真是关心备至。因此不仅在饮食上，且在精神上，这个春节过得也最愉快。

崔所长是吉林公安厅的老干部，1948 年 10 月我在吉林自首，他知道，他说：“那时你若不努力争取，是很危险的。”

过了春节，我对尚传道说：“我们干什么事来报答政府这样的宽大照顾呢？”

他说：“写一些关于台湾当局的材料。”我说可以，我建议：“给台湾的熟人写信，叫他们起义，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写给项迺光一封，岳梓宇一封，都是大特务，与我私人关系比较好。这样的信可以广播喊话，或电台播送。

2 月 18 日，坐上租来的公共汽车去市里参观。先到吉林食品厂，后到公私合营的益发合，最后到长春百货公司第二商店，整整一天。到长百第二商店参观，使我想起解放前，在这个楼下逮捕过地工人员，查封过一个青年药房。那时这个地方住着士兵，糟踏得残破不堪。现在旧地重游，不能不想起过去的罪恶。这不是参观，是检讨自己的罪恶。

长百第二商店，有八千多种货物，令人自豪的不是货物品种的繁多，而是货物都是中国人民自己生产加工制造的。不像解放前的百货商店，化妆品是法国的，毛织品是英国的，丝织品是日本的，到了解放前夕，一些百货商店都成了美国商店了。现在，到长百第二

商店一看，有许多货物比美国的还好，一些绣花缎子是出口的商品，自行车样子美观坚固耐用……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人民翻身当家，发挥出无限的智慧才能，把祖国建设成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

2 月 20 日，起床很早，告诉我们到市外去参观。韩科长和五六个外勤人员与我们坐一辆汽车。过完春节，还有寒意，走了一半路，韩科长叫汽车停下，下车活动一下，又继续行驶。汽车开得很快，一百五十里的路程，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我们参观的是长岭机械化农场。农场主任介绍说："这里从前是一片荒地，没有人烟。现在有了五百多亩大田，国家发给了大型拖拉机，建造了厂房，增加了一些技术人员，成立了三个生产队，成为吉林的大型国营农场之一。去年收成很好，给国家收了 30 多万斤粮食。今后还要扩大，一切劳动全部实行机械化。"

接着参观拖拉机，苏联的履带拖拉机"热特"、联合收割机，驾驶员在院子里驾驶"斯大林 80 号"拖拉机，"热特"机正在切豆饼。天很冷，冻得人手不敢碰钢铁，有许多机器没有开动。

下午又坐车走了十里地，到这个农场的第二大队参观。这里一片平原看不到头，主任在汽车上说："这个地方的土质很肥沃，方圆百里，都要开垦成良田。我们这个农场还需要大批的人力，将来你们再来的时候，就不认识这个地方了。"

农场主任高大身材，黑红的脸，有三十几岁，学机械的，人很稳重，说话言谈显示出一种果断的劲头，充满着乐观精神。在这么一块荒地建成一个这样大的农场，不是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是有能吃苦耐劳的共产党员带头苦干，就不会有今天的成果。我想将来中国的土地都能用上农业机械，那就好了。

路上，有许多野鸭在开阔地上站着，非常好看，外勤人员开了一枪，没击中，全都飞了。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到长春市郊的"红星蔬菜合作社"参观。汽车先开到市委会，找来一个女干部带队，这个十八九岁的小女孩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穿一件新蓝细布棉大衣，像个胖娃娃，挺惹人

喜欢。她上车指着方向，引导汽车前进。

这个社的男女社员穿得整整齐齐，每个人的脸都胖胖的，说说笑笑，显出来生活的富裕和愉快。这个社的负责人是个老头，有50岁的样子。他见到给我们带队的女干部，小声问了一些情况。这个小女孩胸有成竹地告诉了这个老头许多话，她一边说，这个老头一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她对韩科长说："叫社主任报告一下这个社的情况吧。"

于是就由方才那个老头，向我们报告了该社成立前后情况。解放以前，这个庄子只有一家地主，几十户贫农。贫农吃不上饭，家中没有被子。解放后，贫农分了土地，成立了互助组，合作社，生产多了，生活富裕了。现在家家都有新衣服，都有余粮。蔬菜供应市内，冬天有暖室，照样生产新鲜蔬菜。

社主任带我们参观暖室，参观养鱼池。许多男女正在挖很深一个大坑，这里预备养十万尾鱼苗。在养鱼池边，站着一个女的，有20岁，手提黄帆布包，与我们一块来的女干部说起话来。看来她们都是干部。解放前这些小丫头，在有钱的家庭是小姐，娇生惯养，什么也不懂；在穷人家便要拣煤核，吃不上饭。可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这些小丫头都能办事了，这也是了不起的变化。社主任不是服从小丫头，是听党的话。

参观中，我看到一张长春人民法院的布告，上面枪毙了两个土匪。看来土匪和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障碍。

参观回来，车过大经路，看到一家门口挂着大红横标语"长春市公安展览会"。我一想，公安展览会开过多次了，现在还展览什么？1949年的公安展览会，把督察处杀人的佐证都展览出来了：有被杀人的相片，有我坦白的材料，我的军服、便服，以及其他有关的照片，甚至我小老婆从北京来的信也展览出来了。这些情况都是以后被捕的人到了看守所对我讲的。我认为现在再抓到正式军统特务是很少的了。

参观告一段落，写参观感想，我写了七页。第一，感激共产党对

我们的关怀，用参观的方式，帮助我们改造；第二，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现在又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看了许多实在的东西，相信一定能建设好；第三，感到自己不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还给人民增加许多负担，于心不安……

过了两天，韩科长召集我们九个人漫谈参观感想。我在发言中说："国民党时期，为什么不能建设汽车制造厂？共产党找苏联帮助，国民党找美国帮助行不行呢？我考虑了几天，办不到。有许多理由，第一，国民党贪污之风不能肃清；第二，不用人才，只用奴才，用的三亲六故，不是小舅子，就是大妹夫，再不就是'五同'，即同乡、同学、同事、同志、同参（在青帮家礼，同一辈就是同参）；第三，一个汽车制造厂的成立，要随之成立许多工厂，比如长春小五金厂、电木厂、哈尔滨电表仪器厂、哈尔滨轴承厂、玻璃厂等，都是围绕汽车生产部件，不是单一汽车厂的问题，是整个工业化的问题，这是国民党没有法子建设起来的；第四，国民党办的兵工厂，设立军统局的'警卫稽查组'，专门监视工人的言行，工人在那种情况下，能好好干活吗？更谈不到发明创造了；第五，如果国民党办的汽车厂，建那么些住宅，是不会给工人住的，要科长、处长去住，工人住草棚子；第六，最基本的问题是社会制度的问题，私有制度不能为工人着想，不能为国家着想，只能为自己着想，只要自己发了财，有钱可以到外国买汽车。私有制度办的工厂，别的工厂不是援助而是拆台，或拿把，是没有计划的生产，不是全国一盘棋；第七，别的什么也不建设，单单建设起一个汽车厂什么用也没有。国外不要，出不了口，国内不要，老百姓买不起。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工农业同时建设，齐头并进才需要汽车。这是全面的问题。"

每天上午学习，下午轮流做读书报告，把自己读书读报的心得挑出一段讲给大家听。晚上文娱活动，打扑克，下棋，这里的生活倒很有规律。

解放前我在长春照相馆照相，每次都把底版买回来，有时也忘了。有一张八寸半身相照得比较好，我的喽罗每人到照相馆洗了一张，叫我写上上下款，还在下款写上"关梦龄赠"。有一次在一个督察人员家中看到了我的这张照片。这样作在特务机关是不许可的。戴笠活着的时候，一向是不照相的，无论哪个训练班毕业，没有同学录，没有合影留念。戴笠从不把自己的相片送给人，我也从没有见过他的相片。有一次他与蒋介石在一起，中央社的记者把他照上了，事后他叫中央社把他的相取消，不准洗出来，这是他的习惯。可是 1945 年"九·三"胜利之后，他穿上中将服，便照起相来。1945 年 12 月 16 日，在北京和蒋介石于泰和殿前照了一张相片，出乎意外，照完相不久，1946 年 3 月 17 日，他就坐飞机摔死了。死后，就用这张中将制服的相片开了追悼会，否则，追悼会便不能摆照片，只能写灵牌了。1940 年华北日本特务机关和各伪满警察机关出了一张布告，缉获蓝衣社特务头子戴笠，如能缉获悬赏 20 万元，送信者可获 5 万元，可是没有相片，因为也说不出戴笠有什么特征，戴笠防范暗杀或发生意外，他自己杀人多了，也怕别人暗算他。

我在长春照相也是不合规定的。突围前我虽然把家中的许多相片都焚毁了，但是在各处的相片，各照相馆的底版都不能不到政府的手里。这张合影是从照相馆里找来的，我这样判断不会错。

4 月，周总理在政协做报告，号召台湾军政人员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回到大陆。我们几个人看到号召台湾军政人员起义的报道，心中十分愉快，认为台湾解放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我想台湾解放之后，军统局那些大小特务都要回到大陆，我见着他们可以帮助他们，做一个带路人。当然也有一些顽固的，比如那些叛徒，张国焘、谢利功、廖化平，他们怎么办呢？是流落国外？是回到大陆？还是投海自杀？我想这回解放台湾是不成问题的，如果台湾方面没有派人与人民政府接头，不会骤然发出这么一个号召，共产党不打无把握之仗。我想这回我不是 15 年的问题了，是出去干什么的问题了。想着想着，想入非非。如果不是叫我开饭，我都

忘了身在看守所。

没有事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就谈解放台湾的问题，都做了一些错误的估计。比如说台湾解放后，我们可以自由回家或政府给我们安排工作，甚至工作地位还不会低，明知这样估计不实际，但也没人反驳，何必叫大家扫兴呢。

每天我看不少书，写不少笔记，不间断写日记，认为马上就要出去，肚子里没有东西怎么办？毛主席关于农业发展的文件，一读再读，择重要的句子都能背诵下来。

过了“五·一”，韩科长叫我们在这个小院种花，美化环境。我对崔所长说：“少种花多种菜，花又不能吃。”

崔所长买了不少菜籽，也买了一些花籽，这个小院子有一亩多地。别的犯人都关在号里不能出来，只有我们9个人每天专心在院中活动。我们先翻地，只有李树桂说他在解放团干过，其余的人谁也不会干，我用铁锹还外行。9个人虽然累得腰酸腿疼，地翻得依然很浅。崔所长一看笑了。地翻完种上小白菜、芹菜、黄瓜、辣椒……院子空地种了百分之八十。韩科长一看，责怪起来：“唉呀，你们经济观点太严重了，多种点花院子好看，调节空气，夏天有菜吃。再挑空地方种花吧，别再种菜了。”

5月23日下午，韩科长召集我们9个人到大客厅，告诉我们明天要去沈阳，依旧嘱咐我们不要有什么顾虑，并特别指出：“在火车上要随便一些，不要拘束，带着扑克，在车上玩一玩。”我理解韩科长的意思，在火车上别叫人看出来是犯人，可以说笑，大大方方。如果在火车上一坐，9个人一动也不动，像木头人似的，别的乘客会以为这些人是聋哑院来的。韩科长想得很周到。

回到屋子，李树桂说：“如果到沈阳，可能每月还给零用钱，在解放团时，每月发5元钱，我看到沈阳如果入解放团也能发零用钱。”

我说：“每月这样的伙食，有3元钱零用，够买烟就行了。”

大家议论纷纷，猜测判断，我结论说：“反正越来越好，绝不会

越来越坏。”

这个结论，大家都同意。

收拾东西，心里不安静。这儿的环境很好，小白菜已露头了，书报杂志什么都有，这几位干部对我们也好，离开怪舍不得的。还有比这好的地方？我不敢想了。

韩科长叫我们都给家写封信，告诉离开了这里，将来到了沈阳再写信。我犹豫了一下，给我的女儿关棣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明天去沈阳。这样的信她接到也不会高兴，什么时候出去也不说，写信总是说“我很好”，“政府很宽大”，“不要惦念”，成了例行公事。把我的信拿出来一对照，除了日期不同，大致是一样的。我不愿写这种不能给她带来希望的信，这回写了是应酬政府，不然叫政府看我这样消极，与我所说乐观的改造不是相矛盾吗？

上灯的时候，先把张大光提出去，接着又把李树桂也提出去，我以为又是韩科长作个别谈话。我与尚传道整理书籍、包袱。过了半点多钟，他们回来了。他们说：“政府派汽车把我们的老婆孩子都接来，在办公室接见，随便谈了半点多钟！”

真想不到，张大光的老婆和两个孩子都来了，坐在会客室的沙发上，大人孩子说说笑笑，李所长给倒茶，叫他们多谈一会儿，像到亲戚家一样，真叫人感激得说不出话来。虽然我的家不在长春，可我同样感到共产党的温暖。我后悔我的家为什么没有在长春呢？

如果过去我们对人有点好处，一是把自己摆在前面，叫人家领我们的情，张张扬扬，那个样子真讨厌，而韩科长、李所长不多说，做出来的事，叫人一看心服口服。自然这一切是上级党指导他们办的。他们能完成党的指示。这可谓指导得好，办事办得也好。一般情况来说，起解前是不应当泄漏机密的，可是出乎人的意料，明天解往沈阳，今天就把家属接来了。并且畅所欲言，大人孩子都是笑着分手的。

上床之后，我思想很紊乱，想起在长春的一切，又憧憬着到沈阳的情形……

5 月 24 日，吃过早饭，一辆敞篷汽车拉着我们开往火车站。一位警察干部是这次列车的警卫负责人，他与我们一齐上了火车。

别了长春！在这住了八年半，这回分手了。我是 1947 年 11 月 24 日从沈阳乘飞机来的，这次是 1956 年 5 月 24 日乘火车走的。一来一往，个人和国家，甚至于世界都有了很大的变化。8 年半也不算一个短时间，人生一辈子能有几个 8 年半呢？这 8 年半的时间，比我过去 33 年的生活都重要，这 8 年半，给人民造成的危害最大，受到人民的宽大也较多。一方面痛恨自己，另一方面也感激共产党对我的不杀之恩。

在火车上，我打消这些想法，与大家说笑打扑克，政府买了不少糖果罐头。我们 9 个人在一起嘻嘻哈哈的谈着玩着。韩科长也参加进来，介绍沿途上的一些建筑物。这样随随便便，除了车上那个警察干部知道我们是犯人，别的乘客谁会知道我们是犯人呢？

下午 3 点，到了沈阳南站，下火车上汽车，辽宁公安厅的干部等候在火车站。行李另有人负责运输，这样轻松的出门，在过去也是很少的。汽车往北行驶，到了北陵附近的一条街道，进了一个院子，有大门，小门——明白了，还是看守所！

沈阳寄押

我们一一进屋，大高个李寓春、于泽霖、黄炳寰先进屋，我在最后面。我想干什么都要讲运气，按个高矮进屋，运气好进的那个屋子的犯人脾气好，没有个性，生活在一起就无问题；如果都是好吵，好闹的，“我说了算”的那一套，就够伤脑筋的，说不定与他吵起来犯错误。一切事情都有机会存在，这就是我的唯心想法。

我被叫到第 3 号监房，没有床都打地铺，小窗户像仓库的窗户，咳，这与吉林公安厅看守所差远了。屋内有 4 个人，右边第二个

铺位没有人住，露出了草垫子，不用说这是给我留的。我把鞋脱了坐在上面，这4个人事后知道是张国泰、姜明文、郑明新和李衍涛。我一坐下，他们都看我。从他们的惊异眼光里我意识到，怎么来了一个小孩？窃盗犯？不能，这些人都是少将以上的反动派，他的岁数也不对呀？他是干什么的？

我坐了一会儿，他们问我从哪来的？我告诉了他们。他们又问都有谁来？我也告诉了他们。接着他们问我年龄，我说："41岁。"他们说"没有"，"只不过30岁左右"，我笑了。

晚饭吃的高粱米，菜里有点肉，倒也挺好吃。饭后，我们又到看守所去登记。在那儿看到了韩科长，我们对韩科长说，这里不如长春。黄炳寰说："这里邮信要自己买邮票。"一句话，这里比不上长春。韩科长说："习惯就好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到院里运动，看到了陈旭东①。有许多人以为陈旭东与我一定认识，并且还有工作关系，可是我们俩仅见过一面，那是1945年"九·三"胜利之后，我在北京当"北平肃奸委员会"总务科科长。12月底有一天到机场去送人，遇到了陈旭东和他老婆，他们要飞锦州，有个张科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打了个招呼就分手了。以后再也没见面，工作上也没来往。到这以后，别人问我，我说见过，问他，他说忘了。今天早上一见，哈哈大笑，不成想在这会合了。我们这9个人与这里的人相识的不少，尤其东北籍的，讲武堂的多，旧同事也不少。

这里是辽宁公安厅看守所，我们这批反动派原来有30多人，前次走了一批，如李仙洲、卢浚泉等，据说到了北京。这里剩下21个人，加上我们共30人。这30人都是少将级和相当少将的反动派，走的那些是中将级的。

犯人见面，例行话题："判没判？""从哪来的？""那儿都有谁？""这里吃得怎样？""可不可以通信、买东西、接见？""哪个班长厉害？"没用两天一切都弄明白了。最后一致结论，这次集中是中央统一的命令，时间是1956年1月。集中之后一切物质照顾都是比较

好的。我们这些人的反动职务都是少将级，只有我是上校。因为是军统特务，所以上校也按少将对待。

关于处理的问题，大家都认为很快就会叫我们自由了。因为周总理最近号召台湾军政人员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实现祖国统一。这与我们都有关系。黄炳寰要给家写信，陈旭东说：“写什么信，不等你的信到家，你就到家了。这里的情况我熟悉，我在 1953 年从南京到这儿，我是这里的老犯人了。”

我一想，集中之前他便在这儿，集中之后他又没走，他知道的事情肯定多，他这样说也可能不是单纯的希望，一定有所根据，于是我也高兴起来，与陈旭东谈起来了，问了一些旧同事的下落，他告诉我：“袁晓轩也在这押过，沈阳站站长滕勉病在看守所，以后不知到哪去了，可能病死了。”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从南京跑到台湾去？”

他说：“不想走。”又说，“那一天，李宗仁的飞机在机场。我一寻思，不走不走吧，我没到机场，就留下了。”

问他“毛人凤给你任务了么？”他说：“没有。”既不走，又无任务，这不单等着送死吗？我也不好意思像审讯案子那样问他，算了，将来就会明白了。

因为都是从一个泥坑里来的人，职位又都差不多，所以提起一些人拐弯抹角的都认识。谈旧人旧事，形成了高潮。过去在长春监狱什么也不敢谈，到这里无禁忌畅所欲言。有一些人，如卢广绩在沈阳当了工商联副主任，任逖生在沈阳市当了政协委员，张政枋在沈阳当了省政协委员。人家都走对了路，自己还在押，心中颇不是味，自惭形秽。

我想，到这就能释放吗？干什么去呢？想了许多也没个头绪，最后这样结论：不用想，反正共产党给安排好了，到时候一切都有了。现在要办点货，充实一下，不然到社会上连话都不会说，那不是贻笑大方。

隔壁住了一个黄鹤[2]，年龄不大，说是傅作义那儿的少将。我

在傅作义那儿做了几年工作，上校以上的人没有不知道的，没听说有个黄鹤。也许1948年以后去的？有一个早上我问黄鹤："老黄！傅作义那儿你呆过？"

"啊，啊……"

"我有几个朋友你认识不？二处处长史弘、三处处长任兆同、副官处长黄记五，他们在北京没有？"

"我在外边，老不在家，不熟悉。"

我心想，在傅作义那儿不认识这三个人，就不能工作。胡说八道，冒充！再说，傅作义那儿的少将没有这样年轻的？解放前我嫌官小，被改造后嫌官大，可是黄鹤竟然在这里充少将，有意思。这内中有文章，有奥妙。

政府拿来登记表叫我们填。上面有社会关系，分在大陆的和台湾的。我们一看，这是释放前填的一张表，台湾的关系尤其重要。政府人员说，在台湾的关系，要写与你有重要关系的，能够听你的话或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一听，这是说叫他起义他能听，或者最低限度也能考虑一下你的意见。填这样的关系，我们不约而同都联想到台湾解放的问题上。填完了这张表，焦躁出监的思想发展到看不下书报，有一些人，如陈旭东、万厉、黄鹤，见人就说："快了，没有几天了。"这些话不讨厌，不能实现也没关系，他们的心是好的，属于"吉利话"的范畴之内。

又继续写材料，这里与吉林公安厅不同，了解材料的干部进不来，只能把提纲交一个干部送进来，要我写。每天都有，还不少。

到了7月，有一天事务长来到监房的仓库，叫我们把棉衣抱到院子晒一晒。于是我利用这个机会探问了一下，我把衣服抱出去，对事务长说："哎哟，这衣服冬天还能穿吗？"

"怎么不能穿？"

"领子都破了，露了棉花。"

"补一补，可以穿。"

这些棉袄冬天还要穿！这证明走不了了。接着又给我发了一

床崭新的红花棉被。

照理说，政府发东西我应当高兴，可是这回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些征兆说明，我们最近走不了，由此我又有了新的想法：不要妄想了，共产党不会轻易把我们这些人释放出去，安心吧，必须有个两年计划。再不要听陈旭东这些人瞎说了，他们是等着天上掉馅饼呢。

每天上午学习，看书报，每礼拜三合并讨论，大家发言。这天看到一组新闻图片，中国政府审讯日本战犯及溥仪在审讯时作证的图片，登在《人民画报》上。接着报纸刊载了释放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一千多人的消息。我们一看，议论起来了："日本战犯杀了我们那么多中国人，现在都成千的往回放，我们还是中国人呢，也该放了。"

我认为说得对，日本战犯是侵略中国的，而我们呢，与共产党并肩作战打过日本人。周总理在政协报告中，谈到台湾解放时也说过这个问题。后来，我们虽然反对共产党，杀了不少革命人士，可是比起日本战犯终究要好一些，现在他们都释放了，我们不是也应该释放吗？不是最近释放，但不会很久。

报纸上刊载了一些国民党的中、少将在各省政协上的发言；这些中、少将有的是起义将领，有的是进步人士。这些消息与解放台湾是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有人认为，我们出去也能当个政协委员。

在这儿仿佛是寄押，从来也没人找我谈话，学习与开会很少来人指导。领导我们学习的是一个普通干部，每天他虽然来此，但对具体问题从不作指示。比如我们漫谈埃及问题，有两种意见，有人认为事态可能扩大；另有人认为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英帝不敢动手。类似这样问题都是不了了之。因此学习收获不大。从这些我判断这里不是长久的改造场所。

有一天，我们到院中去拔草，听到事务长打电话，是请求对方给房子。他说："不行，不能将就呀！人太多住不下，请你们给想一想办法吧，要有学习的地方，只能住人还不行……"

找房子，还要搬家！这可麻烦了，既然要找房子，就不是个短期

间的改造。

董必武院长在政协上报告说，对反革命分子，除了民愤极大的处以死刑，一般不处死刑。我一想，今后枪毙人的事就少了，大概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肃清了，无须再像1951年那样，大规模的成百成百的枪毙。将来剔除死刑更有可能了。人民的觉悟高，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坏人藏不住，反革命分子活动不了，处刑尺度也要宽了。

从台湾到大陆的现行特务张毅，是上校专员，中统的。到了杭州他向人民政府自首了。政府对他无罪开释，并且给他安置在图书馆工作。我想，如果我在1948年10月不在吉林自首，也像张国卿、项迺光那样跑到台湾。到了台湾，受了使命再回到大陆，一自首，不也能像张毅一样？想到这里，认为张毅赶上好机会了。自己又一想，如果1948年逃跑，在途中被捕也就完了，那与陈牧一样，在四平抓着解回长春镇压了。过去的事不能后悔，悔之无益。进一步说，1948年我起义，把督察处政治犯都放出去，我率领亲信部下投到人民政府，那不比现在的张毅还强？这么想都是吃后悔药，不想想，1948年我能起义吗？有什么思想能支配我起义呢？不可能的事，想它干什么？人心不足蛇吞象。我比张毅不如，但我比陈牧等人还不是好到天上地下吗？不能比，也不应该比，一比就是不满现状。

8月初，天气热得不得了，白天准许把门打开见见风。这里的规定，每天监房门都要扣上，夜里上锁，白天小便，班长把门打开，回来再扣上。夜里小便也要报告班长，班长把锁头打开，这个屋子门响，那个屋的门也响，都去小便谁也睡不好。有一次，我对张所长说："屋里放一个尿桶，比较省事。"他说："太不卫生，空气也不好。"

天气热了，把门打开了，仍然是满身大汗，在屋光膀子，只穿一条小短裤，好在这里没有女干部，我们都很随便。天气一热，心又不定，很焦躁。

9月14日这天，12点已经过了还没有开饭。每天11点50分，厨房就送饭来，今天12点半还没来送饭，我说："好饭不怕晚，今天要改善，大家不要着急，好好等着吧。"我这是瞎说，但歪打正着，果

然改善伙食，到一点钟才开饭，炖小鸡，大米饭，鸡肉多得很。我心想，今天是 9 月 14 日，既不是星期日，又不是假日，为什么改善呢？吃完了饭，看守所叫我们到前面大审讯室。这个屋子我还是第一次到，屋子摆了 30 个椅子，前面有一个条桌，这时来了一个高个黑脸的干部，李科长介绍他是张处长。张处长告诉我们，要把我们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学习，明天就走。说那个地方比这儿好，到那儿要好好学习。接着叫大家谈谈感想。张禹斌等人发了言，认为把我们这些人送走不管了，希望张处长常到那个地方去对我们教育。这些不是思想话，仿佛旧社会的词令，听着不顺耳。接着又有个人发言，表示有一些顾虑。

张处长最后讲了一些话，没用发言稿，他说："改造不在说得好，要看做的如何，要言行一致。共产党不仅听你们说的，还要看你们实践，你们有的人无事找事，给老婆写信要离婚，这是什么意思呢？家人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呢？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我一听就知道是批评尚传道。尚传道到了辽宁公安厅之后，就认为自己快释放了，老婆在 1950 年要与他离婚，他没理。可是这次他认为自己出去讨个老婆不成问题，个性一发，给老婆写信离婚。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真是无事生非。

张处长又讲了一些话，犯人接着发言，我都没有仔细听。我想心事，5 月 24 日由长春到这住了不到 4 个月，又要往别处挪，真麻烦。从北满到南满，从南满又到哪去？估计不到了，到旅大？不能，那是海军基地；到辽阳？那个地方离千山不远了，如果在千山改造，那个地方风景很好，有龙泉寺、五佛顶、青云观……我幼年时去过……想了一会儿，没有理出头绪。

郑明新是 52 军副军长兼营口警备司令，住过解放团，他说："解放团还可以上街吃馆子，极随便，那里不叫犯人。能到解放团，真是解放了。"

我想，凭命由天，到哪也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干特务这行的谁也不相信。

9月15日早饭后，张处长、李科长，还有一些班长都来了，班长们帮我们往汽车上装东西。共两辆汽车，一辆卡车装行李和看押班长，另一辆有篷的汽车坐人。有篷汽车在前，卡车在后，张处长坐卡车。

汽车出东关，往东陵开，大家知道了：去抚顺！90里，不远。

抚顺距我原籍新宾二百里，我小的时候从新宾到沈阳，在抚顺要住一夜，那时叫千金寨。现在回忆起来，我仅能想出街上有大车店，几家小饭馆子，别的印象没有了。

汽车到了旧城，转了几条街停下了。这不是解放团，万历在抚顺住过，他一看大门，说道："怎么又到了监狱？"

①陈旭东：据第七批特赦国民党人员名单记："陈旭东　国民党军统局东北区少将副区长"，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记："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并交给军统囚禁，戴笠将张的旧部陈旭东、吴骞、王化一等也接收过来，安置在军统工作。"

尚传道等人称陈为"张学良的戴笠"。

②黄鹤：据舒靖南《春风化雨沐党恩》记："到了管理所以后，竟有人以小报大。例如黄鹤，沈阳附近人，曾在伪满军警界混事，填履历伪造国民党军181师参谋长，不料该师师长米文和也在所内，所方特让他俩见面，却互不相识。"舒与关梦龄的判断吻合。

第六章 感恩戴德

帝封官在这里集合

我们一看高高的灰砖墙，及墙上架设的电网，心里便凉了半截，这回又完了，折腾了几个月还是监狱的客。想起辽宁公安厅看守所事务长找房子，心里不由嘀咕起来：谁说城市里的房子不好找，这回找到了。不戴镣就是优待。一件事还未见分晓，就下了一个最坏的结论。这是怎么促成的？我一想是长春监狱的经验促成的，也是我不相信共产党促成的，是我职业特务神经过敏促成的。

张处长下汽车走进一个办公大楼，门前没有牌子，只有一个卫兵站岗。一会儿出来一个干部，叫汽车开到南边一个灰大门。我们在门外下了汽车，进院从北门走进走廊。编排姜明文、郑明新、黄炳寰、李衍涛、张国泰、赵广元和我住一个屋。进屋一看，室内很干净，床上放着 7 个行李，上面蒙着白床单，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一看既简朴又漂亮。4 个屋子，29 个人住，非常宽敞。我想这些东西一定是战士的，他们原来在这儿住，现在把房子让给我们，他们的东西没有来得及搬走。我对大家说："这是战士的行李，咱们不要坐，人

家一会儿要来搬的。”

大家谁也没敢碰，都坐在床板上。

值班的班长中等个，胖胖的，戴一个船型军帽，下士军衔，说话很和蔼，他说：“你们要洗脸就到那屋。”他往右边一指，我进去一看，里面有小澡堂子，还有洗脸池子，就是光线暗一些，房子太旧。

我对这位班长说：“屋内的行李什么时候搬走？”

我们整理完东西到走廊转了转，看到不少文娱用具，麻将、扑克、象棋……屋内还有书籍，这些书籍都是日文的。没有新书，没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可能另外还有图书室。

开饭专有一个屋子，第一顿饭吃得心满意足。饭后去洗澡，那一天是礼拜六，我们穿过几个小院子，到处是鲜花，五光十色，灿烂夺目，环境很幽美。我们经过几个改造机关都没有这样好的环境。洗澡回来，我向值班的班长报告：“可不可以唱戏？”这个班长说：“可以唱！”肖兆林私人有胡琴，拉了起来，我唱了两段，于泽霖也唱了两段。我感到这一天生活不坏，这里的环境很好。

上灯时，又换了一个班长，说话辽东庄河口音，他拿着纸烟问：“你们不吸烟吗？”

“我们没有烟，我们都想吸烟，我们有钱可以买。”

这位班长说着就走了，不一会拿了 15 条纸烟，告诉每人 5 盒，还有不吸烟的，剩了一些，又退回去了。我们把纸烟吸上了，那种高兴劲头真是难以形容，这 5 盒纸烟要比中午吃炖鸡，晚上吃包子都好。黄鹤说：“有了纸烟，我什么都不愁了，再多改造一个时期也没问题。”

晚上躺在床上，我想了半天，这是什么地方呢？说是公安机关吧，班长穿着解放军的服装；说是解放军的机构吧，我们这些人应当归公安部门改造。看这种情形，这个机关不是新成立的。想想也好笑，来了一天又吃又喝，却不知是在什么地方。

第三天 9 点多钟的时候来了一个军官，上尉肩章，戴着近视眼镜，很白的脸，右手拿一个红日记本。他问我们吃饭了没有？生活

怎么样？一边走一边谈。大家要求写信，我是不想写信的，既然有人要求写信，我就可以利用这件事，知道这是什么机关。这位上尉说可以写信。

我便很自然地问："回信寄到什么地方呢？"

"回信寄到'抚顺市抚顺城管理所'。"

我一听管理所？这是什么管理所？国民党有日侨管理所。来到这儿看到一些日本人看的书，难道真是日侨管理所？不对，我们这些人不能住到日侨管理所。又一想，既然是管理所，就要接受管理。也不错，不是监狱。这样好的生活环境叫什么名词关系不大，从这个名词上看这个机关不是永久性的，带有临时性质。管理所隶属于什么部门呢？也不知道。不过，我自信这些问题以后逐渐就会知道的。

这位上尉把在沈阳担任组长的张禹斌、高青山、欧阳午[①]、姜明文找去，指示了一些生活制度，叫他们四个继续担任组长。

我问张禹斌，这个上尉是什么人？张禹斌带着十分神秘的样子说："不能问。"我心想，没有几天就能知道。看这位上尉的身体不像部队上的指挥员，一定是做政工搞内勤的，每天写东西，看东西，把眼睛都累近视了，身体也不怎么健壮，可能是指导员吧？

当天漫谈到这里的感觉，大家一致感谢政府对我们生活的照顾，至于有什么顾虑都没有谈，比如这个院墙上有电网，东南角上有岗楼，西南角上也有岗楼，岗楼上白天晚上站着手拿武器的战士。真是有点戒备森严，唯恐我们逃跑。再如，这里虽然吃得好，但是近期我们走不了，长期监押也不乐观。这些想法谁也没谈，只谈了一些正面认识，还有一些要求，如请求看电影等等。

正在漫谈的时候，一位年龄较大，穿古铜色制服的干部来到会场，进屋站了几分钟，问道："谁叫陈旭东？"口气很严肃。

"我叫陈旭东。"陈旭东站起来又坐下。

"陈旭东，我知道你有两下子，你试试吧！"只说了这么几句话这位干部就走了。我认为这是给陈旭东一个警告，因为陈旭东在辽

宁公安厅看守所反省时，不断与看守班长、事务长耍态度，不服管教。这次张处长把我们送到这里，那些问题一定随着材料带过来了。这里的负责人先给陈旭东来个“下马威”，叫他老实点。这几句话不算多，但分量还是相当重的。不知道陈旭东怎么体会？我认为这是辽宁公安厅对陈旭东的鉴定，由这里的负责人把它说出来了。我一想老老实实吧，别给我也来个警告，受不了。

上午阅读文件、报纸。吃完中饭，到院子打排球、打网球，一打就到下午4点，玩个痛快。这段时期，除了上午学习，大部分时间是玩，真正是吃得好，玩得好，没有几天身体就好起来，感到胖了。

于泽霖跟我学俄文，我在1950年于长春公安局学习过一年俄文，粗浅的知道一些，写有两本俄文抄本。经班长同意，每天晚上6点半到7点半，我教于泽霖一小时俄文。我也有个想法，我教他事先我也得好好准备，于泽霖这个人懂得不少，不能叫他不信任我这个老师，这也算是教学相长吧。再说，这也是需要。国民党时期学英文，伪满时期学日文，反动派依靠美国，不会英文爬不上去；日伪时期不会日文，在东北无法工作；现在呢，共产党一切都是以苏联的马首是瞻，如果不会几句俄文那多不时髦呵！居于这个想法我要把俄文温习一下。

一个下午，叫我们到医务室去检查身体。我体重117斤，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重，全身没毛病，只有眼睛近视。眼科医生给我配镜子，我是近视170度。我说：“我的近视不严重，用不着配镜子。”这位医生（后来知道是外请的）说：“近视戴上镜子还好一些，不然越来越深。”我一听，配一副吧。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配镜子。如果我自己安排生活，也不一定非要配镜子，这是政府的意思，心里感到这样照顾太费钱了。我联想到国民党时期，不用说对政治犯，就是陆军大学那样的高级军事学校，蒋介石最宠爱的学员，也没有给配过眼镜，其他机关更谈不到了。

在医务室的另一间屋里有一张镶牙的大靠椅。我高兴极了，我唯一的缺陷就是掉了几颗大牙，吃饭困难。这回如果能给我镶上

牙，我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个希望我认为不久就会实现。

我打网球，一打就是3个小时，别人换我不换。有一天，一把拍子不光滑，把我右手磨破了。打完球回来被当班的孙班长看见，他问我怎么样？我说没有关系。不一会儿外面有人喊："谁的手破了？"我跑出去一看，一位高个儿女护士端着药盘子在走廊站着。我走上前去，她把药盘子放在桌上，先给我把破皮那块儿洗干净，然后抹上红药水，又撒了一点药面，最后用药布包好，贴上橡皮膏，十分的耐心。临走还告诉我："先不要沾水。"我感到真是不应该，手破了块皮，偏叫孙班长看见了，找来护士，又上药又包扎，真过意不去。肯定的说，我的孩子的手破了这么一小块，我绝不会领他到医院去治疗；我自己的手破了这么一点儿皮，也不会找人给我上药包扎；我幼年的时候手脚脸常破皮，我的父亲从不管这些事。现在破一块皮，政府却派来一个护士给我上药，自己那么大的罪恶真是受之有愧，我对大家说："以后注意吧，什么事叫政府知道，就会给政府添麻烦，生活上的事不要再有要求了，这已经超过了我们的希望。"

快过国庆节的时候，我同高青山、张禹斌等人说："我们应该组织个国庆节的小型晚会。"大家都同意。我编了一个相声，李树桂准备了三套魔术，大家又准备了几个歌子，到时候再讲几个故事或笑话。相声稿子拿上去，批准可以演。过了两天，崔科员来了，问我们要买什么乐器？我们开了一个单子：买一套锣鼓、一把京胡、二把二胡、一支唢呐。李衍涛说他会弹三弦，单子开走，以为不知哪天才能买得来，想不到不到两个小时东西就买来了！属三弦最贵，40元钱，交给李衍涛一弹，他不会。大家说把三弦退回去吧，崔科员说不用退了，留着以后用吧。大家认为李衍涛这个人成问题，他可能认为这些东西政府不一定能给买，随便多说一件也没关系，不成想，一会儿就买来了，这使李衍涛发窘了。也给他一个教育，他认为政府不能办的事，恰恰立刻就办了。有了锣鼓，每天晚上肖兆林领着李仲章、万厉、郑明新几个人练京剧锣鼓，晚上电灯一亮，锣鼓喧天，显得十分热闹。

在将近国庆节的一天晚上，看电影《马兰花开》。孙班长把故事的梗概交给我们，由刘荣第念给大家听。过去在监狱一年也看几次电影，到这儿还是第一次，大家都很高兴。

俱乐部里有日本人，有中国人，中国人坐在进门的左首，日本人坐在中间，我们进去坐在右首。陈旭东说："那个高个儿，戴近视眼镜的是溥仪，还有佟衡，他是汉奸！"

我们的脚步踟蹰了。我一看这是三个类型：日本帝国主义战犯，溥仪及其奴才封建主义的余孽，我们这 29 人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派，这是人民的三大敌人。帝、封、官，今天在这里集合。有意思！我想，就这屋里的人来说，过去一句话、一个手令，会使千万人的生命死亡，千万顷良田荒芜。过去都是大马金刀的太上皇，现在都老老实实地坐在这里改造。这是人民的伟大胜利，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战胜了三大敌人的结果。我于是又想起在长春公安厅看守所时，一个政府干部对我说："溥仪还要学习呢！"不错"溥仪还要学习"，还要加上一句：我与溥仪在一个管理所学习。人，这种活的动物真不可思议，我这个人怎么能与溥仪联系在一起呢？

看完电影，大家议论起这些汉奸。陈旭东认识的有，刘荣第认识的也有，张禹斌认识张焕相，我也认识一些汉奸，但没看清来看电影没有。比如我的中学校长韦焕章，我的三舅王庆璋，我盟兄弟臧锤的父亲臧式毅，我的亲戚张焕相等。这些人今天见着也不认识了，我那时才十几岁。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更不能认识我。

自找麻烦

一天，姜明文告诉我："注意，说话得留神，有人很积极，左一个报告，右一个报告，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多情况？"

我很不满意张禹斌。这个人说起来还是我父亲的同事。1928

年他在东北航空军当过航空队的中校队长，我父亲是少校副官主任。后来因为吸鸦片，张焕相一到东北空军便把张禹斌开除了。以后不知怎么又参加了国民党，这回集中了才知道他原名叫张文焕，也不知在什么时间改成了张禹斌。到这以后我也发现他假积极。他所在的第4号正对着班长的办公桌，他每天当着班长的面，一定要做一些给班长看的工作。比如教万历学文件，每天在走廊站队，报告班长；到院子又站队，又报告班长。这些繁琐的报告，用不着的手续实在麻烦。一共29个人，左一个报告，右一个报告，报告多少次也是29个人。

因为张禹斌搞的这些麻烦，国庆节前我给政府写了一个报告，建议撤换张禹斌的组长，推荐李仲章当第四组的组长，并说站队、报告次数太多没有必要。这个报告写了5页，交给了班长。

一个下午，那个上尉来了，找我与刘荣第。见面之后，先问一些生活情况，接着叫我们写外调的证明材料。我还记得到这儿写的第一个材料是丁燕萍的材料，他是60军督察组的特务。由这开始写社会各机关索要的证明材料。

今年的中秋节与国庆节差不了几天，有人想在中秋节买一些吃的，政府指示，不用你们自己买，政府会按照人民的风俗进行准备。纸烟没有了，我在9月30日只剩下两支烟，判断下午可以发烟，可是我失望了，纸烟没发下来。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周年。早饭后，上尉来了，今天他没穿军服，而是穿了一件灰色制服，一条米色的西服裤子，戴一顶便帽，他在走廊里说："你们准备一下，一会儿去市里观礼！"

大家听到观礼鼓起掌来。每个人都把衣服整理了一下，从长春来的穿蓝布制服，从沈阳来的穿黑布制服。在门口又遇到了在俱乐部里见过的那些人，他们坐两部汽车，我们坐一部汽车，一起开往抚顺市车站。车站广场有临时的观礼台，我们被安排在观礼台的左首，那里事先摆了不少椅子，我们被引到座位坐下。不一会儿大会开始，主席讲过话开始游行。抚顺是一个煤矿都市，想不到也这么

热闹，在游行队伍中有这么多矿区，这么多学校，这么多的机关以及无数的工人和居民，真了不起！过去千金寨的痕迹找不到了，抚顺市的建设日新月异，天天在变，我从内心感到共产党有办法，不佩服是顽固蛋，那是不正视事实。

参观回来吃饺子，又发了苹果和月饼，但是没发纸烟，大多数吸烟的人感到什么都好，就是少一件东西，心中很空虚。

有人说："早知道只发5盒烟我就不吸了，把烟瘾勾上来，又不发了，唉，不发不发吧。"

这是怎么回事？政府许多钱都花了，还在乎这几盒烟钱？这其中必有原因，恐怕不是钱的问题，而是防火问题，这个问题在人员集中的地方是比较重要的问题。有许多问题看上去是无所谓的小事，可是反映在我们身上却成了重要事项。吸烟就是一个例子，黄鹤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烟头，卷上纸抽了起来，这个烟头也成了大家争抢的对象，你一口，我一口，感到别有滋味儿。

晚上举行晚会，我与李树桂说了一段相声，又与他变了几出戏法，接着大家讲笑话，我表演了"学女人说话"。

节后的一个上午，崔科员把我们叫到图书室，人到齐了，崔科员对我们说："等一会儿吕科长给你们讲话。"

就是那个上尉，他就是吕科长。我们鼓了一阵掌，他讲话了，真想不到是批评我！他说："你们来了这些日子，许多人能遵守纪律，努力学习，但是有人不怎么好，竟想替政府执政！要换这个组长，要换那个组长；对站队也抵触，站一站队又妨碍你们什么了？这样的人太不自量，不能正确认识自己。"

我一听是我反映的情况，是我提出了一些建议，到头来说我太不自量。好了，以后一言不发。

开完会叫大家检查这些日子遵守生活制度的情况，郭树人站起来说："我们2号房子，早晨倒尿桶没人去，我提议抓阄儿，谁抓着阄儿谁就倒尿桶，这种做法是劳动态度不好的表现……"我一听几乎笑出声来，低着头憋回去了。怎么想到用这个办法？他们那一

屋子的人都成问题，特别是段克文与陈燕茂，他们都经过了劳动改造，这么一点活就要抓阄，太不对了。

以后又分组检讨生活问题。我没有在小组会上谈自己的问题，而是背地问吕科长："报告科长，我那个问题写一份检讨书吧？"

吕科长说："你看吧，写一份也可以。"

我写了一份检讨书，检讨对政府规定的生活制度不满，归结到不认罪上面。

大家背地说："谁要替政府执政？又要换这个换那个的，真是吃饱了饭没事干，胡说八道，牛肉吃多了，撑的。"

我也跟着说："真是无聊，也不照照镜子，自己干嘛吃的都忘了，洗脸盆扎猛子，不知深浅！"

自己一想，到这以后我先挨顿批评，材料口袋里先装了一份检讨，带了这个头儿心中不好受，先入为主，第一个便是坏印象，人家是长时期不会忘记的。

1942 年在西安军统局的"西安查干班"受训，一个大队长对我们讲"切记，不为天下先"，这句话当时我认为不对，可是现在我认为对了。由此可以得出教训，少说为妙，不说更好，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受了批评以后精神不愉快。有一天，孙班长拿了一个小纸条子，叫我与刘荣第换地方。29 个人只对调我们二人。刘荣第在这表现得不错，调动不会有什么想法，我呢，犯了错误调动，心中十分抵触。调吧，不调是不行的，什么原因也问不得。从 3 号搬到 4 号，这号的组长是张禹斌，正是我建议换的组长，我想这一定是吕科长的布置：关梦龄你不是反对张禹斌吗？好，这回就把你调到他那个组！看看你还反对不？反对一个组长得到这么一个结果，今后我一定要小心克制。这件事还在发展，不能再犯错误。我有了戒心，谨言慎行，感到在这里有了压力，精神上不舒展了。

这里的伙食比长春、沈阳都好，这里什么都能吃到，包子、饺子、面条、米饭……随便吃，吃得好。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人认为政

府这样照顾我们，是因为我们过去“官大”，不然为什么这样呢？存在这种思想的有陈旭东。高青山写墙报不指名批评了陈旭东等人，我替高青山抄的墙报稿子。我认为陈旭东这些人还没有认识到这是共产党人道主义的具体反映，有了这些物质基础，才能谈到加速改造。说因为我们“官大”才吃好的，这实在是肤浅得很，也很庸俗。

我们29人都有急躁出监的想法，来到这里以后，这种想法并没有彻底清除。可是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能否出监就成了疑问。我认为匈牙利事件使我们出监的想法落空。在匈牙利问题上背后虽有谈论，也怕给反映上去，所以，说话时也是造句修辞，特别小心。这时的思想是混乱的，加之到抚顺不久还不知道如何发落，每个人都各怀心腹事。

11月下旬的一天上午，班长叫我们把条凳摆在走廊，又摆了两张桌子。这样一摆，大家知道要开会，开什么会呢？我们都没有经验，无法猜测。过了半点钟，吕科长与崔科员陪着一个少校来了，他微高的个，戴着眼镜，风度很大方。他一进来，我们都站起来了，吕科长叫我们坐下。这位少校看了一看我们，没有说什么。吕科长说：“现在开个漫谈会，每个人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谈谈，不要有什么顾虑……”

接着这位少校说道：“我们要听听你们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可以大胆地谈……”

启发我们暴露思想，特别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我谈不谈呢？谈出来是不是又要有麻烦？这可要考虑一下，不能冒失，看看风头再说。这时有人举手了，第一个发言的是谁我忘记了，谈得文不对题。我一看，不发言，不暴露思想，都是不对的。我举手发言，吕科长准许我发言。我起来干脆地说出：“匈牙利事件发生，苏联派去了军队，如果美帝也派去侵略军，事态就要扩大，第三次大战可能爆发，中国就不会袖手旁观。这么一来，我们自由的可能完全没有了。这是我的错误想法，国际紧张，共产党不会释放我们。”

接着有一些人也发了言，真正大胆的，如实的暴露思想的为数

不多，最后张禹斌发言，这已经是下午3点钟了，张禹斌在我的右边，戴上花镜，拿起笔记本，一边说话一边左右走，仿佛在学校里讲课一样，他讲的话使我忍不住笑起来，“而且……但是……不能不这样认识，为什么呢？就是说美帝想要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加一个楔子，什么叫楔子呢？就是一块木头劈一个口子，往这个口子里再加一块木头，这就叫楔子。因此我认为，当然不可避免的……在现在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里有反对的必要……”他讲到了哲学、道学……我心里明白，他不是给我们讲，他是给吕科长及这位少校讲呢，是卖弄自己的“学问渊博”，他讲到快5点了才讲完，他完全没有理会吕科长及这位少校几次看表的情况，我们听烦了，感到讨厌了。他讲完之后，吕科长说：“张禹斌讲了一个多钟头。”别的话没有说，这个会就散了。

我心想，如果与张禹斌有仇，给他出这么个主意，在现在的环境里就是一个很好的报复，他真是愚蠢。

孙所长[②]召集学习组长去开会，了解一下思想，谈到吸烟的问题，孙所长对学习组长说：“你们已经多年不吸烟了，你们来的那天，他们没有报告我就给你们发了烟，后来我知道了，认为你们既然不吸了，对身体有好处，就不必再发烟了。这不是政府舍不得几盒烟钱，是为你们的健康着想，你们就不必再吸了。”学习组长回来一传达，我同意孙所长的意见。吸烟每天早上要咳很多痰，强迫不吸烟也好，最好都不吸，但是有忍不住的，黄鹤与段克文到七所日本战犯的垃圾堆去拣烟头，回来偷着吸，在厕所吸，大家一反映，于是一天上午把我们29个人召集到图书室，专门谈吸烟问题，问谁还要吸烟？一举手有十多个人，我一想他们吸，我不吸也忍不住，我也把手举起来了，一共有18个人。吕科长一看，说道：“既然你们都戒不了，政府再发给你们烟。”这样，又吸上烟。不过这次发的是烟末，还发了一些卷烟纸，无论什么烟，总是解决了问题，于是我又吸上了烟。政府明知吸烟对我们身体有害，可是不发我们不高兴，也只好发给我们。政府在可能的范围内迁就我们，主要是有利于我们

改造，我认为离开改造我们的主题，管理所的工作是没有意义的。

12 月 4 日上午，集合到大俱乐部。有我们 29 人，有汉奸 56 人，张焕相年龄比较大，内中还有 30 多岁的汉奸。1945 年"九·三"胜利，才 20 几岁，在伪满做什么官呢？伪满的官也讲出身、年资，不能乱来。这些小汉奸过去与溥仪一朝为官，现在又在一起改造，可谓全始全终。

我想看看有没有熟人，看不清。这时吕科长同前天那个少校，陪着那位年龄较大的干部来到大俱乐部，少校说："今天由孙所长给你们做报告。"

他是孙所长，就是来所不久警告陈旭东的那个干部！孙所长上了讲台，大家鼓掌。他手中拿着讲话底稿，先讲目前形势，后讲学习问题，最后讲日本战犯改造的情况。讲话中谈到苏波问题、匈牙利事件……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台湾和平解放很有可能……"并且批判了国际局势紧张就不能释放的想法，又说："只要你们改造好，我们可以呈报有关机关把你们开释。"这些话我都记住了，他还透露了："韦焕章顽固，要帮助他，但是有病也要给他治，张景惠也没有放，反动派的报纸造谣说张景惠被处死了，这些都是谣言……"

孙所长又说："我的脾气不好，有时性子急……"我认为孙所长的确性子急，在对待陈旭东的那个问题上看得出来。

最后他说："我希望你们早日改造好，我不愿意总给你们当校长！"

这番话使我们听起来非常入耳，既有希望也有勉励。他讲话的时候，有时照稿子念，有时脱稿子说，举些例子也很生动，讲到下午 4 时还没讲完，叫我们回来，明天再讲。

第二天，12 月 5 日上午，又集合到俱乐部，先由吕科长介绍："今天孙所长有事，由金科长接着做报告。"

这位少校就是金科长[3]，他接着昨天孙所长的讲话，今天讲的是日本战犯改造的情况。

日本战犯集中到这里，开始每天呼"天皇万岁"的口号，后来，他们不但不呼"天皇万岁"，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经过180度的转变，憎恨日本军国主义。他们交待了在中国土地上所犯的一切罪行。参观中见着中国的老大娘、老大爷，跪下痛哭，控诉自己，感到过去做了许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情。他们认为这些政府工作人员是毛主席派来的最好的工作人员。有一次，在院中打球，一个战犯把窗户玻璃打碎了，这个时候政府工作人员问这个人伤没伤着？是不是有思想负担，精神溜号了？加以安慰。这个战犯很受感动，他说："如果在日本，遇见这种事，一定要把打碎玻璃的人打一顿，是绝不会予以安慰的。"这些事例都说明了这里的工作水平。

金科长讲了两个小时。大家对日本战犯的转变感到很不容易，我认为，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从小就受军国主义教育，认为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对日本天皇的崇拜无以复加，改造他们的工作既艰巨，又细微，不简单哪。同时又想，这样一来我们最近绝对出不去了。

李寓春有肺病，吃流食，每天早晨喝牛奶，吃饼干。一天早上他在饭厅喝牛奶，他要我吃了几块饼干，我边吃边说："在家也难吃上这样的早点，政府太照顾咱们了，如果把咱们惯坏了，出去看什么也不如这好，那就麻烦了。"

"我已经向班长报告了，我不用吃流食，这里的主副食都很好，营养已经够了。"

"不要拒绝，医生有一定的标准，只要对你身体好，改造好，政府是不计较这几个钱的，我们只感激还不够，还要变成行动呀。"

"没有问题，虽然我有肺病，政府什么号召我都响应，绝不落后。"

李寓春表示得很坚决，接着又说："所长这个报告，我听得明明白白，改造不好，什么也谈不到，现在就是要安心改造。"

看来所长的报告在我们中间发生了作用，侥幸出监当政协委员的想法都抛到垃圾箱里了。

像在朋友家中做客

12月7日，发现了一个新情况，那间大玻璃窗户的屋子，骤然搬进来许多人，每天我们倒尿桶都倒在南墙根的下水道，看到那屋子是空的，可是今天来人了！大家议论开来，得不到一个答案。

12月8日早饭后，政府宣布刘荣第为生活大组长，高青山协助，叫我们往4所搬家。这回把我调到姜明文这一组。孙班长念名次，我们这屋有姜明文、李衍涛、赵广元、张国泰、黄炳寰、杨文泉、王光复、刘荣第和我。我把东西搬到4所71号，最北边把门。在4所看到许多穿蓝棉袄的人，是哪来的？不是汉奸，有人认识，也是我们这样的反动派。

在我们对门70号，有欧阳午、张禹斌等人，他们两个都是原来的生活组长，新组只能有一个继续担任生活组长，他们问孙班长怎么办？孙班长指示："你们选举吧。"这屋子有段克文、万ළ、陈燕茂、郑明新、王建民、黄鹤、张大光、张禹斌和欧阳午，选举结果，赞成张禹斌的是4票，赞成欧阳午的是3票，票数一发表，大家认为生活组长的问题已盖棺定论。

欧阳午，大家与他开玩笑叫他"欧阳牛"，我叫他"小牛"，因为我长得矮，他叫我"小崽子"。票数一发表，欧阳午失望了，当时大家认为欧阳午改造的不如张禹斌。如段克文就反对欧阳午，认为欧阳午在生活上好嘀咕。欧阳午没当上生活组长，段克文等人非常高兴。这时欧阳午找我说："咱们改造的不好，人家反对，我当生活组长也不行，态度不好。"

"小牛啊，你的生活组长我负责，我保险。别说还有3票赞成，就是一票赞成你也换不下来，这若是旧社会，我给你活动一下，你就得请客，今天不开玩笑，70室生活组长一定是你欧阳午。"

“孙班长叫选举嘛，选举出来还能变化？”

“什么选举？没有人民立场的选举，没有是非的选举，不算！这是政府对你们这些人的一个考试，结果 4 个人不及格，张禹斌的生活组长是他自己撤掉了，不是别人撤的。”

“怎么回事？”

“在 11 月底那个暴露思想的会上，有金科长和吕科长在场主持，张禹斌做了一点多钟的总结性报告，这就决定了今天的生活组长不是他，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快吃晚饭的时候，刘荣第把 70 室选举的情形，经过，报告了孙班长，晚饭后，孙班长到 70 室门口宣布：“这屋的生活组长由欧阳午担任！”

事后，欧阳午对我说：“小崽子，你真行啊！”

“不是我行，是你们那屋的人看不出来问题。”

搬到 4 所之后，我们这 29 个人，占了 6 个房子，3 个房子住人，一个房子食堂，两个房子搞文娱，洗漱室没有了，不如一所宽绰了。

那些穿蓝棉袄的人是从南京来的，有一百多人。他们有很多错误思想，有人认为到东北是下关东，地方苦，天气冷，到东北等于逃荒；一进大门看到院墙，电网和岗楼，认为是住进了牢狱，长期羁押，再也不能回关内了……千奇百怪的想法，在小组会上，在背地里传播着。他们的思想在浮动，不知到这里是怎么回事。

过了九天，武汉又来了一批人，有八九十人，这批人住在 3 所，他们的包裹很多，还有许多捆行李的绳子。孙班长叫我们去几个人把他们这些东西搬到仓库。在搬东西时，我发现每个包袱都有名字，我仔细的看看有没有熟人，便看到了“陈烈新”的名字，我回头告诉陈旭东：“烈新也来了(陈旭东有个叔伯弟弟叫陈烈新，在长春团管区当副司令)，在 3 所呢，他怎么到了南方？真想不到。”

“我没看见烈新，我看见鲍志鸿和黄康永了，一定还有熟人。”

武汉来的人在院中谈话，有人说：“这个地方好冷呀，受不了，

改造是越来越苦，生活制度越来越紧。”

不几天又从北京来了一批人，有 30 人左右。这么一来，3、4 所[④]共有二百多人。这个老熟人，那个旧同事，猜测这个，判断那个，讲起来思想又波动了。

我认为把这些反动派都集合到这个地方，是因为这个地方既有改造经验，又有良好的环境，有利于改造，这是好的一方面；不好的方面是最近别想走。

这些日子吕科长不到我们这里来了，天天呆在南京来的人那里，找这个谈，找那个谈，我心想，二百来人，做管教工作的可要操心啊。这使我想起前几天崔科员找我谈话：“王庆璋你认识吗？”

“认识，他是我三舅。”

“你知道王庆璋的家属在哪儿？”

“不知道。”

我感到愕然，政府怎么知道我认识王庆璋呢？王庆璋不可能认识我呀。

崔科员接着说：“政府要给你三舅找家属，不知道他家属到哪去了，你可以提供一下线索吗？”

“我只知道他在‘九・一八’事变时，住在沈阳大东关二署南胡同。在长春我到过他的住址，但没见到人。刘荣第认识我的表弟，王庆璋的儿子与他是朋友，回来叫刘荣第提供一些材料吧。”

政府给汉奸代找亲属，这样可以使他们减少家庭负担，好好改造。哎哟，这真是用心良苦。

回想 1945 年“八・一五”光复后，戴笠在北京亲自主持“肃奸”。把汉奸逮捕，派特务和警察在汉奸家中驻守。有的把汉奸的小老婆给奸污了，有的把汉奸的女儿强奸了，今天到汉奸家中拉沙发，明天到汉奸家中“借”车子，我就派了许多小特务到汉奸家中去“借东西”，给戴笠布置客厅。汉奸被押，对其家属设法敲诈。汉奸一人犯罪，全家跟之受辱，这些情况我是耳闻目睹说不完的。看看共产党对汉奸的家属、我们的家属的照顾，我感到十分惭愧。做管

教工作不容易，在理论上要有较高的水平才能深入浅出的说服我们；在态度上要有托儿所阿姨的耐心，才能使我们感到温暖；在待人接物上要有平易近人的作风，才能不使我们害怕，敢于暴露思想。党的方针政策是通过这些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管教人员的言行表达出来的。作为我们要从管教人员那里吸取党对我们改造的精神食粮，依据管教人员的言行，作为将来重作新人的榜样。管教人员代表着党，代表着政府对我们实施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改造政策。改造工作相当光荣，但也是非常艰巨的。12 月中旬我们便停止了学习，准备文娱节目在新年演出。我是这 29 个人选出来负责文娱的，我们准备了一个话剧《向真理低头》，还有相声、双簧、快板、京剧清唱、魔术、二人转等，每天都在排练，心里不想更多的事。

有一天，我们几个人打扫院子，在一所的窗户下边，我发现了一只被黄鼠狼咬死的老母鸡。这只鸡挺肥，还可以吃。从这件小事，我知道我们的生活相当好，每次吃鸡肉，每人一碗，全所吃一次鸡要有几百只，所以丢一只两只无所谓，如果小人家丢了一只鸡那还得了。因为吃得好，我不馋了。

每天晚上屋里放来暖气，外边飘着鹅毛大雪，零下 20 多度的气候，我们在屋里穿不住棉袄，真是室暖如春。拿着纸烟，喝着开水，想想过去那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摇摇头心内不安。

1950 年，《人民日报》刊载一篇阎慰冰追悼她父亲阎朴的文章。她父亲是共产党员，在革命根据地作过经济部长，长期革命积劳成疾，1950 年在北京医院病死。她追述阎朴的艰苦革命精神，真是令人感动，文章里的主要感人之处是：

“作为我的同志、我的老师、我的父亲，你在人民需要你的时候死去了，我为失去了一个好同志而感到难过。

“在长征的时候，父亲把自己的乘马给有病的同志乘用，组织上照顾他多病的身体，发给他的物资和钱，他转给别的同志，他关心别人，胜似关心自己。他看到别的同志有病着急，但是他忘了自己也有病。

“我父亲出身一个地主家庭，是三少爷。我父亲参加革命以后，每年放暑假回家的时候，一些贫苦的老乡都来找我父亲，他们都是含着眼泪来，带着笑脸回去。我父亲同情他们，帮助他们，给他们解决一些困难问题。

“有一次被匪保卫团追捕，我父亲躲到山上一个洞里，一个好心的老奶奶给我父亲送来鸡蛋和一些上供用的供品，老奶奶说：‘三少爷！你有肉吃，有绸子穿，你为什么要这样担惊受怕干这些事？’父亲说：‘老奶奶，我不是为我一个人吃肉，穿绸子，我是为全国劳苦大众都穿上绸子，吃上肉。’老奶奶听了，点点头说，世界上竟有这样好的人！

“1950年在北京医院卧病的时候，组织上照顾给雇用了特别护士，父亲拒绝了。父亲问我住这样的医院，一天要多少斤小米，今年年成好不好。在病床上，他强烈地希望回到江南，看看那个老奶奶还在不在？看看江南的劳苦大众翻身后的生活。父亲没有看到这些，没有看到五星红旗在江南上空飘扬，就与我们永别了……”

这篇文章，我常常回忆起来，使我对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十分敬佩。

过新年的前夕，发给我们一些苹果、糖块。我们的文娱演出博得了全所好评。我与段克文说的相声是我编的，内容是批判教条主义，名为《学习》。南京来的人说：“他们过去一定是说相声的。”

一所汉奸演的剧叫《从黑暗走向光明》，反映在管理所的改造生活。有一个叫任广福的汉奸，痛哭流涕地说（演员的台词）：“我们这一群丧心病狂的卖国贼，人所痛恨的汉奸，在解放后，人民没有杀我们，还给予我们这样人道主义的改造照顾……我们过去喝劳苦大众的血。现在，人民的功臣，政府的干部，把自己的血输给我们！使我们得以复生，共产党就是我们再生的父母……”我们都流下了眼泪。心想，旧社会住监狱，是看守人员勒索敲诈犯人，辱骂拷打犯人，有病不给看，还希望病人死。死后可以把犯人的东西贪污。今天，管理所的干部给汉奸输血！如果不到这里来，真无法相信。这

个剧大家都受了感动，有的说："政府把心都掏给我们了，如果再不相信政府的话，就不是人！"我心想，1957 年的新年文娱活动既娱乐了，又受到了教育。过了新年，大家兴致勃勃地迎接到抚顺的第一个春节。

这时从武汉、南京来的人已感到冷并不可怕。他们没来之时，有人说东北天气冷，小便要用小棍敲，不然马上就得冻。可是到了这里，室外虽然零下 20 多度，但屋里放暖气温暖如春，于是对冷的恐惧消失了。

由于来了这么多的人，相互认识的老朋友、旧同事都见了面，虽然没有说话，但是心照不宣。这些人中，我只认识鲍志鸿，他是军统局一处少将处长，见过面，没有来往。陈旭东认识的人多。这个陈烈新大概不是陈旭东的堂弟，可能是重名。

腊月二十七开始包饺子，由大厨房给剁好饺子馅，抬来几大桶和好的面。3、4 所一齐包饺子，有的包，有的送，说说笑笑，真像一个大家庭。我一看眼前的情景，想起 1948 年于长春，当时从哈尔滨带来一些解放团的画片，上面有打球的，有看书报的，这些画报到了我的手，我笑了笑："八路对俘去的军官真能这样？我才不相信呢？这不过是他们自己化妆照的，送过来做宣传而已。"可是眼前这些情景我信不信呢？我自己就在其中，我信。因为这是事实。从前的想法也不奇怪，自己不断的杀共产党人，认为共产党把我们的人抓去绝不会轻饶，一定要以牙还牙，加以屠杀。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反动的唯心思想。就像戴笠于 1942 年 3 月，在西安对军统特务说的："共产党就是杀人放火的暴徒，他们把破坏说成建设，他们好也是坏，坏的更坏。"现在一看，这是蛮不讲理。

这样优待，应该促使我们死去的良心复苏。

春节前洗了澡，理了发，每人从里到外，从头上到脚下都收拾得十分干净。屋内的一切都认真的打扫了，玻璃擦得雪亮。搞文娱的人，加紧练自己的节目，每个人的脸上呈现出笑容。除夕发了花生、糖块、苹果，晚饭炖鱼，年年有鱼(余)。晚饭后大家自由活动，下

棋、唱戏、打百分，走廊上挂着五光十色的花环，灯光辉煌，走到哪里都有一种新气象，仿佛荡漾在温暖的海洋。我在这时候想到的是：太好了，我不像是在管教所，我像在一个朋友家中，只是我的家人没来。共产党待我这样好，我怎么报答也报答不了。旧话说："重恩不言报"，就是重恩报不了，只有竭力报答，永世记在心头，告诉我的后人，重恩报不了也要报，做多少是多少。

夜半，按照东北人的习惯要吃一顿饺子，小的时候叫"吃圆宝"，南方没有这种习惯。我吃饺子的时候，想到全国除了台湾全部解放了，在今夕是不是全国人民都能像我们这样吃上饺子呢？不一定。人民生活肯定是提高了，没有饿死的人，但不是所有人的生活都与我们一样的水平，我们是较高的，是共产党对我们的特殊照顾。

吃完了饺子，肚子撑得饱饱的，上床睡觉太不舒服，于是我们在走廊里打起了锣鼓，扭起了秧歌……

"战犯"帽子有点大

大年初一，白天有我们的节目，因为我清唱《二进宫》一段青衣，只吃了十个饺子。报幕由我担任，报幕的内容是我拟的，主要是感激共产党和政府对我们的照顾，给我们安排了文娱演出。报幕词的头一句话写的是"同学们"，我们到这儿究竟怎样称呼呢？政府没明确指出。去年在辽宁公安厅看守所的时候，不叫犯人，互相不叫，政府人员也不叫。可是到这之后，接着又来了这么多的人，究竟是犯人呢？还是同学呀？南京来的人称同学，这是一个问号。于是我要了一个心眼，我拿着报幕词对崔科员说："我拟了一个报幕词，请科员看一下，行不行？"

崔科员看了一下说："可以。"

"报告科员，前面称同学，还是称同犯？"

崔科员一考虑，马马虎虎地说："行啊，什么都行。"我一听，完了，还是犯人！用"同犯"太刺激，先用一次同学吧，以后再说。现在，我明白了，我们是犯人。想想也对，在被押期间不是犯人是什么？我没有对别人说这件事，因为过春节大家正高兴呢。

初一上午，政府给我们29个人一个光荣任务，叫我们挑一些人到大厨房去做饭做菜。刘荣第、高青山和3个生活组长研究了一下，挑出来8个人，我没去，因为我搞文娱节目，我对刘荣第说："咱们能够把这件工作争取到手，是政府对我们信任，说明你这个生活大组长带动得好（我故意拍了他一下），这个任务咱们只许做好，不许做坏。"接着我又小声嘱咐说，"到厨房可别妄作主张，听师傅的指导，咱们的人可要留神，出了事交待不了，这是大年初一。"

"我们一定注意，放心吧。"

刘荣第领着7个人到大厨房，我们到大俱乐部去演节目。崔科员领一个人在那儿装置广播机，这个人号牌是一千多号，这里有这么多的犯人吗？这个人说的是中国话，一定是汉奸。他对广播机是熟手，不一会儿就装置好了。我们的节目都很精彩，有一个活洋片，是我们从长春监狱学来的，洋片是真人，比如政府关心我们身体健康，洋片里就有一个医务人员手拿听诊器，给一个犯人诊病，两个人拉着唱着："往里瞧，往里观，看了那片，再看这片——看吧，有骨头有肉真的一样，活的一般，这一片大夫诊病照在上面，大病小病一齐看，有了急病到床前……"这个形式大家都没看见过，引起了观众的兴趣。

我们29个人全部上台，没有死角，集体参加了文娱活动。一辈子没上过舞台的赵广元、杨文泉、王建民也参加了，他们说："有生第一次上舞台，真有意思。咱们高兴，政府人员也高兴。"

武汉、南京来的人也演出不少节目。武汉的歌舞好，南京的京戏好，我们的杂耍好，各有妙处，都有特点。

正月初三，我把节目演完了，身上没有了负担，我争取到了去

厨房做饭。那一天，有刘荣第、姜明文、张大光、欧阳午、李仲章、陈燕茂和我。晚上的饭菜单上有规定，是60斤牛肉炖萝卜，20斤白糖蒸馒头和花卷。我一看菜单才知道，我们每天吃饭都有规定，不是有什么菜吃什么菜，也不是厨房师傅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厨房还有这么些制度真想不到。我这个人就是言行不一致，我告诉刘荣第到厨房不要妄作主张，听师傅的话，可是这回我到了厨房，一看菜单心里便想开了：牛肉炖萝卜，吃花卷就可以了，用不着放糖蒸馒头，加上我不喜欢吃糖，我便对刘荣第小声说："这20斤白糖我看别搁了。""不搁也行。"他同意了。

厨房有个钟师傅，很年轻，人很老实，我切萝卜，他站在我身边问："那个相声是你说的吧？"我笑了，他说："说得好。"

"报告师傅，这20斤白糖不要放了，牛肉炖萝卜是咸的，糖是甜的，不合口味。"

"菜单上有，还是要放。"他坚持说。

"大家不怎么喜欢这样吃呀！"我这是胡说，什么大家，只是东北人不愿这么吃，现在是刘荣第与我不愿这样吃。

呆了一会儿，钟师傅出去了，很快又回来了，他说："这20斤白糖不放了。"他把白糖又放回那个小屋子里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不仅学习，开会有计划、有步骤，就是吃东西也有计划、有准备，政府对我们用了多少心哪，这不过是几百件中的一件而已。

在大厨房看到起居时间表，前边有"犯人"二字，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身份都是犯人。这个问题明确了。

过了春节，尚传道写材料提纲，纸上印有"沈阳军区抚顺战犯管理所"⑤的字样。尚传道一说，我才知道我们是战犯。"战犯"二字太刺激了，我才是"上校"，也不够战犯，1949年1月，人民政府公布战犯名单，蒋介石以下共计有43名。起码文官是特任，武官在上将以上，一个中将军长都列不到战犯名单之内，我们这些小家伙怎么能称战犯！合乎实际情况吗？如果说我们有罪，那是不成问题的，"战犯"的帽子戴在我们头上有点大。

1948年12月，在长春公安局看守所被押时，有一天在厕所里遇见长春警察局局长袁家佩，他小声对我说："咱们都是小战犯，不好办哪。"摇摇头唉了一声，表示无可奈何。我听他这么一说，认为他是过于悲观。可能这个思想成了负担，后来他病死在公安局看守所，现在，袁家佩说的"咱们都是小战犯"这句话兑现了，袁家佩真有先见之明，可惜死得太早，不然他也得到这儿来改造。

2月底，金科长宣布成立学委会，由王仲模、蔡省三担任正副主任，严毅、姚轻耘、刘荣第、刘庄如、曾传坦、田文奎为委员，高青山和张普林为学委会的干事。学委会领导大家进行学习与劳动。我对这些委员没有意见，因为别的人不认识，只认识刘荣第一个人，他是我们29个人的生活大组长，靠近政府做得好，他当委员完全可以。刘荣第当学委与我没有坏处，可是尚传道对刘荣第当学委，高青山当干事不服，他认为学委会应当有他。学委会成立的第三天，规定学习时间及学习内容，尚传道一看就反对，那时他是68号的学习组长，他在小组里说："这样规定怎么能行呢?学委会也不找各组长研究一下，就公布了这个表，太不合适。"他在组里振振有词，牢骚满腹，他怎么这样呢？也许因为他在公安局看守所住了8年的单房(除了1950年冬与我在一起住过几个月，其余都是单人监)，每天看报、看书，社会现实一无所知，并且没住过监狱，不知道犯人应当怎么做，他可能把这个学委会比作清华大学的学生自治会，那时他是自治会的主席，学生自治会可以自己搞一套。可是现在我们是犯人，犯人学委会可以随便规定一套学习制度吗?他没有多考虑，自命不凡，犯了一个反抗政府的错误，受到吕科长的批评。

吕科长常与我谈话，去年在一所调号的事情也弄明白了，调号是我多心，绝不是因为我反对张禹斌当生活组长，就偏把我调到那个号，为什么调号呢？因为我原来住的那个号没有学习组长，调刘荣第去当学习组长，这样便需要调过来一个人，因此把我调过来了，如果当时班长或科员这样告诉我，我就不会有那种错误的想法。在犯人身上一件小事的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或粗枝大叶的说儿

句，可能会出大事，这是我的切身经验。

吕科长批评我们这29个人展不开批评。的确，我们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讲究情面，经过吕科长这一指出，我们组织了一个墙报，展开批评。第一个稿子是我写的，批评段克文，在搬仓库时，段克文看到一些蓝棉帽子，就提出来用旧帽子换一顶新帽，负责的刘科长不同意，段克文便一再恳求，刘科长只好同意他换了一顶新的蓝棉帽子，回来我批评他，他说："这是政府批准的，又不是我私自拿的。"大家都不同意他这种作法，可是无人当面提。我的批评稿子就是批评他这种见东西就要的坏毛病。这一批评，段克文吵闹不休，我没理他。接着别人也展开相互批评。

大家还就毛主席的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展开争论。

有人提出来："我们是不是团结的对象？"

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于是又在墙报上展开了争论。有的人想息事宁人，便说："这个问题争论它干什么？由政府人员下一个结论不就明确了！"

张禹斌写了一篇墙报说："我们是战犯，不是团结的对象，但是我们可以争取到被团结的对象。"我认为张禹斌这个看法是对的。后来刘荣第请示崔科员，崔科员说："你们叫政府给你们打保票吗？好好争取就是了。"

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为什么要争论这个问题呢？有人认为我们是人民，所以说我们是团结的对象；有人说我们是战犯，根本不是人民，你们硬要往共产党那方面靠，人家也不要你。人家团结人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团结战犯干什么？将来改造好了，那才是团结的对象，现在这样讲是假进步，太不自量。

金木水火土

所方规定，我们来自东北的29个战犯，因集中于辽宁沈阳而称之为辽宁队，南京来的叫南京队，武汉来的叫武汉队，北京来的叫北京队，一共有240人左右。

3月初的一天下午，孙所长找我与陈旭东谈话。先找陈旭东谈了半小时，又找我。我到哪个改造机关负责人都要找谈话，因为我是特务，需要加强管教，这里也是如此，孙所长问："你叫关梦龄吗？"

"我叫关梦龄。"

"到这有多少日子了？"他手拿着报纸，似乎无所用心的样子。

"5个多月了。"

"这里有多少人？"

"有三百多人吧。"我心想，对一般战犯怎能如此的问话。

接着谈了一些政策，又问了我的改造经过，最后叫我写两份材料，一份是写我自己的全部材料，从8岁写起，写到被捕；另一份写辽宁队战犯的思想情况，每人一份，我问："我自己的思想情况写不写？"

"也可以写。"

再没有谈什么我就回来了。由这开始天天写这两份材料。我想这里的军统特务大的有、中的有，为什么叫我写这两份材料呢？可能提前处理我！不对，陈旭东在孙所长的眼睛里是个调皮分子，跟他在一块没有好处。不过我在这里没犯错误，也不会有坏处。大概是公安厅要材料，我写了20多天，我个人的材料写了一百多页，辽宁队的战犯的思想材料30多页，一并在3月底交给了政府。

学习毛主席在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

的一篇讲演,《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很用心的学习。这篇著作共有十二个问题,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肃反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坏事能否变成好事?这几段我反复读,写了学习笔记,其他关于工农业等问题,只是一般的看了一下。

在肃反问题上,毛主席说:“我们的肃反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错误。过火的,漏掉的,都有。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在肃反工作中,凡是已经发现了的错误,我们都已经采取了或者正在采取纠正的步骤。没有发现的,一经发现,我们就准备纠正。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

这个文件帮助我理解了许多国际或国内问题。只有感性的东西,没有理论水平,仅从眼前的物质生活感激政府,那是不能生根的,尤其毛主席的著作更要深透的学习。虽然在学习上有一些收获,但也有一些错误想法,毛主席说“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共产党伟大的地方,最后说要“宣布平反”,我一想,平反就要来一个检查,文件内也说,“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如果来一次大检查,我被判的刑比较轻是不是再加刑?这也是问题,错了要纠,重了要减,判轻了不也要加重吗?我又一想这是肃反,我的问题属于镇反,也许不是一码事。不对,肃反与镇反都是针对反革命分子,不能分开来看……心中疑惑,想了一阵,最后认为不会再加刑,因为这里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判刑的,可能无形中延期,这是将来的问题,这些想法过了几天就消失了。

政府组织我们到菜地劳动。到菜地劳动可以晒晒太阳,透透空气,玩一玩,比在屋子里好多了。解放后,我在长春监狱参加过劳改,那是做胶皮鞋,轻微的劳动,体力没有锻炼出来。用铁锹翻地真累人,不一会儿浑身是汗,气喘不止。心想我是不能作体力劳动的,将来政府也不会叫我们从事农业劳动。政府改造我们花了这么大

的钱，到头来叫我们种地，太不值得了。我们将来不作体力劳动是肯定的，至于作什么，这么大国家还多了我们这些人？随便什么机关都可以安置。因之大家一边说一边笑一边干，有些人在干活中马马虎虎，拔草也拔不干净。我们出来40人，只跟来两个班长，还是徒手，什么武器也没带。看来政府人员对我们的思想情况全部掌握了，知道我们不会逃跑，但是有个班长坐在铁路边上，他的任务一定是看着火车，怕我们叫火车碰了，想得真周到。

南京队的人在院中谈话，一个说："政府发纸烟，你吸不吸？"另一个说："我说恐怕不能发呀！""辽宁队都吸呢，一样的改造还能两样待遇，连一所汉奸也吸烟。"

看来这烟吸不长久，一样的改造怎么能有两样的待遇？南京队与武汉队洗澡路过我们的屋子，看到我们在吸烟，他们能没有想法吗？我认为这是特殊，这样不好。我自觉地把烟戒掉了。我戒烟之后，李衍涛也跟之戒了。在这件事情上，黄鹤另有看法："吸几盒烟有什么关系？不吸烟就等于进步了？"我对这话置之不理，我之所以戒烟，只是为了"不特殊"，别的我没考虑。我也没有告诉别人，劝说别人，李衍涛是自愿戒烟，黄鹤这样说实在不应当。

我的孩子关棣从徐州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附来一张小相片，说她学习很好，问我什么时候改造好？又说她妈妈和她外祖父母都好，她妈仍在利国铁矿当会计，信的末尾，我的岳父王悦珩附了一笔，说："有机会计划同关棣到抚顺去看你。"又说，"这个信封是才侠(我的老婆)写的。"我看完这封信，意识到王才侠还没嫁人，不然，她写这个信封干什么？我给她们回了一封信，告诉她们我好，好，好。别的也谈不到。

过了几天，大俱乐部举行南京队与辽宁队控诉自己罪行的大组会。我对刘荣第说："我争取在大组会上发言，控诉自己的罪行。"同时，辽宁队也有人准备在大组会上发言。刘荣第认为，我在大组会上发言有教育作用，我是被政府宽大的典型。经过他向崔科员报告，决定我在大组会上发言。我把提纲组织了一下。这次学习是管

教科主持，金科长与吕科长负责。至于我们在台上怎么讲，那是我们自己改造程度的反映，政府没有框框。那天，大组会先由姚轻耘发言，他发言的时间很长，过程多，重点不明显。他下来之后就叫我发言。关于解放前的罪恶，我举了这个事例：

1948年2月，督察处在长春大学逮捕了一个叫庞文录的学生。原因是庞文录的妹妹1947年从哈尔滨到长春，因为男朋友与人争风吃醋，便向督察处控告，说她是八路派来的女间谍。于是在1948年除夕之夜将她逮捕。在侦察中，发现她有一个哥哥在长春大学读书，于是把庞文录也抓了。庞文录被捕之后，长春大学的学生，均感愤恨，就推举代表到督察处请愿，要求把庞文录释放。长春大学学生会推举国民党长春大学的支部委员王恩孚等二人来办这件事。王恩孚是国民党员，认识一些反动派，到督察处一定要见我，我接待了他。他把来意对我说了以后，我委婉地对他做了解释，并且说："我们对庞文录侦察明白一定释放，不会给他麻烦。"把他应付走了。过了几天，庞文录并没有放，王恩孚又来了，上午我推说不在家，下午没有办法又出面接见了。在接见时候，处长张国卿在座，王恩孚看见张国卿坐在我的旁边，没带肩章符号，不知道他是杀人不眨眼的特务，王恩孚气势汹汹，以质问的态度问我："为什么抓庞文录？"我尽力用和蔼的态度回答他，他越发理直气壮，甚至于用威胁的口吻说："我们长大两千名同学，要求你们释放庞文录！"又说，"如果你们认为我有共产党嫌疑，也可以把我留下！"我用了最大的忍耐把他安慰走了，这时张国卿在旁边有点忍耐不住了，王恩孚走了之后，张国卿说："这小子一定有政治背景，不然不能这样硬，回头叫情报科调查一下！"

情报科派长春大学的学运组组长郝铮调查，很快调查清楚了，他说："王恩孚是民盟分子，最近要到解放区去。"这个情报一上来，张国卿就在夜间派人去长大逮捕王恩孚。当时与王恩孚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长大学生，也一并逮捕来了。抓到督察处酷刑拷问，认定是民盟。督察处决定秘密处死，给警备司令部上了一个报告，新七

军军长兼长春警备司令李鸿批准了。批准以后，张国卿与我研究怎样处死这两个学生，我说用毒药把他们毒死。张国卿说不行，如果服了毒药肚子一疼，一叫唤，不秘密，这个办法不好。我又说不能毒死，那就活埋，在督察处后院破楼里挖一个坑，把他们埋进去就行了。这个办法张国卿同意，我派了四个基本特务，先在后院的破楼里挖了一个坑，决定在当晚九点执行。

可是这天晚上我在家中开舞会，来了许多男女朋友，我把这件事忘了。到了 9 点钟，督察处来电话找我，我才想起来。马上到了督察处，张国卿已经去了。张国卿过去在上海做过潜伏，但没做过行动。我告诉他拿个大棒子，站在大坑边上，等王恩孚到了，从后脑海打一棒子就埋。我又告诉了这几个特务如何动作。一切都布置好了，命令把王恩孚带来。王恩孚被捕之后，有一天给他用刑，被我遇见了，他对我说："督察长，我年轻不会说话，请督察长不要怪我，我什么也不是。"我对他说："你如果是民盟就承认，没有什么，如果真不是就不难为你。"这么敷衍了一下。这天晚上把他提出来，我先问明他姓名、年龄等项，这是处死之前验明正身，我问完了，他说："报告督察长，我什么也不是，我就是好出风头，什么是民盟我都不懂得。"我听了一下对他说："今晚上把你送到兵团军法处，你这个事我们已经侦察明白，没有关系了，到军法处再过一堂就可以释放，能找到保吗？"他说："能找到。"我说："那好。白天送你到兵团，被你的同学遇见了又要起哄，夜里好一些，走吧。"特务把他的眼睛蒙上，嘴里塞进棉花，两个人架到后院。王恩孚架走之后，又提第二个，姓韩，名字我忘记了，这个学生有 20 岁，中等个，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长得挺招人爱。来了之后，我问了他的年龄、籍贯。他说："我是去王恩孚那屋串门，正赶上抓他，也把我抓来了。我不知王恩孚的事情，到这之后，也给我上刑……"说着说着他哭了，我一听这可怎么好？非处死他不行，公事已经批下来了！这么一个 20 岁的大学生，无罪处死，我的心也有了问号，但是不处死也不行呀，我一咬牙，把对王恩孚说的那一套欺骗话又重说了一遍，最后我说："你

走吧,没有问题,到那就会释放的。”

我报告到这,我的眼泪不自禁地流了下来,下边有的同犯也掉下了眼泪。

把这个学生的两手也后绑起来,眼睛蒙上黑布,嘴内塞上棉花,架着他往后院走,走到后院大破楼里,王恩孚已经大头朝下放在坑里了,这个姓韩的学生到了坑边一站,张国卿亲手拿一个大棒,用劲朝这个学生的后脑海一击,应声而倒,大头朝下往坑里栽去,四个特务立刻用铁锹撮土掩埋,因为还没开冻,土块大有空隙,这两个人没埋死,声声惨叫从坑里发出来,我赶紧叫他们去提水,把水提来,泼上水又加了一些碎土,用脚踩了一会儿,这才没了声音。就是这样,没有人性的把这两个学生活埋了。像这样的罪行,也不是这一件,以后又杀害了四十多个地工人员及进步青年。有许多酷刑,是想象不到的——用金、木、水、火、土[⑥]的五刑,来虐待被捕的人。

最后,我谈了对罪恶的认识,感激政府对我的宽大,以及今后的改造决心。

报告以后,南京队用学委会的名义给我批评了一番,大字报说:“关梦龄像耍魔术似的控诉了自己的罪行。”

李衍涛不解地问我:“我看你报告得不坏,我都掉了眼泪,大字报怎么说你耍魔术呢?”

我生气地说:“人家水平高,咱们不认识问题,向人家学习。”其实,我也不知哪一点错了。我当然不能问,也没有人告诉。我一想算了,对我要求高也是好事。

大组会后,吕科长找我谈话,我对吕科长的印象很好。他与金科长在理论上很有造诣,在政策上掌握得也很稳,他找我之后首先说:“我去年对你的批评是不是还有抵触?”

“当时有抵触,过去那一阵就忘了。”

勉励我一些话后,他说:“政府对你的宽大是你争取的结果,你还要努力,继续争取。在思想改造上多下功夫,要靠近政府,起积极

作用。"

我说："这一次大组会上的发言没报告好。"

"还是起到了教育作用，揭发匪特的罪行，对你们认罪也有好处。"最后又说，"你的相声说的编的都很好，将来在这方面要多做一些工作。日本战犯曾经编了一个剧，描写日本人民不愿当兵出征的情形。有一个人不愿当兵，把胳膊砍了下来……这个剧没有演完，观众痛哭使剧演不下去了。这样的剧就很起教育作用。你们将来可以写一些东西，把特务的罪行揭露出来。"

吕科长这次谈话对我鼓励很大。

我们的大组会开到 5 月中旬，对于我们认识罪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有的人表现得很做作，如南京队武子芬、刘之剑、李汉萍等人，在大组会上发言，上去还没有说上两句话就哭不成声，说不出话来。辽宁队的杨文泉说："这样子搞，我来不了，不是哭的地方硬要那样，有什么意思！"我心想，他们这样表现是政府人员支使，还是真的感到过去的罪恶对不起人民才痛哭失声？不得而知。最后，刘之剑在台上还给吕科长跪下说："向人民赎罪！"吕科长叫他起来，他才起来。

这次控诉自己罪恶的大会，进一步认识了我们这些战犯过去所犯的滔天罪行是不可饶恕的，初步认识到我们应当改造，不应当逍遥法外。至于个别人的表现，难说那就是真诚认罪，我认为做作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

不是事先布置的

5 月 20 日上午，吕科长宣布，为了加强思想改造，决定组织我们到社会上去参观！我们的掌声立刻响了起来。从大俱乐部回到监号，大家一路上兴高采烈，不可形容。外出参观是我们改造生活

中一件最大的喜事。我的运气真好，前边有宽大政策挽救了我的性命，接着又有加速改造把我们集中，现在又要组织参观，将来还会有好事！我的前途十分光明，只要老老实实的改造，出监之期当在不远。

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着笑着，谈论这回参观都到什么地方？我说："政府一定有安排，凡是政府认为我们需要看的，都能叫我们看到。"

我们这些人虽然经过一些学习，看了不少报纸，但对新中国的实绩了解甚少，这回叫我们看一看，和国民党比一比，要不然我们不服输，不能很好的认罪。以利改造。

洗了澡、刮了脸，衣服、鞋、袜都准备好了，政府给我们编了队，把我们与北京队编在一个中队，因为这两个队都是崔科员领导的。编队之后，又派了中队长，我们的中队长是田文奎与刘荣第。对于病号政府又费了许多口舌，这些病号一定要去，政府没有办法，只要能行动的便准予随队参观。

政府人员对我们像老人对孩子出门似的，再三叮嘱，注意这个，注意那个，以至"小孩子"感到厌烦，认为"老太太"太罗嗦了，肖兆林说得好："政府人员把我们当作老小孩看待，微末细节也考虑到了。"

21 日上午 8 时，我们与一所的汉奸乘坐七辆大汽车向郊外驶去。车走了一点多钟，到了台山堡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们下了汽车，到一个小学校前面休息。不一会儿合作社王主任给我们做报告，当报告到蒋匪军到他们这个村子，骚扰老百姓的时候，南京队学委王仲模大喊一声："跪下！"大家都跪下了，跪下就哭。我当时没有眼泪，因为只听王主任说蒋匪军的士兵到村子抓鸡、杀猪、抓壮丁，这些行为固然不对，不过还不是"三光"政策，感情还没到那地步，因而泪水掉不下来。

王主任的报告我们是跪着听的。

接着我们开始参观台山堡的合作社。这个社比较富裕，暖室、

电磨，应有尽有，社员收入都很多。

一个脚穿蓝球鞋，手拿鞭子的老头对我们说："我在解放前活了70多岁，吃的大米没有解放后吃得多。现在我们这个村子，吃大米容易，吃高粱米却不容易。我80岁了还放羊，身板也硬朗，精神也高兴！"

这是人民的声音，是我直接听到的。由这几句话，可以说明解放后的几年，比解放前70多年都好。尤其令人信服的是，这不是共产党做的宣传工作，而是真实情况。这个老头从山上放羊回来，一看到我们这么多人，都穿一样的衣服，不知是干什么的？他在我们旁边一站，我们就与他谈上了。他随便的就谈出了以上的那些话。我心里考虑了一下，认为这个老头的高兴是真的，不是做作，尤其可贵的是，这个人不是事先布置的，不像《三国演义》三顾茅庐的诸葛亮在卧龙岗的那一番布置。

参观了一个上午，回来在小学校院子里吃饭。我们自己带去的面包、肉足够了，合作社还给我们每人一个鸡蛋。大家认为不该受领，政府叫我们吃，我们只好接受了。

饭后，每组派一个人去家庭访问，这组选举我去的，由崔科员领着，另有社的干部陪同。我们访问这家有个老大娘。我们几个人见了老大娘，立刻跪下谢罪，告诉她我们是战犯，过去做了许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今天来谢罪。我们这一举动，把老大娘闹愣了，她叫我们赶紧站起来。她谈了许多解放前后的事情，伪满生活极苦，国民党来了更坏，只有解放后，全家才得救。现在有三个劳动力，生活富裕。老大娘越说越高兴，最后说："不是共产党毛主席解放了抚顺，我们再呆下去就要饿死，那就没有今天了。现在的日子多好哇，不愁吃不愁穿，这茬人赶上好时候了。"

老大娘的一席话，使我领会到人民对国民党恨之入骨，共产党毛主席深为人民所爱戴。人民拥护共产党毛主席，是从心里拥护，是从他们切身利益上拥护。这一点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任何人都不能挑拨人民与共产党的关系，也就是说反动派想要变天，国民党想

打回大陆，那都是做梦。我们这些战犯如果谁还幻想蒋美卷土重来，那才是不看事实，自绝人民。

5月22日，参观抚顺露天矿。看到一列一列的小火车在繁忙的运输，大电铲一下子铲起两吨半煤。这么一大片的煤矿层，如果不是被日本鬼和国民党那样乱采乱开，出煤的数量还要多。我想起1947年，国民党207师在抚顺市驻守。师长罗又伦成了抚顺一霸，他利用工人开采的煤投机倒把，赚了很多钱。利用煤做投机生意，不仅一个罗又伦，还有很多人，可是抚顺煤矿工人却吃不上，穿不上。

从露天煤矿参观出来，又派了一些代表去参观工人养老院。他们参观回来说："真想不到煤矿工人的生活有那样好，收工之后，又洗澡、又照太阳灯，医疗设备十分齐全。这样的生活过去哪些下级职员也办不到。"

午后，又参观了抚顺市工人疗养院。这些老人住着三层大楼，院子种着各种花卉，每月给他们一些养老金。吃完了饭，有的下棋，有的赏花，这种晚年的幸福生活在解放前是想也想不到的。

23日、24日，到沈阳参观。我们先后参观了工业展览馆、第一机床厂、百货商店、体育馆、风动工具厂、电缆厂，游览了北陵、东陵。

参观中，我几次联想到解放前沈阳的情况，我亲眼所见，工厂驻进了部队，厂房成了马棚，各工厂的烟筒均不冒烟了。日伪开办的工厂，国民党接收以后，前门贴封条站上门岗，后门拉东西。所谓接收，实质是"劫搜"。1947年我在沈阳，看到马路上到处是卖衣服的、卖破烂的。小贩、窃盗、娼妓、骗子遍布全城，工厂最多的铁西区也是一片凄凉景象。当时我与沈阳一些亲友交谈，我把责任推给了共产党，我说："如果共产党不打仗，就不能这样！"有的人被我欺骗了，也顺口说："希望把八路早日打垮，好过太平日子。"

我7岁时从故乡新宾到沈阳，那时是张作霖统治东北，我虽然年幼，也记忆一些东西。现在沈阳变化很大。从前南湖是个臭水泡

子，现在建成了人工湖。工学院的建筑壮观美丽，新建了一片又一片的大楼。参观前我想，沈阳的楼房大都是日本鬼子时代建筑起来的，解放后，人民政府也需要利用日本鬼子的建筑，自己不会骤然间建筑起来多少大楼，因为时间有限。可是这次参观，证明我的想法是错误的。这些问题不用辩论，大楼摆在那儿，只要不是瞎子就能看见。我钦佩共产党领导得好，建设得快。在伪满时期，盖一个大楼一般都需要二三年，长春的中央银行花了七年多才盖好。我仔细一想，沈阳为什么建设得这么快呢？在长春我听说，中国建筑工人给日本鬼子干活"磨洋工"，偷工减料，有监工的看着也不行，所以工程进度迟缓，一所大楼最少也要二年或三年。解放后工人当家，意识到这是建设自己的国家，在工作中不挨打、不受气，吃得饱、穿得暖，干活的劲头就来了。我这么一想，也就想通了。

参观电缆厂，这座工厂是苏联帮助建设起来的，其中有一架60头的卷线机是苏联的第一部产品，表现出中苏两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友谊。

又参观了北陵和东陵。我小的时候到过这些地方游玩，旧地重游，看到这些地方比过去更美丽了。1947年冬国民党军队，派兵到东陵伐树，构筑城防工事，现在山上还有残痕，风景区的大树砍掉再长起来需要多少年哪？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

参观沈阳百货商店，我们看到许多种类的中国产品。我是最喜欢用外国东西的，崇美思想支配我，认为中国的东西不如美国好。一些针织品，上海的还可以用，但也不如日本。这回到百货商店仔细一看，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东西，如皮鞋、呢绒、丝织品，外观漂亮，质量坚实，不次于美国货。

百货商店的顾客很多，十分拥挤，这说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才有可能来买这些日用品。在解放前，沈阳和平区的几个私人百货商店，以及沈阳城内的"吉顺丝房"那样的大商号，门前冷落，没有几个人去买东西。现在是顾客盈门，买呢绒、买皮鞋的人数不少。我心想这不是购买一双皮鞋，这不是单纯的商业兴盛，是整个

国民经济好转，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三年经济恢复之后，开始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的结果，百货商店兴盛也说明农业在发展，没有农业就不会有轻工业，也不会有这么些商品，这是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从百货商店出来，看到街上站满了人，人们在看我们，他们一定知道了我们的身份，可能围着溥仪这个伪满的皇帝吧？人们一边看我们，一边小声议论，有一个人说："他们都是大官，过去都是坐小汽车的。"

我想，人们如果知道我们这些人的罪恶，又知道我们被政府宽大，他们一定有意见，会要求枪毙我们。

从沈阳参观回来已经是月底了，这时犯人中有一种侥幸想法，认为日本战犯在 1956 年夏，参观之后便释放回国了。我们是 1957 年参观，也是夏天，参观之后可能释放！我没有这种想法，我认为中国战犯与日本战犯不同，孙所长报告说得明白："对你们要求加速改造，对日本战犯没有提出这个口号。"

当然我希望成为事实，参观之后释放最好了。

又有人说，西南岗楼上的哨兵撤消了，与释放我们有关系。大家这样说，我都寄以希望，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变成事实。

这时期锅炉检修，不能洗澡，大家都感到很不舒服，在屋里弄点水擦擦背也不方便。我心想，在长春公安局四年，总共洗了不到十次澡，开始连脸都不洗，现在几个礼拜不洗澡便感到不舒服了，真是不知足。

谢 罪

在 6 月初的一个大组会上，吕科长又宣布一条好消息：由明日开始继续参观！于是又赢得我们一片热烈的掌声，并且透露此次到北满参观。我兴奋之余，私下安排了一个参观日程：到长春参观第

一汽车制造厂，到哈尔滨参观亚麻厂……病号坚持随队参观，用他们的话说："这样的参观史无前例，这样的参观一般干部也没条件哪！"大家又议论了，这么多人到什么地方去住呢？有人说住工厂，我说可以住学校，有人说无论如何不能住庙。这样的谈论都是没有根据的，但有些人坚持认为自己说得对，强迫别人接受他的看法，我们战犯的争吵有时就是这样引起的。

专车一直向北开去……我心里很不安，认为到长春一定下车。下午一点到长春，车只停了20分钟，继续北行！我知道回来是要停的。二次回长春，怎么见长春人民？这是我思想上的一个负担。

下午火车到哈尔滨车站，这个地方我从前没有来过，这是北满的一个大都市。我们住进哈尔滨旅馆。旅馆的设施使我惊异非常，钢丝床、皮沙发、地毯、绸子被，这样的饭店一天要许多钱呀！这时刘荣第对我说："这是哈尔滨最好的饭店，老名字叫'马迪尔'，一般人来不了这个地方。这个旅馆有舞厅，有餐厅，有电影院，大得很，咱们怎么能住这里呢？"

辽宁队各组都住好了，金科长来了，他看了一下我们的铺位，很关心地问了问情况。我说："报告科长，我们住这样好的饭店太浪费了，住一般的旅馆满可以了。"

金科长说："政府为了照顾你们的休息，参观，所以安排在这个饭店，方才还有一些旅客住在这里，临时动员他们迁到别的旅馆。"

我想在抚顺，我们说到哈尔滨住工厂，住学校，还有说住庙的，为此还抬起杠来，现在在事实面前感到我们这些人就是好唯心的武断，这件事又给了我们一个耳光。

共产党有许多事情是我们想不到的，这又是一例。

晚上，我们在浴室洗了澡，洗完澡喝茶，大家坐在沙发上谈天。感到这次参观政府花的人力、物力太大，我们是罪人，又不是人民的功臣，于情于理均有不合。入夜，我躺在钢丝床上，盖着绸子被，联想到1955年11月，在长春监狱戴上脚镣子睡觉的情形，与今夜相比，真是不堪回首！我的思想有时很特别，从这一件事像箭一样

又联想到另一件事，我自己也莫名其妙。

第二天，在楼下餐厅吃早点。只有我们吃上饭，干部才能坐下吃饭，白科长和金科长等人就像在家里一样，把孩子都安顿好了，大人才能吃饭，等大人端起饭碗，孩子们吃完饭又闹起来了，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先吃，干部后吃，干部还没吃完饭，我们就有人要大便，真是啼笑皆非。于是干部就得抓紧，班长们不是细嚼慢咽，而是狼吞虎咽，把饭碗一放，带犯人去大便。我们有许多人不顾干部和班长的辛苦，一会儿要求这个，一会儿又要求那个，就像一些不懂事的孩子，缠着妈妈不放手。

早点后，我们到兆麟公园参观。在李兆麟将军的墓前，我为良心所驱使，跪下了，掉下了忏悔的眼泪。因为心情难过，虽然在兆麟公园游逛了好多时候，看了许多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却没有往脑子里去，只记得有一个孔雀，还有一个三条腿的猪，一些猴子，其他的东西我记不住了。

从兆麟公园出来，坐汽车游览市容，到了水道街那一带，车上的解说员介绍说："这是水道街，1946 年 3 月 9 日，在水道街的光明医院，军统特务把李兆麟将军杀害。前边拐角的地方，就是光明医院的旧址。"我一听真难过，我们这些人到处留有血债。

第二天参观了电表仪器厂、量具刃具厂、亚麻厂、电机厂、毛织厂，这些工厂除了毛织厂是过去已有的，其它工厂都是解放后新建的。

量具刃具厂，在厂外看不出是工厂，仿佛到了图书馆，一点声音也没有。工厂全是现代化机器，生产的产品十分精密。我看到一些工人是南方人，从这些人的籍贯来说就不简单。哈尔滨天气冷，冬天需要燃料和冬服，比上海费钱。解放后工人有了主人翁的责任感，加上政府的动员，上海工人也能到冬天零下 40 度的地方工作，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事情。我在工厂食堂看到一个"无人售货台"，没有人看管，买咸菜自己拿，自己把钱放在箱子里，这是新社会的新风气。旧社会买东西有人在那看着，还有一些爱占小便宜的人多

拿呢。

哈尔滨毛织厂在十八道街。崔科员对我们说："解放前这一带冻死饿死的人多得很，扎吗啡、抽白面的人，都到这个地方集合，干什么下流勾当的都有。解放以后这些地方都干净了，每个人都有正业。不劳动不得食，不学好吃不上饭。"这个毛织厂是公私合营的产物。解放前说哈尔滨有俄国毯子，就是这个工厂的出品。工厂有许多女工。机器都是旧的，厂房也很老，可是工人劳动都很积极，表现出主人翁的劲头。成品很好看，一床床娇黄色的毛毯，上面织有花卉，毯边镶着古铜色缎子，看着毛茸茸的，美观得很。这个工厂的机器是木头做的，还能革新，扩充一下能成为北满第一大毛织厂。

哈尔滨的风俗习惯有点欧风，男女青年走起路来都扬着脸，挺着胸脯，别有一种劲头。

下午，到东北烈士馆参观，一听这个名字，我的心就沉重起来。我们在东北烈士馆门前下了车，把帽子摘下来，进了烈士馆。馆内庄严肃穆，由解说员一一解说。我想，我正是这些烈士的敌人。现在我面对着死难的烈士内心感到形容不出来的愧悔。

走进烈士馆的附设室，解说员出乎意料地指着一幅照片说："这是美蒋特务于1948年，在长春解放前夕，惨杀我党地下工作者及爱国青年的图片。躺着的是被害人，两手被绑着，嘴里塞进棉絮，眼睛用黑布蒙着，这几十个人都是这样被杀害的。长春解放后，人民政府把这些被害人从地下挖出来，予以棺殓掩埋……"

我一听，就像谁猛打我一拳似的，轰地一下，我马上跪在了这幅图片的前面。忏悔的泪水止不住的流了下来，解说员仿佛代表千千万万人民对我控诉。我在事实面前感到恐惧慌愧，不知所措的怔住了。我意识到良心上的责罚比肉体上的责罚更痛苦。

在东北抗联纪念室，我们看到了杨靖宇将军所领导的抗联队伍在万般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所使用的武器，所吃的草根树皮等实物。烈士馆馆长，给我们介绍杨靖宇的遗事，内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比如杨靖宇所率领的抗联武装，在日本军队和伪军四

面围剿的情况下，弹尽粮绝，同志们吃草根，女同志生了孩子掐死……种种的艰苦并没有使杨靖宇将军及其所率领的战士灰心，他们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给日伪军队不小的打击，最后终因人数较少，杨靖宇被敌人杀害。杨靖宇将军是抗日的英雄，革命的功臣。对比一下国民党抗日自惭形秽。

从东北烈士馆参观出来，回到饭店，桌上的饭菜不像往日那样一扫而光，而是剩下不少。我们许多人心情太激动，太紧张，感到烈士馆里的烈士与我们这些战犯都有直接、间接的关系，我们还活着，并且活得很好，真不该呀。往日的欢笑在房间里消失了。吃完饭都默默无语地想着各自的心事，我自己偏重想特别室那些照片。我想，督察处在长春的罪恶一定随着照片附带来许多说明，包括我在现场的指挥活动，我原来想，自己的罪恶仅只长春知道，可是1949年《东北日报》就把长春督察处的罪恶报道了一番。这次参观，我以为长春可能有个展览会，不意，在哈尔滨也展了出来！这就说明，不仅长春人民恨我，许多地方的人民也都恨我。

6点钟把我们集合到楼下的电影院开会，1所与我们3、4所的战犯都到齐了。金科长要我们谈谈参观哈尔滨的感想，大家都举起手来，1所的溥仪发了言，他说："我是傀儡皇帝，认贼作父，丧心病狂。与日寇勾结，对东北人民进行压榨，给东北父老兄弟姐妹带来了无数的灾难和死亡。这次参观我认识到，哈尔滨人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过这样好的生活。我的罪恶十分严重，对不起哈尔滨人民，参观回去一定要好好改造……"

其他犯人也说了话。最后，由黑龙江省公安厅的负责人对我们说了一些勉励的话。

6月9日，9点钟乘汽车离开饭店到车站。这辆汽车每天拉我们到各处参观，给了我们许多方便，我们向司机鼓掌致敬，表示感谢。

在火车上，我们谈论在哈尔滨的感受，有人说："夜里白科长到各房间给犯人盖被子，别的干部也是这样。"

又有人说："鲍志鸿的女儿到饭店看他来了！"

"他女儿怎么知道他来的？他女儿在哪儿？"

"是政府通知鲍志鸿的女儿，她才来看的，他女儿在哈尔滨外国语学校读书。"

"哦，政府想得真周到，不然父女见面可不容易。"

"如果你家属在哈尔滨，这回不也能见面了。"

"可惜不在哈尔滨。"

我想说说我的感受，一言难尽哪，我的全部感想表达在我日后写给东北烈士馆的一封信上，原文如下：

哈尔滨东北烈士馆

尊敬的馆长和全馆干部：

我们在6月8日到您馆参观(与其说是参观，在我说应当是谢罪)，承您及全体工作人员对我们的解说与教育，对于我们改造有了很大的帮助。所以，向您和全体工作人员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们在哈市做了4天的参观，在工厂里有许多新产品，过去我国不能制造的，现在我们能够大批的生产了。哈尔滨市由过去的消费城市转变为工业城市，高大建筑相继出现。哈尔滨市作为一个老解放区，随着祖国工业化的突飞猛进也朝气勃勃的向前发展。不论在哪一方面都有许多的成绩，这些成绩是与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分不开的。这不仅是英雄的哈尔滨市150万人的光荣，也是全国人民的光荣。

在参观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东北烈士馆。6月8日的下午，我以严肃心情走进了烈士馆。当时，我那十分激动的和无限悔愧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既哀悼死去的烈士，又悔恨自己的罪恶，我受到了良心上的谴责，精神异常的痛苦。

我是军统局的骨干分子，解放前长期效忠蒋帮，无恶不做，一贯仇视人民。1948 年我是长春督察处的督察长，我的名字在你们的材料中不会是很生疏的，也是人民所痛恨的。在 1948 年，我们在长春作垂死挣扎的时候，由我指挥的罪恶活动，先后杀害了人民政府地工人员及爱国青年四五十人，这个严重的罪行是不可宽恕的。

在烈士馆的附设室，听到解说员解说了匪特在长春的血腥罪行，如杀害地工人员等。这些惨无人道的勾当，就是在我的指挥下干出来的。回忆这些罪恶，面对死难烈士的遗像，使我认识到自己罪恶的深重，我跪下，我痛哭，我向死难的烈士谢罪。解说员的声音仿佛是千万人民向我控诉，我受到正义的制裁，我不是人，我是最可恶的豺狼野兽！

在李兆麟将军的纪念室，我更为痛心。李将军在伪满统治时期与日寇苦战十四年如一日，艰险备尝，功绩卓著。在"九·三"胜利后，竟被军统局的分子——我们这群野兽们杀害。李将军没有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而死在特务的迫害下。李将军是国家的最宝贵的财富，人民的功臣，人民正需要他的时候，他被迫害了，这是共产党和人民的损失。我瞻仰李将军的遗像，我悔愧无地，因为杀害李将军的刽子手刘一之、夏芳庭等人，由哈市逃到长春之后，均由督察处晋级录用。而我这个顽固已极的特务还对这些刽子手说："脱离现场的技术不好，还应当加强。"

我这样鼓励他们多杀人，杀更多的人，在李将军的遗像前回忆起来，我觉得对不起宽大改造我的共产党。内心责备自己，我默默向李将军发誓："我过去是您的仇人，我们杀害了您，我认识到了这个罪恶的危害性，我对不起您，我向您谢罪。我痛悔过去，我要好好改造，由野兽变成一个善良的人民，我不会忘了我的罪行，我也不会忘了共

产党对我的宽大，我的余生献给祖国，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立功赎罪！”

听了杨靖宇将军的英勇事迹的报告，给我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东北抗联在日伪统治的年月，苦战了14年，打消了我过去“东北抗联在东北活动是不可能的，即便有抗联，人数也不会多，活动范围也不会广”的错误想法；另一个问题，知道东北抗联与日寇的斗争，没有吃，没有穿，没有武器弹药，冰天雪地，终于在1945年配合苏联红军获得了东北的解放。由此，我深刻认识到，真正抗战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国民党是不抗战，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

杨靖宇将军率领人民武装与日寇血拼的时候，正是国民党和日寇进行谈降的时候。东北烈士为解放东北人民而艰苦斗争的时期，正是我们这些战犯向人民进行疯狂镇压的日子。听到杨靖宇将军及所有烈士们为解放事业而自我牺牲的忠勇业绩，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使敌人胆寒，使国人爱戴。我们这些战犯在抗日战争中，除了升官发财之外，没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表现，面对烈士坚贞不屈的英灵，我们是无地自容的。

在烈士馆我看到一位中年妇人，穿着素服，愁容满面地注视着我们。当时，我想到这位妇人为什么那样抑郁惆怅呢？是不是她的丈夫，或是她的亲人被我们这些刽子手杀害了呢？如果她是烈属，她对我们又是怎样的看法呢？想到这我掉下了眼泪，我应当向她谢罪，我也应当受到人民的严厉惩处。由于我们丧心病狂的为非作歹，使多少家庭不能团聚，使多少孤儿寡妇失掉了父亲和丈夫！这些罪恶都要由我们负责。不应该死的人，倒被我们杀害，应当死的我们，反而得到人民的宽大。由此，我深刻的认识了共产党人的宽宏大量，有改造人类的伟大抱负，以人道主

义精神来改造和照顾我们，使我们死去的良心又复苏了。所以，我感谢共产党对我的再造之恩。

在烈士馆的参观，使我们有了向烈士们，向人民谢罪的机会，使我们更能了解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和为解放事业而牺牲的精神，这是人们学习的榜样，烈士们的鲜血在东北土地上开了花，结了果，有了东北的解放，才有全国的解放，没有烈士们流血牺牲，就没有人民的幸福生活，烈士们虽然死去，但烈士们的精神，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永垂不朽。

我是一个罪恶滔天的战犯，1948 年 10 月长春解放后，我向人民政府自首，由于政府的宽大和我主观的努力争取，使我认识了真理，知今是昨非，特别这次参观烈士馆对我有很大的教育，这与您和您的全体工作人员的耐心教育分不开。我一定加速改造，来回答政府对我改造的苦心。

最后，我以悔恶向善的忠诚向您致以万分的感谢！

此致

敬礼！

战犯　关梦龄

1957 年 6 月 21 日

抚顺战犯管理所

无颜见长春父老

火车向长春行进，我的心忐忑不安。去年 5 月 24 日从长春到了沈阳，今天 6 月 9 日又回到长春。一年中间换了三个改造环境。我想不到能回长春，我对长春有些顾虑，良心上有愧，感到无颜见

长春父老。

下午两点钟到了长春。我们坐的是托儿所的汽车，椅子不大。我明白了，这7辆车都是由各机关学校借来的。汽车只开了几分钟就到了吉林省政府招待所，我一看，这是解放前军民联谊社的旧址。我们辽宁队住了几个小屋子，这个招待所比不上哈尔滨旅馆。屋内没有铁床，被褥都还干净。我们这屋住7个人，每人一床，屋子不大宽绰，但能走开人。从洗脸室回来，我发现崔科员与孟班长住在楼梯下的一个小房间，我问崔科员："这个房间太小，行吗？"他无所谓地说："行，挺干净。"政府人员住的房子不如我们住的，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干部不为自己考虑，如果是反动派的官一定先找一个好房间自己住，然后才能谈到别人。想这些又觉得低估了共产党的干部。国民党时期能领着政治犯去参观吗？参观什么？参观妓馆吧。

食堂在军民联谊社的楼下，是督察处第三巡查队的办公室。队长张子温是我下边的一个少校督察员，派他兼这个队的队长，综管车站附近地段的"治安"工作。他在这里抓了不少政治人犯，就在这个屋吊打施刑，逼迫口供，然后解送到督察处。他这个巡查队与警察二分局斜对面，老百姓不怕警察局，就怕第三巡查队，因为这是特务机关的外勤单位。记得1948年4月，有一天，我穿个长袍在街上走，在军民联谊社的对门，有几个老百姓吵架，我走上前去问讯是怎么回事？老百姓一看我穿个便衣，没戴帽子，像个大学生似的，没有理我，我说："你们在大街上吵闹，围了这么些人，有碍观瞻，我好心给你们排解，你们还不耐烦了，真是不知好歹！"

"你才不知好歹！"一个商人模样的闹事者气冲冲地给我来了一下子。

"你这个人太不对了，你打架不能把拉架的也打了！"

"你少管闲事，你管不着！"他的火越来越大。

于是我朝第三巡查队的门岗一招手，来了几个便衣特务和武装士兵，我说："把这个人带走，问问他们是怎么回事？"

许多人愣了，不知我是什么人，而我坐上汽车扬长而去，并且把这件事忘了。这几个人被带到第三巡查队押了两天，没敢放，第三天队长张子温给我上了个报告。我告诉他说："没有什么，吵架斗殴，放了吧！"

就这样无缘无故把人押了两天，无人敢问。现在想起来这些事不也是罪恶吗？谁知这几个人被押之后是病了？是伤了？受了多少经济损失？

我们坐下之后，长春市人民政府人员给我们介绍长春的情况。长春是过去宽城子车站发展起来的，有60年历史等等，并且透露1948年长春饿死了12万人。12万！我吓了一跳，真没想到。当时我身在长春，只知道饿死了许多老百姓，但没有统计，现在经过长春市人民政府统计，死了12万人，我们的罪恶不小哇。

在我们住的楼上，可以看到大街上的行人，车马，我们的右首是长春的胜利公园，1950年在这个公园，镇压了7个反革命分子，其中就有督察处侦审主任翟丕禽。

我给崔科员写了一个报告，请示如果有谢罪的机会，我要报名参加，控诉自己在长春的一切。

6月10日早饭，在食堂门口站了一二十人，内中有公安局的杨审讯员，他朝我点点头，笑了一笑。他怎么调做外勤了？也可能是临时执勤。我一看食堂门前和招待所门前站满了人，这些人衣服都不同，一定都是公安局临时派出的执勤人员。

吃完饭，坐上汽车到中国科学院长春玻璃仪器研究所参观。这个研究所专门研究玻璃仪器，照相机的镜头，望远镜的镜头均归这里研制。照相机镜头已经超过了德国莱克照相机的镜头。还介绍了许多新产品，因为我们是外行，领会不多。

吃中饭时，食堂的窗户都关上了。天气已经热了，为什么要关窗吃饭呢？我对他们说："咱们吃包子，又有炒菜，又有汤，几碟几碗，叫人民看见会有意见的。并且一所的人，在长春市有很多亲友，认识溥仪，认识张焕相的人多得很，叫老百姓看到了这些大汉奸受

这么高的待遇，人民会怎么想？长春的人也有不少认识我的。关上窗户吃饭虽然热一点，倒也减少不少麻烦。这是政府苦心的安排。”我们有许多人只看到关上了窗户，别的什么也没有看见。

下午参观长春市区。南湖，我在长春期间没有到过，整天忙于督察事务，没有功夫游山玩水。从南湖到红旗街，距长春电影制片厂有一二里。解放前这里设了检查哨，由我派特务在这里当哨长，凡是出去的人一概不准再入市内。所以在卡哨外饿死了许多人，这也是我的一条罪恶。从红旗街转到同志街，途经一座一座楼房，日伪时期是大汉奸和日本战犯的住宅。国民党来了，就由国民党高级人员住用。现在到了人民手里，有的作了托儿所，有的作了幼儿园……汽车开得很慢，从同志街又到了南关，然后进城到了长春大马路……长春这些大街，哪一条大街没有留下督察处的罪恶？督察处的特务在我的指挥下，每天每时都在抓人，都在维持“治安”。当时，我不过点点头，或者哼一声，可是下边的人要大肆逮捕，造成被害人的经济破产或生命死亡。金科长要我们站在被害者的立场上来想一想，对我震动很大。因为没有下车，没有遇到熟人，心里倒也安然。

6 月 11 日，上午参观第一汽车制造厂。给我们这队作解说的张同志是上海人，他在解说中最常用的话是：“在我们的国家，对待工人生活与劳动条件都给予了莫大的关心。”“在我们的国家，这是第一次生产汽车。”表现出新中国人民的自豪，我爱听他的解说。

我们参观了十多个主要车间，最后参观总装配车间。

我们看到 9 分钟一部解放牌大卡车从总装配车间开出去，真令人欢喜。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事情，将来产量还能多。有第一汽车制造厂，还要有第二、第三汽车制造厂呢。

去年我们是 9 个人参观，很方便。现在有 260 多人，一切都不方便了，有参观的，有等着的。我们这中队在大石头桥上休息，那边有几个执勤干部在说话：“哪一个是关梦龄？”

“就是那个矮个子，坐在石头上呢。”

"就是他呀!"

黄鹤听到告诉了我，我说:"我在长春的罪恶大，知道的人多。"

可以判断出来，这是一些年轻的公安干部，可能是杨审讯员告诉他们我来长春了，所以要看看我是什么样，一看，一个矮子，"一般"的反革命分子。

托儿所里的孩子真是可爱，这些小宝宝是祖国的花朵，革命的接班人，在托儿所站着队欢迎我们，与我们握手。圆圆的笑脸，胖胖的小手，又健康又活泼，都像画里的孩子。一个小男孩与我握手，问我:"你们来几个人?"

我笑了笑，心想，我们来几个人你不知道，我们是些什么人你们也不知道，如果你们知道我们是一些什么人，你们还能和我们握手吗? 孩子是纯洁无瑕的，哪里会想到这些，我为在孩子们面前的"伪装"而感到不好意思，但又不能不这样。

这里的儿童得到良好的培养，正在幸福的成长。这使我想到郭树人解放前的家境，他是少将，国防部第二厅的少将部员。因为他不敢贪污，不会招摇，他一家大人和四五个孩子，生活很困难。吃饭是粗粮，小孩子穿的衣服像小乞丐一样。他本人也吃不到今天我们战犯吃的伙食，他的小孩子更赶不上今天托儿所的孩子。这种情况并不是郭树人一个人，有许多少将都是这样。在国民党时有了兵，有了枪杆子，就能贪污，就能卖给养，就能吃空额，就能投机倒把，就能贪赃枉法，光杆司令是吃不饱，穿不暖的。这并不是说光杆少将罪小，我是说一个光杆少将尽管给蒋介石卖命，可是家中生活过不很好。所以参观托儿所之后，郭树人说:"这里孩子生活比我解放前的生活都好。"大家笑了，细一想，确实如此。

各组派了一些人去参观儿童医院，其余的人在家休息。

参观回来，国民党长春团管区司令李树桂对我说:"我们坐在汽车上，路过七马路督察处旧址，我告诉他们，这就是关梦龄犯罪的特务机关。我也有许多感想，那时我常到那儿去找你……"

我心中很不安，解放已经八年了，督察处所犯的罪恶人民没有

忘，我自己也没有忘，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6月12日上午，参观长春电影制片厂。解放前这里住了解放军，距国民党军队的卡哨只有一二里之遥，相距这么近，两边喊话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们参观了各种内外景，特技表演，又到摄影棚参观，那里正在拍摄山东吕剧《李二嫂改嫁》，吕剧演员郎咸芬饰李二嫂。为了一句话，一个动作，反复的修正，可见一部电影的拍摄需要很多劳动力，需要许多手续。什么工作也不容易呀。担任党的电影工作者，对人民的教育，对文娱生活的调剂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还参观了兽医大学，看到了苏联的阿尔登种马，这些高大的马能挽车四吨。

晚上宣布参观结束，夜里离开长春。什么会也没开。又一想，也好，只要能认罪，不在于形式如何。

夜间出发比较好，我们在长春这几天接触了许多人，可能有不少人晓得了我们的身份。如果白天上火车，那不是我们参观长春，而是长春老百姓来观看我们了。

临睡前，看到门前有人在执勤。我们来长春四天，白天夜里要由公安人员来执勤，需要很大的劳动。这么二百多个反动派和大汉奸，如果发生了什么事件那还了得。记得在1942年10月，蒋介石从兰州到西安，之前，由军统特务机关妥善地布置了警卫工作。因为1936年他在西安发生了西安事变，所以再一次到西安特别戒备。特务机关与胡宗南再三考虑，小心安排，不许发生任何事件。当时我被派充警卫组第一组长，担任西安北大街的警卫工作。规定抓了嫌疑犯一律扣押，等蒋介石离开西安再行释放。蒋介石到了西安，住西安城南王曲。召集西北将领开了五天军事会议。有一夜，蒋介石自己带了一个随从，进入西安南门，到钟楼一带观看市容。在他要走的时候特务才发现，临时动员一些人到南门等处警卫。这一次在西安没有出事。

1945年12月15日，蒋介石与宋美龄飞抵北平，抗战胜利亲自到华北来“安抚民心”。当时我在北京，担任前门大街到南苑机场

的警卫。蒋介石化名“高先生”,电话里一说“高先生出门”,北京的特务立刻行动,在各街道警卫。当时戴笠也在北京,这次警卫做得也好,没有出事。

特务做警卫失败的是西安事变。当时戴笠没有在西安。事后戴笠吹牛,如果他在西安,就不会发生西安事变。由那之后,军统特务给蒋介石做警卫,特别当心,不能使西安事变重演。

1946 年 6 月,蒋介石从南京到沈阳,陈旭东负责警卫。蒋介石离沈阳之前召见陈旭东,对特务工作予以鼓励。并奖给这次做警卫的特务十万元东北流通券,参加警卫的人每人一个金戒指。陈旭东对这件事十分得意,引以为荣。在 1956 年于辽宁省公安厅看守所谈到此事时,还颇有自豪的意味:“老头子到沈阳时,我派人做警卫……”

给蒋介石做警卫比较好做,给戴笠做警卫最困难。1942 年春于西安,当时西安警察局侦缉大队长马德皋给他做警卫,马德皋事后对我说:“咳,他乱跑,一会儿上汽车,一会儿下车徒步,东一拐西一拐,不一会追不上了,真伤脑筋。他走得快,有时他在前边走,忽然举手叫人,你就得到他的跟前,没有两下子就得挨骂。”这些特务勾当都已成了过去,今天人民公安机关的警卫怎么做的呢?

早上 5 点钟火车抵沈阳,又开动去鞍山。大家知道参观鞍钢,心里甚是高兴。到东北,不看看鞍钢,是不会领会“东北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之说的。我们参观了炼铁厂、薄板厂、无缝钢管厂、炼钢厂、9 号高炉、轧钢厂等单位。厂子太多又太大,到哪儿都要坐汽车。因之只把主要的厂子看了一下,还有许多厂子没来得及看,这样看已经感到很疲劳了。

薄板就是做铁壶及炉筒子的原铁板,在旧中国是不能自造的,必须依赖日本进口。所以中国人管做铁壶的白铁板叫“洋铁”。现在,我们能自己制造了,就不叫“洋铁”叫“薄板”了。无缝钢管过去也是不能制造的,解放以后也能自造了。

1945 年“九·三”之后,日本工程师临回国时,对中国工人说,

鞍钢这个地方，你们只可以种高粱和豆子。意思是中国离开了日本工程师的技术，就不能进行钢铁生产。事实粉碎了反动的预言，现在鞍钢这块地方，不但没有种高粱，反而建了许多工厂。

我们又坐上了专车，天黑以后火车到达抚顺城车站，三省五市的大参观到此结束。

我在这次参观中认识到，像这样大规模参观不是中共中央，毛主席决定是办不到的，这次参观要许多部门协助，交通部、工业部、公安部、各地党政机关……各个部门都给予了很大的方便，据说花了 20 多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真使我吃惊。我想起在哈尔滨量具刃具厂的精密加工车间，我看到门上贴着一个条子，“未经允许严禁入内”，但准许我们到里边参观，这是政府为了加速改造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之一。

参观之前，我们多数战犯有这么几个错误思想：

第一，我们抗过战，打过日本军队，并且还有人受伤。不错，我们承认反共，可我们也参加了抗战，日本投降，我们也有一份功劳。这是“抗日有功”的思想；

第二，现在国民党被打垮了，共产党胜利了，我们被俘了或被捕了，作了战犯。共产党说什么都有理，这种思想是“胜王败寇”的思想；

第三，共产党只会打仗，不会建设，打垮国民党是事实，但是要建设新中国，不一定能建设好，必须找苏联，共产党人不会建设；

第四，不服气思想。国民党被打垮，我们被俘，总觉得不甘心，特别是解放以后，看到一些干部和军人也并不是三头六臂，偏偏叫这些人打垮了，有点不服气；

第五，共产党只会宣传，实际情况也不知道，我们的脑子在解放前就存在“共产党只会宣传”的错误想法，到参观前还是没有变动；

第六，“贪天之功，以为己功”，我们在参观前认为，东北的工业是日本建设的，共产党来了，修一修，补一补，就说是共产党建设的。

经过三省五市的大规模参观，这些思想被事实粉碎了。

并不是共产党打了胜仗说什么都有理，共产党在没有把国民党打垮的时候，老百姓就拥护他。因为有道理，给人民办好事。在国民党没有被打败的时候，老百姓拥护吗？不拥护。压榨人民，抢掠人民。在参观中，哈尔滨金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及抚顺市台山堡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接触的社员，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拥护，是异口同声称之为救命恩人。真理只有一个，不是胜败的问题，只要是真理必定会胜利。如果不是真理迟早也是失败，必被人民所唾弃，“胜王败寇”的说法被否定了。

没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就没有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我们所参观的企业厂矿都有共产党人参加，都是共产党领导。亲眼一看，就改变了原来的说法。第一汽车制造厂有一个师参加建设，放下武器，拿起工具。这样例子很多。

不服气是没有用的，这些平凡的人做了不平凡的事情。解放前哈尔滨是一个消费城市，抽大烟的、扎吗啡的、开妓馆的、设赌场的，到处皆是，社会风气败坏，流氓恶霸横行。这样的社会国民党绝对没有办法治好，但是共产党能治好。共产党的干部诚然不是三头六臂，但是这些干部诚诚恳恳为人民服务，不贪污、不舞弊，以人民利益为利益，这些事实摆在这里，不服气有什么用！

“共产党只会宣传”这是国民党的说法。我们这些战犯也中毒很深。就这次参观而言，参观前管理所的干部并没有对我们进行宣传，我们到各机关、企业参观，都叫你看实物，详细看。同时我认为，如果宣传对人民有利当然可以宣传。

东北的工业不是修一修，补一补日本遗留的厂矿，而是大力兴建工业设施。鞍钢解放后建设了许多新厂。长春的汽车制造厂，哈尔滨的亚麻厂、量具刃具厂、电表仪器厂，长春玻璃仪器厂等，都是解放后新建的，不是修一修，补一补日本留下来的，更不是国民党建设的。

当然，并不是一次参观就能把我们全部思想都解决了，可是对

我们安心改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回忆我的改造过程，在没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前的八年改造中，对共产党也是拥护的。为什么拥护呢？因为没杀我，宽大了我，我在良心上不能不说共产党好，不能不说毛主席对我的天高地厚的恩宽。究竟共产党怎么好呢？经过这次参观，我知道共产党好，不是仅仅不杀我的宽大政策好，而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翻身，能把人民引向富裕幸福的生活大道。这样以来，从理论到实践，从现象到本质，使我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更深一层的信任。

离开管理所 9 天，回到监号感到屋子尘土很厚，光线也十分暗。多日没翻报纸，打开报纸，我看到右派分子向党发起了进攻。

①欧阳午：据 1960 年第二批特赦国民党人员名单记："欧阳午国民党第 60 军暂编 52 师少将副师长"。后经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撤销原特赦通知书，按起义人员对待。据长春文史资料记载："欧阳午同志，1948 年 10 月 17 日，在暂编 52 师师长李嵩阻碍起义被曾泽生扣押后，欧阳午同志毅然随曾泽生军长率部起义。现任南京市玄武区政协委员、中山陵管理委员会委员。"

②孙所长：即孙明斋同志。

③金科长：即金源同志，后来任抚顺战犯管理所副所长、所长。

④3、4 所：抚顺战犯管理所下辖的"所"，为战犯的管理单位。1 至 7 所的序号为当年管理日本战犯所列。大批日本战犯离去后，只有 1、3、4、7 所关有战犯。1 所关押的是伪满洲国战犯，7 所关押的是日本战犯，3、4 所关押的是国民党战犯。最初国民党战犯是以地区分所、室，后来因生产分工，身体状况进行若干次调整。

⑤沈阳军区抚顺战犯管理所：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抚顺战犯管理所"，但其组织、人事、业务均归公安部门领导。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出现是管理战犯的特殊需要，以示与管教普通罪犯之不同。

⑥金本水火土：长春督察处刑讯犯人除一般的打骂、体罚外，专门设有金、木、水、火、土五类刑罚。金刑：以金属物、金属器械伤人，如，铁棍、铁丝、铁条、钢丝鞭，过电也属金刑之列；木刑：刑具以木器为主，例如坐"飞机"、压杠子、打棒子等；水刑：对受害人灌辣椒水和凉水；火刑：用点燃的蜡烛去烧被害人的脚心；土刑：让人跪在硬地或砖石上，两手高举一本杠，长时间不许动。

第七章 监 门 微 启

越来越紧

每日整理参观笔记，编写、排练庆祝“七・一”的节目……虽然没有空闲，我依然坚持看报，了解反右情况。

右派分子诬蔑共产党的领导，说现在生活不如过去，大家很气愤，郭树人说：“胡说八道。叫他们到南满的鞍钢看看，到北满的长春汽车制造厂看看，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一事无成。”然而大家对于参观回来释放的想法自消自灭了，希望落空了。有人焦躁不安，吵闹起来。4所56室刘衍智与王毅夫俩人在熄灯后大吵大闹，白科长到场也没能制止，真是不像样子。

我自己认为最近出不去，这一反右更没有希望了。如果右派不闹事也许有可能，右派在社会上捣乱与我们也有牵涉，会有人认为战犯放到社会上，会成为右派的预备队，因而绝不能放。共产党释放我们这些人不容易。

我对右派分子还有同情之处，开始共产党号召大鸣大放，这些右派就发起了议论，如果不叫大鸣大放，谁敢讲呀？右派分子这是

上了当，现在又反右，将来叫谁给共产党提意见？只能歌功颂德，隐恶扬善，坏话、批评的话绝对不能说？想一想，自己好说，如果在社会上遇见大鸣大放还不一样瞎说？也成了右派。没有出去就没有这些麻烦了。犯人有什么反动想法也不奇怪，因为没有改造好嘛。我的同情右派的想法，在当时只吞吞吐吐的暴露了一半，认为还是马马虎虎吧，暴露太多了，成了监内的"右派"，那就是斗争的对象。无事不找事。政府规定出来"犯人守则"，有十多项，第一条是服从政府人员的管教。守则拿到小组叫大家讨论，大家说我们是战犯应当遵守犯人守则，遵守犯人守则是我们认罪服法的具体表现。大家都从正面发言，可是心里都有一个想法：参观后不但不放，反而越来越紧，以后的事还要多。

我一想，有了犯人守则就不能随便了，一切都要遵照守则办事，违犯就是错误。看来这里也要往监狱犯人的制度上发展。

白科长召集学委会及生活组长开会，指示各号用不着的东西，如绳子、带子、小刀子、玻璃碴子等都要缴出来。这事传达以后，一些抵触思想就发生了，杨南邨问："我们的桌子缴不缴出去？"段克文问："钢笔尖也是铁器，缴不缴出去？"

我有一个小镊子，我一贯不刮脸，用这个镊子拔胡子。传达以后，我认为这个镊子是我用的东西，没有缴出去。刘荣第知道后，一定叫我缴出去，我说："这是我用的东西，这个镊子从长春监狱带到吉林公安厅看守所、辽宁公安厅看守所，经过这么些机关都没有上缴，现在我还需要，我不缴！"

"不缴不行！这是制度。"

"传达不是说了嘛，用不着的东西缴出来，这个镊子我用！"

"这东西不是必要的。"

"这件事你报告白科长也不会叫我缴，就是你找我的麻烦！"

我与刘荣第闹成了僵局，我非常抵触。一方面对刘荣第，一方面对犯人守则。犯人生活就是不好过，想不到的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

刘荣第把这件事反映给金班长，刘荣第的意思是，像关梦龄这样不守制度应该批评，可是金班长没有找我，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反映的，我只好不理。

第二天，金班长找我，我心想没有别的事，一定是为了这个镊子，我已准备了许多理由，金班长很和蔼地问道："你有一个镊子吗？"

"是的，我有一个镊子。"

"这个镊子你需要，你就留着用吧，不必缴出来了。"

我一听，出乎意外，立刻一切抵触都消失了，什么理由也没有了。我又一考虑，感到自己不对，我马上说："报告班长，我这个镊子说用也用，但不是必须用它不可，我与刘荣第闹别扭，是因为我不满意他的态度，现在班长既然这样说，这样照顾我，我不留了。""你留下吧，我叫你留的，没有关系。"

一个 20 来岁的青年态度这样和蔼，处理问题这样大度，事情虽小却使我很受感动，从他身上体现出共产党的温暖，我站在金班长面前显得太渺小。我接着说："政府这样照顾我，我更应当自觉，我现在认识到，我不应该留这个镊子。"

"那你把镊子缴出来，拔胡子怎么办？"

"我先缴给班长，我用的时候再向班长要。"

我的意思是能把镊子缴给班长我的心就安了，所以我找到一条缴给班长临时保管的理由。

"那也可以，使用的时候找我要。"

我回到屋里，把镊子拿出来，高高兴兴地交给了金班长。

王光复问我："怎么的？受了批评了？"

"受了批评我就不这样了。"我把经过对王光复说了一遍。

王光复说："共产党教育的青年真不简单，就这么一点事情，如果批评一顿，把镊子要出去，你还能不服从？可是那样做效果不好，他这么一处理，你也自觉了，事情也办了，你还感到政府很照顾我们。事情是一件，办的方法不同，效果也不一样。这个金班长，别看

他年轻，不慌不忙的办事挺稳当。”

这个班长叫金兴石，犯人对金班长印象最好。比如有一次他值班，周上凡是3所的总值日，他搞错了人数，金班长只看了周上凡一眼，并没有批评，周上凡脸便红了，马上对金班长检讨，金班长说：“以后注意，人数不要差了。”

周上凡以后对我说：“金班长不批评人，可是谁都尊敬他，因为他的态度感人。我就怕他，在他当班时特别小心，十分自觉，叫金班长费心那就太不对了。”

秋天进行草袋子生产，参加劳动的战犯，开始认为这是运动，因为政府人员就是这样说的，后来才知道这不是运动，而是劳动，于是在思想上就有了抵触，如尚传道说：“这样疲劳轰炸怎么能受得了！”

他这样说，受到了同犯的批评，因为他没有上过劳动改造这一课，他只在公安局看守所住单人房，犯人的事对他来说一点也不懂得，他想的是多看一些书，将来当研究员。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他就感到疲劳了。大多数犯人的劳动是好的，有一股干劲。我参加打绳，脱了光膀子干，我是为了锻炼身体，倒不全为生产草袋子，利用劳动机会，增强劳动观点。

国庆节时，政府组织所有的战犯到抚顺市观礼。观礼台仍设在抚顺车站，在主席台的右首预备了一些凳子，那是我们三百人的座位。坐在观礼台上看大会游行。孩子们拿着鲜花，成年人举着红旗，五光十色，灿烂夺目。正在我们看游行的时候，我发觉我们后面来了三四个武装战士，我回头一看，是大会的警卫哨兵，他们知道我们是战犯，便过来看守我们来了，真不好看哪。就在这时金科长到了后面，小声地跟这几个战士说了一下，他们就走了。我一想，还是金科长懂得我们心理。政府不怕我们出事才叫我们来观礼的，这些年轻的战士不明白我们的情况，结果对我们产生了刺激。

观礼回来，大家发现一所的人不够数了，原来有五六十人，现在没有那么多了。演剧的那个高个子，变戏法的小个子，扮蒙古姑

娘的那个人，唱歌打拍子的那个戴眼镜的，一二十人不见了，是释放了吗？还是转监了？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这时露出了消息，在6月举行大规模参观的时候，他们这些人没有去，释放这一二十人的事还见了一所的墙报。我对释放这些人的看法是：这是一些小汉奸，不是大臣之流，在解放战争中没有罪恶，捕来押了几年表现还不错，从轻处理，予以释放。我认为不会转监，在战犯管理所的战犯不会再转到一般监狱去劳改。真的到了监狱，这里的事传到刑事犯的耳朵里就不好了。

冬天举行了一次图片展览，通过“图展”认识国民党统治中国的罪恶，以及解放后，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我是这个图展的解说员，这个图展由吕科长主持，由三所学委会主办。一切图片制妥之后，先做一次预演，由吕科长亲自听了一下，又加纠正了一些事情。比如画社会主义阵营的地图，用蓝墨水画的。吕科长问田文奎这是什么道理？田文奎说：“没有红墨水，才用蓝墨水画的。”像这样的事情，如果不及时纠正，就会出笑话，犯错误。

交罪种种

1958年春节过去不久，金科长召集3、4所犯人做动员报告，检查不认罪，怀疑政策的思想，进行互相帮助。由浅入深，步步深入。

开始几天，吕科长到各组窗前听同犯们的发言，然后召集学委会，批评学委没有把大家动员起来，发言没有声势，有气无力。于是学委会向各学习组长传达了批评意见，要求一定要把学习深入下去，并开展写大字报，互相批评。这样一来，运动开展起来了，相互提意见也逐渐的尖锐起来，从暴露思想进展到交罪，互相揭发罪行。这样一来，有的同犯受不了了，产生了抵触。比如我们小组给

黄炳寰提意见尖锐了一些，特别是刘荣第说黄炳寰交罪打埋伏，有罪不交！黄炳寰闹了情绪，在一天早饭时，黄炳寰对生活组长姜明文说："老姜，现在我正式表明：我开始绝食！"黄炳寰果真不吃饭了，大家怎么劝他也不吃。我也劝了他几句。我认为黄炳寰绝食是十分愚蠢的，坚持下去是要吃亏的，这是吓唬政府，难道因黄炳寰绝食而停止交罪？或者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批评？不会的，他想得太简单了。

崔科员上午便把黄炳寰找去进行了教育，中午他便吃饭了，就像小孩似的，所以，吕科长说："反动派的官越大，越愚蠢。"一点也不错。我们这些在国民党时期负责任的人，到了今天，丑态百出，不像个样子。

张国泰检举了陈旭东："陈旭东对我说，南京解放他之所以没有走，是因为有潜伏任务。"

根据这个检举，辽宁队开大组会对陈旭东进行帮助与斗争。我这时进退两难，追陈旭东的潜伏组织吧，他不可能有。是毛人凤叫他留下来在南京潜伏吗？根本不可能。像陈旭东这样一个交际甚广，人人皆知的人物，怎么能做潜伏活动呢？蓄意把这个潜伏工作弄垮，才可能派陈旭东潜伏。并且，陈旭东在军统里并不是一个重要的特务，也不被戴笠与毛人凤所信赖，这一点不是军统内部的人是不会知道内情的。军统所以任用陈旭东，是因为他在东北的军界、政界，有很多人事关系。比如 1945 年底，把陈旭东派到东北，给文强当副手，实质是叫他为文强作向导，作开路先锋，给军统局拉磨。而东北特务的总负责不能交给他，因为不信任他。既然不信任，就不能叫他做潜伏。再说做潜伏工作也要有一套潜伏的布置，上下级的关系不能没有。既无电台，又无交通，有了情报交给谁呢？与什么人取得联络呢？这些都没有，这个潜伏怎么做呀？所以说他没有潜伏任务。

况且，如果陈旭东真有潜伏任务，他怎么可能对张国泰说呢？不会那样冒失，他既没有神经病，也没有喝醉了酒。张国泰检举他，

可能把他的话听错了，所以我认为张国泰这样检举是有问题的。可是我不能表示，只能跟大家一样帮助他，叫他交待组织、交潜伏名单。我不这样办又该怎么办呢？运动一开始，我给陈旭东当律师，那就成了运动的障碍物了。我只有叫他交这个交那个。我真是言不由衷，即便这样，大字报也不指名地批评了我，意思是说，与陈旭东很有来往的人在帮助陈旭东的时候表示冷淡，顾虑重重等等。我对此不予理睬，也不去申辩。辽宁队的大组会开了几次，陈旭东始终没有承认潜伏任务。有一次，崔科员亲自主持，陈旭东也没有承认。

5月底，4所战犯赵一雪检举了我们小组犯人赵广元在南京当汉奸处长的事；又，业杰强检举张国泰当参谋长召开军事会议的罪行。这么一检举赵广元原形毕露，他始终没有交待这个汉奸职务。他认为当反动派比当汉奸强。不仅赵广元有这种想法，我们都有这种想法。认为1所汉奸比我们坏，我们与1所汉奸在一起改造都有些抱委屈。因而赵广元在南京当汉奸的罪恶决心不交。可是这一次经过赵一雪的检举，不交不行了，他才交出来。

1958年6月，在交罪运动中辽宁队迁到了4所，仍由崔科员领导。

有一天，吕科长召集各学习组长开会，在启发战犯交罪时提到了我，吕科长说："关梦龄有四五十条血债，在长春是军统特务重要分子，他什么罪恶都敢交，才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你们不要顾虑，不交出来并不等于没有，只是说明顽固。"

交罪运动开始以来我没有什么顾虑，我的主要罪行已交了，并且判了刑，有了判词，我是很坦然的。我一方面对别人进行帮助，一方面我也补交了二百多条余罪（都是一般罪行）。

交罪运动使战犯有许多想法，大致是：要根据交的罪判刑，这种判刑是不公开的，判而不宣；再就是判刑之后可能迁到监狱去改造。还有的人认为，从前已进行了交罪，这次再交不是说明我过去不老实吗？再者，如果这次都把罪交完了，将来再号召交罪，不就没

有可交的了？所以有许多人不敢大胆的交罪，有许多顾虑。

在交罪检查中出了许多相声材料。周觉民在检查中大吹大擂，说他家在贵州是一个望族，多有钱、多阔绰，把他家说成是贵州的“周府”，这不是检查，是吹牛；北京队一个战犯路秀三说，在英国海德公园，可以对当政首领发表不同意见，这是最民主的国家，他自己受其影响有海德公园思想。这张大字报被武汉队肖步鹏看见，他也贴了一张大字报，说自己也有海德公园的思想。一问他什么叫海德公园思想？他说不知道，再一追问，他说：“我看路秀三那样写，我也那样写。”这不是笑话吗？我把这些事编成了一个相声。

交罪的问题更多，有的把小罪说大，有的把大罪说小，有的化整为零，有的罗列现象，有的看风使舵，有的采取关门主义。

把小罪说大：我打了农民，因为我这一打，农民病倒不能出工，给这家农民带来了许多损失，分析起来这件事的后果不堪设想；

把大罪说小：有人说这个毙命农民是我枪走火打死的，这是错伤，过失杀人；

化整为零：一件罪恶分成几条。比如枪杀了一个地工人员，他把它化为四条罪，搜集地工情报是一条罪，逮捕是一条罪，审讯地工人员是一条罪，杀革命者又是一条罪；

罗列现象：比如肖抱愚把在当国民党贪污、吃空额也列为罪行，用他的话说：“我在国民党军队吃空额，不用担架兵。到各县要民伕做担架兵，这就是罪恶！”这个罪恶是抓民伕，搞贪污、吃空额……多罗列一些现象叫人知道他交罪多；

有人看风使舵：交一些似是而非的罪。比如带兵的战犯，交枪毙逃兵的罪，有人问：“枪毙逃兵是什么罪呀？”他说：“这个罪大了，被枪毙的是劳苦人民的子弟，用枪毙逃兵来巩固反动派的军队纪律，为反动派效忠，这不是一条严重的罪行吗？”这不是他的主要罪恶，他交这些罪的目的是看看风头再作道理；

有人采取关门主义：干脆说：“我的罪没有了，都交清了。”意思说，你们帮助我，我也没有了；

还有人无理取闹：谢代生交罪有一条是："小时，我偷妈妈的钱，这是自幼不端，本质恶劣的证明。"

还有人利用交罪，粉饰自己：李介立交罪时说："我在当团长时，驻防一个地方，我把这地方庙内的泥像都打倒了，这是罪行一条。"我对他说："这也不是罪行啊，这是你不迷信，反封建，进步的表现哪！""不，我把佛像打倒是不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对人民有害处，这是罪行。"

赵广元交罪："1925年，在沈阳当警察厅督察时，打了一个商人的耳光，是罪行一条。"

张国泰交罪："1926年，我当团长时偷了老百姓一条床单。"

各式各样的情形都有。政府根据这些现象，进行了批评，端正交罪态度，并且在四所成立了一个交心室，由衣科员负责布置。交心室四周都是图片，屋内阴森森的，一进屋便毛骨悚然。图片是许多罪行画片，有割头的、有割女人乳房的、有活埋人的、有用火烧的、有用辣椒粉熏死的……每张画片都有具体人和具体罪行。画了一百幅左右，叫四所犯人分批到交心室去表示态度。另外，谁如果有罪不交，就把这个人拉到交心室，叫他跪下，对他斗争。

我们辽宁队也到这屋去表示态度，我一进屋便考虑，如果叫我交罪，我交不出来血债怎么办？想来想去只好胡编一套，反正我编的谁也查不出来。宁可胡编，也不能抗拒，宁可犯胡编的错误，也不能犯阻碍运动的错误。但是没有拉我出去我也就没犯这个错误。

辽宁队由崔科员领导，他也领导南京队的运动。6月底，交罪运动达到高潮。虽然有午睡，衣科员却仍然在午睡时间集合一些战犯开帮助会。这时的会都是斗争会，一发言就是大声喊叫，表示有声势。开这样的会，辽宁队的午睡睡不成了，南京队也没有人敢睡，都在准备材料或写大字报。高潮中发生了许多事情，南京队打了陈廷琪的耳光，是姚轻耘打的；贾斗奎被捆起来，是袁剑飞等人动手绑的，罚立正等事情也都出现了。

有一天晚上，走廊摆着桌子，拉人上去交罪。被拉上去的是段

克文，他拒不交罪，又把他拉到交心室，叫他跪下交罪。这时刘荣第走到段克文跟前，打算劝说段克文交罪，结果斗争段克文的叶佛佑与陈庆斌误解了，以为刘荣第是去袒护段克文，便动手打了刘荣第，胳膊打破了，陈庆斌说："段克文不交罪，你刘荣第去包庇，不打你这个落后分子，打谁？"

崔科员来了，他问了一下事情的经过，便叫刘荣第到医务室上药去了。上药回来，我看刘荣第的小褂撕破了好几块。我对南京队打人很不满意，不应当打刘荣第，这内中一定有缘故，是叶佛佑的意思吗？没有搞清楚。

在交罪当中，南京队的生活组长（南京队习惯称为行政组长）更换太多。比如今天肖桂国交了罪，衣科员便在肖桂国那号门口说："你们这组生活组长由肖桂国担任！"原来的生活组长也不撤，如果再有人交罪好，又派了一个生活组长，达到一个组三个组长。真是少见的事情。交罪好坏用当生活组长来奖励，如果这一组都交得好，大家都当生活组长？那么谁来当组员？

有一个下午，衣科员叫 4 所的人每人画一张自己的罪行图，贴在墙报上。有的会画，有的不会画，但是叫画，怎能不画？结果画个乱七八糟，贴在墙报上也看不出来画的是些什么东西。我想，这一定是为了加深我们对罪恶的认识，才叫我们画的。然而画得不像，效果不好，达不到预期目的。

段克文抗拒交罪运动，来了个关门主义，政府给他戴上手铐，由黄看守长将他押出监号，战犯们鼓掌，表示政府处理得正确。

我们小组的黄炳寰被拉上 4 所走廊的桌子，他胡编了一些罪恶，回到小组便推翻了。后来辽宁队召开大组会，帮助他，他立正站在门口。有一个人说："黄炳寰再不老实，叫他跪下！"说时迟，那时快，黄炳寰一个箭步跑到外面，径直朝后院大烟筒跑去……他在前边跑，欧阳午和尚传道在后面追，黄炳寰跑到大烟筒跟前，抓住了铁扶手，欧阳午赶紧用手把他的脚拉住，他上不去了，这时孟班长跑来了，他叫黄炳寰下来，黄炳寰不下来，但也不上去，最后，大家

一拉，把他拉了下来，这时黄炳寰说："我的自来水笔呢？"大家赶紧帮他在地上找笔。我心想，这个家伙老是办这些丢人的事情。上次他绝食，这次又跳大烟筒，他是想死吗？不，他是吓唬政府，真想死，还要自来水笔干啥？

烟筒没有跳成，黄炳寰回到了监号。孟班长没有批评他，但气坏了。第二天早上，黄炳寰把新袜子、新鞋穿好，坐在行李上静等枪毙。他认为这件事是在交罪运动中犯的必然要杀头。上班后，崔科员把黄炳寰找去教育了一番，黄炳寰回到小组两眼发直，精神不振，心中忐忑，不知他又在想什么？

段克文戴上铐子押在禁闭室反省。自 1951 年，我就与段克文在一起改造。他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他不会反省好的。这次关在禁闭室，经过崔科员个别对他教育，又叫他到辽宁队的大组会上交待问题。这天学委会、辽宁队的 28 个战犯都集中在 4 所 59 室。崔科员叫段克文发言。

段克文戴着铐子，面不改色，发言还是之乎者也指手划脚，什么罪也不交，满嘴是辩护的话。大家一听，都说他不老实，但又找不到要害。我知道崔科员也没有掌握段克文的材料，刘荣第知道一点还是我说的。会场被段克文控制了，都在听他夸夸其谈。这不成了笑话！我站起来请示发言，我说："段克文在这个运动中起了破坏作用，在这儿戴上手铐恐怕还是第一个人。如果不是太坏、太顽固也不至于如此。这一点，段克文首先应该认识到。段克文有没有罪可交呢？有罪可交，他在吉林伊通县当县长，成立保安队，在长春近郊枪毙老百姓，这内中还有血债。段克文对这件事，对这个罪恶没有很好交待。别人一提，他就来个关门主义，顽抗到底，再就是他在长春督察处寄押了一个人，寄押的这个人据督察处法官于文学检举是有八路嫌疑的人，后来这个人病死在看守所。这件事段克文也没有彻底交待。他说押的这个人是逃兵，可是参加审讯的于文学说不是逃兵，这是一个问题。"

"再就是往脸上擦'雪花膏'。1945 年于上海见了戴笠，戴笠叫

段克文回东北刺杀张学思。我认为这是段克文假造的。他认为戴笠已经死了，无人出来对证。表示他对张学思还有一点'照顾'的意思，这不是假装进步吗？他说1945年12月戴笠在上海见他，那时戴笠不在上海，在北京，我每天都看见戴笠。再说，张学思的问题是军统局计划策反张学思，而不是刺杀。如果真的刺杀张学思，能派段克文吗？按段克文说，他与张学思是同学，这个关系能成为刺杀张学思的条件吗？况且段克文没干过外勤，对行动工作是外行。如果找人行刺，又不会布置。这样的情形戴笠派他去刺杀张学思谁能相信？这是不是在交罪运动中向政府邀功呢？"

我又问段克文："你见过戴笠，那么戴笠穿什么衣服？什么样相貌？有什么特点？住的是什么房子？你说说叫大家听听！"

他说了半天都不对，陈旭东在旁边也笑了。因为段克文没见过戴笠，怎么想象也想不出来。戴笠留着大背头，铁青脸，大嘴，不喝茶，不吸烟，头发上抹许多油，经常不戴帽子，冬天穿藏青哔叽中山装，夏天有时穿绿呢子中山装，穿别的衣服较少。鼻子有病，经常用手帕擦拭。一口浙江话，走路快，这是戴笠的特点。没有与他接触过怎么能想象出来呢？段克文说戴笠从腰里掏纸烟吸，这就是胡扯了。段克文把见戴笠认为是光荣，居心何在？我说："把假东西说成真的，那么真东西又说成假的，这就是问题。这样下去，这副铐子你就保持住了。"

接着陈旭东也发了言，同我的意思一致。但是，段克文坚持他见过戴笠，我一想这没有什么争论的必要。崔科员叫段克文再反省一下，把他送走了。过了几天，把手铐给他下了。许多问题他是以不变应万变，也过了关。

在交罪运动中，万厉患了大疮，小便都烂了，屋里味儿难闻，真怪，大绿豆蝇也不知从哪来的，那么多，把万厉都给包围了。郑明新给万厉洗衣服，收拾床铺，表现得不坏，很关心同犯。没有几天，万厉被送到市立医院去诊疗。我心想，政府真好，给我们治一切病，连花柳病都给治。像这样的病在家中也是讨厌的，在这里受到政府的

照顾，真是令人感动。

交罪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姚步烈诬蔑政府人员，有一些犯人非常气愤，把他打了。我心想，只要不打出伤就行，应该打，这个小子不可理喻。杨不平作反动诗，也被大家斗争了……在交罪运动中必须急风暴雨才能促使战犯认真对待，如果和风细雨有些罪恶就难以交出来。至于个别人由于思想不正确，动手打了人，这是同犯之间的事，这其中也有伪装进步而打人的。

到了 7 月初，3、4 所战犯的罪恶基本交待清楚。我补交余罪 202 条，过去交罪 102 条，共 304 条，一齐抄写清楚，呈给了政府。

人人呈请处死

罪交完了，接着进入认罪阶段，这一阶段辽宁队的学习归衣科员领导。崔科员不管学习了，大概是筹办电机厂去了。

南京队在认罪阶段，一些人要求处死，赵玉林说："过去我钻了政府的空子，判我 15 年有期徒刑。现在我认识到，自己罪大恶极，请求政府把我处死，以平民愤。"

衣科员叫我们辽宁队去听赵玉林的发言。赵玉林发完了言，衣科员对辽宁队说："你们听听，人家是怎么认罪的。"并责令高青山发言。

高青山没说两句话就被南京队给制止了，说高青山不认罪。接着，衣科员召集辽宁队学委刘荣第、高青山及三个组的学习组长、生活组长谈认罪问题。只有欧阳午与尚传道两个人呈请枪毙，别人都没有这个请求。衣科员把没有请求枪毙的人撵出了会场，留下欧阳午与尚传道在那屋里继续漫谈。不一会儿，又到 3 所，把辽宁队的人重新召集在一起，再谈认罪。这次改由欧阳午主持会场，刘荣第与高青山在一旁坐着，俩人一声不吭。辽宁队的人谁也不知怎么

说才好。我只说:"我罪大恶极,判15年太轻,应当加重判处。"我没有请求处死。

第二天,写呈请处死的申请书,每人都要写,我也写了一份。这是谁的意思呢?是衣科员的意思?还是管教科的意思?如果多漫谈几天,战犯有这种认识可以,然而漫谈的时间不多,每人就写处死申请书,能处死吗?不可能。正因为知道死不了,这样写谁也不在乎。要从内心真正认识到我们这些人罪应处死,出于本心写这样的申请,那才是水到渠成。可是现在总有点勉强,思想工作做得太草率,争取时间完成任务就不免走过场。

辽宁队三个组配属在南京队里学习,辽宁队的学习组长、学委,在南京队都是组员。在衣科员的思想里,辽宁队是最落后的,只有南京队才是进步的。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辽宁队归衣科员领导,成为后妈的孩子,南京队是亲生的孩子。刘荣第、高青山在崔科员领导时是最信任的两个学委,可是归衣科员领导之后,最烦的就是他们二人。于是先斗争刘荣第,说刘荣第没有写自传,叫辽宁队写大字报帮助他。刘荣第在4所56室学习,我也在那学习,陈庆斌是56室的学习组长。陈庆斌秉承衣科员的指示,斗争刘荣第,叫我先发言。我说什么呢?刘荣第没有什么缺点,我罗列了一些鸡毛蒜皮,说我包庇。我心中不痛快,一想,算了,落到后妈手里老实一点好,光棍不吃眼前亏。

刘荣第白天写检讨,夜间写自传。刘荣第嘴里不说什么,心里怎么想的我知道。我认为衣科员与崔科员在同一领导之下工作,为什么对战犯有两种态度呢?是衣科员左了呢?还是崔科员右了呢?我看衣科员处理问题有点左。

比如衣科员对战犯的态度有许多地方值得研究,有一次叫袁剑飞写一张大字报,袁剑飞写好了,请衣科员过目,衣科员一看,便给扔在了地上,大不满意,又一次叫王仲模统计战犯通信表,王仲模的字写得潦草,衣科员便把这个表撕得粉碎,扔了一地;李寓春交了罪,后来又写报告给政府,说他交的罪有一条是假的,衣科员

回答说："谢谢吧！"这是什么意思？不明白。

衣科员最好临时召集战犯开会，他到4所一边走一边说："每组来两个人到学委会！"

一个组派出两个代表到了学委会，大家不知什么事。衣科员先说了，大意是，有的人思想很成问题，对蒋美还有留恋，"你们挖一挖，这是什么思想根源支配的？"首先刘衍智发言："我就有幻想蒋美思想，这是我根深蒂固的反动思想支配的。我是极顽固的战犯，科员不指出来，我是绝对不说的，科员今天指出来，是对我的教育，我一定要……"下了一些保证就收场了。

再过两天，又开了一个会。衣科员说，有一些人讨厌学习，不愿学习。这么好的环境不好好学习，将来怎么做人？这些人厌恶新东西，说明还没有接受改造。问谁发言，刘衍智又站了起来："我就有这种厌恶学习的思想，一学习就瞌睡，有这样好的环境不好好学习，这是对不起朝夕教导我们的政府人员，我今后一定要……"又下了一些保证。南京队有一些人，如赵一雪、徐照明、杨南邨、樊迅等人都会赶浪头，只要衣科员提出一种错误思想，马上就有人站起来承认，并且把自己大骂一顿。类似这样的会事先无准备，当场现发言，我认为效率不高，有时起好作用，有时起副作用。

衣科员办事性子急，遇事乐于立即作决定，比如张林生当学委的事，怎样决定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因为上山劳动，张林生很能干活，就叫他当了学委。但是张林生这个人并不是很适合作学委的，说话随便，随意打人，都产生过不良影响。

1958年的交罪运动成绩是肯定的，因为不交罪，就谈不到认罪；不认罪，又怎么能谈到安心改造呢？如果说后来我们改造有成绩，那就是这次交罪运动奠定了改造的基础。

回想一下交罪之前，南京队有一些战犯认为："我犯的是公罪，是国民党整体的问题，我自己没有什么罪。我被俘，迁到这里总感到有点那个……"就是说，叫他改造冤枉了他。他的罪是国民党的问题，不是他个人问题，不认罪。可是经过交罪和认罪之后，都转变

了："我们这些人都是人民的罪人，我们这些战犯杀了几十万人，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不论怎样我们都是蒋介石的忠实工具，没有我们这些人蒋介石一个人就反动不起来。所以我们应当认罪，应当感谢共产党对我们的宽大，感谢人民政府对我们的不杀之恩。"如像赵玉林"请求处死"的发言便是感恩的心理的一种表示。

交了罪，认了罪，感到没有包袱，轻松愉快了，在这改造也心安理得了，不平不满的想法克服了。

这与管理所首长的正确领导分不开，与衣科员的苦口婆心的教育也分不开。在成绩当中，也避免不了有缺点。有一些我认为是缺点，也不一定就是缺点。在我与衣科员接触当中，我感到他也有优点。办事直爽，快刀斩乱麻。他对我从来没有批评过，还多次在会上表扬我，表扬我打草绳打得快，交罪交得好，热心搞文娱等等，对我鼓励很大。

崔科员是否右呢？他领导我们的时候对我们不多批评，或不批评，形成"迁就"我们，也许他强调我们自觉，可是我们有一些人却不能体会到这一点，所以，黄鹤说："崔科员还没说我'不'呢，你就说了！"再就是对刘荣第与高青山等人过于信任，比如1957年冬评奖，辽宁队郭树人得一等奖，得了一支自来水笔，是不是郭树人比别人都好呢？不见得。就因为郭树人在帮助尚传道时肯破除情面，大胆直言，替高青山说话，因此刘荣第就说郭树人如何了，而得了奖。后来有人说怪话，郭树人又要退奖，受到了白科长的批评，这些事属于偏听偏信。

一切又恢复正常了。在交罪运动的两个多月里，没看电影，停止了一切文娱活动。有一天，秦班长叫我到院中去搬东西，我一看是部新机器。我问："这机器新买的？"

"可不是，新电影放映机，五千多元呢。"秦班长说。

我从这部放映机看出来，我们在这改造还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日本战犯在这的时候，有那么多人都没有买这么好的机器，我们来了就买这部机器，看起来来日方长啊。

大家所关心的

这时候大跃进开始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提出来了,展开了敢想敢干的活动,新的发明创造如雨后春笋。为了配合我们学习,政府组织我们参观"超英馆"。我们在大墙里边不知道社会上这样敢想敢干,一座大楼二十几天就盖好了;有许多产品超过了英国;连抚顺市一些中学都有发明创造;工人开动脑筋找窍门;都在大跃进。我们看到了许多实物,非常惊异,怎么干得这么快?真了不起呀!一个抚顺就这样,全国加在一起,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跃进。参观回来,大家谈论得十分兴奋。

10月,政府又组织我们到东陵辽宁农业展览馆参观。在这里看到了许多农业上的成就,有一些是大跃进的产物,特别是农业机械有很大的发展。在改造中需要一点一点地往脑袋里装新东西,天长日久装多了,就能把旧的东西挤出去。但不会一下子装满,说不定哪件事能装进去,这要看个人具体情况。比如在参观前有的南方人认为东北没有水果,如果有也较少,可是经过参观他才知道东北辽宁的苹果是中国苹果的主要产区,用这些苹果可以与苏联换钢材。于是,对东北的看法有了转变,进而认识到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值得骄傲。

11月,战犯管理所成立电机厂,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我有两种想法:第一,成立电机厂就不可能轻易取消,我们参加劳动不会是短期的。显而易见要在这长期改造下去,心里感到这不是好事情;第二,成立电机厂,我可以学一些技术,将来可以自食其力。俗话说:"艺多不压身",有技术到哪儿也可以谋生。两种想法,后者战胜了前者,学习技术的想法占了主导。

没有几天,就调我们十几个人到电机厂。我被分配学钳工。开

始，吴师傅认为我年轻，对我抱很大希望，我也下定了决心。可是后来，吴师傅对我失望了，我对他也失望了。他在钳工组呆不住，一天也不与我们说一句话，这样怎么学技术呢？学不了。维持现状吧。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也不往深里追求了。一个礼拜天，我们被提出去，给大车床安天轴。这时吕科长来了，旁边还有关师傅、赵师傅等人。吕科长问我："关梦龄，几个月能把钳工学会吧？"

我没有回答，因为在师傅面前，我如果说能学会，师傅一定不满意。我笑了一下说："我一定好好学。"吕科长走后，赵师傅说："几个月把钳工学会，那就没有技术了。"关师傅笑了一笑，我心里知道，他们都不同意吕科长的这种说法。我也知道，学技术不容易。

我们又学习了有关人民公社，大跃进的文件材料。衣科员很认真地领导这次学习，还不时地进行测验，贴出了许多大跃进的剪报：钢超过了英国，稻子丰收，工业创新纪录……这些材料贴出来叫我们知道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是当前的两件大事，加上总路线就是三面红旗。在这三面旗的指引下，我们可以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

尽管处于大跃进时期，我们战犯还是希望出去之后作新闻记者、教员、研究员或从事其它脑力劳动，没有想到将来从事体力劳动，我对李衍涛说："我们出去政府绝不会叫我们种地。如果去种地，花这么大的本钱改造我们干什么？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脑力劳动，最好是做一些与解放台湾有关的工作。"这是我的想法，但是具体做什么工作我也没想好。将来的事情在我脑袋里模糊一片，眼前想的不是将来做什么工作，而是什么时候出去。

战犯谈天都谈一些什么呢？第一是谈过去的旧人旧事；第二是谈现在的改造情况；第三是目前的生活。

谈过去，一方面谈解放前的旧人旧事，津津乐道：这个在北京呢，那个逃到香港去了；他的老婆很漂亮，我与他们打过牌……对于过去的腐朽堕落生活依然留恋。有些人谈得太多了，感到被人反映上去不太好，便在话尾又加上几句批判词儿："回想起这些事真

是罪恶，太不应当。我们花天酒地一席饭，老百姓需要积攒好几年，过去哪认识这些呢。”

也有谈过去的改造处所，如“我们1950年在山东解训团时，每天发水果，顿顿是鸡鸭鱼肉，那个时候菜吃不完，毛巾、鞋，月月发，不要都不行。”意思是这里不如山东解训团好。

谈现在改造的情况，感到生活制度太罗嗦，菜多吃不了，每天劳动的时间有点少，哪个班长好批评人，哪个科员批评了谁，哪个班长是朝鲜人，哪个犯人很顽固，出了什么笑话……

谈目前的生活，东北只用大锅煮菜，东北冬天吃不到青菜，接着就开“口头宴会”，说用白菜、青萝卜、大辣椒、豇豆可以做泡菜，能下饭，由泡菜扯到油菜，油菜如果用大海米烧好吃。这样一扯大家都参加进来了。

战犯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一是出监问题；二是家庭问题；三是现状问题。个别例外，另当别论。

出监问题是战犯首要考虑的问题，什么时候出监呢？如何才能出监呢？这是朝思暮想最为关心的大事，肖抱愚曾说：“我只问耕耘，不求收获，我只安心改造，别的什么我也不想，放不放那是政府的问题。”这样说不是心里话，大家也不同意他这种违心之论。

其次是关心家庭问题，对老婆孩子特别关心。老婆离婚了没有？孩子上学了没有？就业了没有？如果从家庭得到鼓励是一件大好事。比如陈达老婆在长沙医院当护士，四个儿子都能参加农业劳动，去年收入很多，买了自行车，给陈达邮来了罐头和葡萄糖，对陈达的鼓励很大。年龄大的战犯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政府对这个问题也给予了关心。张禹斌的家早就没有信了，他也认为找不到了，崔科员对张禹斌说：“政府可以帮助你寻找亲人。”过了一些日子，崔科员通知他，找到了！那年他父亲90岁，知道儿子尚在抚顺，心中感到莫大的安慰，告诉张禹斌要好好改造，张禹斌掉下眼泪，感激地说：“我90岁的父亲还健在，我一定好好改造，争取回家看看老父亲。”张禹斌不但找到了爸爸，也找到了弟弟和女儿，这样

一来，张禹斌的精神愉快了。女儿又到这儿会见，送东西，写信，大大鼓励了他的改造情绪。

再次是关心现状，既不很快出监，家中又无亲人，只好希望现状好一些。对伙食特别关心，白菜能做出多少种花样？白面能做出几样食品？这很重要，不但关系到战犯的健康，也关系到战犯的情绪。战犯在口头上不说，或不敢说，但并不是心中不存在这个问题。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是说不说的问题。比如夏天，搞一点辣椒，拌一点黄瓜，吃得就兴高采烈。由头一年秋天到第二年“五·一”，每天是白菜煮海带，有人说了：“在东北吃菜没有办法，没有别的菜，白菜一吃就是半年，棉袄一穿就是七个月，嗨，白水煮白菜，这就是东北的吃法。”因为吃的问题挨了批评，到生活检讨会上，每个人都能发表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论，似乎是很认罪的。比如说吃海带的问题，樊迅说：“海带到我们南方，用它做席，是最宝贵的食品。政府给我们买这样的菜吃，真可以说太照顾我们了，我为什么不爱吃呢？因为我一吃海带肚子疼，不消化，医生知道。”别人虽不这样发言，但是也有一套对待办法。先说海带大量的吃是政府的照顾，我愿意吃海带，真到分菜的时候，勺子一点，把菜碗拿走了，就是这样对待这些问题。说是说，做是做，二者根本没有联系。厨房来了什么东西？礼拜日吃什么？也都是战犯所关心的。

其他关心的是，看电影、洗澡、发日用品，特别发纸烟，对于吸烟的人更是重要。

除了关心这些问题，还有一些改造比较好的战犯，关心国家政治生活。比如生产建设，对外政策方针。有一些关心国际问题是从反面来看待，希望天下大乱，别有用心。

不能出监，只能关心眼前。有病就看，闲话不说，无事在床上一坐，低头一想，就算一天。这种情况不是全都如此，但为数不少。

1959 年春天，经过调整监号把辽宁队并入 4 所，把北京队并入 3 所。在电机厂劳动分为两班，4 所甲班，3 所乙班，上下午分班干活，队的称呼无形中取消了。我被调到 4 所 56 室，这屋是钳工

组，小炉，安装的人也在这儿。各监号的人数差不多，基本上是按工种调整的。这样劳动、学习比较方便。

夏天，白科长领我们4所犯人到将军堡去开荒。第一天我们徒手空拳把山上的草拔了，有了立脚的地点，然后开路，继续拔草。第二天，我们又去修路，修猪圈，盖三间小房子，一样一样的建设起来。大家力量虽然不大，但干得挺有劲。这是因为金所长（即从前的金科长）、白科长带头劳动，大家精神十分振奋。我们有些人背后说："这不是劳动，这是运动，到山上逛逛，与我们的身体有好处，这里的空气新鲜。"一边劳动一边说笑，思想上很开朗。但我有不同想法，又到电机厂、又上山，又是工、又是农，不知哪一方面重要？我愿意在电机厂多学一点技术。我把上山，只看作锻炼身体，从不考虑生产问题，认为我们的一切都由政府供应，不需要我们自己生产粮菜。

在机关西边种了一些稻田，由金所长带领打了一口水井，准备浇稻田用，但是水少，不够用，这口井花了很多劳动力，加了很多夜班。金所长的看法是"重要的是锻炼锻炼，养成劳动习惯。"

我们劳动在电机厂，在稻田，每天常换劳动岗位，也颇有意思。不过我总想在电机厂学技术，修理也好，装配也好，把技术学到手，将来到社会上可以自食其力，心安理得。我对劳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看到产品有自己的劳动感到特别欣慰。在我们的稻田中间立着一根电线杆，这个电线杆被挖走时，把稻子踩倒了一片，我看见后心中很不好过。这才体会到行军打仗把农民的田地给糟踏了，农民心里的难受滋味儿。

6月，刘荣第和李仲章被释放。当时，没有人敢谈论这件事。我知道这是刑满释放。刘荣第是1951年6月在北京被捕，判刑10年，由逮捕之日起，中间因为检举揭发有功，给他减刑两年，到1959年6月正好8年，到期释放。我是15年，还有4年，现在谈不到这个问题。不过我想，除了刑满释放，没有别的方式释放战犯吗？我想会有的。可是没有先例呀！回所背后议论："判刑的可以等到

刑满释放，没判刑的等什么呢？""等大赦呀！""什么时候有大赦？""什么时候颁布，什么时候有。"

出监是战犯最关心的，加刑是战犯最担心的。万历住院治花柳病期间，乘班长不注意，拉拢一个小青年，他对这个青年吹了许多牛皮，把管理所的一些人犯也泄露出去了，他对这个小青年说："我将来出去给你找工作不成问题，我认识的人多了，我们管理所有溥仪，都是大官。"这个青年认他为义父，给他买了许多东西，内中有日记本。他把日记本带回来才犯了事，他问我："你看我这个事能不能加刑？"

我吓唬他一下："你这是现行反革命活动，在监中继续犯罪，一般的说要加刑二年；你把管理所的人犯都泄漏了，这一项就是一年，加在一块，加刑三年。如果坦白得好，也可能从轻处理。你这件事严重得很，我都替你害怕！你患这样的病，政府送你住医院，这是天高地厚的恩情，你来了这么一手，给管理所找了麻烦。看守的班长也因为这件事要受批评，你连累了这么多人，于心何忍？"

"那我怎么办呢？"

"先写检讨承认错误，把这件错误从头到尾好好坦白，再挖挖思想，为什么到医院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我写不好，你给我写吧。"

"你怎么想的就怎么写，你怎么做的就怎么写，我不能替你写。"

万历这件事，在监狱一定要加刑，但是在战犯管理所就不一定了。

帝封官同堂谈罪

7 月，彻底打扫卫生。各监号把墙壁上的灰尘用铁片刮下来，

顶棚上的积垢也要扫除干净，然后重新粉刷。俱乐部扩大，修上了电影放映室。院子铺上石子甬道，这些措施我认为是为了庆祝建国10周年。又一想，这样大的整修，证明这个地方要长久地存在下去。我们也要在这长期改造。不能如此深想，否则没有情绪。我学会了从日常生活中培养乐趣。白科长叫我们修院子的甬道，把大俱乐部后面铺成石子路。我们到永安桥的河里捞石子，由4所和3所战犯在院子里铺路。甬道需要铺出花纹，美术化。我既参加铺路，也参加捞石子。我特别喜欢捞石子，可以到河里洗洗脚，洗洗背，感到好玩。幼年时，我常到河里去游泳，现在又下到河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趣味儿。

8月，举行了一次大组会。1所、3所、4所、7所的战犯都参加了——帝、封、官三大战犯在一起举行罪恶漫谈会。

7所日本战犯古海忠之先做报告，他讲日本话，由一所战犯溥仪的弟弟溥杰翻译。古海忠之是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他叙述了在东北所犯的罪行，认识得很深刻。我一边听一边想，能把日本战犯改造好，很不简单，只有共产党才有这样的能力，只有共产党才有这样伟大的抱负。国民党把岗村宁次弄了去，指使岗村宁次仍然作战犯活动，继续危害中国人民，共产党把这些日本战犯改造好，去从事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的活动。两者对比，就知道国民党的反动性了。共产党能够改造日本战犯、汉奸和国民党战犯，这种伟大的创举古今中外是没有的，我们从内心钦佩共产党。

古海忠之报告完，溥仪报告。伪满的皇帝颇吸引人，我以好奇的心情对待这位清朝末代的皇帝。溥仪一口北京话，报告的内容很丰富，暴露的思想很具体，很实在，认识罪恶也很深刻。没听溥仪报告之前，认为他学习得不会好，可是听过他的报告，打破了我的主观想象。能把溥仪改造到这种程度，由他亲口说出认罪的话，真是共产党改造人类、改造战犯的卓著成绩。改造皇帝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过去没有人改造皇帝，今后呢？没有皇帝便用不着改造了。

第二天继续开大会，在施锦的发言中，说到他在中统当特务，负责看守所时，如何把廖承志的手表勒索来，如何残害进步人士等罪恶时，声泪俱下，给大家很大的教育。

这三类战犯所犯的罪行是严重的。日本战犯古海忠之与日本首相岸信介同过事，古海忠之到东北负责经济部门工作，把东北的矿山等资源开发给日本。不仅如此，作为东北的太上皇操纵一切，他成为仅次于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的第二号日本战犯。溥仪及一些汉奸大臣是伪满第一等战犯，再就是我们这些人，是蒋帮的骨干分子。从以上这三类战犯作的典型发言，控诉的罪行可以知道，战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

这个大组会开了三天，对我们起了教育作用，大家说："日本战犯和溥仪改造得比我们好，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们改造的时间比我们长，他们在 1945 年就押到苏联去了，比我们多了四年呢！"

我心想，我们 3、4 所战犯固然有改造好的，但能比得上溥仪的不多，不用说报告的罪恶，就是对罪恶的认识，我们还相差很远。

战犯在报告中也出现一些小小的失误，这主要发生在我们国民党战犯里。在张整军的报告中，他用了"以德报怨"和"以怨报德"，这两句话他常常颠倒，如说我们过去犯了大的罪，今天共产党对待我们还这样好，真是"以怨报德"，大家说："说错了！"他马上改了过来，以后他又这样说了，台下大喊："胡说！"我认为类似这样的成语，如果弄不清最好少用，如果差了就差一百八十度，相差太远。我在自首后，写材料也好在文字上推敲，用四六对句，后来政府人员对我说："不用这样考虑词句，你想说的话用最通俗的话说出来就行了，大家能明白就可以，不必引用一些成语，否则不恰当更麻烦。"因此，我以后写材料，便不在文字上多加考虑了。我们这些战犯，有人写东西总是想卖弄一手，在文字上过于修饰，有时因词害义，便出了问题。张整军就是一个例子。

报告会之后，来了许多摄影记者，并且住在这里，每天拍摄不停。院内的一切情况，特别是溥仪的活动，都照了相。后来又到电

机厂去拍摄，给车工组肖桂国、安装组高青山，各拍了劳动相片（也许是拍电影镜头）。于是大家猜测，这是为了特赦作准备。

院中，许多女工刷油漆，大俱乐部焕然一新。这时候我们正准备迎接“十一”的节目，有一些小节目在大俱乐部预演，晚上那些摄影记者都来观看。后来我们京剧组一研究，一些小节目被外人看见不一定会有好感，我们应该演一个比较有把握的京剧给外宾看看。经崔科员同意，排演了《辕门斩子》，在 9 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演出了。观众还是这些摄影记者，他们评论很好，说我们的文娱生活还是很不坏的。文娱演出，代表了我们改造的气氛。

战犯们的思想多数不安定，我认为在国庆节会举行特赦大会，来一个庆祝建国十年，外加欢呼特赦，喜上加喜。与我一样想的大有人在。这个说：“这回能放出去百分之八十，所剩无几了。”那个说：“都放出去，这个电机厂就归北院[1]了。”还有的说：“剩下一些人，到明年国庆节也会一扫光。”有人对我说：“你一点问题也没有，已超过十年了，在改造中又不坏，这回十拿九稳！”三所乙班钳工组的全体战犯对于我的特赦一致同意，他们的理由：第一，是自首；第二，改造中表现好；第三，写材料多；第四，交罪好；第五，靠近政府；第六，文娱搞得好。”我听到这些话心里甜滋滋的，认为这些人看问题实事求是，很全面。我自己也这样估计。其他有谁，有多少，我不考虑，反正我是必然有的。

这时，战犯的思想言谈都围绕着特赦问题：看见来了几部汽车，大家也纷纷议论，一定是上级来人筹办特赦来了；叫我们到大街上垫垫马路，也认为与特赦有关……风吹草动，一切事物都与特赦联系起来，闹得人心浮动，坐卧不安。

我静下心来想了想：特赦之后我到哪去呢？老婆没有信，据判断她在 1957 年还未嫁人，1959 年就嫁人了？不会的。如果没嫁人，那就没有问题，如果她嫁了人，我就回北京。有了工作，找老婆是不成问题的。小孩子怎么办？把她接到北京？或仍叫她在徐州？想来想去没有结论。这些事等出去之后再说吧，好办。

国庆节前夕，照样演出文娱节目，改善生活。三天过去了，国庆节没有特赦，我失望了。我想，也许还没准备好。十多年都等了，晚几天就等不了？自己又想，这不是小事，要经过中央才能决定，不能够草率从事，等着吧。

是非是能够分辨的

有一天，黄鹤负责维护露天舞台的栏杆及四周的墙基。这个舞台是日本战犯修的，现在坏了，要重修，再刷一刷漆。在维修过程中，刘协理员来了，对黄鹤的搞法不同意，叫他改，黄鹤坚持不改。刘协理员走了。黄鹤不服从政府人员，真成问题，但他对我说："谁说的不对，我也不服从！"

我批评他："你个性太强了！"

他不屑一顾地说："你不用管这些事！"

1958 年的夏天，我们去人到 7 所盖鸡棚子，当时黄看守长叫把立柱斜架在墙上，架好之后，刘协理员对黄看守长说："立柱不直立没有劲。"第二天就返工了。由黄鹤的这件事，联想到盖鸡棚子，黄看守长都能接受的意见，战犯黄鹤却不能接受。这说明我们改造差得太远。这是政府人员对战犯的另一种态度，启发自觉，但也有另一种人员。

我们不少人都怕孟班长，只要孟班长一上班，应该请求办的事情，也要拖到他下班之后再办，实在没有办法才向他请求。向孟班长请求事要小心谨慎，把要说的话事先准备好，走到孟班长前面一定的距离，站好，"报告班长！我们请求到大俱乐部排戏。"孟班长低着头，看也不看一眼，半天不做答复。我心想，排戏是搞文娱，又不是我个人的事，受这样的气真是难过。等我把请求再重复一遍，他才把脑袋一抬，用一种斥责的口气说："去吧！"这样做使我心寒，我

这是为什么？难道我不作京剧的剧务，就不能改造吗？

3所犯人吕震寰骂人，有人反映给孟班长，孟班长把吕震寰找去，进行严厉的批评，吕震寰不服。

"你为什么骂人？"

"我没有改造好。"

"为什么没改造好。"

"我反动思想严重。"

孟班长有来言，吕震寰有去语，各不相让。孟班长坐在把门的座位上，吕震寰站在他对面，有一些同犯在偷看。结果，孟班长对吕震寰只是喊了一阵，什么作用也没起。吕震寰回去之后气得够呛，孟班长也气得够呛。

这位孟班长为什么总是没有好脸呢？从他的表情我们体会不到温暖，提起孟班长就想到发脾气，批评人。拿批评吕振寰来说，当然吕震寰是不对的，不听政府人员管教，《犯人守则》第一条就不允许。但是又一想，对吕震寰是不是没有办法改造呢？共产党能改造人类，包括战犯在内，难道说把吕震寰除外？改造吕震寰是没有问题的，在方法上如果注意一些，效果也可能好一些。如果把吕震寰找到屋里，避开同犯，稍微讲究一下态度，吕震寰是不会抗拒的，可是在走廊里批评他便适得其反，吕震寰一想：这是故意叫我丢人，好，吵就吵，闹就闹，反正就这么大个事，我就不服你！结果成了僵局。

过了几天，白科长在大俱乐部给3、4所战犯讲话。谈到生活问题，白科长说："有人大吵大闹，别看你的刑期不长，如果这样下去也不见得好。"我知道这是指吕震寰。

这使我想起我曾出过力的一部反特电影《无形的战线》，内中审讯特务有一个拍桌子的镜头，据说周总理看后要求修改。这说明了共产党主张什么，反对什么。

当然孟班长也有许多优点，办事认真，就是对管理所的同志也照章办事。比如锅炉房王师傅在一个礼拜天到监房提人干活，因为

没有办公室的条子，被孟班长拒绝了。战犯看问题，虽然离不开自身的角度，但是毕竟经过政府十多年的教育，一般的是非是能够分辨的。如果多数战犯都有相同的看法，那也是值得考虑的。

10月中旬，我们4所的战犯到人民公社去收白菜、萝卜。这个劳动大家都愿意参加。我们自己带粮，还可以在那买地瓜吃。有一回地瓜煮多了，吃不完拿着在路上吃，很有生活情趣。还有一天，收菜回来晚了，天黑看不清路，到了大岭，对面来了一辆汽车，大家说："如果汽车来接咱们，那有多好。""你们总想好事。"有人反驳。

汽车越走越近，车灯照得眼睛睁不开，走到跟前，汽车停下来。我们一看，是咱们的汽车！金所长从车上跳了下来，对我们说："我知道你们走黑路不行，就用车来接你们，快上车吧！"大家嘻嘻哈哈上了汽车，我上的拖车，金所长也上的拖车，我们说："所长坐前边吧。"

"我来的时候就坐在这儿，大家赶紧坐好吧！"

汽车开了，金所长就与我们漫谈起来。金所长这个人很随便，又很温暖。小的时候，出门回来晚了，做老人的不放心，总要站在大门前张望。现在做了战犯，政府还能这样关怀我们，能不叫人感动吗？大家一致说："像金所长这样对待我们，就是石头心也能感化。"

白科长对战犯十分照顾，他领我们出门就像阿姨带孩子一样。告诉队伍前边慢点走，年龄大的别跌倒，就这样一边走一边说。我有时候嫌白科长太罗嗦，难道我们还不会走路吗？以后才体会到，这是照顾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我搬到学校里去住，离家的时候，父亲告诉我，不要喝凉水，少吃零嘴，晚上睡觉不要凉了肚子……我感到特别絮烦。现在回忆起来这些旧事，感到政府人员对我们的照顾和在家一样，有的甚至比在家还好。

有人向白科长反映，一些年龄大的战犯就爱吃有肉的菜，没有肉的菜吃得很少。白科长听了，笑一笑说："好的嘛，谁不愿意吃？年龄大的人喜欢吃，就叫他们多吃一点，不喜欢吃，就少吃一些，这方面要照顾他们。"白科长这样一说，给大家一个教育，3所犯人都

说："我们因为吃菜闹意见真是不应该，谁若多吃一些，就多吃一些，有什么了不起，今后不要再给政府添麻烦了。"吃菜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我们养了一些猪，打算找一些白菜帮子做饲料。王科长、崔科员领我们七八个人出发了，另一组由白科长、衣科员率领到了山后的生产队，人家说白菜帮子自家留着喂猪，不叫我们拣。我们坐在生产队大门前休息，王科长去联系。中午，金所长坐着小吉普给我们送饭来了，一桶大米饭，一些咸菜。在哪吃呢？在生产队的门口？崔科员说："咱们上山吃去。"我们提着饭，爬到对面一个山坳里，王科长与我们一块吃，说说笑笑，怪有意思。王科长作风也很平易近人，说话也不做作，与他谈话不拘束，也不必考虑自己的言语是否得体，所以，午饭吃得很痛快。吃完了饭，我们有几个人凑在一起开小会，有人问："咱们为什么上山里来吃饭？"有人回答："这个地方空气好，干净。"

我说："这是涉及我们战犯的待遇问题。你们想，我们来这么些人，什么也不干，在生产队休息了一阵，汽车就把大米饭送来了。如果在生产队门前吃，围上一群小孩，势必暴露我们的身份。知道我们是一群战犯，又受这样的照顾，人民会有意见。所以拿到山里来吃，缩小影响。"

"对，关梦龄体会得对。这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水平超过了普通老百姓。"

11月初，我们由金所长率领，到距此有20里的马三家子生产大队帮助植树。大家很卖力气，干部也动手干，效率很高。中午在那吃饭，这一餐饭吃得大家十分欢喜。老豆腐，落花生，随便吃不限量，这是东北人待客的习惯。大米又白又有油性，一些战犯从没有与东北人民接触过，这一顿饭把他们吃服了。东北人民的生活这么丰富，东北人这么大方。日本战犯第二天也去了。临走的时候，又给我们发了花生。7所崔科员用日本话告诉日本战犯，这些花生是生产大队赠送的，日本战犯连声说："谢谢！"回来的路上，一边走一

边吃花生，大家非常高兴，都赞扬人民公社。就栽这些小松树来说，如果单干户，这个荒山就绿化不了，可是人民公社就办得到。我想，如有机会让我们多参加一些社会劳动，使我们能更多的接触社会，对我们的改造一定有促进作用。

这一天，回到所里已经上灯了。大家对这次劳动有一些反映，业杰强说："我们这次协助人民公社栽树，是叫人民看看我们改造的情形，好特赦。"

我们这次到人民公社劳动，农民对我们反映很好，说我们栽得很快。有这样的评语不容易呀。

才放 10 个

过了秋天，到了冬天，暖气来了，外边下雪了。9 月 17 日国家主席发布的特赦令，至今尚无消息，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死心。一天，在大俱乐部召开 1 所，3、4 所的大组会，由金所长主持。他叫大家谈谈最近的思想。大家盼特赦，想特赦，是当时唯一的思想。会上首先发言的张普林说："我这些日子就盼特赦，但是我又怕自己不够，心里很矛盾。"接着发言的是刘衍智，他说："为什么还想特赦呢？这个思想在小组不是批判了吗？怎么还想它？我就不想，我想的是如何改造自己。"

肖抱愚接着说："我现在考虑的是研究一种煤渣，如何能从煤渣里提炼出油来。我只想改造，没想特赦，赦不赦那是政府的问题。"

溥仪也发言了，他说他想特赦。

发言者多数想特赦，只有刘衍智、肖抱愚两人不想。大家发完言，金所长简单地说了一些话，大意是叫大家安心，不要浮动，尤其在劳动中不要思想溜号出了事故，又说："想特赦也是必然的，不是

不应该想，应该想。但要想的全面一些，特赦的条件挺高，不是一般的条件，应从改恶从善这方面多想一些。”

回来之后，大家都认为刘衎智与肖抱愚在政府人员面前不暴露思想，说一些违心之论，言不由衷，改造不老实。

11月底，我们搞文娱的准备新年京剧节目。衣科员来了，对我们京剧组的人说：“不要赵金鹏唱京剧，叫他说10段山东快书吧！”赵金鹏一听10段山东快书！犯愁了。既然衣科员这样指示，就没有派赵金鹏的京剧角色，叫他专门搞山东快书，这在赵金鹏身上成了负担。

这时，犯人们又议论开了，有的人认为特赦这件事可能没有了。我把特赦令找出来仔细一研究，这是1959年的特赦令，是为了庆祝国庆10周年，对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进行一次特赦。这事决不会跨年度，一定在年前特赦。一些看到特赦令的战犯都同意我的意见。我又一想，可以在12月31日举行特赦，与元旦联在一起，也很有意义。想得太多，也不考虑可能与否。我甚至想，1953年判刑的时候我还很高兴，现在无所谓了。现在大家谈论的不是判刑的问题，是够不够10年，有一些人甚至认为10年不10年也没有关系，只要改恶从善就能特赦。至于什么是改恶从善呢？有人说：“政府说你改恶从善了，你就改恶从善了，政府要放你，你就改恶从善了。”

明明在特赦令[2]上面写着“关押已满10年，确已改恶从善。”但是我们不少人都不注意这些条文。认为规定是规定，最后还不是政府一句话。可谓利令智昏，因为自己的利益什么都不顾了。我也是这样的人，对于怎样才算改恶从善，我只认为出去不反动就行了。我的精神非常疲劳，如果特赦大会这样拖下去，一定有一些人要患病。政府怎么还不举行特赦大会啊？没有我也好，有我更好，快点过去，别这样拖。心神不安，什么也搞不好，尤其在电机厂掌握机器的战犯很容易发生事故。

11月30日，下了一场大雪。12月1日，发动我们扫雪，打扫监

号的卫生。12 月 2 日接着扫雪。这次打扫与往常不同，要求彻底。可能要开特赦会吧？同时，也彻底地打扫了电机厂的卫生。3 日这一天，一切场所都打扫干净了，大俱乐部装了许多电线，还有录音机、摄影机，大家知道这回一定要开特赦大会了。

3 日下午，我在图书室写材料。我认为马上就要走了，这些材料是写台湾军统特务的，写一点，是一点。我写了一页多，金所长进来了，随后衣科员也来了。金所长问我："写什么呢？"

"写材料。"

"等一会儿再写，先回去。"我出了这屋，衣科员叫来了杜聚政。金科长与杜聚政谈了 20 分钟，又把张普林找来，说了一会儿。

我分析这个时候金所长找他们两个一定与特赦有关。张普林还可以，杜聚政这个人改造得不好，经常吵吵闹闹，他是挨批评的对象。于是我走到杜聚政的窗前，偷偷地观察杜聚政的表情，一看，他擦眼泪呢！受了金所长的批评了？金所长很少批评人，方才说话的声音也不大，他怎么哭了？问题一定十分严重。但是看金所长的面部表情很平静，这是怎么回事呢？

汽车拉来了许多长条凳，要举行会餐？许多布置都是围绕特赦大会的。个人有个人的想法，我想什么呢？我想，我是 1948 年 10 月自首的，到今天已经 11 年多了，明天是 12 月 4 日，1948 年 12 月 4 日，我在长春公安局看守所被押时，一个朋友在这一天给我送来一些衣服、被子和现款，我老也不忘这一天，明天特赦大会也是 12 月 4 日，这一天我也不能忘记。真巧，都凑在一块了。晚上一切活动停止，既不学习，也不娱乐。夜里，胡思乱想，入睡很晚。

第二天起床后，传达换上新衣服。早饭后，集合到院子，白科长讲话，指示了一些入场的规矩，告诉前排椅子留出一排，喊到名字的人，到主席台施鞠躬礼接特赦通知书，然后站在第一排上，等到都喊完了名字再坐下等等。我听说只留一排椅子，心里便计算了：一个椅子坐 4 个人，4 个椅子也不过 16 个人！人数这么少哇，我的心先凉了一半。

队伍整理好了，依次进入会场。这个场面在解放后第一次看到，这么些摄影记者，不停地闪着耀眼的灯光，我的心情紧张起来。不一会儿进来一些首长，我们站起来鼓掌，之后坐下，由金所长宣布特赦大会开始！念特赦战犯名单，发特赦通知书……一个又一个，我的心焦急万分，剩最后一个的时候，还没有绝望……都念完了，我怀疑还有没念到的！就这么几个？也太少了！念完了名字，我什么也不愿意听了。政府首长讲话，特赦的战犯讲话，留监改造的犯人讲话，马马虎虎听了一些。反正没有我，我听那些干什么？越听越失望。呵，杜聚政被特赦登台讲话了，这我才明白，昨天他为什么擦眼泪。张普森是代表留监战犯发言。一切都明白了。获特赦的还有赵金鹏、白玉昆、贺敏等人。

从大俱乐部回到监号。我们这屋业杰强被特赦，我们帮助他收拾东西，与他握手。我心想，人家走了，我在这泡吧，心情空虚得很，十分不高兴。同屋的人也都坐在自己床上默不作声。坐了一会儿，学委会找我，晚上演京剧欢送特赦的战犯。我心想，特赦没有我，还要演剧，为他人作嫁衣裳。唉，心里不是个滋味。演吧，找人布置，忙个不停。赵金鹏演《追韩信》。他来化妆，与我客气了一阵，我告诉他："心情太激动，要静一静，不要忘了台词！"

"没关系，忘不了。"

一切准备好了。前边是一些小节目，后面就是《追韩信》。我把场。赵金鹏一上场，台下一阵鼓掌，他紧张了。他本来是名老演员，今天也显得发呆，唱那大段流水的时候，掉了一段词。赵金鹏在台上演戏，李科员拿照相机在旁边照相。我心想，特赦的人一举一动都为大家所注意。人家怎么改造的？有的人，如杜聚政也看不出来有什么优点？我心内不服。

演完了戏，回号休息。第二天又开送别会，唐曦讲了临别赠言，溥仪也讲了话，大家拥抱欢呼。散会回来，就结束了。

12 月 5 日下午开始漫谈，别人暴露了不平不满，我暴露了灰心失望。许多人认为这回完了，十年八年才有这么一次特赦，还未

轮到自己，有人说："才放10个，太少了。"

"什么改恶从善，政府说了算！"

"这回是放杂牌的，不放中央的，周震东、赵金鹏、杜聚政、白玉昆，都不是中央系的。不放特务，一个军统、中统都没有。"反正从鸡蛋里挑骨头，各式各样的思想都涌现出来。

如此混乱了几天，大约12月10日，金所长做大报告，主要讲特赦问题。讲了改恶从善的标准，也谈了溥仪的问题。他说："溥仪根除了封建主义的思想，有一次他的家人来看他，仍称他为'圣上'，被溥仪批评了，这说明他对过去的称呼感到可耻。"金所长又说，"一所有人说自己没有当皇帝的思想，当然你没有，你也不会有，具体人具体要求，要求溥仪的就是这个。还有一次，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到这来采访，与溥仪见了面，他们想从溥仪嘴里得到一些东西，但是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很失望地走了……这些都说明溥仪的立场坚定，改造好了。"

接着金所长说："你们有的人，改造也不错，但是有血债和罪恶，人民不同意，这就不能特赦，这就要求你们更加努力改造，政府再向人民做说服工作。我建议你们，应当时刻站在被害者的立场来认罪，如果你们的亲人被杀，你们该怎么想？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始终是想不通的。认为特赦没有你，你就抵触，这样对待特赦是不正确的。"最后，金所长说，"你们已经有十年的改造基础，每人都有改造的成绩，在这个基础上再提高一步，把错误的思想埋葬掉，好好改造，希望很大。"

我们根据金所长的报告，漫谈了三天，我想通了。首先考虑到自己没有改恶从善，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又过低估计了别人，这就产生了不服气的思想；再者，从认罪上来说，长春人民对我恨之入骨，我真改造好了，也要对人民进行说服；同时，从被害者的立场来认罪，将心比心，如果我的亲人被杀，我一样地痛恨刽子手……再回忆参观东北烈士馆的情形，于是我的头脑冷静了，抵触的情绪渐渐地消退了。

我在小组会上发言："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没有特赦到我的头上，我就不满意，别的话都是其次。特赦战犯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我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看待这件事情，既狭隘又片面，说明自己观察问题的水平很低，说明改造的程度很差。我感谢共产党毛主席对战犯的特赦，特赦是对所有战犯的宽大与鼓励，不是对哪一个人的问题，我们都应当感恩。"

尚传道说："我认为最近还会有特赦，因为这是第一批，既有第一批，就有第二批。我看第二批不会很远，第二批的人数还要比第一批多。"

我知道这种想法很难实现，但我不反对。在我的思想深处，还是对改恶从善这个标准模糊。究竟怎样算改恶从善呢？又不能用秤称，用尺量，还不是政府一句话。有的战犯说："政府掌握的材料，咱们怎么会知道？特赦人的优点，咱们知道吗？""不知道，我们向特赦的人学习什么呢？"也有这样的反问。接着就有这种说法："特赦的人有政治作用，伪满最大的是溥仪，国民党最大的是杜聿明。这也巧了，他们反动职位高，改造的也都好，内中不是政治作用是什么？溥仪改造是不错，我们看见了，是不是一所就没有比溥仪再好的了？也不见得。"

张三民对我说："特赦大会前，我们那组以为你有十分希望，给你打了保票。特赦大会之后，我们对这件事进行了检查，检讨看问题不全面，看现象，不看本质，唯心、武断等等。因为你，我们增加了这么些事情。"

我说："我们这些人看问题，唯物、正确那才是怪事呢？在改造中不可免的要有这些问题。"

特赦大会的余波，残存的反映，有时还会在某些战犯，某些场合流露出来。

一天，金所长告诉我们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特赦回广州的业杰强[②]又返回来了。原因是业杰强杀过一个姓曾的亲人，这回听说业杰强特赦，姓曾的要找业杰强算帐。业杰强在广州与家中联络，

他老婆告诉他，千万不要回家。走投无路，他便再一次求助战犯管理所。

①北院：指与抚顺战犯管理所一墙之隔的普通监狱。

②特赦令：1959 年 9 月 1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最高人民法院 12 月 4 日特赦释放首批战犯 33 名。特赦令第 1 条：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关押已满 10 年，确已改恶从善，予以特赦释放。

③业杰强：原国民党第 72 军 233 师 698 团上校团长。业特赦未能回故里，返战犯管理所后，先后与一批特赦人员在凌源矿山机械厂、营口新生农场劳动。1966 年初安排回乡就业。

第八章 犹有竟时

黄金时代

转眼到了1960年春天。这个时候管理所的改造与生产是我们进所以来最好时期，可以说是管理所战犯的“黄金时代”。单说生产，7所生产的鸡蛋，不但能满足战犯自己吃，还能供应市场；日本战犯不但养鸡有成绩，同时还开荒种稻。日本战犯的人数虽然没有我们多，但是在崔科员领导下，干劲十足，种了不少水稻，我们很钦佩；3、4所在山上开荒，逐渐扩大了耕种面积，在电机厂劳动之外，养猪、设无线电组；1所分担大厨房，喂马、培植蘑菇。

3月20日，举行了生产方面的评比发奖大会。这天很热闹，战犯敲着锣鼓向政府报捷，各单位积极挑应战。奖品有1、2、3等奖，我是被表扬的，奖品有秋衣、毛巾。一般战犯由政府发给一个精制的日记本，一条麻纱手帕，一个印有“劳动光荣”的背心。得奖与不得奖皆有所得，大家欢喜。

我与姜明文、张大光、尚传道，代替1所开会的战犯下厨房做饭。姜明文做大米饭，我与张大光炒木须肉。姜明文把大米饭做糊

了，糊味儿大俱乐部都闻到了。我与尚传道两人打鸡蛋，打了一个多钟头，有一千多个。另外每人还发了两个煮鸡蛋和一袋白糖，当时的物质很丰富。

下午，我参加了评比会。一个日本战犯的发言感人肺腑，他说："……我们过去屠杀了中国人民，屠杀了许多儿童，现在由我们喂养的小鸡下了蛋，可以给中国人民吃，给中国儿童吃，我们内心得到了一点安慰……"

无线电组把装好的一部收音机放到俱乐部的台上，当场播音，声音很好……这一切都说明我们这些战犯能够生产，能够自食其力。我心想，不经过改造，我们这些人只会发号施令，指手划脚，经过改造都变了，不变也不行。

这样的会1957年开过，只有奖没有惩，这一点不同监狱和劳改队。那里每年都开奖惩大会，有奖也有惩。有的加刑、有的戴镣，严重的还有当场枪毙的。战犯管理所只有奖，所以叫"评比发奖大会"。只奖不惩，用好的来鼓励不好的向前争取。这个评奖大会也是一种教育形式，我们多数有所领会，增加了劲头。

3月底，电机厂扩大，把2所的房子打通，把车工、钳工的房间打通，做翻砂用。这个工程很大。2所的房子都是小间，所有的间壁都要打通，还要铺水泥地。白天照旧在电机厂劳动，夜里分前半夜，后半夜去2所，我多数在后半夜干活。这样一直搞了半个月。筛石子、拉砂子、运砖，人人不闲着，大跃进的劲头在我们这里也起来了。这么一来，电机厂扩大了，将来这个工厂变成国营企业，我们一变身份就成了工人，这有多好。

每天下午大澡堂子烧水，叫我们洗澡。金所长说："多费一点煤不要紧，烧点水洗洗澡，解乏。国营企业的工人也有每天洗澡的。"

我们感到政府想得真周到，同时觉得金所长对我们了解得很深。有人判断他是朝鲜族人，日本战犯最多的时候，他是管教科长。他的理论水平不低，仪表风度也大方，善于说服人，鼓励人，他的名字叫金源。当会计的那位郑科员是他的爱人——我们东一凑，西一

湊，什么都知道了。有的是从电机厂传票上看到的名字，有的是从干部谈话中听到的东西。战犯谈论干部是常事。

过了“五·一”，政府组织我们参观。由于日本战犯在1956年参观过大青人民公社（当时还是农业社），现在他们要求再参观一下，看看这几年的变化。政府批准了他们这个要求，还一并参观抚顺市郊上游人民公社。

我们辽宁队的一部分人在1956年来过这里，这次听刘主任报告，感到进步太大了。我们听报告的这个大俱乐部就是新建的。

中饭以后，组织家庭访问，我知道不论哪次参观都必然选我作代表，他们的理由是，第一，关梦龄是东北人，说话对方能听懂；第二，关梦龄记性好，回来能传达完整；第三，不说了，第三是什么？谢罪的时候关梦龄会哭。因为怕哭，所以姜明文、黄炳寰、李衍涛都不来，一致选我，我也不好意思说破，这次当然又选了我。出发之前，由衣科员领着，告诉我们不要激动，就是说不要进门就哭，什么话没说，一进门就跪下，一大群呜呜地哭起来，叫人家莫名其妙，使人感到不吉利。这次交待一下非常好。

我们这路有李寓春、袁剑飞几个人。社里来了一个女干部，把我们引到一家姓崔的老大娘家，说是老大娘，也不过40岁。家中男人都出去劳动了，儿媳妇也去劳动了。我们进屋坐下之后，我先开言，问老大娘家中人口、生活，唠起了家常话。

这家6口人，两个半劳动力。家里养鸡、养猪，房后还有自留地，屋里摆得也挺整齐，也是一个小康之家。我想，过去我们吃喝嫖赌，每日瞎忙，并没有得到快乐。真正的快乐是一家人吃饱了饭，大人孩子团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无忧无虑，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躺在炕上问心无愧，那才是快乐呢！我们过去那些所谓的快乐，都是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戴笠在北京，一天已经过夜3点，他要跳舞，叫我去找乐队，找几个“太太”，我只好派车派人去找。那夜是招待宋子文，跳完了舞天已经亮了。这就是不管别人、只要自己高兴的典型。这不是快乐，这是罪孽。

崔大娘与我们谈话兴高采烈，但是谈到解放前的情景，马上难过起来……我发觉袁剑飞想说话，想了半天，想起来一句话："老大娘，你们这儿民兵站岗不？"

"站什么岗？"老大娘没明白什么意思。

"他问，你们这儿的民兵站不站岗，防备坏人？"我从旁给当翻译。

"哎哟，没有站岗的。反动派都没有了，这村子里坏人也没有了，不用防备。"

我们这些人从不与社会上的人接触，说出话来叫人莫名其妙，笑话百出。

参观中还出了一件使人不愉快的事。下午刘主任在大俱乐部介绍情况，金所长与刘主任都坐在前面，刘主任给我们讲话。金所长用暖水瓶给刘主任倒水泡茶。刘主任没有顾得上喝。讲完话刘主任与金所长离开座位，刘主任还没走出门，3 所战犯梁津便站起来，走到桌子前面，把刘主任那碗茶端起来，喝了。别人一看太不像话，上前制止，他不听，结果硬是把那一碗茶喝光了。真丢人啊，他给这次参观点缀了一件事，真令人扫兴。

另外一组有刘佩玺、陈旭东，他们也访问了一个老大娘，这个老大娘一见刘佩玺就说："好个姓毛的，解放前你把我儿子拉去了，你还打我！"这个老大娘拉着刘佩玺不放，后来白科长对老大娘说："他不姓毛，他没来过东北，您认错人了。"这样解释才作罢。

参观大青公社回来之后，大家都说："反动派的罪恶到处都是，真若是遇到了苦主，拉住不放，政府也没有办法。"

"如果这件罪没有交，可就不好交待了。"

"看来交罪必须交清，不能马虎呀。"

第二天，参观上游人民公社。先参观引水上山工程，接着参观小学校、中心医院、百货商店……百货商店不知道我们的身份，一个负责人给我们介绍商店的情况，最后他说："我们经验不够，请同志们多提意见。"

我心想，这意见不敢提，我们是什么人你不知道，我们走了，你就会知道了。

下午到稻田参观，看到有三台电动机抽水浇田。这些水是城内的污水，人们动脑筋，什么东西都有了用处，废水、废料都利用起来了。人民当家，给自己生产，把聪明智慧发挥出来了，都使用出来了。

参观回来，大家心里很亮堂。我们学习了人民公社的文件，看报知道了不少人民公社的事情，但是就是没有亲眼看到。政府组织我们实地一参观，心里明白了，知道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6 月准备"七·一"的节目，我把参观两个公社的所见编了一个相声，另由京剧组预备京剧节目，还有一些反映参观的节目。比如苦主错认刘佩玺那件事，战犯把它编成了话剧。

6 月 30 日晚上，已经点完了名，门已经上锁了，班长交给我一个小条子。条子是病号室战犯魏季良与叶佛佑写的：奉大夫批准，明日演出《武家坡》，请京剧组给我们排定出演时间，并明早叫文武场排练一次。

第二天早上，我找蔡省三[①]研究，我说："大夫怎么批准他们演出《武家坡》？为什么这样匆促？"

"既然大夫批准了，上午就给他们排练一次，下午演出。"蔡省三说。

"他们二人还有肝病呢！与我们接触有许多不便，不过没有办法，大夫批准了，都是一个政府，不能不服从，演吧。"

一些戏是不适宜在监狱演的（战犯管理所也是一样），如《女起解》不能演，《武家坡》夫妻分别 18 年，演出不起好作用。因而这类戏本着政府的精神都不演，白科长很注意这些事。我记得 1958 年，京剧组要演《打渔杀家》，这个戏里的教师爷要拿一条锁链，一般舞台用很轻的铁链，我们这没有，我到电机厂去找铁链，找到一条拿起来正要走，白科长出来了："关梦龄，拿的什么？"

"一条铁链。"

"干什么用?"

"演《打渔杀家》的道具。"

"我看算了吧,别拿铁链子了,稀啦哗啦拿到台上多不好,找别的东西代替吧。"

于是我们用黑线绳作了一条锁链,演出了《打渔杀家》。这些影响犯人情绪的戏尽可能不呈请,一贯如此。所以这次演出《武家坡》是想不到的。既然是温大夫同意的,我们不能有什么抵触。我先叫打鼓、拉胡琴的七八个人到大俱乐部。然后报告班长到病号室把魏季良与叶佛佑找来,排练《武家坡》。表面上我很高兴的叫他们唱做,心里总有一个疙瘩。排练了一遍,解散回来,我告诉魏季良说:"把你们这个节目排在下午第二个。"

早饭之后,开始文娱演出。演了几个节目,该我的相声上场了,衣科员指示:"关梦龄的相声放在后面。"

我又把大褂脱了下来,这个相声编得比较生动,所以衣科员让放在后面。正在这时,李科员来了,告诉蔡省三说:"下午有电影,京剧只能演一个,你们考虑一下演什么?"

蔡省三在后台找到了我,一研究,我的相声不演,高青山与郭吉千的《金玉奴》不演,只演《武家坡》。这是照顾病号,并且是温大夫批的。就这样决定了,马上通知魏季良与叶佛佑上场,就这样演出了《武家坡》。

事后,衣科员问蔡省三是谁叫演的?蔡省三说:"温大夫批的。"衣科员没有吱声。我说:"看来这件事叫魏季良与叶佛佑钻了空子。可能他们请示大夫要演戏,或者问他们能不能演戏?大夫说可以演戏,但不一定说演什么戏,而他们就说大夫批准他们演《武家坡》。温大夫决不会决定戏目,这个人不会那么糊涂。"

蔡省三认为我说得对,因为这件事无法对证,过去也就算了。

小关师傅

夏天开展了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电机厂挂起了大幅标语，动员我们进行发明创造。大家都动起来了，刘协理员、王科长到3所，召集学委及生产组长会，进一步动员。战犯们一看政府人员这样重视，便行动起来了，首先蔡省三和我计划把废的矽钢片炼成钢，这样可以把许多矽钢片的碎块炼成原料。我们开始了这项实验。利用铸铝组的焦炉、坩埚炼了几次，因为温度不够没有炼成。吕科长鼓励我说："你们都是有文化的，动一动脑筋，总可以创造出一些新东西来！"

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暗自责怪自己，真饭桶。又一想，脑子里没有这门知识，"高大精尖新"谈何容易？许多战犯都考虑发明创造，写了一些建议，画了不少图，也费了不少思考，但是成效不大。

我们钳工组甲班计划搞机械绞丝。我画了图，经过蔡省三、杨植等人研究，认为可行，又经关师傅同意，我们利用夜间改制三号钻床的皮带轮。这一来又要车工组张亚东、舒靖南等人加夜班。谢科员对我们实行机械绞丝大力支持，两夜没有睡觉，在电机厂与我们一起改装。改装以后尚可应用，但是因为没有机械绞丝的丝锥便搁下了。

在"双革"运动中，说我们这些战犯一点贡献也没有，那是言过其实，应当说有一些贡献，然而贡献不大。比如钳工组改装了压力机，安装组找了一些生产窍门……虽然这些东西在关师傅他们眼里是值不得提的事情，但是在我们身上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因为战犯这方面知识太贫乏。

政府大力支持我们这是体会得到的，但我从旁感到政治与技术有矛盾，管教人员与师傅们不一致。关师傅、李师傅等人，对我们

提出的建议认为幼稚又可笑。事实上也实在可笑，比如有人提议："用铡刀切断螺丝杆，可以不用剁子，还能保证质量。"铡刀怎么能切断M6的螺丝杆呢！根本没有细想就提出来了。王科长在会上还引用这个例子说，"双革"是一件技术上的大事，不是偶然一想就能解决问题的。

类似这样的"合理化建议"的确可笑，其他一些建议师傅们也认为根本不行。有一些建议谢科员拿到电机厂征求师傅们意见，师傅们否定之后，谢科员回来对我们说："可以，你们再研究一下。"

管教人员认为战犯可以有发明创造，师傅们认为我们不会有什么创造发明，这个矛盾我从旁看得很清楚。这个"双革"运动，就这样的过去了。

师傅们与管教人员看问题不一样，比如一次我们议论在哈尔滨参观工厂，看了那么些机器和部件，这时李师傅说了："看了，你们也不懂。"战犯樊迅从旁边说："我们不是从技术上看问题，我们是从政治上看新中国的进步！"

从这些谈话可以发现，师傅们的政治水平还离不开技术的小圈子，当然，没有技术是谈不到生产的，如果仅仅看技术，也是有局限性的。对于战犯的改造着眼于什么？师傅们还不够明确。我认为学技术比思想改造要容易一些，如果1956年我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就宣布：关梦龄学好钳工就开释，别的不干，那么我白天晚上学钳工，几年功夫我就可以掌握一定的技术。但是我在思想上还幻想蒋美卷土重来，还想把人民政权推翻，还想军统那一些老朋友，行吗？

一个雨天的午后，张国泰在2号钻床干活，他要钻一个大部件，必须把钻床用扁担抬起来，再拧螺丝。这是李师傅对战犯李文开的指示。李文开把李师傅的指示对张国泰重复了一遍，但是张国泰没在乎，他没有用扁担抬钻床的头部，而是直接用扳手松螺丝，只听"轰"地一声，钻床的头部掉了下来……车间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这时李师傅从小屋走出来，问怎么回事，李文开一

报告，李师傅问道："你没告诉他，用扁担抬吗？"

李文开说："我告诉他了，他不听！"

李师傅火了，大声地对张国泰说："站好，你是反革命！你这是干什么？为什么不听指示？你知道一部钻床多少钱？你总觉得自己有一套，什么思想？"大声批评了许多时候。不一会儿关师傅来了，问李师傅怎么回事？李师傅把事情的经过又说了一遍，关师傅没有吱声，站了一会儿，看看钻床没有坏，关师傅走了。

事后，大家说："头一次看到李师傅发这么大脾气。"

蔡省三说："这是工人阶级极端爱护国家财富的自然流露。"

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是，张国泰是不对的，但是李师傅在车间那样喊有点过分，什么"站好，你是反革命！"这样的话对战犯说来是完全应当的，况且战犯比一般反革命罪还大，但是不讲究场合说出来，也不见得会收到好的效果。我想，这件事如果被金班长碰上，他不会说什么，但是只要在张国泰身边一站，他自己就会很好的检讨，别人也会说张国泰的不对。

电机厂的师傅在改造战犯方面，还是关师傅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也批评人，但是能掌握分寸，注意态度，合情合理。比如赵玉林弄断丝锥，一天断好几个，赵玉林打怵不敢干活了。我报告给了关师傅，关师傅先从技术上分析为什么会断？再从思想上说劳动时不要害怕，学技术要用心。这么一分析，一批评，赵玉林心服口服，背后他对我说："我们能学到关师傅那样的技术，那种对人的态度就行了。咱们相差太远了。"

关师傅在政治方面如果能加一把劲，那是很完美的。1959年有一天我给他收拾抽屉，发现了他的国文课文，那时他念的是第五册。这件事使我很有感触，我回号对大家说到此事，大家说："看来谁都要学习，咱们更得好好学习了。"

"五·一"以后，学习《列宁主义万岁》，学习两个月，漫谈多次，还暴露一些错误思想，不知道这个时候为什么学习这个文件？对文件的精神虽然有所领会，但领会得不深。

我在电机厂劳动，心想学一些技术，可是我们一天只有4个小时的劳动。礼拜休息，节日休息，有时听大报告，有时到农园突击任务，有时写外边要的证明材料。并且产品也限制了技术发展，只生产电动机，钳工组只做胎具、绞丝、下锭子等，没有别的活。这些活很简单，我早已经学会了。一颗有很高热情的心逐渐冷了下来。

这一年，我们甲班钳工组的张禹斌、蔡省三做胎具，我下锭子、绞丝，与外组打交道。陈亲民、赵玉林、樊迅、尚传道的技术不如我，我领着他们干，陈亲民与我开玩笑说："跟我们小关师傅干活，精神痛快。"

所以，以后他们都叫我"小关师傅"。

我当时干了多少活，关师傅也不大清楚。他知道蔡省三劳动态度好，因为蔡省三总坐在那里做胎具。我呢，一会儿安装组找我，一会儿去领东西，忙得不亦乐乎。钳工组长张禹斌说："我的腿跑不动了，你比我年轻，你多干点吃不了亏。"这样就形成，关梦龄总不在钳工组，他到哪儿去了？关师傅虽然没有问，但是肯定有这个想法。

有一天，我从一号大钻床回来，车工组吕雅堂、张守谦和张亚东他们三个人在那接皮带，吕雅堂叫了我一声，我就过去了。

"什么事儿？"我问他们。

"小关师傅，给我们接接皮带吧，三根皮带一齐断了，我们还等着下活呢。"

"行啊，你们拿到钳工组去吧，这里没有工具。"

正说到这，李师傅从那边来了，他立刻问我："你不干活，到这儿干什么？"

"他们叫我接皮带。"我回答。

"当一个车工连皮带都不会接？自己接！"李师傅把他们三人都批评了，我回到了钳工组。我心想，李师傅把自己的徒弟估计太高了，他们会接吗？不一会儿，吕雅堂、张守谦和张亚东一人拿一条皮带到了钳工组，终于还是我给接上了。

事情过去张普林问我："是他们找你接皮带？还是你自己要去

接皮带？”

“是他们找我去的。”

“是谁找的？”

“是吕雅堂找的。”

“他说没有找你。”

“他们都没有找我，我有神经病？我们钳工组没有活干，我可以坐着，也犯不上到车工组去揽活去。这些人不老实，他们如果不承认找我，我自己去的，那就说明关梦龄不在本组好好劳动，到各工序乱窜。”

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呢？就在一些人没有劳动观念，不认真学技术，一切依赖别人，还是过去指手划脚的作风。我认为这件事不大，没有向关师傅、谢科员报告，岂知张普林叫我碰了一下很不高兴。张普林、蔡省三及学委会的人以此为题大做文章，并且得到了李师傅的支持，说我劳动态度不好。在评比时，我连表扬都没有。那么甲班钳工组的活都谁干了呢？在小组中，陈亲民、李介立、张禹斌都同意表扬我，蔡省三、尚传道、樊迅、赵玉林不同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蔡省三与张普林一致，表示学委会看问题的一致性，向政府汇报没有矛盾。樊迅、赵玉林不同意我是因为我在钳工组常给他们提意见，我对他们不客气。他们说：“关梦龄带我们干活，对我们有帮助，这是优点，但是作风还是过去那一套，好要态度，所以我们不同意他。”评比过去，我心里不舒服，好在这次评比没有发奖，过去也就算了。

“混蛋”这两个字重了

9 月 12 日，调整工种，成立坩埚厂，王科长强调坩埚是一项新的技术，要保守秘密。接着宣布调整后的名单，念到电机厂钳工组，

没有我的名字，把我调到坩埚厂！我的头轰地一下子，心中十分难过，这是把我从电机厂开除了。

第二天晚上举行漫谈会，我发言表示了不满。蔡省三用一些我也能说的"大道理"帮助我，我根本没有入耳，心想，钳工组这么多人，把陈亲民、赵玉林、樊迅调出来，剩下的李介立、邬国贤，比我强么？这一定是因为修皮带的事，认为我不安心工作，而把我开除出钳工组。这些事与管教科没有关系，这事与关师傅有关。我一向对关师傅印象很好，不过这件事这样处理我不满意，他观察问题不全面。想来想去想不通，不想了。反正在哪儿都是改造，到那儿好好争取也有希望。但是一想，那里也是这些政府人员，心里未免打怵，但是不去是不行的，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9月13日，到了坩埚厂。衣科员宣布，由张林生、谢异炎两个学委负责（我不知道谢异炎什么时候当的学委）。一起劳动的有肖兆林、谭自平、王经五、任建冰、樊迅、秦铮。残、老、病、弱都集中在一起了。我与这些人在一起，我算落后分子了。不过也有好处，跟他们在一起没有重活，没有危险活，没有精密活。不言语，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看看再说。

头一天，抬土垫厂房，我与赵玉林抬一个筐，我对赵玉林说："咱们是主力，要多干，干出汗，这里咱们不多干，谁多干呢？"他同意我这个说法。我们从3、4所的后院，把土抬到厂房，抬了一天没人管，我们累得够呛。晚上赵玉林咳嗽起来，我一听他咳嗽，心中便不安起来。白天我不应该和赵玉林那样抬，他有肺病，真的累坏了怨我不照顾同犯，与政府改造精神是不符合的。

厂房垫好，开始磨粉。把石头破碎磨成细面，送下一道工序炼坩埚。炼坩埚的有唐乐山等人。我不到那屋，因为那屋有电，去了怕出事儿。

9月16日我从磨粉调到坩埚炉，调去的有我、赵玉林、陈旭东、陈达、傅希章、谢异炎、周开成、张林生、唐乐山9人。我什么也不懂，只有唐乐山在这干了几天，张林生和谢异炎也知道一个大

概。我们才知道坩埚怎样的炼法。看了一个上午明白了，只是吹的时候要技术，别的问题在其次。这个活倒不累，只是管电门这个活需要特别小心，稍一不慎，即可造成人身及设备事故。这是新东西谁也不会，是由北院的师傅来教的。一个坩埚能卖几百块钱，赶上一部电动机值钱了。

坩埚生产分三班，每班一小组，三个人一组。我们这个组组长张林生，组员我与陈达。开始叫我管电门，陈达装炉。每天晚上，除了刘所长[②]、值班的干部和医务室的干部不来，其他干部都轮流到坩埚炉上值班，是全所干部所关心的一个生产单位。在技术上说干部也都是陌生的。北院师傅来了一次，他虽然比我们有经验，可也不能够把生产上的道理说清楚，不是完全内行。

坩埚上需要的石头，由三所战犯到山上去弄。另外政府又派人到人民公社去买，去运，这些事都很麻烦。运到所里需要洗干净，大块石头破碎成小块，再送到磨粉车间磨成细面。磨粉车间有三四十人，每天磨粉几百斤。在磨粉中也发生不少问题，每天公布磨粉的数字，一些老头干劲也很大，不过也有干得不好的。比如任建冰，自己磨得慢，他就到公家磨粉箱里去偷成品，被人发现检举了。这些事都说明，为了争数量，不择手段，成了我们谈话的材料。

在坩埚炉上劳动的战犯都是电机厂调来的。赵玉林对我说："你看，把一些特务都调来了：陈旭东、陈达、张林生、谢异炎、你、我，我们在这儿工作要小心哪！"我想，可能是把这些特务都调到这考验一下，如果不好好工作，就调到农园劳动。这时，我倒希望去农园，在这干活有夜班，白天休息不好，对身体不利。这里干活管电门，容易发生事故。果真发生事故对一个特务来说，就是现行破坏，要枪毙。我心中十二分恐惧，怎么把我调到这来了？这明明是要我的好看！陈旭东说："这都是有用意的，你们不知道，这不是为了生产，而是为了改造我们……"

过了几天，调我装灯，由陈达管电门。我离开电门，心中减少了负担。只要政府人员不在，我们就凑在一起发牢骚："咱们从电机厂

刷下来了，咱们技术不行，那好，叫他们干吧！”我拉长声说。

“舒靖南的技术也不比陈达好啊！”

“说那个干什么，身在改造之中，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哪儿还不是犯人。”陈达说。

赵玉林说：“前天有人说，因为技术不好才调到坩埚。关师傅否定这个说法。”

我没好气地说：“否定是否定，实际情况不是摆在这儿吗？周开成好吵架，陈旭东不顶一个人干活，你我又怎么样？”

“你比我强多了，修理这些工具，也需要钳工啊。”

我们当时都吸纸烟，一支接一支的吸，长吁短叹，唉声叹气，心中有说不出来的别扭。这样的工作情绪怎能搞好工作？我真担心发生事故。在坩埚炉劳动的战犯的思想，我没有汇报，因为我就是有问题的人。这段时间，政府人员及战犯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产品上了，无暇考虑战犯的思想，可能看我们都挺愉快，其实这是假象。

干了几天停工修电器设备，我们转到基建干零活。一天贺知诗问我：“你们累不累？”“不累，没有事。”接着他谈到节约问题，我说：“吃稀饭，晚上尿太多。”他把 4 所节约的情形也谈了不少。我认为节约是有问题的，但没有与贺知诗详谈。因为他这个人我是晓得的，一贯胡说八道。对他说多了，传出去不可收拾，说了几句，我赶紧站起来离开了他。我当小工递砖，砌小炉那几间房子。我站在树上看见地上的胡光焘，便与他开起玩笑：“胡光焘，有一个京戏你看过没有？”“什么戏？”“树上老人！”开始，他没明白，看我站在树上才明白，他说：“树上老人我没看过，我看过树上孩子！”

说完了这句笑话，晚上睡了一觉，胡光焘第二天不会说话了。同时，孔海昆不能走路了。这些事发生得这么快！难怪“黄昏思想”在年龄大的战犯中普遍存在。

坩埚炉的电器设备修好之后，继续生产。每天王科长、贾科长都来，在坩埚炉一呆，就是一两个小时。我看王科长这个人很平易近人，蹲在地上看坩埚与我们谈话不拿架子，不装腔作势。我们对

他说话，从不考虑这句话应该怎么说？那句话是不是应该说？有人说："王科长在部队干过，所以能这样平易近人，我们一辈子也学不了。"我一看王科长容易使人接近，便想找他汇报一下思想，又一想，劳动中还有别的犯人在场，就没有找。

有一天下午，王科长来了，正赶上出炉，唐乐山从炉里夹出胎就吹，吹得很大，王科长一看气够用了，忙喊："好！好！"唐乐山不听还给气，只听"砰"地一声，炸个粉碎，玻璃碴子崩了一屋子……王科长一声没吱。别人说话了："科长叫'好'你不听，看看，挺好一个胎，炸了！"唐乐山感到很不好意思。

王科长说："气够用了你还给，它能不炸吗？以后要注意，给气不要给多了。"别的什么也没说。唐乐山自己用笤帚扫玻璃碴子，心中很不好过。这种事在其他劳改部门绝不能这样过去，起码要批评一顿"为什么不听政府人员指导？""这不是有意破坏吗？"但是王科长态度依旧很和蔼。

坩埚生产很不顺利，成品时好时坏，也找不到毛病。政府人员很着急，我们也很伤脑筋。崔科员到外边取了一些经，但是仍不起作用。每天消耗许多电，我感到情况不乐观，质量有问题，产品出不去厂，我们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个礼拜天，我们这组是白天的班，赵玉林、陈达和我三个人操作。赵玉林负责吹坩埚，他的个性很强，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结果吹坏了一个。赵玉林向谢科员报告，说了一大堆理由，但没承认自己不听别人意见。谢科员很不满意。正在这时，又出炉了，赵玉林赶紧操作，把胎从炉里夹出来，金班长在旁边叮嘱他不要慌，稳住架。赵玉林手忙脚乱地把胎从炉里拿出来，一吹"砰"地一声炸了！玻璃碴子飞到墙上，他的一件棉袄在墙上挂着，棉袄碰上火烧着了。棉袄一烧，房子也危险，我赶紧取水往墙上泼，火泼灭了，可是赵玉林的棉袄却烧了很大一个窟窿，不能穿了。这么一会儿闹得乱七八糟。祸不单行，下午5点钟的时候，谢科员和金班长又来了，又赶上出炉，赵玉林把胎夹起来，一不小心掉了！真可惜啊，谢科员

一见火了："赵玉林，你要干什么？混蛋！你这是搞的什么把戏？"

赵玉林还想把这个胎夹起来，但已经来不及了。一个胎要炼一个小时，需要许多成本，他怎么这样不小心啊？谢科员这样发脾气，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谢科员当时也不过二十七八岁，没有在部队干过，在革命队伍里还不是老战士，当然不会炉火纯青。尤其与我们这些老反动派打交道缺少经验，遇到令人气愤的事发脾气是不可避免的，况且这件事很可气。我认为谢科员发脾气问题不大，就"混蛋"这两个字重了。

我记得1951年在长春公安局被押时，一个审讯员对一个犯人大喊大叫，审讯员的上级在背后提醒他："这样能解决问题吗？这种斗争方式应当考虑！"事后我知道了这件事，并且记住了这位领导的话。在我当学习组长时，别的组长打犯人，我没有犯这个错误，其原因就是那位领导的言行对我发生了作用。

赵玉林的棉袄叫火烧了，又受了批评，晚上回来垂头丧气打不起精神，想不到当晚金班长又给赵玉林发了一件新棉袄！赵玉林穿上新棉袄，坐在床上，低下头半天没说话，我知道他的头脑很乱。

谢科员对坩埚生产抓得很紧，拟出"八定"的生产办法，对用电、炭精棒、粉子、风、时间等都作出了规定。这么一来，产品质量提高了，生产正常了，但是日子不多，因为产品不能出厂而停工了。

谁吃豆腐？谁吃豆腐渣？

改造12年第一次患病，可能与调工种心情不痛快有关。那天夜里当班，屋子热，外面凉，没注意感冒了，觉得头很沉，支持了一夜，第二天又支持了一夜，实在不行躺倒了。头昏，烧得不省人事，躺下两天，温大夫来了几次，到第三天给我吃流食，一吃流食我便知道病得不轻。我躺在床上不能起床，流食我吃不下去，太甜。解

放后，我喝牛奶从不放白糖，我不喜欢甜东西。可是流食都是甜的，一点也吃不下去，我只好喝水，一夜喝一暖壶开水。一所赵炜给我送饭，我有点不过意，说："来点别的吧，甜东西我吃不下去，有没有面条？"

过去有人吃面条，所以我这样问了。他摇了摇头，我一想算了。我想吃几个鸡蛋，一想 7 所的鸡蛋有的是，我给班长写了一个条子，请求给我几个鸡蛋，也没有批准，我想不通。王仲模有病，要吃苹果、白糖，政府都给他买，我有病怎么什么也不行啊？我劳动得不好？

感冒没有好，又转了别的病，打嗝，一夜不间断的打嗝，这样打嗝能把人打死。温大夫一看，叫我到医务室，往喉咙注射。我感到很紧张，打了两针又吃了一些药片，打嗝停止了。虽然发烧，头痛没有好，但是打嗝停止了，没有危险我就放心了。不知注射的什么特效药？大概要不少钱？真是立竿见影。政府对我的病很关心，温大夫细心诊疗，这使我的心往宽绰上想了，精神也舒展了一些。

杨南邨不知因为什么病到医院开刀，国庆节前从医院回来了。

这年，中秋节与国庆节赶在一天，我能勉强下床，改善生活也能吃一点，但吃得不香。京剧活动我也没参加，只到大俱乐部看了一眼，精神还是提不起来。

我每天与杨南邨在院里晒太阳，与他聊天。他说："我的病来得快，我还认为不会有危险呢，骤然疼得要命，大夫把我送到医院，马上给我动手术。多亏及时，不然，咱们见不到面了。这就是人道主义的具体表现，我感谢政府给我第二次生命！"

我对杨南邨说："过去政府给别人治病，送医院你无动于衷，只有给你开刀了，你才感谢政府，是不是？"

"给别人送医院，我也感谢，但没有自己受到恩惠感激得深。"

杨南邨很善讲话，说起来没有完，他讲在医院怎么开刀、上麻药，像讲评词一样。

有一天晚上，没给我药，半夜我要吃药，便写了一个条子放在

小窗台上，等待班长来取，不一会儿药送来了。

“有开水没有？”我一听问话的是贾科长，他是在国庆节替班长值班。人在病中见到一点关怀都觉得温暖。这次贾科长亲自给我取药，使我感激万分。政府对我们的照顾是上下一致的。如果在反动派那里，阳奉阴违，各行其是，上级命令到了下边便打了八折。比如说在抗战时期，蒋介石下命令，抓到日本战俘要优待，叫“优待俘虏”，可是汤恩伯的部队抓到了日本战俘，怕解送麻烦，“砰”地一枪给打死了，士兵说：“谁说了算？老子说了算！不打死，给老子找麻烦，往这送往那送，要是中途跑了，老子还要坐禁闭，这么一下子都省事。”反动派就是这么乱七八糟。当然更谈不上科长替班长值班，科长亲自侍候犯人了。

很快我就搞明白了，我病中提出的要求为什么没能得到满足？因为粮食发生了恐慌，社会上都在实行定量，实行节约。我们在墙里面知道不那么具体，只知道要实行节约。

一天，刘所长把1、3、4所战犯召集到大俱乐部做了一个报告。前面是改造问题，后一部分谈到生活问题。他批评有人扔面包（段克文往污水缸里扔面包），又提出要节约，不应当浪费。全国人民都实行定量，毛主席都定量，你们也应当考虑这个问题。日用品呢，应该用的能不能少用？也应当考虑。

我们对刘所长这个报告体会不够，没有认真对待，照旧那么吃，日用品、纸烟，照领照吸，只有肥皂减了一些。我们基本上没有响应刘所长的号召，采取了应付的态度。

又过了几天，谢科员召集三所学习组长开会，对吸纸烟浪费感到不满，他说：“你们吸烟是从赌场上学来的？你们吸烟是从婊子那学来的？为什么不能戒？”又说干部才领4盒烟，一年才用几块肥皂。这些话，由各学习组长回来传达。我在3所44室，是学习组长尚传道传达的，我知道纸烟吸不长了，戒还是不戒，我迟疑未定。

第二天下午收工，我看墙报上贴出刘庄如写的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实行戒烟不领烟的保证。于是我到学委会问刘庄如：“不能吸

了?”他一摆手,我就知道了。晚饭后,我第一个写大字报响应不领纸烟,并且提出:一年6块肥皂,3包牙粉。随即各室也都动了起来。但是仍有一些人坚持不戒烟,如黄鹤、张三民、樊迅等,然而多数吸烟者已不领烟了。

关于吃的问题,据说衣科员每月才27斤粮,于是我们也要求定量。也不知是学委会搞的,还是有积极分子鼓励,定量的这股风刮起来了——我们自己给自己定量,有定30斤的,有定35斤的,有定40斤的,形形色色,都是自己贴大字报宣布的。还有的写:大米饭一平碗,面包早晚各一片、中午两片……这时期各屋吃饭,互相监督,执行定量,多吃不行。我定30斤,早晚只吃稀饭,不吃面包,中午两块面包。吃了两天,我感到有点受不了,别的屋子有了反映,不满情绪随即变成了怨言,有人说:“如果定量,面包块大小都要切匀,不能大的大,小的小。”

“大米饭要用一样的碗来量,袁剑飞那个碗有洗脸盆大,二斤米装不满。应当划一,以免不标准。”过了两天,谢科员纠正了这些事情,不准互相监督,自己吃自己拿,别人不准问,谁如果干涉就犯错误。

在定量的几天里,发生了一些令人寒心的事情,比如张严佛多拿了半块面包,生活组长杜彦兴看了他一眼,他又送回去了,他背后说:“唉,为了吃半块面包,叫人看了一眼,真难过!”

肖抱愚是3所45室生活组长,他订28斤,叫别人也不能多订;陈远湘是小炉的,也订28斤;谢异炎是坩埚的,也订28斤。这样一来,全屋的人都不满肖抱愚,有人怀疑肖抱愚这样做是学委会的指示,进而也怀疑学委会是受政府的指示。经过谢科员一纠正,才知道是他们这些人从中鼓动,引起了不应该有的波动。

有一天,4所学委会召集生活组长开定量会议,正赶上刘所长去了,一听研究定量,所长说:“政府对你们是保证吃饭吃好,注意节约,不浪费就行。”虽然这样指出了,4所的学委会仍然告诉各小组施行定量。各小组把定量数送到学委会,衣科员说,劳动好的可

以多加一些。上山劳动的时候，姚轻耘在走廊里大喊："上山的同犯可以多吃一块！"

究竟是怎么回事？4所的战犯也不明白。又过一段时间，这种现象才被纠正，大家都说学委会从中捣鬼，给姚轻耘起了个外号叫"坐山雕"。

关于吸烟的问题，姚轻耘在学委会说："纸烟可以报领，干部每月才5盒烟，你们看着领。"

这样一来，吸烟者只得每人领五盒，许多人都感到不够吸，背后发怨言，胡汉文对我说："我领6包，生活组长叫我考虑考虑，每天吸4支烟，再考虑就不叫吸了！唉，真没办法。"

11月，王科长在大俱乐部召集1、3、4所的战犯开了一个大会，由王科长做报告，讲节约问题。他说，我们吃饭是不定量的，政府叫我们吃饱，但不要浪费，也不要限制，更不要互相监视。听说4所吃饭还规定数量，这是不对的。以后，该吃多少就吃多少，只要不浪费就行。说得非常婉转。大家一听，心里都想到全国人民定量，只有我们这一小撮战犯不定量。于是产生了感激政府的心情，心里颇感不安。接着王科长又谈到吸烟问题，王科长说："5盒烟是不够吸的，那么10盒烟够不够吸？"台下的战犯很快就有人答复："10盒烟够吸了！"王科长说："好，那就先发10盒！"

吸烟的问题也解决了。从大俱乐部散会回来，大家喜笑颜开。我们感到政府这样照顾我们真过意不去，尤其是王科长那样的讲话，和蔼可亲，足以代表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我们的父母般的照顾，使我们的心暖暖的，形容不出来内心的感激。

过了两天，虽然没有领纸烟，但是我们收工回来发现，凡是吸烟的战犯床上都放了一条纸烟。我们3所44室，只有樊迅把烟留下了，其他的人都把纸烟退了回去。因为我们已经发表声明不吸了。我想干部才领四盒纸烟，在节约时期我们能省就省，吃饭都应该少吃，为什么烟不能戒呢？如果不是战犯，还另当别论，可是我们是战犯哪！不应当不自觉。在解放前，我吸食鸦片，注射吗啡……

吸纸烟必须是什么牌子的，否则不吸。当时如果不这样不够派头。如果拿起什么牌子的纸烟都往嘴里搁，叫人看见笑话。从小在东北吃豆油长大的，1947年回东北就不吃豆油了，硬说吃豆油恶心。这种忘本的作法，居然有许多人说："东北的豆油不如关内的小磨香油吃起来香。"回头一看，感到非常可耻。现在吃豆油也不恶心了，不吸纸烟也行了，一切坏毛病都可以克服。鸦片能不吸，纸烟也能不吸，现在是节约时期，不要给人民额外增加负担，等将来自食其力的时候再吸也可以。况且，我对吸纸烟引起火灾也很害怕。记得7月一天晚上，我们都去洗澡，张禹斌把纸烟头放在床底，结果把褥子、床板都烧了。第一个洗澡回来的孙焕彩一进走廊，闻到一股烧布的味道，挨户一找，找到我们这屋张禹斌的铺位，孙焕彩把火给扑灭了。张禹斌挨着我，我也吸烟，如果我们这条铺都烧了，或者我们这间屋子都烧了，责任算谁的？这次孙焕彩在张禹斌的铺位上把火救灭，而他坐在上面，不叫人看，说："没有什么，烧得不大。"这些人生活非常散漫，烟头随便扔，如果不戒烟，早晚要跟他们吃亏。

在节约时期，我们知道干部粮食定量不多，我们吃豆腐，干部食堂吃豆腐渣，并且吃树叶子做的代食品，即或吃这些东西，还千里迢迢驱车去内蒙古打黄羊……这些事很快就被我们知道了，大家谈起来很受感动。

"人家是人民功臣哪，还吃树叶子，我们是人民的罪人哪，还吃白面，于心何忍！"

"我们吃豆腐，干部吃豆腐渣，按理我们应当吃豆腐渣，干部应当吃豆腐。"

岂止是吃呀，我想起8月浑河涨大水，政府一方面保护电机厂，一方面关心我们的安危，调查我们谁会游泳，不少战犯报了名，又安抚大家不要惊慌，准备把我们迁到安全地带，可是政府人员的家眷却没有人照料。想到这儿我说："我们不能吃树叶子，因为我们没有那种水平，没有那种与人民共甘苦的优良品质。思想上没有那种较高的境界，焉能有正确的行动！"接着，我联系了自己的罪恶，

1948年5月以后，长春粮食缺乏，我从政治犯身上打主意，先吃干饭，后吃稀饭，再喝米汤，最后吃釉子，饿得“犯人”走不了路。可是今天呢？全国定量，大人孩子定量，我们战犯不定量！干部吃树叶子，我们吃大米白面！对比过去，再看今天，心里不能没有许多的感触，不能不承认这是共产党以德报怨！对我们特殊的、破例的照顾，期望我们加速改造。

在节约问题上，开始发生的偏差，是我们擅自搞的，经过政府人员的纠正，错误的现象消灭了。进而看到，干部的艰苦奋斗精神，对比我们的生活，深深感激政府的关照。

穷　欢　乐

11月中旬，有几天没来报纸。26日晚饭后，谢科员召集学习组长会，传达了刘少奇主席发布的特赦令，并且把报纸交给学习组长，回组传达学习报上刊登的特赦令。传达中各小组接连不断地响起掌声。战犯都希望自己能特赦，也有入监不够十年的，“在黄鹤楼上看帆船”，但是心情都是一样的：多多益善。即或这次出不去，由于越走越少，自己越有被赦的可能。

我估计这次特赦不会有我，因为我这一年改造收获不大。如果同第一次赦的人数那样少，我根本不要想，但也有侥幸心理，一种矛盾的心情交织在身。

政府从头次特赦取得经验，这次尚未等战犯的思想波动起来，在传达的第三天，就召开了特赦大会。开特赦大会的这一天，还是穿新棉衣进入大俱乐部。关在单间的姚步烈不允许他去参加大会，专门为他安了一个扩音器，放在三所学委会的窗前，正对着姚步烈的46室，这个屋子原是我们写材料用的，8月份关姚步烈，他一个人给占了。姚步烈是“橡皮碉堡”刀枪不入，任何教育都不能转变他

的既定想法——一定要结婚[3]，姚步烈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在3所交罪时，他胡说有人打他，现在还是乱说……这么胡闹不想出监了？这不是自取灭亡吗？政府如此关心每一个战犯的改造，令人感动。希望姚步烈听到特赦的消息能够猛醒。

这次来采访的记者比第一次特赦少多了。被特赦的有张普林、陈庆斌、欧阳午、高广荣、庞铮、冯国典、陈芳芝等人。这次还有十多个改判的，原来是死缓或无期徒刑，这次改判为有期徒刑20年或18年。

特赦大会后漫谈了三天，漫谈中暴露了许多错误想法。有人认为被特赦的战犯改造得并不怎么好，尚传道说："我看欧阳午与我差不多，有些地方还不如我。"

"我看这次特赦过于照顾山东解放团来的，他们7个人就特赦一个。"

"还有南京来的也多。"

"我们这里没有特赦一个特务，难道这么多中统、军统，一个改造好的也没有？"这是特务战犯的想法，我也是如此。

"这次特赦的都是有家有业的，如果没家没业，一个人无所归宿容易出事，这也是一个条件，不相信，你们看嘛！"这是赵玉林的看法。

"这次特赦小的多，少将的少，陈芳芝、高广荣、冯国典、庞铮、张普林等人都是上校级，放小不放大。"

有许多错误想法，但比第一次特赦好多了，情绪还比较正常。

改判减刑的对"减刑为有期徒刑20年，由改判之日起"有争议，这么一算，还要加20年才能出监，现在60岁的人，到80岁才能期满！悲观了，发牢骚了。周上凡说："早知这样，还不如不减刑呢！"为此，王科长还专门找减刑的战犯开了一个会，给他们打通思想。

平心静气地讲，特赦的张普林、高广荣、陈芳芝等人，是我们所公认的进步战犯，个别人不服气那是存有私念，一致认为政府特赦

是公平的。受两次特赦的鼓舞,“老死监中”的错误想法消失了,大家明确,只要关押已满十年,确已改恶从善,就有特赦的可能。

过了新年我们开始准备春节的文娱节目。今年社会上大搞文娱活动,用以弥补物质上的不足。我们战犯的文娱活动也比历次搞得热闹。

衣科员到街上买来五六十本文娱剧本,数量之多大概是把书店所有的剧本都买来了。

一天晚上,我、胡汉文、于泽霖在广播室谈京剧问题,刘所长来了,他询问京剧活动的情况,特别向胡汉文了解了山东解放团改造中的文娱活动。胡汉文对这里的生活感到满意。后来所长问我们演出还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靴子,每次演出都是穿胶皮靴子,现在胶皮靴子已经破了,穿着上台不好看,应当发一点布,我们自己做靴子,这样就解决问题了;再有,唢呐现有的吹不响,应该买一个或换一个;其次是晚上有演出任务的,晚饭时不敢多吃,怕吃多了唱不出来,最好准许留晚饭,演完戏回来再吃。”正在这时,郝事务长来了,所长便指示郝事务长,发给京剧组几尺黑布做靴子,又叫郝事务长到街上买唢呐。关于唱戏吃夜饭的问题,所长说可以通知大厨房给准备一些面包。这几件事全解决了,京剧组感到很愉快。我把所长的关心,对京剧组的同犯们一说,大家说一定把戏演好,活跃我们的文娱活动。

我们搞文娱的战犯,排定节目送上批准,然后派角色。我主要演出京剧与相声,其他一些小节目也参加演出。这次3、4所大多数战犯都参加了文娱活动,只有极少数是死角。每天晚饭后,集合到大俱乐部排练。这时候,大俱乐部就像庙会似的,有唱二人转的,有跳舞的,有演话剧的……台上排京戏,角落里对台词,锣鼓一响,台词听不到了……有时一个人又演话剧,又演京剧,这边叫他去,那边也叫他去,话剧与京剧矛盾了,剧务与剧务冲突了,一边排戏,一边辩论……整个大俱乐部十分热闹。我感到头昏眼花,特别疲乏。

春节到了,院子、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走廊里挂满了花环、灯

笼,政府照例下发了苹果、糖果,人们感受到了节日的气氛。除夕文娱晚会是摆地摊演出,就是把大俱乐部的椅子摆成圆圈,中间成小广场,节目在小广场演出,战犯们在周围椅子上观看。第一个节目是我们小组的快板剧《上北京》,我扮一个老太太,小组的犯人都参加这个剧的演出,这个快板剧很热闹,看后叫人兴奋,所以贾科长把它放在第一个演出;接着我演相声,还有7所的舞蹈,日本战犯一边唱一边舞,很精彩,演到11点才结束。晚饭时,有人说:“今天是年三十,少吃点,半夜还有饺子呢。”

从大俱乐部回来,通知马上睡觉!大家知道今年三十没有饺子吃了。我知道这是因为节约,困难了。其实吃完饺子再睡觉更不舒服,再说我也没有感到饿。但是有的人露出了失望的样子,特别晚饭吃得少的樊迅,这回怕是饿了。大家什么话也没说就睡了,我想,只有等待明朝了。

第二天大年初一,一起床互相问好,洗完脸就张罗化妆,准备饭后演出,担任演出的人忙个不闲,管剧务、化妆、道具的特别忙。

早饭吃上了饺子,我以为是黄羊肉的,不是,是猪肉馅的,挺好吃,每人都吃了不少。我想,干部是不是也吃上了饺子?从大厨房挑饺子回来的同犯说:“干部在大厨房给我们煮饺子呢!”那么干部吃没吃上饺子呢?不得而知。

饭前化好妆的,因为吃饺子弄得嘴巴全是油,又重新进行了补妆。一切弄好了,开演白天的节目,一直演到吃晚饭。

衣科员指示下午5时演出京剧,到时演不出就要受批评,过去常受到这样的批评。因此我抱着宁早不晚的主意,下午一时就开始化妆,晚饭前把妆化好。我知道带着妆吃晚饭不舒服,但是这是没有法子的事,不这样不行。本来到了年节,都希望吃点好的,可是演戏饭前化妆,脸上抹了一些白粉,吃好东西也不香。为了演出,大家把不愉快闷在心里,不过有一些愿意演戏的如胡汉文、魏季良等人倒不在乎,胡汉文把晚饭留下来,放在茶楼的大水壶上,等演完了戏再吃,而谭冀平、靳金城、蔡省三演戏不敢多吃饭,炖肉也顾不得

吃了。

晚饭后，我赶忙叫服装组给演员穿衣服，有的在厕所大便，我也去催。这些人也够磨蹭的，3点钟晚饭，吃完饭3点40分，再上厕所就4点多了，5点开演，怎么来得及？只好催这个催那个。到5点钟，不管准备好没有，把队伍带到大俱乐部……迎头遇上王仲模，他催促道："关梦龄快一点呀！"

"好，你快去找蔡省三！"我扭身就跑。

"蔡省三穿上衣服了，他叫我找你，衣科员催呢！"

"好，好，大家快一点呀！你叫曹琦戴头盔，你找王云沛去，穿那件绿靠！"

东一头，西一头，把衣服穿好就开戏了。开戏时我在上场门一站，担任催场、提词、维持台后秩序，一直到演完为止。有许多时候后台吵起来，衣服穿差了，演员没开水喝，道具没准备好，连黄鹤扮太史慈忘了戴胡子上场都是我的问题，他们一齐向我发泄怨气。

演完戏，班长叫我到厨房去拿烤面包，无疑这是所长指示的。正在吃面包的时候，所长从走廊走了过去，看我们吃上面包没有，这个情景别人不清楚，我清楚。我对姚轻耘说："面包挺多，叫后台的职员也来吃一点吧。"

于是管服装的、监场的、打锣鼓、拉胡琴的，都来吃了。

一连三天文娱演出，白天晚上一齐演，共演出130多个节目，是我到战犯管理所演出节目最多的一个节日。大家说："我们也是百花齐放，什么角色都挖出来了，有一些从不上台的也上了台，表示大家都很快乐！"

欣　慰

赶写特务技术材料，这是去年8月刘所长布置"特"字号（战犯

对我们这些中统、军统特务的称呼)的任务。写材料我从没有抵触,因为我知道我的一切都是写材料争取来的。可是由于姚步烈占了我们写材料的屋子,我们没有专门的地方写材料了,因此思想不够集中,写得不够连贯,4 月 25 日呈上去二百多页,自己看了也不满意。

5 月有一天,刘所长又召集我们“特”字号的战犯在前楼会客室谈话。所长就写特务材料一事,读一份文件。我虽然距离刘所长很近,但是由于我的眼睛近视,看不清文字,听文件的口气是一个权威机关叫我们写的,要求写全部的特务材料,过去已经写了还要写,今后再也不写了。所长把内容念了一遍,又加以解释,最后问我们需要多少时间?张严佛说:“需要一年。”施锦说:“需要一年半。”我说:“要半年,如果是整天的写,而不是一天两个小时,那又不同了。”关于时间方面由所方给安排。在漫谈如何写材料时,张向阳说:“我在军统局住了几年禁闭,关于军统的事我知道得太少,写不出东西。”我对他这种说法不满意,别人也不满意,大家发言不提名地批评了他,我想,这个顽固蛋一点也不争取。他在 1945 年“九·三”胜利之前,在西安第 3 中美训练班当上校教官,担任政训工作。中美训练班的事有很多可以写的,他说写不出东西来,令人奇怪。

我想起从前写类似材料的经验,建议道:“这份材料如果集中写,能写出一部完整的东西,否则一个人一个人写就分散了,编辑都困难。我过去在长春公安局曾参加集中写军统材料的工作,那份材料写得比较准确、丰富,今天如果再集中写,有这么多的人,一定能写出一份更完整的特务材料,如果不这么写,以后这些人一调开,就不容易写了。”

所长想了想还是叫个人写,不集中。我判断这份材料是公安机关用参考的东西。参加的“特”字号的战犯有王业鸿、黄康永、鲍志鸿、张严佛、刘非、陈旭东等人。他们都能写出一些真实的东西,唯有王安之不行,这个人已年迈昏聩;陈达、钟化民、黄玉元、张林生、潘澄清、谭容等人,因为从事特务时间少、资历浅,不会提出可用的

东西，不过他们可以把他们所在单位的材料写出来。

晚上又漫谈，谢科员进行了动员，王科长作了指示。这时对于写这份系统的特务材料，大家都有了足够的重视。我与王科长说："我们用的纸是黑纸，太不好写，能不能找一点好纸？"王科长答应想办法。会后，王科长找黄玉元谈话，回来黄玉元笑了，我判断可能黄玉元有负担，科长对他作了工作。我知道黄玉元没有什么可写的，他只是一个上尉报务员，1949 年在"包围圈"里才升为少校，莫说与老牌特务张严佛比，与我也比不了。

5 月中旬开始写系统材料。一天一个不认识的干部找我谈话，能随便到监号提人，是公安机关的人，具体一点说，是辽宁公安厅的人。他领我到办公室，拿出纸烟给我，我说不吸烟。这个人有二十六七岁，问我写材料没有？我说已经开始写了。

他问怎么写的？我说按照所长指示写的。他又问所长怎么指示的？我说有三点，一边说，我一边掏出笔记本，他说："给我看一看。"我对所长指示记的条理分明，他看完很满意，我想，昨天所长念的那份文件可能就是他们带来的。他对写材料进行了一些启发，问我有什么顾虑没有，他又问我开始从哪儿写起，我说从我加入军统时开始写。

"我看你从东北地区开始写吧。"

"那也可以，我从沈阳写起。"

结束谈话回来，学委会传达东北地区的特务先写东北的特务情况。我断定找我谈话的干部是辽宁公安厅的，而其他"特"字号的战犯仍写供职地区的材料。我、陈旭东、康健东、段克文、钟化民，先从东北写起，后来，又传达给鲍志鸿、张严佛等人，从 1945 年"九·三"胜利时写起，这是要了解解放战争时期的特务情况。

上下午都写，不出去劳动，这么一来我担心身体不好，优点不鲜明。因为我们在这里写材料别人不了解情况，只有劳动大家才能看得出来好坏。写到 130 页，这个干部(后来知道他姓张)来到监号，亲自把这些材料拿走了。这期间他们有四五个人住在这里，每

天找人谈话，每天来要材料，与管理所的干部一样，随随便便，进进出出。

一个礼拜天，我们京剧组在大俱乐部那儿练唱，一个索要材料的高个的干部走过来，当时我正在唱，唱完发现他站在我的身旁，他说："关梦龄你唱得很好！"我笑了。他问了许多京剧组的活动情况，这时正赶上我们京剧组把所有的演出服装拿到外边晾晒，我就对他说："这些服装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没有一件是买的，如果不在跟前看，绝对不会看出来是画的图案，如果买这么些服装，那需要很多的钱呀。"他称赞道："真不少，一个小戏院也不会比你们多，真了不起，你们的人才很多呀！"

我说："这只能说明我们这些战犯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改造教育下，思想有了转变，精神愉快才能有情绪参加文娱生活，如果在解放前，别说上台演戏，看戏都不一定赏光。现在我们的话剧和京剧都很活跃，有许多人想上台演出，还没有机会呢。我们是乐观改造。"

"好啊，乐观改造。好好争取，争取特赦！"

"我想争取第三次特赦。"

"努力吧。"

张干部非常关心我写的材料，对我很了解，有时就坐在我身旁，看我写材料。我想，他一定急于要沈阳地区的材料，我把沈阳地区的东西尽量写详细一些。我在沈阳认识一个李友三，他当时在沈阳邮政总局工会当主席，1947 年夏他找我，要求我给他们派几个特务，协助他们防止共产党渗入。当时，我忙于私人应酬，没有给他派人，后来，他是否又找别人要求派特务，不得而知。因此我把李友三写了出来，这是一个检举材料，另外又写了一些沈阳地区的组织材料。有一天我写社会关系，写到张冠英—　鲍老太太，她是张学良的胞姐，张干部指着张冠英的名字说："把她的情况写详细。"

这样写，写到 8 月 30 日，张干部一共拿走东北地区的特务材料 815 页，随即他们就离开了管理所。这些材料可能会起到作用，

只是我难以像在吉林、长春那样直接看到我的工作成果。不过在写材料期间，我和大家十分欣慰地看到了我们的另一成果。

5 月，政府组织我们参观了“辽宁工业展览馆”。新建的展览馆十分壮观。

这个展览馆展出的机器都是辽宁各厂生产的。大型机床，巍峨挺立，看过使人感到我们国家在蓬勃前进，值得骄傲；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刺绣、雕刻、绘画，都非常精致。我过去认为刺绣只有川绣杭绣，别的地方如辽宁省根本谈不到刺绣，女人绣个枕头花可以，绣个大幅精致的东西不行。今天一见，出乎我的意料，可见用固定的眼光看事物是不正确的。

参观时，战犯对电动机非常注意。我们战犯制做的电动机，也在这里展览！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进入了显赫的展览厅，大家心中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许多人在这部电机上付出了汗水，面对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能不感到欣慰。

由于参加了战犯管理所电机厂劳动，我们对一些机器及部件都大致了解了，再不像 1957 年参观那样，只看大，只看新，其他什么也不懂。懂一些常识参观起来就更有兴趣了。比如摇臂式的钻床我们明白，大砂轮、小丝锥更熟识……虽然我在电机厂劳动没学成哪一门技术，但是我增长了不少知识。

此后，我利用时间继续写军统系统的材料。张干部仅拿走了 815 页，还有一半没有写，再写，恐怕时间成问题。

病的包袱

政府人员曾经批判李邦勋“老死监中”的思想，但是随着岁月的增长，战犯们身体上的病患越来越多了，于是政府方面又及时地作了大量的保健工作，其无比的关怀是令人垂泪的。

这里每年一次身体大检查，此外，还针对战犯较多的病例进行专科集中治疗，如牙病、痔疮、疝气、梅毒等。解放前三十三年中我才检查一次身体，那是1938年入战干一团政训班。其他就顾不得了，也想不到这件事。现在做了战犯，居然有人关心我的身体健康了。

去年节约时期，依然请来医生给我们检查身体。这次我希望能给我镶牙，到了牙科大夫那儿，给我拔下一颗大牙，但是不能镶，我说吃饭不方便，他仍说不能镶。我想这是所的指示，只管拔不管镶，所里的温大夫也无能为力。过去段克文的牙为什么能镶呢？赵金鹏的牙为什么也能镶呢？我心中明白了，现在节约了。战犯百分之八十的牙有毛病，都镶牙行吗？站在政府方面想，只要你们还能对付吃饭，就可以不叫政府增加负担，站在我们这方面想，只要能吃饭，虽然有困难也要克服，不能给人民增加负担。在认罪上应该这么想："为什么枪毙那么多的特务，不枪毙你关梦龄？"镶牙一桩小事攀比别人就不应该了，再一想，冯国典一个牙也没有，特赦之前，由政府给他镶的满口牙。人家平时能克服，我怎么不能克服。并且，像我这样情形，说我的牙坏得厉害，还要用许多话来解释，也感到麻烦。

在检查身体的时候，发现有些战犯的小腿肿了。所方对这个病很注意，凡是有这种病的停止劳动，上午参加学习，下午在屋睡觉，并且吃营养饭。每天三餐豆浆、细面包、豆腐、鱼。大家说这是心脏病，我认为是营养不良。不然为什么给他们增加营养呢？许多人认为这点小病留在家里不应该。医生嘱咐静养，蔡省三却在屋里看小说。这些现象发生后，政府便把休养的人集合在一个屋子睡觉，这样才比较安静地休养了。少数有病的同犯感到过意不去说："我好了，腿不肿了。"结果到医务室一诊断，并没有好，还要休养。战犯普查了几次，每次有痊愈的，也有新患病的，前前后后共有四五十人被停止劳动，进行休养。这些患者都相继恢复了健康。

去年政府还给战犯治了一次梅毒，梅毒俗称花柳病。旧社会在

大都市里，患花柳病的太多了，尤其是反动派的上层，老爷、太太、小姐，没有患花柳病的不多。男女关系一团乱，有的太太就是高等破鞋。加上妓馆林立，造成了都市花柳病院特别多。解放以后，颁布了婚姻法，取消了妓馆，取缔了破鞋，男女不能胡搞，都有职业，实行一夫一妻制，花柳病逐渐的就少了，将来这种病将会消灭。这是共产党给人民带来的好处，这是共产党给战犯带来的恩惠。有梅毒的战犯每天到医务室注射，大家又说了："在旧社会狂嫖乱赌得的下流病，早不治，晚不治，到了新社会由人民政府来治，政府对我们真是包下来了，包治脑袋里的病，包治身上的一切病，不感激政府就没有良心！"

我记得1942年我被调到重庆受特务训练，我们的特务训练班叫"军统局视察人员训练班"，一省调一个去受训，总共29人(原来是30人，有一个坐飞机失事摔死了)。班址在杀杨虎城将军的白公馆前面，靠着戴笠住宅只有一百米左右，有时戴笠在屋里骂人，我们都能听见。这时，我患了梅毒，训练班设有美式医务所，我不敢去诊疗，怕戴笠关我禁闭。我自己偷偷到街上小医院去治，用的是化名。当时我对戴笠只是怕，并不恨。可是现在回忆起来，却感到他太可恨了，他患梅毒由专用医生治。在这样主子的领导下，下属的特务机关乱七八糟，甚是肮脏。今天呢，战犯的梅毒重犯，政府包治，并且医务人员十分尊重战犯的人格，没有人说"这是花柳病啊，脏病啊！"之类的话。

今年3月，赵玉林调到电磨给干部生产代用的"面粉"。这时赵玉林已经吐血了，他的肺病十分严重，他对我说："我的病吐血了，怎么办？""不要客气，你要报告张大夫(当时张大夫负责磨粉车间的工作)，因为你是给干部加工吃的东西，有这样的病不相当，这不是不积极的问题。"他听了我的话，就报告了政府。

4月29日这天，我们刚吃完早饭，正预备提纲发言，门外喊："赵玉林！科长找你。"不一会儿，王科长就与他一块到了3所44室。赵玉林进屋显得很紧张，匆匆忙忙整理东西，王科长很和缓地

说："赵玉林到疗养院去养病，可以不传染大家，他自己也可以得到很好的休养。"这时，赵玉林出去拿东西，王科长对大家说："赵玉林很紧张，他不明白政府的意思，到那边疗养比咱们这里条件好。"

我与赵玉林的肥皂还没分呢，我说："你都拿去吧。"赵玉林坚决不要。王科长问怎么回事，大家说两个人一块肥皂，王科长对蔡省三说："肥皂不用两个人一块，一个人一个月一块。回头你告诉学委会，每月一块，天气太热半块肥皂不够用。这块肥皂给赵玉林拿去，你们再领。"

肥皂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从王科长的谈话发现，我们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政府方面有许多不知道，是战犯自己搞的，如牙粉节约，肥皂节约等。

赵玉林走了，我们感到政府既照顾了他，也照顾了我们，这样处理很全面。但是大家担心赵玉林在铁岭医院疗养胡乱想，他这个人个性特别，想法也特别。"五·一"前我们劳动，他说："'五·一'劳动节是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我们'五·一'前应该劳动，劳动也不应该超过八小时。"

监狱中的人只要一调动，不论这件事有多么好，起初都要瞎想一阵，过几天才能安定。我体会到，我们这些人的心好比手表里的游丝，只要有一点轻微的颤动，游丝就会有感觉而晃动，这几乎是普遍的现象。

过了一些天，接着赵玉林之后，又有郭树人、范玉林、李文开、潘立强、叶芳华等人，去铁岭疗养，听说他们也是肺病。这些人旧社会生活腐化，加上年龄大，患病在身，不好医治。如果在家，这些人会早早死掉，在这吃细粮，不断地吃药，没有劳动，在屋里静养，等于养老院。我们参观抚顺工人疗养院，除了政治身份不同，他们有自己的自由之外，在物质方面没有我们这里好。所以，一所的犯人王贤伟对我说："韦焕章在这病倒，他儿子来了不往家领，因为领到家里养活不起，又是牛奶，又是流食，谁家能有这么些好吃的。"

我看许多战犯在这里还能活下去，真若是放回家就完了。像王

光复有肺病，脚背经常浮肿，在这不断吃药，是医务室的“老主顾”，回家吃药怎么办？别说没有钱，就是有钱是不是就能买得到呢？办不到的，并不是说人民的生活不如过去，正是人民的生活好了，许多物质才感到不足，就要有计划地供应。

6 月份，3、4 所调号，把患肺病、肝病的战犯集中起来。3 所的战犯身体比较好，4 所的就差一些。调号之后，我被调到 3 所 50 室。

调号之后，3 所没有思想波动，4 所的战犯思想波动很大。比如陈达、姜明文、陈廷琪、谢异炎、杜彦兴等人，过去都自认为身体健康，经过一调号，心上有了负担，对自己的前途发生了怀疑：“这样的身体，不能劳动怎么改造啊？”

方舟对我说：“你们对我们调到 4 所高兴？幸灾乐祸，下一次你也要来了！”

这样的玩笑开得不应该，反映了个别战犯没有认识到政府这样做，对大家都有好处，这使政府人员又做了许多说服工作，才使战犯们扔掉了病的包袱。

调号之后，张严佛调到 50 室，与我住邻铺，没有事常与他谈论军统的事情，我对军统的内幕知道的不如他多，他对外勤不如我内行，我问他：“你在局里面当主任秘书的时候，怎样维持生活的？”

“靠薪水，不够就从经理处借，再就是有人给我送钱，没饿着。”

我一听，他的生活比外勤人员苦多了。外勤特务在处面独挡一面，可以向银行借款，搞投机倒把，雇一个买卖经理，不担名义，人不知鬼不觉，生活根本没有问题。我告诉他：“1943 年我在陕西安康当查缉所长，分担 11 个县的查缉私货任务。我与中央银行安康分行经理合伙找一个货栈经理给我们走私。我们从安康把盐运到老河口赚一倍，回来买纸烟又赚一倍，20 万的盐，运回来 80 万，坐在屋里什么也不管，就把钱赚了。有一些人贪污部下的薪饷，吞搂办公费，那是最下的办法。所以，做外勤的特务，不愿回到重庆做内勤。1945 年‘九·三’胜利，戴笠在北平决定‘裁弱留强，里外三

百’，把弱的、不好的人裁掉，把好的能干的留下，把军统局的内勤人员调做外勤三百，把外勤的人调回做内勤三百。当时我一听就害怕了，怕把我调做内勤，吃饭成问题。”

“你们做外勤的痛快极了，做内勤的在抗战时期，每天白天8小时办公，晚上还得加二三小时，整天不闲，吃得又不好，许多人得了肺病。公事多，一千多人办还忙不过来，我的办公桌上经常堆满了待批的公事，公文一多，外边来人都看不见我了，叫公文给遮上了。有一些公文看了一个大概，拿笔就批，有的事我批过去就忘掉了，那才作孽呀。”

军统局的人虽然这样苦，可是特务头子戴笠却非常享受，张严佛说：“戴笠吃得特别好，比蒋介石吃的都好。他用的东西，从美国运，每天不离女人，给女人买东西，用的钱没有数，你给他在北平办过总务，你还不知道。”

“知道，在北京时更腐化。”接着，我对张严佛说，“你可以把戴笠政治方面的材料写一些，比如蒋介石叫戴笠暗杀某人，对哪一省军阀如何收买？怎样利用？”

写系统材料，张严佛比陈旭东写得多，态度认真，不过有许多他经手指挥特务暗杀的案子，他说不清楚了，如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宣侠父，就是他与蒋鼎文决定之后，呈请蒋介石批准暗杀的，这个案子，他不能详细的交待出来，他对我说：“暗杀之后，由李汉亭把宣侠父的尸首扔在一个井里，以后我记不清了，伤脑筋。”

他还很伤感地对我说：“我与任建冰在武汉公安厅的时候，武汉战犯启程来抚顺，公安厅副厅长想把我俩留下，说在武汉解决问题，打算释放我们。后来又变了，1958年移送到这，到这儿就成了战犯！”接着他告诉我参加和平起义，与程潜、陈明仁等人的关系，最后一摇头：“起义的思想到这之后解决了，现在我认识到我是战犯，我参加和平起义是假的。”

第三个特赦令

1961年。夏天来到了，西红柿已经成熟，院里种的西红柿一批一批摘下来，发给大家吃，政府还给买了一些甜瓜。大家吃得很有兴味儿，没有想到政府会给我们买甜瓜，出乎意外地发到监号。大家一边吃，一边谈，有人对我说："你们东北还有甜瓜，真了不起。"

我开玩笑说："这不是我省的，这是汉口的，过去东北这个地方什么也没有，我们都是喝西北风长大的。自从你们来了，才有了粮食，才有了甜瓜。"大家都笑了。

这一天夜里，厕所的门不住地响，有人泻肚。别的号有人向班长报告什么，不一会儿监房的门打开了几个。我从梦中醒来，一看，我们这屋就有五六个人泻肚，别的屋也是如此。过了一会儿大夫拿来药，管泻肚的，都吃了两片。吃完药还有泻的。这么一搞，3、4所就有几十个泻肚的。我心想，千万别出事，本来有许多菜可以生吃，但是在我们这里都要用水煮，比如黄瓜医务室不同意生吃，只好喝黄瓜汤，什么味也没有了。这么一出事，夏天就别想吃水果。

第二天，有许多人没有起床，早饭也有许多人没吃。3所每个屋子都有几个人躺在床上，肚子依然疼痛。这件事成了人们谈话的材料。早饭后，班长把西红柿、甜瓜等没有吃完的水果一律收起来，送到3所54室。这步棋我早就料到了。

医务室对这些泻肚的人进行了妥善的医疗，整天不学习、不劳动，我什么病没有，也跟着在屋休息。外边的医生也派来了，到监房看了看，听说也到厨房去了。所长和王科长到3所，所长问我跑肚了没有？我说没有，并且说："泻肚子是吃咸菜吃的，这几天在咸菜里发现有蛆。"

王科长问："怎么没报告呢？"

我吱唔说："是的，没有报告。"接着我又说，"这次泻肚与西红柿、甜瓜没有关系。"所长同意我的意见。

后来经过所方与外来医务人员调查，确认是咸菜有问题。一所在大厨房做饭的战犯，没有把咸菜洗干净，以致使病菌传染，发生了普遍性的泻肚。较重的患者由医务室集中到3所53室。金班长把铁丝绑在窗子上，然后挂上一些大玻璃瓶，瓶子装有药水，给这些人点滴。事情本来不大却惊动了抚顺市。第三天中午吃海带炖猪肉、大米饭。我想，大家正泻肚，怎么能吃猪肉呢？有人说："这是政府的照顾，大家拉稀，把肚子拉空了，该增加营养了。"我们休息了三天才算恢复正常。

邬国贤说："我一个大甜瓜没舍得吃，给没收了，真可惜。"

我开玩笑道："就数你那个甜瓜好，真可惜。你可以给一所赵炜提意见，因为他们不注意卫生，影响你的甜瓜没吃到嘴。"

10月份，苏共召开22次代表大会。周总理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在苏共22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严重事件，开创了在一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攻击另一个兄弟党的恶劣先例。周总理表示不同意这种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作法。周总理在莫斯科没有呆几天就回来了，回到北京，毛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总理率领的中共代表团。这件事发生之后，我们战犯感觉到中苏两党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有了不同的意见，最终闹得不欢而散。蔡省三说："毛主席到机场迎接周总理有很大的意义，说明周总理在苏共22大上的发言是正确的，看来中苏两党关系复杂化了。"

谭冀平对我说："苏共22大结果不圆满，周总理没有在莫斯科多呆几天就回来了，中苏两党前途不乐观哪。"

一些战犯特别不同意把斯大林的灵柩迁出红场，认为赫鲁晓夫做得过分，我说："人已经死了，这样对待是不对的，赫鲁晓夫这个人肚量太小，怎么那样仇恨斯大林呢？"

"可能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对赫鲁晓夫不客气，压制了他。所

以，这回进行报复。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挖坟盗墓是最不道德的事情。"这是周上凡与我小声说的。

《人民日报》把霍查及赫鲁晓夫的两篇文章刊登出来了。战犯们都感到霍查批评赫鲁晓夫是一针见血，觉得赫鲁晓夫的文章没有说服力。我认为大国不应该欺负小国，尤其是不应该断绝国交。苏联把海军撤出发罗拉，将阿尔巴尼亚送给帝国主义，这种作法是赶尽杀绝，想把阿尔巴尼亚一手掐死。

战犯谈论这个问题是偷偷摸摸的，认为赫鲁晓夫有问题，霍查也不对，中国共产党是支持阿尔巴尼亚的。战犯的理解都有片面性，究竟何为对错，谁也不敢公开说。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一知半解，不敢妄自发言，说对了算是碰上的，说不对说我"造谣""污蔑"，麻烦就多了。虽然我嘴里不说，心里也有一个想法：我认为赫鲁晓夫欺负霍查，中国共产党要打抱不平。至于"理由"谁都可以说上一大堆，谁都可以当原告。没有正式学习，没有叫我们暴露思想，过去就算了。

一天下午，姚步烈回来了。姚步烈是春天从这里解走的。解走的时候，我想，可能把他解到北院监狱，或枪毙了。可是走了半年，现在又回来了！我纳闷怎么没有枪毙？这是宽大无边哪！有人说，这回可能转变。但愿如此。

12 月 18 日，我因为写材料没有出工。下午 4 点钟，电灯亮了，我从 50 室到 51 室一看，谭冀平与黄玉元两个人注视报纸上的文章，他们看完了，各自走开，谁也不说话。我走到桌子前，把报纸拿到手，里一翻，外一翻也放下了，什么也没看见。黄玉元过来把这张《辽宁日报》的正版往我跟前一推，我再一看：啊，特赦！我赶紧抓起来，看看是什么日子的报，是 1961 年 12 月 18 日的《辽宁日报》！我看报有过经验教训，无论什么报到我手，一向是先看日期，因为过去看报出过笑话。1947 年春，在北京，我桌子上有一张《华北日报》，刊登着京戏广告，我发现有程砚秋的《荒山泪》，于是我就到处打电话，请朋友听戏；又派人到开明戏院买票。晚上，我同朋友都到

了开明戏院，一看不是程砚秋的《荒山泪》，是别人的戏，我问戏院子，人家也不知怎么回事。我责备他们说："不是程砚秋的戏，为什么在《华北日报》上登海报？岂有此理！"

经理出来一再对我婉说："我们没在《华北日报》刊登《荒山泪》的海报，最近程老板也没上台呀！"吵了一顿回来了，到家把报纸找出来一看，原来是1946年春天的旧报，是预备包东西的旧报纸。从那之后，每拿报纸必先看日期，今天，一看有特赦消息，便仔细看了日期，这才相信，这是最近的事情。

黄玉元、谭冀平都不说话，这俩人从不乱说乱动。他们不说话，我说什么呢？我也不说了。我与黄玉元走出51室，我对他说："你很有希望，乐在心里吧。"

收工回来，各屋吵吵嚷嚷，大家还没看到特赦的消息，尚传道问我："有什么事没有？来报没有？"这是他的习惯。

我装着十分平静，说："我没出屋只写材料了，我看对门来了一份报。"

饭后，消息传过来了，"特赦令下来了！""主席颁布了特赦令！""这是第三批了！""我算计该有了！""每年一次，一进12月就有门。""这回人数少不了。""关梦龄你在家不知道这个消息？""我没看报嘛。"我这样说，减少一些麻烦，我不爱看报，他们知道。

特赦令下来之后，战犯们仨一群，俩一伙，交谈起来。艾毓英、许权、刘非、邬国贤这一小伙汉口同乡；胡汉文、贾斗奎、黄家驹一个生活小组的；我、谭冀平说得来的；黄炳寰、陈旭东、张国泰性情相投的……这些小圈子平素虽然不怎么显露，但是人人知道，他们常常谈一些私房话，谁也不反映。特赦令公布之后，这些小圈子活跃起来，估计谁有希望？政府最近找谁谈了话？谁写了"和平起义经过"的材料？谁的表现不错？谁的罪恶少，历史简单？用这些蛛丝马迹，来衡量特赦的可能。

我想别人，也想自己。半年前我曾对索取材料的政府人员说过："我想争取第三次特赦。"这次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的

第三个特赦令呀！

……

关梦龄　1963年于抚顺释放前后亲笔
李占恒　1988年于沈阳整理一稿
　　　　1998年于沈阳整理二稿

①蔡省三：原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蔡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一直是战犯学委会的成员。1975年特赦后欲去台湾，未准，滞留香港发表了许多回忆文章，较客观地介绍了自己的战犯生活。

②刘所长：即代所长刘凤奎同志。

③（姚步烈）一定要结婚：姚步烈原国民党少将政工处长。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期间，自以为所方护士×××爱上了他。姚向所方提出与×××结婚，达到纠缠的地步。据所方医生介绍，姚此举属精神病症状并予以积极治疗。后来姚病逝于战犯管理所。

后　记

关梦龄没有获得特赦，他是刑满释放的。获释那年是1963年。关梦龄后来的情况怎样？

我拜访了曾经与关梦龄一起改造的原国民党将领、关梦龄就业之后结交的工友，以及他的女儿……熟知他的人告诉了我想知道的大部分情况。

关梦龄遗稿纵贯一条感情的潜流，那便是对独生女儿关棣炽热的爱。女儿与他保持着通信联系，开初传递母亲的期待，后来便报告自己的生活。一次，她告诉父亲，女儿的京剧表演轰动了全市，上了报纸，登了照片……女儿不时地用美好的生活感染着囚禁中的父亲，召唤着父亲的归来。虽然关棣的书信有喜欢女婿的外祖父的指点和恪守礼教的母亲的授意，但是此后的种种表现看得出关棣是不失一个懂得感情的人。

关梦龄在囚禁中对前程有许多美妙的想法，想成为我方的特工人员、想当政协委员……最后想得实际了，那便是"大人孩子团聚一起，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关梦龄刑满被安排在抚顺园林处做工。他迫不及待地奔赴徐州，去会见女儿。那一幕是十分揪心的。

"大约是1964年，父亲来徐州，住在姥爷家。我那时是剧团的学员，我知道消息后打算去看父亲，请示剧团的领导，剧团的书记

说：‘看看可以，但你要与他划清界限！’到了姥爷家，姥爷说：‘这是你的爸爸！’我随口叫了一声‘爸爸！’爸爸哭了……他说他要带我去抚顺。我立刻想起书记的话，赶紧说：‘不，我跟你断绝关系！’爸爸哭了，哭得很厉害。姥爷训斥了我……”

这是关棣亲口对我说的。那是1979年，我去徐州拜访关棣和她的母亲。这时关棣已经更改了姓名，随了继父的姓氏，并且根据“革命需要”从文艺舞台转到了工厂的翻砂车间。那年她已经是一个9岁女儿的母亲了。她长得个头不高，体态略胖，圆脸，单眼皮，已经没有文艺人的风采了，但言谈起来质朴、纯洁可见，热情、直率袭人。她平和地对我叙说了与父亲的最后一次相见。

我欲采访关棣的母亲，关棣热情地传递了我的希望，又热情地回绝了我的希望：“妈妈在我11岁那年改嫁了，妈妈与继父又生了四个女儿，我们一家处得很和睦……”于是，我知趣地收回了我的希望。

关梦龄只身回到了抚顺，投入了孤寂的自由生活。关梦龄没有什么想不通的。早在1948年一个公安干部就对他说：“你的历史可以清楚，却不可能清白。”关梦龄获释的前一年，1962年，蒋介石集团企图反攻大陆，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动员令——接近“文化大革命”的神州大地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这形势对关梦龄来说是清清楚楚的。

骨肉可以割断，亲情怎能剥离。虽然女儿向他，向他的组织声明，断绝父女关系，但是关梦龄依旧用自己微薄的收入来贴补亲生的骨肉，依旧在口袋里装着女儿的相片。这不禁使我想起苏联的革命家捷尔任斯基，他在华沙监狱的单身牢房里陈列着儿子亚西克的全部相片，任儿子从四面八方看着他，他在各个角落看到儿子。一个是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一个是由反革命转变而成的普通公民，其爱子之心如源一流啊，人之天性。至此，女儿仍是关梦龄的精神寄托，生存的动力。以至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关梦龄为了求得一条红色的袖标佩戴在女儿的胳膊上，决心断绝父女关系

……“信发走了，他包了饺子，呷着烧酒，睡了一宿好觉。”这是一个工友告诉我的。这使我想起莫泊桑的《一个哥尔斯方式的复仇》，儿子被强盗杀死了，老婆子发誓为儿子报仇，她已年迈无力，便精心训练一条家犬，家犬把强盗咬死了。仇报了，誓言实现了，“老婆子在傍晚的时候回了家。那一夜，她睡得真好。”

工友们又告诉我一些关梦龄的生活琐事。

关梦龄来园林处那会儿天已经冷了。他穿着扎腿的黑棉裤，矮小的个子，黑面皮，大嘴叉，挺丑，不显眼。一开始谁也不敢接近他，怕“粘包”。但是总在一起干活，总要有些来往，比如，一起劳动问个钟点什么的。奇了，关梦龄不戴表，但一报钟点差不了多少！这人不凡哪。没几天，全处二百多人他全能对上号，姓名，家庭人口，爱人情况……一清二楚。连临时工也不例外。这人浑身是眼睛，浑身是耳朵！大家心生几分恐惧。但是关梦龄待人热情，跟谁都合得来。这也不足消除大家的疑虑，倒是他的生活的特殊习性为人们表明了他的心迹。关梦龄独身一人，小屋总要有一些打牙祭的东西，照他的随和脾气，一定会主动邀人品尝的，可是事实相反，关梦龄从不请工友吃他的食品；关梦龄从不沾燃油，即使抽烟，也只备火柴，不置打火机；打了园林的碗，自己掏钱赔偿……慢慢人们愿意接近他了，谈话也敢向纵深发展了。

“你认为写国民党特务的小说、电影，哪一部写得好？”

“我看《红岩》不错。”

“你在看《燕山夜话》呀，有意思吗？”

“很有学问。”

“你没多大罪吧，若么怎么才判十五年呢。”

“留下我，毛人凤、郑介民都会吃惊。”

“来咱们公园有什么打算？”

“人民公园为人民。”

关梦龄关心两桩婚事成为人们的美谈：一个是喂鹿的工友，他虽然离了婚，但藕断丝连；一个是养花的工友，此人搞对象脸红，见

女人便跑。关梦龄都积极献策，热情奔波。但是当有人向他提出再娶之事时，他谢绝了："我不办了，再办，我就是第三房了，对不起女儿呀。"可以说，关梦龄这个新人很快就被人们所接受了。大家认为：这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人。

但是不愉快的事情时有发生。关梦龄在花卉组，他所从事的劳动是培育美丽的花朵，供游人观赏。每日的活计是到老虎的笼子里清扫老虎饱餐之后的残骨碎肉，用来沤肥浇花；到山上割蒿杆，为硕大的花朵支撑腰身……实质这是务农。这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活动忽一日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了，于是变得不那么简单了。公安派出所提出意见：公园里常有坏人出没，放这样一个人不合适；学大庆经验为工人评功摆好，给不给关梦龄评？争论不一，结论不能评。关梦龄陷入迷惘。其实关梦龄是受过左的教诲的。早在长春看守所，斯大林死，犯人在监舍里不准动，有几个走动的，便被砸上了脚镣；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展交罪运动，管教人员布置人人要写"呈请处死的申请书"；以至大跃进，抚顺一座大楼二十几天竣工，中学生大搞发明创造，而跃进的结果却使战犯尊崇的管教干部大食"瓜菜代"……虽然如此，关梦龄仍不相信他努力争取来的权利如此被践踏。他逢人便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有公民权啊！"愤懑无奈，又说："这不是共产党的政策，我要回监狱里去。"紧接着红色风暴刮起来了，人民公园的花盆扣倒了，金鱼倒湖里了，宫灯砸碎了，汉白玉的台阶拆了；紧接着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了！关梦龄以他的经验觉得不对头，他提出许多疑问：

"对战犯都能宽大，老革命家犯点错误就要打倒，踏上千万只脚？"

"踢开党委闹革命，党的政策也踢开了？"

"打击一大片，势必要遍地设监狱，敌人多了对共产党有利吗？"

因为特赦令是由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的，因此战犯管理所便被冠上了"刘少奇的战犯管理所"的帽子。至此，关梦龄进入了艰难

的岁月，同时也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的时期。

关梦龄之所以该死而不死，与他检举揭发了大量的敌特有直接关系。关梦龄在监禁的15年里写了有近百万字的此类材料。凡我党掀起政治运动，对那些由旧社会过来的人都要进行内查外调。关梦龄为不少人，不止一次地出证。据园林处的一个领导同志反映，“文化大革命”找关梦龄出证的外调人员排着长龙，挨在末尾的人抱怨道：“他还成了‘佛’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得挨着号前去拜见！”关梦龄端坐床板，盘着二郎腿，腿铺纸，手擎笔，唰唰唰，几分钟一份。

“××到底叛变没有？”

“××是我党坚强的同志！”（据说，释放之后，成为公民的关梦龄习惯于把共产党称之为“我党”。）

“不对！”

“怎么不对？你拿这份证言与我从前给他写的证言核对一下，保证一字不差，不信我再写一份。”

“混蛋！历史要在我们手里重写，你要按路线斗争需要写！”

关梦龄明白了，造反派要怎样的材料，以及用这些材料干什么。

早在1948年，关梦龄在吉林看守所时，问过一位犯错误的干部：“要想改造好，从哪儿下手？”这位干部告诉他：“你本身最重要的就是老实做人。”在此后漫长的改造历程中，他记住了这句话，他在写材料时，“我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对他们要实事求是，忠诚老实，在材料上，罪恶绝对不夸大，不缩小，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所以我的材料拿出去，他们都相信。”痛苦的监禁，深刻的反省，已使一个杀人的刽子手脱胎成为一个老实的公民，而“无产阶级革命派”为路线斗争需要，要他已复苏的良心再度泯灭！关梦龄不干了，他拒不改口！据在场的工友反映，造反派跟他拍桌子，他也拍桌子！

我十分欣赏关梦龄这一击，这是共产党政策的巨大成功啊。

这使我想起关梦龄遗稿中的一段，他为我改造政策所感动，写道："旧话'重恩不言报'，只有竭力报答，永世记在心头。告诉我的后人，重恩报不了也要报，做多少是多少。"这响亮的一击不就是最好的报答吗？

好呵，关梦龄有良心！

据我所知园林处的组织与群众还是讲政策的。早在"文化大革命"前，他们就如何对待关梦龄，多次请教战犯管理所和有关部门，从而把他与其他"四类"区别开来，没有给他更多的难堪。即或"文化大革命"，对他也高抬贵手，在为"各类人员"关门办班的时候，关梦龄还委以重任，叫他担任学习组长，并协助专政人员管理总务。其大胆启用人才实为全国所罕见。然而这一抬举无形中把他推进了灾难的漩涡，当革命深入发展进入清理阶级队伍时，那些关进牛棚的，以及没有关进牛棚的根正苗红的人对重用关梦龄的"革命群众组织"进行了猛烈地攻击，罪名是敌我不分，重用战犯。被攻击的一方无言以对，于是关梦龄被所有的人抛弃了，只有女儿的照片陪伴着他；只有取证来的"革命派"与他对话。他学会了打发时光：一顿晚餐他搞得相当复杂，工友告诉我："他经常包饺子，丝毫不怕麻烦。"

他热衷测字。1968 年冬，他翻阅"红宝书"，第一眼看见的是一个"屏"字，"屏"乃"尸"、"并"组合，人死之躯曰尸，"并'可作"合"解，合于那些作了革命者的行列？还是进人十八层地狱，去会合他那些挨了枪子儿的同僚？自己是当死的，但是人民政府不叫他死。"我深刻地认识了共产党人的宽宏大量，有改造人类的伟大抱负……我感谢共产党对我的再造之恩。"身处水火的关梦龄想到了死，而没有马上死。

关梦龄祖籍新宾县，属抚顺市辖区，这里有他不少亲朋故友，但是那年月无人登门叙旧，无人与之交杯畅饮。忽一日，一故友请他！孤寂中的关梦龄欣然受命，去了。此人恰是本园一个年轻工友的亲娘舅。这位故友没有料到这顿不算丰盛的晚餐，竟为关梦龄去

另一个世界饯行了。

1969年春，抚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挖出了一个“地下黑俱乐部”，罪状是聚众听“黄色歌曲”和篡改“革命样板戏”的唱词儿。首犯是本园的一个年轻工友，此人恰恰是宴请关梦龄的那位故友的外甥！于是阶级阵线在这里明朗起来，国民党战犯是这个“地下黑俱乐部”的黑后台。体育馆召开斗争大会，关梦龄被责令陪绑。

关梦龄这个人有个毛病，死要面子，即使在囚禁中，也不肯接受诸如戴脚镣这种处罚。如今关梦龄不是战犯了，他是一个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竟让他作为“黑线人物”在“红色海洋”里亮相！关梦龄的精神崩溃了。

有个工友对我说，斗争会后他和几个人被押到机关讨论“受教育”的体会，在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段语录时，他把“忘记”二字忘掉了，读作了“千万不要阶级斗争”，一时间，他和全场的红色的、黑色的人物都哑然了。采访中有的人不记得这个细节。也许不知道的人没参加这个小会？我知道早在狱中关梦龄便能背下来重要文件与文字，例如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我把全文背诵下来，作为学习引用，对人也好卖弄。”记忆力如此惊人，竟会把八个字的语录漏掉俩！我不很相信，且那时为这段语录漏掉这两个字的罪例太多，而觉得有编织之嫌。但无论怎么说，这个会使他神情恍惚了。第二天，人们便在公园的湖里捞到了他的尸体。具体是哪一天已无据可查了，有人回忆是5月28日，因为这天开工资，他没有来领。领工资的日子人们记得清楚。

他死的决心很大，脚捆着石头，手抓着烂泥。他留有遗嘱，其内容据阅视者回忆：存折有五百元钱，欠工友×××、×××多少多少，要还人家；东西，谁愿意要谁拿去；此外还有一段话：我所能提供的材料已经尽了，我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对得起我党。

死时，他的口袋里装着女儿的相片。

后事是他的姐姐从北京赶来料理的。

该死的时候，我们没有叫他死；不该死的时候，他自己死了。对于他的死，我们是应该进行思索的。

好在共产党人自己拨乱反正了，用党的决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好在有许多的共产党人和无数的群众对关梦龄有客观的评价，赞扬了他人生的最后时日；

好在他有一个好女儿，她在拨乱反正之初就致函抚顺园林处寻找父亲；又去徐州公证处，办理恢复关梦龄女儿的身份。现在关梦龄女儿的女儿也有了女儿。每逢佳节，女儿都要在家祭上将平安幸福告慰天国里的父亲。

关梦龄，你可以安息了。

李占恒

1998年1月10日于沈阳药王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黑皮自白
作者＝
页数＝３３５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前言
第一章　败兵之将
生日，灯罩炸了
缴枪，掉下了眼泪
一个人在院中徘徊
平安胡同新新旅馆
“找人”
要老实做人
第二章　该杀当死
被服线与纸条儿
少一个负担，多一个顾虑
锒铛脚镣
电影“顾问”
尝到了犯人的滋味儿
采纳了我的建议
戴笠二三事
血债血还，杀人偿命
写材料，一个接一个
我一定争取
伊通小住
顽固者
第三章　网开一面
大逮捕
大镇压
敬服
还有什么希望呢？
第四章　樊篱偷生
急于判刑
降到黄牌，降到蓝牌
又戴镣铐
３５项缺点
第五章　目的不明
洗掉背上的大字
看了许多实在的东西
想入非非
沈阳寄押
第六章　感恩戴德
帝封官在这里集合
自找麻烦
像在朋友家中做客
“战犯”帽子有点大

金木水火土
不是事先布置的
谢罪
无颜见长春父老
第七章　监门微启
越来越紧
交罪种种
人人呈请处死
大家所关心的
帝封官同堂谈罪
是非是能够分辨的
才放１０个
第八章　犹有竟时
黄金时代
小关师傅
“混蛋”这两个字重了
谁吃豆腐？谁吃豆腐渣？
穷欢乐
欣慰
病的包袱
第三个特赦令
后记
附录页